

内容简介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是一部立足于当代中国多民族语言生态与国家治理需求，聚焦蒙古语—汉语之间功能性文本翻译的系统性学术著作。本书以应用翻译学理论为指导框架，选取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这两大具有高度社会功能性和意识形态属性的文本类型作为研究对象，深入探讨蒙汉翻译在实践操作、策略选择、功能实现及人才培养等方面的内在规律与现实挑战。

全书结构严谨，逻辑清晰，由理论奠基、语料分析、策略归纳到教学建议层层推进。作者首先厘清政务与新闻文本的核心功能——包括信息告知、政策宣导、舆论引导与话语建构等，并指出其语言特征（如庄重性、程式化、时效性与客观性）对翻译提出的特殊要求。在此基础上，依托自建的蒙汉平行语料库，从词汇、句法到语篇三个层面展开微观对比分析，结合典型案例，细致剖析译者在处理术语统一、文化负载词、句式转换及语用功能对等问题时的具体策略与效果。研究不仅关注“如何译”，更追问“为何如此译”，深入揭示意识形态、制度语境、职业规范与译者主体性等因素对翻译决策的深层影响。

尤为可贵的是，本书并未止步于学术探讨，而是积极回应现实需求。作者针对当前高校蒙汉翻译教学中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课程内容陈旧、技术应用滞后等问题，提出以社会需求为导向的教学改革路径：增设政务翻译、新闻编译、双语写作等专业模块；强化校地合作，建立政府外事、新闻媒体等实习基地；推动计算机辅助翻译、译后编辑与本地化技术融入课堂；并倡议建设开放共享的蒙汉政务新闻平行语料库，为教学与研究提供基础设施支撑。同时，著作强调跨文化素养与职业道德在翻译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主张培养兼具语言能力、专业知识、技术素养与文化敏感性的复合型翻译人才。

尽管本研究在样本代表性（时间跨度有限、地域覆盖集中）、理论深度（如译者认知机制、读者接受效果的实证不足）等方面存在局限，但其以应用翻译学视角切入蒙汉非文学翻译的尝试，不仅拓展了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研究的理论边界，也为提升民族地区公共信息传播效能、服务国家语言能力建设提供了切实可行的学术参考与实践指南。

作者简介



克西克达拉 · 加拉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大学美术教育专业。少数民族语文翻译中级。现就职于新疆广播电视台，担任广播新闻中心蒙古语播音主持与记者翻译岗位。采写了大量优秀新闻作品，系列报道《文明家庭的风采录》荣获 2016 年度新疆新闻奖一等奖；消息《美丽乡村建设成为农牧民致富金钥匙》荣获 2017 年度新疆新闻奖一等奖；消息《绿色铺就幸福路》荣获 2023 年度新疆新闻奖一等奖；消息《一马当先的“牧马人”》荣获 2023 年度新疆新闻奖二等奖 新闻专题《追逐梦想，医路无尽》荣获 2023 年度新疆新闻奖三等奖；新闻专题《唱响文化润疆的最美和声》荣获 2024 年度新疆新闻奖三等奖。

Mongol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News Texts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 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克西克达拉·加拉 著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Mongol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News Texts

克西克达拉·加拉 著



PRICE: \$25.00



**Mongol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News Texts**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
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克西克达拉·加拉 著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CIP INFORMATION

Title: Mongol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News Texts

题目：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Author: Jiala Kexikedala

作者：克西克达拉·加拉

ISBN: 979-8-90040-010-5

Publisher: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Price: \$25.00

定价：25 美金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Mongolian-Chinese Translation Stud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pplied

Translation: Focusing on Government and News Texts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Address: 100 N Howard St Ste R, Spokane, Wa, 99201. United States

Tel: +888-754-5177

Email: contact@cypedia.net

Format: 170mmx240mm 1/16 Sheets: 15.25

Word Counts: 200.000

Edition: First edition in December 2025

Printing: First printing in December 2025

**CYPEDIA INTERNATIONAL UN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CHOLARS**

非开放获取·电子版请联络出版社购买·版权归出版社所有·侵权必究

Not Open Access. For the electronic version, please contact the publisher for purchase. The copyright belongs to the publisher.
Infringement will be prosecuted.



在全球化与信息化深度交织的 21 世纪，翻译早已超越传统语言转换的工具性角色，日益成为国家治理能力、文化传播效能与社会协同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多民族统一国家的现实语境中，少数民族语言与国家通用语言之间的互译工作，不仅关乎信息公平、公共服务均等化和语言权利保障，更承载着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民族团结进步、维护边疆稳定的重大政治与社会使命。蒙古语作为我国使用人口较多、文字体系完整、文化积淀深厚的少数民族语言之一，在内蒙古自治区及周边蒙古族聚居区具有广泛的官方与社会功能。因此，高质量的蒙汉互译，尤其是在政务发布、新闻传播等公共领域，直接关系到政策意图的准确传达、政府公信力的有效建立以及主流话语在多元文化语境中的接受度与影响力。

然而，长期以来，蒙汉翻译研究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一方面，大量成果集中于文学文本、宗教典籍或基础语法对比，强调审美再现或语言本体差异；另一方面，对具有高度功能性、时效性和制度依赖性的应用型文本——如政府公文、法律法规、新闻发布、政策解读等——缺乏系统性、理论化的探讨。这种“重文学、轻应用”的倾向，导致翻译理论与行业实践严重脱节，高校人才培养难以满足政府机关、主流媒体、外事部门等对专业化、职业化蒙汉翻译人才的迫切需求。同时，在实际翻译操作中，术语不统一、文化负载词处理失当、句式冗长累赘、文体风格错位等问题频发，不仅影响信息传递效率，甚至可能引发政策误读或舆论偏差。

正是在这一现实困境与学术空白的双重驱动下，本书以“应用翻译学”为理论视阈，聚焦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这两大典型的功能性语类，试图构建一个兼具理论深度与实践导向的蒙汉翻译研究新范式。应用翻译学强调翻译的“目的性”（Skopos）、“功能性”与“用户中心”原则，主张翻译活动应服务于特定的社会交际目标与受众需求。这一视角尤为契合政务与新闻文本的本质属性——它们并非供人鉴赏的文学作品，而是社会治理与公共沟通

的实践工具。政务文本的核心在于权威性、规范性与指令性，其翻译必须确保法律术语的精确对应、行政程序的清晰表述以及政策语气的恰当传递；新闻文本则强调时效性、客观性与可读性，其翻译需在有限时间内准确转述事实，同时兼顾目标读者的文化认知习惯与情感接受方式。二者的成功翻译，不仅要求语言能力，更要求译者具备政治敏感性、制度理解力、跨文化素养与职业伦理意识。

本书的研究路径体现为“理论奠基—语料实证—策略归纳—教学反哺”的闭环逻辑。在理论层面，整合功能目的论、话语分析、跨文化传播理论与社会翻译学等多元框架，构建适用于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分析模型；在方法层面，突破传统印象式点评，依托自建的蒙汉平行语料库，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方式，从词汇选择（如文化负载词、政治术语）、句法重构（如长句切分、被动转主动）、语篇组织（如信息焦点调整、衔接手段转换）等微观维度展开细致对比，并结合典型案例深入剖析译者决策背后的意识形态、制度约束与专业判断；在实践层面，则紧密对接行业需求，不仅系统提炼出“删减冗余”“精炼句式”“避免过度修饰”“音译加注”“功能对等变通”等可操作的翻译策略，更前瞻性地提出课程体系改革、校地协同育人、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应用、蒙汉政务新闻术语库与平行语料库共建等系统性建议，力图弥合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与行业应用之间的鸿沟。

当然，任何学术探索皆有其局限。本书所用语料主要来源于近十年中央及地方官方发布的双语文本，虽能反映当前主流实践，但在历史演变维度、方言区域差异以及非官方媒体语料覆盖方面尚显不足；对译者认知过程、读者接受效果等动态环节的实证考察亦有待深化。此外，人工智能与大语言模型对翻译生态的重塑，也为未来研究提出了新的课题。尽管如此，我们坚信，唯有扎根中国大地、回应时代之问、服务社会之需，翻译研究才能真正彰显其学术价值与实践意义。本书愿以此抛砖引玉，激发更多学者关注少数民族语言翻译的应用转向，共同推动蒙汉翻译事业迈向专业化、规范化、智能化的新阶段。

限于作者水平，书中难免存在疏漏及不妥之处，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

C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应用翻译学与蒙汉翻译研究导论	1
第一节 应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1
第二节 蒙汉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7
第三节 政务与新闻文本的翻译特点	12
第四节 研究方法与结构安排	18
第二章 政务文本翻译的理论基础	27
第一节 政务文本的功能与分类	27
第二节 蒙汉语言对比分析	32
第三节 翻译策略与原则	38
第四节 文化适应性处理	45
第三章 新闻文本翻译的理论探讨	53
第一节 新闻文本的语言特征	53
第二节 信息传递与准确性	59
第三节 文体风格转换	65
第四节 受众接受度分析	70
第四章 蒙汉政务文本翻译实践分析	77
第一节 政策文件翻译案例	77
第二节 公告通知翻译技巧	84
第三节 术语统一与规范化	94
第四节 翻译质量提升：错误分析与改进策略	97
第五章 蒙汉新闻文本翻译实践研究	101
第一节 新闻报道翻译实例	101
第二节 标题与导语处理	107

第三节 时效性与语言简洁性	113
第四节 跨文化传播效果	119
第六章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处理	127
第一节 蒙汉文化差异比较	127
第二节 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	133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	139
第四节 案例分析与对策	144
第七章 翻译质量评估体系构建	151
第一节 评估标准与指标	151
第二节 错误分类与权重	157
第三节 专家评审与读者反馈	163
第四节 应用实例验证	169
第八章 技术工具在翻译中的应用	175
第一节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175
第二节 语料库建设与使用	181
第三节 机器翻译与人工校对	186
第四节 效率与质量的平衡	192
第九章 翻译人才培养与教学实践	199
第一节 能力要求与课程设计	199
第二节 教材编写与资源开发	205
第三节 实训项目与案例分析	211
第四节 评估与反馈机制	215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221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221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224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不足	229
第四节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232
参考文献	237

第一章 应用翻译学与蒙汉翻译研究导论

本章主要从应用翻译学的角度出发,对应用翻译学的核心理论进行系统的阐述,为后面章节中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实践及策略分析指明方向。

第一节 应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

本节系统地整理出应用翻译学的核心理论体系,从学科特征、研究方法等角度进行剖析,目的在于给具体的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翻译实践提供一套清晰、有效、可操作的理论指导。

一、应用翻译学的定义与学科定位

弄清楚应用翻译学的内涵和外延,是进行所有相关研究的前提。该部分对核心概念做出进一步分析,在翻译学科谱系中确定它的位置,阐释它所具有的学术价值与时代意义。

(一) 应用翻译学与纯理论翻译学的关系

应用翻译学与纯理论翻译学不是彼此对立的,而是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共生关系。纯理论翻译学主要研究翻译的本体论问题,即翻译是什么,努力构建出通用的理论模型和解释框架。其研究成果给应用翻译学提供了一个基本的概念工具以及分析的视角。而与之相反的是应用翻译学,它更加关注于“如何进行翻译”,主要研究现实生活中某个场域、某种类型的文本翻译难题,其研究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翻译工作的效率和译者水平。

两者之间存在动态的、相互影响的关系。纯理论给翻译实践指明方向、提供评判标准,避免实践的盲目性;而应用翻译学在处理大量的复杂的翻译任务中产生的新的问题、新的挑战又反过来推动对纯理论的反思、修正和发展,使它更具有解释力和生命力。可以认为,应用翻译学是检验、丰富和发展翻译理论的实践场所和实验基地,二者一起构成了翻译学科完整版图,使整个学科不断向前发展。

因此，研究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必须把两者有机结合起来，用理论指导实践，用实践回馈理论。

（二）应用翻译学的跨学科属性

应用翻译学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其固有的跨学科性。翻译活动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跨语言、跨文化的交际行为，因此它与生俱来就和其他学科领域联系在一起。解决具体翻译问题的时候，应用翻译学常常要从别的学科获取理论上的滋养和研究方法，这就使得它成为一个开放而包容的学术领域。语言学，尤其是语用学、社会语言学、话语分析为源语文本的细密剖析、目标语文本的有效搭建赋予了微观层面的尖锐手段。

社会学、文化研究的介入，把翻译研究的视野从文本内部解放出来，翻译被看作一种社会行为，重视译者、委托人、读者等多元社会角色，重视权力、意识形态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翻译过程和结果的影响。而传学却给翻译的交际目的和效果提供着重要的理论模型。对于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主的蒙汉翻译研究来说，跨学科性体现得更加明显。

一名合格的译员除了要有出色的语言能力外，还要对政治学、公共管理学、新闻学、国际关系学等各方面的知识有所涉猎。译者对于原文深层意涵的准确把握，对于译文功能的合理定位，都离不开译者对这一领域知识的积累，这也直接决定了翻译是否能够准确地传递信息，是否能够达成预期的社会功能。这种跨学科的本质，就要求研究者必须采取一种综合的研究范式，才能从容面对蒙汉应用文本翻译带来的复杂挑战。

（三）应用翻译学的研究范畴与目标

应用翻译学的研究领域十分广泛，基本上包括了所有与翻译实践直接有关的领域。它研究的是翻译的全过程和各层次，从译前准备到译后评估，从宏观的翻译政策制定到微观的术语管理，都在其研究范围之内。主要支系有翻译教学、译员培训、翻译批评、翻译辅助工具开发与应用、特定领域（法律、医学、科技、财经、政务）的翻译规范研究等。

本研究集中于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翻译，就是应用翻译学中“特定领域翻译研究”的一个分支。应用翻译学的最终目的是为社会服务，解决问题。它不把建立一个宏大的理论体系当作主要任务，而是努力提出能够实际操作的办法来提高翻译工作的质量和效率。其具体目标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1. 优化翻译流程与质量控制体系，为翻译机构和个人译者提供科学的工作方法论。
2. 构建面向不同领域和需求的译员能力模型，为翻译人才的培养与职业发展提供明确指引。
3. 推动翻译技术与现代语言服务的深度融合，提升整个翻译行业的生产力水平。
4. 就蒙汉政务信息传递、新闻报道等具体的翻译活动给出相应的翻译策略和规范性建议，保证翻译产出的社会交际效果。

二、功能目的论及其在应用翻译中的指导作用

功能目的论属于应用翻译学领域里的一个理论基础，给翻译工作指明了根本方向。其核心原则对于以实现特定交际功能为首要目标的蒙汉翻译活动来说，是无法取代的。

（一）目的法则的核心要义

功能目的论的核心思想凝聚在目的法则里。该法则明确地指出，所有的翻译活动都是由它的预设目的来引导的。译文要实现的功能，即译文在目标语境中为达到目标受众所期望的效果，是决定整个翻译过程的最高准则。也就是说，翻译采取什么策略和方法，决定因素不是源语文本的语言特点和所谓的文学价值，而是译文所要完成的任务委托方为译文设定的具体用途。

根据这一法则，源语文本不再是不可侵犯的圣旨，而是译者在目标文化环境里进行文本再生产的时候可以利用的信息源。译者的角色也由原来的被动语言转换者变成主动积极、敢于负责的跨文化交际专家。他必须对翻译任务的需求做出深入的分析，明确翻译出来的文本的读者是谁，他们希望从翻译的文本中获得什么样的信息，以及翻译出来的文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被使用。

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的实践中目的法则的指导意义更加突出。例如，一份蒙古语政府工作报告，如果翻译的目的是向国内其他民族干部群众通报工作，那么翻译的重点就是保证信息的准确和完整；而如果将其翻译成汉语摘要，用作对外宣传材料，此时翻译的目的就变成了展示良好的形象，这时就需要译者在忠实于核心信息的前提下，对语言风格、信息结构做出更灵活的调整，使之更符合外部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接受期待。

（二）连贯法则与忠实法则的辩证关系

在目的法则的统领之下，功能目的论还有两个重要的次级法则，即连贯法则和忠实法则。连贯法则是译文要有内部的通贯，即译文的文本结构、语言表达要合乎目标语的规范，可以被目标读者自然地理解和接受。一篇不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读起来拗口晦涩的译文，即使在字面上做到了对原文的忠实对应，也无法达到交际的目的，因此是一种失败的翻译。这就意味着，蒙汉新闻翻译时，译文要读起来像一篇地道的汉语新闻报道，而不是一篇带有“翻译腔”的生硬文字。

忠实法则要求译文与原文之间要有一定的联系，也就是所谓的语际连贯。它要求译文要忠实于原作的信息，但是这种忠实不是对原文语言形式的机械模仿，而是功能意义上的、动态的忠实。而且，忠实的具体内涵和程度，同样要受到最高准则“目的法则”的限制。如果翻译的目的要求译文与原文具有相同的功能，译者就会努力使译文在内容和风格上接近原文；相反，如果目的要求译文具有不同于原文的新功能，译者就有权对原文进行必要的删减、改写或者重组。一般认为连贯法则优先于忠实法则，但是二者最终都是为了目的法则服务的。辩证关系把译者从传统的“忠实”的道德枷锁中解放出来，给译者更大的自主性、灵活性，创造出在目标语境中功能更高效译本。

（三）翻译行为理论的实践价值

德国功能学派的重要理论组成部分之一，翻译行为理论把翻译活动放在社会互动的大框架中加以考察，使应用翻译研究的视野更加开阔。该理论把翻译当作一种有目的的人类互动活动，把译者看作是其中的重要参与者。译者的核心任务，就是为翻译的发起人创造出一个可以成功跨越文化障碍、在目标情境中发挥作用的“信息载体”。

该理论具有的实践价值就是使译者的目光不局限于源语文本本身，而是去系统地分析构成翻译行为链条的所有参与者及相关的各种因素。即委托方真实的意图、源文的作者身份背景、译文预期读者所具有的知识水平以及预期期待、译文将要被使用的场合和媒介等。在这个理论的视角下，译者就像项目经理一样，要把所有变量算得清清楚楚，然后做出最好的翻译决定。

在处理复杂的蒙汉政务以及新闻翻译的时候，其意义愈加凸显出来。以翻译一份地方性法规的蒙古语版本为例，译者在进行法律条文之间的精准对译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这份法规在蒙古族群众中宣传普及的实际效果。他也许会加上一些

必要的注释，也许会用更通俗的语言去解释那些复杂的法律概念，也许会重新调整一下版面的布局，以保证信息能够被目标读者所接收、所理解。翻译行为理论给译者赋予了专家的地位，认为译者应该是可以全方位解决跨文化交际问题的专家，这对提高蒙汉翻译工作专业化水平有重大意义。

三、其他相关理论的综合借鉴

应用翻译学的发展，因为其开放包容的理论胸怀。借鉴各种理论资源，能给蒙汉政务、新闻等应用文本翻译研究提供更加丰富立体的分析工具和解决途径。相关理论的要点如表所示。

德国功能派及相关理论要点表

理论名称	代表人物	核心观点	在蒙汉翻译中的应用启示
文本类型学	凯瑟琳娜·赖斯	根据文本功能（信息、表情、操作）决定翻译策略。	将政务、新闻文本归为信息型，翻译首要目标是准确传递事实。
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	克里斯蒂安·诺德	翻译前需系统分析文本内外因素（如作者意图、读者、媒介等）。	为处理敏感、复杂的蒙汉政务新闻文本提供了系统化、规范化的操作流程。
交际翻译理论	彼得·纽马克	区分“语义翻译”（重原文形式）与“交际翻译”（重读者效果）。	蒙汉政务新闻翻译应侧重交际翻译，追求信息在汉语读者中的等效传达。
描述性翻译研究	吉迪恩·图里等	客观描述翻译现象，发现制约翻译行为的“规范”。	通过考察蒙汉翻译实践，发现潜在的翻译模式与规范，为改进实践提供实证依据。

（一）德国功能派理论的整体观照

目的论、翻译行为理论以及德国功能派理论是本研究理论核心所在，在全面审视德国功能派理论之后，可以形成一个更为全面的应用翻译分析框架。当中凯瑟琳娜·赖斯的文本类型学理论可谓奠基之作。她把文本分成信息型、表情型和操作型这三类，认为不同的文本要采取相对应的翻译策略。政务和新闻文本本质上属于信息性文本，政务新闻文本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准确无误地传递事实信息。赖斯的理论给我们从宏观上把握这两类文本的翻译原则，提供了清晰的参照系。

克里斯蒂安·诺德提出翻译导向的文本分析，给功能理论赋予了具体的途径。该模型认为，在翻译开始之前，必须对源文本以及翻译任务说明做系统的分析，全面整理出文本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因素，比如作者的意图、读者的对象、交际的

媒介、文本的功能等。经过仔细分析源语语境与目标语语境的不同，译者便可以准确地找到翻译工作中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在此基础上，再根据问题的性质来选择一条条理分明、理由充分的翻译方案。这一详尽的分析模式可以减少翻译过程中主观随意性，保证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严谨性和规范性，对处理信息量大、文本繁杂、敏感性高的材料有极高的实用性。

（二）交际翻译理论的启示

彼得·纽马克提出的交际翻译理论为应用翻译研究又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他在《翻译问题探索》一书中提出的语义翻译和交际翻译的二元划分，对学术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语义翻译重在准确再现原文作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力求接近原文；交际翻译则更加注重在目标读者身上产生与源文读者相同的效果，把译文的交际功能和可读性放在首位。

对于大多数蒙汉政务、新闻文本来说，其根本目的仍然是有效的信息传递、顺畅的交流，而不是文学欣赏或语言学分析。因此，交际翻译的理念对于处理这样的文本来说是天然适用的。译者最需要考虑的是怎样用最地道、最自然的汉语，把蒙古语原文所承载的中心信息和意图传达给汉语读者群，以达到“等效”的交际效果。该理念与功能目的论所强调的译文在目标语境中发挥的作用是一致的。虽然理论起点与德国功能派有所不同，但是交际翻译理论也把读者的反应以及交际的效果放在了中心位置，给译者在处理文化、语言习惯等方面的差异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

（三）描述性翻译研究的应用视角

描述性翻译研究属于翻译学的一个分支，它并不直接涉及指导翻译实践，而是把客观描述并系统阐释翻译现象当作自己的主要任务。注重于对现实翻译行为实际做了什么分析，通过大量的文本翻译、文化环境研究来找出普遍规律以及影响翻译决策的因素。虽然它的性质是描述性的而不是规定的，但是它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对应用翻译学有重要的借鉴作用。

采用描述性研究的方法，可以对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的历史和现状做系统的梳理和考察，分析不同时期、不同机构所译的译本具有怎样的共性与差异。这样的分析有利于发现蒙汉翻译实践里长时间存在的，不容易被察觉到的制约因素，比如在术语选用、句式构造、信息组织等层面所形成的一种共同倾向或者模式。

深入认识这些规范有明显的现实意义。一方面可以解释目前译本为何具有这

样的面貌,另一方面也可以反思一些僵化、固化的翻译模式是否阻碍了信息的传播。这样一来,根据实证描写与分析而提出的翻译实践改进建议,就能给翻译教学和译员培训赋予一些鲜活的案例和可靠的参照,这些案例和参照来源于真实的语料。描述性研究给应用翻译学打下了深厚的实践基础,使应用翻译学所提策略不是空中楼阁,而是生长在翻译实践的沃土上。

第二节 蒙汉翻译的历史与现状

蒙汉翻译作为沟通蒙汉两种民族文化、信息的纽带,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都起到不可替代的作用。从古代零星翻译到今天全面繁荣的发展,其发展历程很好地反映出蒙汉民族关系的变化与具体时代的要求。如今蒙汉翻译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活跃、复杂,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一、蒙汉翻译的历史沿革

蒙汉翻译史,就是一部民族交往史、文化碰撞史、政治互动史。它开始是为政治统治、军事需要而进行的官方行为,后来慢慢渗透到文化、经济等领域,走过了一条由无到有、由自发到自觉、由初步尝试到体系化的发展之路,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巩固起到了重要的语言支撑作用。

(一) 古代蒙汉翻译的萌芽与发展

蒙汉翻译实践在两大民族初度接触的时候便已开始,到了元代达到了第一个高潮。蒙古帝国建立以后,为了对广大的汉族地区进行有效的统治,设置了会同馆之类的专门机构,负责翻译蒙古语诏令、法律文书和官方往来文件。本时期的翻译活动主要为了达到政治军事目的,保证政令畅通、国家有效治理。例如元朝把大量汉文典籍译成蒙古文,目的是把汉族主流思想、治国方略灌输给蒙古贵族,以巩固其统治地位。

宗教文献的翻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伴随着藏传佛教的普及,大量的佛经或汉文、或藏文翻译成了蒙古文,使得蒙古族的精神世界及文化形态都受到了很大影响。反之亦然,一些蒙古族的史诗和文学作品也被介绍到中原。虽然古代的翻译活动在规模和系统性上不能和后世相比,但是它开启了蒙汉两大语言文化体系对话的先河,为后来的深入交流与融合打下了基础。

（二）近现代蒙汉翻译的规范化进程

近代，由于西学东渐和内因社会变迁双重作用的影响，蒙汉翻译开始进入新的发展时期。晚清至民国时期，面对内忧外患，清政府以及后来的民国政府开始重视边疆民族地区的教育与文化。内蒙古地区新式学堂的建立使蒙汉双语教材的需求急剧增大，而翻译的内容也不再局限于传统的儒家经典著作中，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方面也出现了新的题材。此时的翻译活动已经不再只是传统的文史哲典籍的翻译，而是把重心放在了现代科学知识和新思想的介绍上。

众多的知识分子和教育家投入到蒙汉翻译事业中，他们不但是翻译大量国外和日本著作的主体，而且也开始研究翻译的理论和方法。新术语的创造成了这个时期的主要问题。面对国外涌现出的许多新概念，翻译家们在为蒙古语创制相应的词语过程中虽然遇到许多困难，但是却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代蒙古语的表达能力。同时开始编纂同时蒙汉词典，为翻译的规范、标准化提供条件。

近现代是蒙汉翻译由传统走向现代的过渡时期。翻译目的从原来单一的政治目的转变为更广义的文化启蒙、知识传播。翻译工作者不断进行自觉探索，促使蒙汉翻译逐渐向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向迈进，为新中国成立以后翻译事业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三）新中国成立后蒙汉翻译的繁荣

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蒙汉翻译事业进入空前发展时期。国家重视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发展与使用，将其当作保障民族平等权利、增进民族团结、促进民族地区发展的重要部分。因此国家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创建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民族翻译体系，其中包括民族出版社、民族翻译局、各新闻单位的蒙语编译组等机构，培养出一大批专业的翻译人员。

这一时期翻译成果之丰富，规模之大，是以往任何历史时期所望尘莫及的。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家领导人著作、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被系统地翻译成蒙古文，保证政令在内蒙古地区及时传达。同时为了满足蒙古族群众在教育、文化等各方面的需要，大量的汉文教科书、文学名著、科普读物和影视作品被翻译成蒙古文，极大地丰富了蒙古族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了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养。

蒙汉翻译的历史发展脉络清晰，其在不同时期的特点可由下表概括。

蒙汉翻译历史发展阶段特点简表

时期	主要目的	翻译内容	特点与影响
古代 (元代高峰期)	政治统治、军事需要	诏令、法律文书、儒家经典、佛教典籍	官方主导，单向性较强，开启了系统性翻译的先河，促进了高层统治集团的文化融合。
近现代 (晚清至民国)	文化启蒙、知识传播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国外著作、新式教材	翻译领域拓宽，开始注重术语创制和标准化，为现代蒙古语的发展注入活力。
新中国成立后	贯彻民族政策、文化普及	政策法规、领袖著作、教科书、文艺作品	规模空前，体系化、组织化程度高，全面服务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项事业。

二、当代蒙汉翻译的现状分析

进入新世纪之后，在全球化、信息化以及市场经济不断发展的情况之下，蒙汉翻译的外在环境及其内在生态也都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其功能不再只是单纯的政宣和文化普及，而是多向度、多层次的发展态生。社会需求扩展、行业标准挑战、市场和政策双重影响一起构成了当代蒙汉翻译现状。

（一）翻译数量与领域的扩展

伴随着中国同蒙古国交流的日益密切以及国内区域经济的协同发展，蒙汉翻译的需求量激增。互联网的普及打下了信息传播壁垒，大量的网络信息、社交媒体的信息产出会存在即时和非即时的翻译需求。传统的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虽然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其比重正在被其他新兴领域所稀释。

翻译领域前所未有地得到扩展。经济领域对商业合同、产品说明书、市场报告等翻译的需求不断增加，在法律方面，随着法治建设，司法文书、法律条文的翻译标准也越来越高。文化旅游、影视娱乐、医疗卫生、科技信息等各方面的翻译业务也如火如荼地开展。领域扩展之后，对翻译人才的专业背景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单靠语言技能已经不能胜任，复合型翻译人才正在成为新的市场宠儿。

数量和领域双重的扩充既表现出蒙汉翻译事业的旺盛活力，又给翻译资源的配置以及人才的培养造成了新的问题。怎样去适应这种多元的需求，给予高水平、专业化翻译服务，就成了当下蒙汉翻译界所碰到的重大任务。

（二）翻译质量与标准化的挑战

翻译数量和领域的迅速扩大，无法避免地引起人们对于翻译质量的担忧。目

前蒙汉翻译质量参差不齐，标准化建设落后于实践发展，正成为行业发展的瓶颈。

1. 缺少统一风格和评价标准。除政务、新闻等传统领域的翻译还没有统一的标准可以遵循。不同的翻译机构或者译者各自为政，造成同一类文本在术语、句式、语言风格等方面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从而影响了信息的准确传递。

2. 质量监督体系的缺失，除少部分官方机构内部设有较为严格的质量控制程序之外，大部分市场化运作的翻译项目都没有健全的质量监督体系。客户是质量的最终评判者，但并不是所有的客户都能分辨译文的好坏，这就给低水平的翻译留有生存的空间，甚至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

3. 技术应用是一把双刃剑。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应用虽然可以提高翻译的效率，但是也产生了新的问题。有些译者对机器翻译过分依赖，没有及时用人工去审校润色，造成译文生硬、错漏很多。对于蕴含着深厚文化内涵、语境复杂的文本来说，这个问题就显得尤为突出。

（三）市场驱动与政策引导的双重作用

当下蒙汉翻译的发展，是由市场和政策两个因素共同推动的。二者互相缠绕，一起作用于翻译行业的发展走向。市场化大潮正在改变着翻译服务的供求关系。随着中国同蒙古国经贸往来不断加深、国内跨文化交流日益频繁，商业翻译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企业、个人以及各种机构都是翻译服务的主要消费者，价格、效率和专业性成了市场竞争的主要要素。市场驱动力使翻译服务商品化、产业化，产生了很多商业翻译公司，给行业注入了活力。

另外政策引导依然起“压舱石”的作用。国家为了维护民族团结、促进信息公平、保障少数民族语言权利而采取的战略措施，设立专项资金、支持重大翻译工程、在公共服务领域强制配备翻译等方式来保证政务、法律、教育等基础领域翻译需求的满足。这些政策性项目保证了翻译的公益性质，也给翻译人才的培育和翻译理论的研究赋予了稳定的支撑。市场讲求效益，政策讲究公平和规范，二者之间你来我往、相互影响又彼此配合的情况，正是当下蒙汉翻译健康发展的一大根基。

三、当前蒙汉翻译面临的主要问题

当代蒙汉翻译虽然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繁荣的表象之下，仍然存在着阻碍其向更高层次迈进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牵涉到人才培养、理论创建以及基础设

施等诸多方面,倘若不加以重视并予以解决,就会给蒙汉翻译的总体水平和长久发展带来危险。

(一) 高端翻译人才匮乏

蒙汉翻译领域最突出的症结之一就是高端人才的严重缺乏。尽管有大批的蒙古语专业毕业生,但是能胜任高难度、高水平的专业性翻译工作的人才很少。人才缺乏主要表现为缺少某一领域的专家型翻译人才,金融、法律、信息技术、生物医药等专业壁垒较高的行业里,既懂双语又懂领域知识的复合型人才极度缺乏。

同声传译和高级别的会议口译人才非常缺乏。随着高层级的对外交流和国际会议越来越多,市场对高质量口译服务的需求也随之增大,但现有的口译人才培养体系还远远不能满足这样的需求。目前的翻译教育仍然停留在基础的语言技能的训练上,忽视了对专业知识背景以及高级翻译技巧的培养,致使毕业生成了高端市场的“过客”。于是出现了低端翻译市场竞争惨烈,高端翻译任务无人问津的人才结构性断层。

(二) 理论与实践脱节

蒙汉翻译领域存在的又一问题就是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相脱离。一方面翻译工作者大部分都在做着具体的工作,大多依靠个人经验和语言直觉去工作,缺少对理论自觉性的认知以及系统的反思。在实践中遇到的关于文化差异处理、新词术语创制、特定文体翻译策略等方面的共性难题没有上升为理论研究的课题,宝贵的实践经验也就无法沉淀下来、推广开来。

另一方面是学术界翻译研究的“象牙塔”倾向。有的研究只是把国外翻译理论引进来,做纯理论思辨,或者只对文学作品进行个案分析,对于政务、新闻、科技这些应用性很强的文本类型漠不关心。此类研究成果很难直接有效地用于指导翻译实践,不能对一线译者面临的实际问题给予回应。理论不能很好地为实践服务,实践中的问题又不能及时反馈给理论研究,这种双向隔阂严重地制约了蒙汉翻译整体水平的提高。

因此迫切需要加强以《应用翻译学》为代表的实践导向型研究,搭建理论界与实务界的沟通桥梁,使理论研究更“接地气”,使翻译实践更具“科学性”。只有形成常态的交流机制,举办专题研讨会,共建翻译项目等等,才能让理论与实践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促进蒙汉翻译学科的健康发展。

（三）术语体系尚待完善

术语统一规范，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对于政务、法律、科技等领域文本的翻译尤其重要。目前蒙汉翻译术语体系的建设滞后，已经成了影响其专业化发展的一大障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目前还没有统一、权威、可以随时更新的蒙汉术语数据库，造成“一词多译”、“同词异译”的混乱现象。

伴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新的概念、新的事物不断涌现，在政治、经济、法律、科技等领域里尤其明显。由于缺少权威的审定和发布的渠道，新的术语出现后不同的译者或者机构往往根据自己的理解进行翻译，造成术语使用的混乱。不一致轻则会造成读者疑惑、信息传达有误，重则在政务、法律等严肃领域引起严重误解，甚至造成执行层面的分歧。目前已有的一些术语表或者词典，普遍存在更新不够及时、涵盖的领域不全面、权威性不足等状况，不能很好地回应当下翻译实践的迫切要求。因此加快建立一个开放共享、动态维护、覆盖面广的蒙汉术语国家标准数据库，已是迫在眉睫。

第三节 政务与新闻文本的翻译特点

从应用翻译学广阔的视角看，研究各种类型文本的翻译是它的主要内容。政务文本和新闻文本作为社会生活中两种重要的信息载体，其蒙汉互译实践不但是信息有效传递的需要，也是政治、文化、社会语境精准对接的重要环节。本节会从两方面入手，对它们的翻译特点进行深入分析，然后从对比的角度提出启示。

一、政务文本的翻译特点

政务文本是政府开展行政管理、实施社会管理的手段，政务文本翻译就是将政策传达出去、传递信息、塑造良好形象。蒙汉政务翻译的特殊性不在于语言层面的简单转换，而在于两种不同的行政文化和语言体系之间严谨又精妙地对话。因此，翻译者必须掌握其固有的文体特征和功能要求，才能保证译文在政治立场、规范性、信息传达等各方面的准确性，从而保持文本的权威性和可操作性。

（一）政治性与严肃性

蒙汉政务文本翻译的第一个特点就是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严肃性。无论是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还是官方白皮书，都带有一定的政治意图和意识形态，是

官方的正式表达。翻译过程中要忠实反映原文的政治立场、方针政策、精神实质,任何微小的错误或者含糊不清的地方都会造成严重政治上的误解。这就要求译者不仅要有深厚政治素养,还要有敏锐的政治辨别力,准确把握原文的政治含义并忠实传达。

严肃性是政治性的直接反映。政务文本语言风格一般庄重正式、严谨缜密、用词考究,以体现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在蒙汉翻译中,译者应选用与原文风格一致的正式书面语体,坚决不用口语化、随意化的表达。对于具有特定政治含义的词汇,必须使用官方发布的或者约定俗成的标准译法,不能随意创造或者替换。对长句、复杂句的处理也要在保证语法正确的情况下,保留原文的逻辑层次和庄重性,使得译文具有与原文相同的严肃性。

政治性、严肃性要求译者在翻译时一直要保持一种“戴着镣铐跳舞”的状态。译者要在原文的政治框架之下,发挥自身主体性,让译文顺畅自然,符合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这种约束不是束缚,是保证信息正确传递、政治功能正常发挥的条件。所以,不断学习、领会国家大政方针、民族宗教政策、社会发展动态是蒙汉政务译者的基本功。

(二) 规范性与程式化

政务文本翻译有很强的规范性、程式化特点。为了保证行政命令、政策信息的传达清晰并且执行有效,政务文本的结构、用语、句子等一般都有一定的模式。公文一般有固定的格式,如标题、文号、主送机关、正文、落款等,语言表达中充满了带有一定功能的套语和程式化的结构。这就需要蒙汉译者既要两种语言的公文体系有所了解,还要对各自文体的范式有着深刻的理解。

术语翻译要非常一致。政府机构名称、职务头衔、法律术语、政策性词汇等都有标准的权威译法。这几种标准的译法是通过长期翻译实践形成的,有唯一性和强制性,是保证政务信息在不同的语言间无损传播的基本条件。译者应该牢记标准术语并严格按照规范的用词翻译。对新出现的术语,应该按照官方译法或经过仔细研究之后给出严谨的翻译建议,不能因为个人理解的不同造成术语混乱。

句式结构的程式化也是它重要的表现。政务文本常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手法来加强语势,用“本着……的原则”、“为了……的目的”、“必须……的”等句式来突出行为依据、目的和要求。蒙汉翻译不是简单的字面翻译,是要找目的语中功能对等的程式化表达。蒙古语是黏着语,其语法结构及表达习惯与汉语有

很大差别。译者要掌握蒙古语政务文本里常用的句式、段落之间如何过渡，改变句式以达到忠实于原文内容且符合蒙古语写作习惯的目的，让读者觉得文章庄重、有条理，而不是生硬难懂。

（三）信息准确性与权威性

政务文本翻译的绝对准确是政务文本翻译的生命线。政务文本所涉及的内容一般会牵涉到国计民生和法律权利义务等，即使是一点小的疏忽都会造成政策被曲解、执行出错甚至引发外交纠纷。准确性要求是全方位的，不单包括核心事实、数据、专有名词的准确无误，还要包括语气、态度、隐含意义的忠实再现。限定、范围、程度的词，例如基本、主要、部分等，必须找到与之意义和分量完全对应的蒙古语词来进行翻译。

权威性是在信息准确性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政务文本的发布目的在于树立政府的权威形象，政务文本的译文作为原文在另一种语言文化环境中所延伸出的成果，同样需要具备不可质疑的权威性。权威感是翻译语言的准确、规范、确定所造成的。蒙汉翻译中不能用模棱两可、含混其辞的词语、句子。对原文中可能有歧义的部分，必须通过查阅背景文件或者联系相关方面来弄清原意后再准确地表达，不能主观臆断。

为了保证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政务文本翻译一般会经过建立和维护统一的术语库、使用翻译记忆工具、严格把关的审校制度等一系列的工作流程。审校环节尤为重要，一般由比译者等级更高或者有更丰富经验的人来做，对译文从政治、政策、语言等多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核查，及时发现并改正错误。这一系列保障措施一起构成起政务翻译质量的坚固防线，使译文成为权威信息的可靠来源。

二、新闻文本的翻译特点

新闻是记录和传播新近发生的事实的载体，它的主要功能是尽快、准确地将最新的消息传递给公众。蒙汉新闻翻译是联系不同语言群体的桥梁，是传递信息、开展文化交流的重要手段，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新闻文本翻译不同于政务文本翻译，它更注重时效、客观、传播效果，要求译者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完成语言、文化、读者接受度等各方面的转换。

（一）时效性与客观性

时效性是新闻的生命，也是新闻翻译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新闻事件瞬息万变，

翻译工作要和新闻发布周期同步,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信息传递给目标语读者。在蒙汉新闻翻译中,尤其是报道突发事件或者重要会议的时候,译者经常会遭遇很大的时间压力。这就需要译者有良好的双语能力,并且能够迅速反应,还会使用各种翻译辅助工具和网络资源提高翻译的速度。

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即真实、中立、不带倾向性的报道事实。新闻翻译也必须严格按照这个原则。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当忠实于原文所报道的事实和所引述的观点,不得主观增减信息或者改变原文的叙述态度。原文中即使含有译者个人不赞成的观点,也必须客观地呈现出来,把判断权交给读者。蒙汉新闻翻译中体现为:

1. 对事实和数据的翻译必须精准无误,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专有信息需仔细核对,确保无误。
2. 对于引语的翻译,要力求再现说话人的原意和语气,避免因翻译而产生曲解。

这种对客观性的坚守,是维护媒体公信力,保障跨文化信息交流健康发展的关键。

(二) 简洁性与可读性

新闻语言的特点是简洁明快、通俗易懂,目的是使广大读者能够迅速地理解和得到信息。新闻文本一般结构清楚,句子简短,用词直接。蒙汉新闻翻译译文也应该具有这些品质。译者要防止使用过长过繁的句子,用简单明快的语言组织译文。汉语新闻中常用的电头、导语、主体等结构,在翻译成蒙古语时,也要按照蒙古语新闻语篇习惯进行调整,以符合目标语读者对新闻的阅读期待。

可读性是衡量新闻翻译是否成功的一个标准。好的新闻译文要让读者感觉不到翻译的痕迹,像阅读母语新闻一样自然。高可读性要求译者对两种语言间存在的差异有充分的了解。蒙古语和汉语在语序、句子结构、逻辑连接上存在很大的差别,蒙古语动词后置、格词变化多。直接对译会造成译文生硬不自然,影响阅读。因此,译者要在忠实传达信息的基础上对句子结构进行必要的重组和再创造,使用地道的蒙古语或者汉语表达方式,从而提高译文吸引力及传播效果。

处理文化负载词是提高可读性的重要途径之一。新闻报道当中经常会带有某些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词语、习语、典故等。蒙汉翻译当中,倘若直译会造成目标语读者困惑,那么译者就需要采取灵活的策略,如意译、加注解、寻找文化

对等词替换等方式来消除读者的困惑。汉语的一些成语在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要使用整句的解释才能传达出其中深刻的意义，从而使阅读更为流畅。

（三）受众导向性

新闻翻译属于一种带有很强目的性、具有跨文化交际性质的活动，它的最终目的就是让目标语的受众去理解、接受信息。因此，“受众导向”成了其主要的原则之一。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顾及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阅读习惯，价值取向以及阅读期待。这就意味着译者不只是一个语言转换者，而是一个文化中介、信息重构者。他要决定哪些背景知识对蒙古语或者汉语的读者来说是生疏的，就应当适时地加以补充。

受众导向性在翻译策略的选择上就表现得十分明显。像在中国内地经济政策的深度报道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译者就得对蒙古族读者不太熟悉的术语或者政策背景做些解释。反之，翻译有关蒙古国传统节日的报道时，也要给汉语读者补充相应的文化知识。此种增译、解释性翻译并不是对原文客观性的背离，而是在新的文化语境中达到和原文读者认知相等的忠实。

标题的翻译最能体现出受众导向性。新闻标题的作用是吸引读者，概括内容。由于蒙、汉两种语言表达习惯、修辞手法不同，标题的生硬直译使它的魅力大打折扣。好的新闻译者会依照目标语媒体风格以及读者阅读习惯，对标题予以再创作，在保持主要信息不变的前提下，用更有冲击力且更合乎目标语表达习惯的词语进行表达，从而实现最佳传播效果。这就体现了受众导向原则。

三、两类文本的共性与差异比较

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在功能、风格方面存在差异，但是两者都属于应用性文本，在蒙汉翻译实践当中存在共通之处，同时也有各自的侧重。比较二者的异同，对于译者在具体的翻译任务中准确把握文本性质，选择合适的、高效的翻译方法，提高翻译质量，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大有益处。

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在蒙汉互译实践中呈现出显著的共性与差异，具体特点可见下表：

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翻译特点对比表

特征维度	政务文本	新闻文本
主要功能	传达政策、管理社会、塑造形象	迅速、准确传达最新事实
核心原则	政治性、严肃性、规范性、准确性、权威性	时效性、客观性、简洁性、可读性、受众导向性
语言风格	庄重、严谨、程式化、书面语	简洁、明快、通俗、灵活多变
译者角色	信息“复刻”者，严格遵循原文	信息“再加工”者，具有更大灵活性
翻译策略	规范化、对等，直译为主，谨慎处理模糊处	灵活功能化，编译、意译、增减译，注重传播效果
约束条件	政治框架、法律法规、标准术语	时间压力、读者接受度、媒体公信力

从上表可知，虽然两者都追求信息的准确传达，但是语言风格、功能目的以及翻译策略上却各不相同。

（一）共性：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要求

无论是发布政令的政务文本，还是报道事实的新闻文本，最根本的共同点就是对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要求。准确性是这两种文本实现其功能的前提。政务文本的准确性直接影响到政策的落实，影响政府公信力。对于新闻文本来说，准确性是新闻报道的生命线，关系到媒体的信誉和公众的知情权。因此，在蒙汉翻译中，对于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数据等主要信息的处理必须准确无误。

对翻译工作准确性的共同追求，就意味着无论译者的文本类型如何，都应该有严谨的工作态度和扎实的基本功。充分理解原文是进行准确翻译的前提，所以译者不应该仅仅停留在表面信息上，而应该把文本发布的背景、目的、语境等一并考虑进去。同时广泛的知识面和不断学习的能力也十分重要，因为政务和新闻内容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各个方面。只有了解相关学科的知识领域，才能对文本内容做出正确的判断。

（二）差异：语言风格与功能目的

政务文本和新闻文本的语言风格、功能目的有很大区别。政务文本语言庄重、严谨、规范，多使用书面语和程式化的表达；其功能目的主要是为了指令性、指导性、宣传性，实现社会管理和政策传达。翻译的时候要保持原文的庄重风格和权威口吻，按照规定的术语、格式来操作，译者创造空间小，主要是进行原文权威性、规范性的复制。

新闻文本语言追求时效、简洁、生动、易懂，语言风格比较灵活多样，可采

用叙述、描写、评论等不同的笔法。功能目的，信息性、传播性、引导性，快速广泛地传递信息，有可能引导舆论。新闻翻译更加重视译文的可读性和传播性，在保证事实正确的基础上，译者留有较大的发挥空间。译者为了适应目标受众的阅读习惯和文化背景，会对句子结构、表达方式、标题等进行调整再创作，这时译者就成为了信息再加工者。

（三）翻译策略选择的侧重点不同

由于存在上述差异，蒙汉译者在翻译这两大类文本时采取的翻译策略也不相同。政务文本的翻译策略主要是规范化、对等原则。翻译时重视等值直译、术语规范，力求使词义、句式、篇章结构等各方面保持原文的风格与形式。翻译的重点在于保持原文的权威性、法律效力，使译文在目标语环境中被当作和原文同等地位的官方文件。原文中任何含糊不清的地方都必须极其谨慎处理，一般采用考证核实的方法，不能主观臆断。

新闻文本翻译的策略更加灵活，遵从功能对等原则。译者为了达到传播效果最大化的目的，会综合使用编译、意译、增译、减译等手段。当直译会造成文化误读或者可读性降低的时候，译者就会选择更符合目标语读者认知习惯的意译或者改写。翻译的要点就是能够有效地传递信息，使受众能够理解并接受。在这个过程中译者的主体性就发挥得更多了，译者不但是语言之间转换者还是跨文化传播中积极参与者和建构者。这两种文本完全不同的社会功能、交际目的就造成翻译策略上的明显差异。

第四节 研究方法 with 结构安排

本节主要对研究的整体设计进行系统说明，确定研究中采用的方法和逻辑。一个科学严谨的研究方法论体系是保证研究质量和深度的基石，也是获得可靠研究结论的必经之路。本部分主要说明研究的方法论指导思想、具体研究方法，并对论文整体结构、重难点、创新之处做系统性的说明。

一、研究方法论

本研究的方法论体系是在完全领悟翻译学研究范式的基础上，采取多种方法互相衬托、互相映照的方式展开研究的，希望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去探究

问题,从而构建起一种立体的、动态的分析框架。其最终目的,是对应用翻译学视域下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规律与复杂性,有更加全面、深刻的认识。

(一) 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相结合

本研究把定性与定量两种研究方法放在一个互相补充、互相印证的整合框架里。就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的翻译研究而言,不论采取纯粹的定性还是定量分析,都会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定性研究可以对翻译现象背后的文化、语用、意识形态的动因做深入的挖掘,通过解读译本、对译者进行访谈,来了解译者在选用翻译策略时所考虑的各种因素。它能够回答“为什么”、“怎样”这样的问题,为理解某一种具体的翻译行为合理性或者特殊性提供厚重的描写。对具有丰富政治文化意蕴的术语,则可以追溯它的历史来源和演变过程,并分析不同的翻译方式所反映出的权力关系以及话语建构目的。

定量研究用数据收集和统计分析来提供客观、量化的依据,从而增强研究的科学性、说服力。本文打算建立一个小型的蒙汉平行语料库,然后对政务、新闻文本中高频词汇翻译的一致性、术语的翻译一致性、句法结构转换的模式、信息增删的比例等进行统计分析。通过数据的整理,蒙汉两种语言在官方语境中的转换特征和规律就可以客观地呈现出来。以统计不同类型的文本中某种政治术语的各种译法出现的频次为例,可以评判官方译法的规范程度以及译者之间是否达成共识。两种方法结合起来,既可以从宏观上把握翻译的一般规律,又可以从微观的角度对具体的翻译实例进行深入的分析,在理论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之间达到一个平衡点,使研究的结果既有理论深度又有经验数据的支持。

(二) 理论思辨与案例分析相结合

按照理论思辨的指导性、案例分析的实证性相融合、相互促进的研究路径进行研究。运用翻译学领域中已有的理论,比如功能对等理论、目的论、描述性翻译研究、话语分析等,给观察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现象提供多元的理论视角。这些理论不但是分析工具,也是建立研究框架、提出研究问题的出发点。本文将从理论思辨入手,对应用翻译学的关键概念在蒙汉翻译这个特定的语境中是否适用、应该如何修正进行探究,进而形成一种符合实际情况的分析结构。将目的论应用于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分析,就能清楚地揭示出译者为了达到预期的读者接受和传播效果,在“忠实”与“变通”之间所做出的权衡和选择。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它能解释现实问题的能力,案例分析就是理论联系现实的

桥梁。本文选取的代表蒙汉政务文件和新闻报道有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关于同一事件的双语报道等。对具体案例进行剖析不仅能够检验理论框架的有效性，更能用鲜活的语料来丰富和发展理论。案例分析将不会只停留在现象的列举上，而是在理论指导之下，重点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文化负载词处理、意识形态介入、文体风格再现等具体问题进行研究。

这种方法把抽象的理论思辨放到具体的翻译实践当中去检验并落实，有效地防止了空洞的理论蹈袭。同时具体的案例分析因为理论的照明而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系统性，不再局限于就事论事。理论与实践的往复对话会一直存在于研究之中，保证本研究既有高远的理论自觉，又有牢固的实践根基，以此来加深对蒙汉特殊文本翻译问题的理解。

（三）宏观描述与微观剖析相结合

本文从宏观和微观两方面入手，努力在社会文化背景与语言文本这两者之间找到有机的联系。宏观描述，即把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活动放到更大的社会、政治、文化背景之下加以考察。经由对内蒙古自治区语言政策的演变、官方翻译机构的设置与运作方式、主流媒体的翻译规范和传播手段展开梳理，探究这些宏观因素怎样共同营造出蒙汉翻译的生态环境。对外部环境整体情况的描述，可以发现影响译者选择的因素，也能认识翻译是社会行为的本质。

微观剖析就是对翻译文本本身做细致入微的检视。本文主要从词汇、句法、语篇等角度进行蒙汉双语文本的比对，并发现翻译的技巧与策略。像政治核心术语的对译选择、长句拆分重组、修辞手法转换补偿、语篇衔接手段调整等等这些，都属于微观分析的范围。微观分析最能直接体现出译者为克服语言差异、文化隔阂所做出的创造劳动，翻译的精妙之处。通过对每一个具体的语言转换细节进行考察，可以对蒙汉语言转换的规律形成具体化的认识，并进而将其提炼为具有一定普适性的策略。宏观的整体把握给微观的细节分析提供坐标和背景，使语言现象不会迷失于琐碎之中；微观的实证剖析给宏观论断提供坚实、具体的支撑，防止宏大叙事的空泛。二者有机结合，既可以从社会文化语境入手，也可以从语言转换的细节着手，从而得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立体认知图景。

二、具体研究方法

为了使上面的方法论思想能够得到有效的落实，本文将采用文献研究法、对

比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这些方法互有侧重，互相配合，一起形成起一个严密、系统并具有较强的操作性的一套研究方案，为研究的顺利开展和深入挖掘赋予可靠的工具性支撑。本研究会采取多种具体的研究方法，各种具体的研究方法的侧重点和功用见下表：

本研究采用的具体研究方法及其功用表

研究方法	主要功用	在本研究中的具体应用
文献研究法	奠定理论基础，把握研究现状	系统梳理应用翻译学、政务 / 新闻翻译、蒙汉翻译等领域的核心文献与前沿理论，明确研究的起点与学术定位。
对比分析法	揭示语言转换规律与翻译策略	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层面，对蒙汉平行语料进行细致比对，归纳总结翻译技巧与模式。
案例研究法	深度剖析典型翻译情境与过程	选取代表性案例（如政府工作报告），结合理论进行“解剖麻雀”式的深入分析，检验理论并深化对复杂翻译现象的理解。

（一）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法是本研究的起点，也是本研究的理论基础，它在研究的全过程中都起着重要的作用，给课题的确定、理论框架的建立、研究现状的把握、研究内容的丰富等提供智力支持和学术营养。本研究的文献工作主要从如下几个方面入手，以保证研究具有扎实的学术基础、能够和学术前沿进行对话。

本文将会从中外两个方面，搜集和梳理应用翻译学、政务文本翻译、新闻翻译、蒙汉翻译等各个方面的研究文献。文献来源以核心期刊论文、学术专著、博士学位论文、重要会议论文集为主。通过对已有的文献进行系统阅读并加以批判性的吸收，一方面目的是清楚地勾勒出本研究领域的学术脉络和历史演变，在此基础上准确把握已有研究成果、方法及不足之处，从而确定本研究的切入点及学术定位，避免低水平的重复。从另一面来说，可以给研究者提供坚实的基础理论依据，为之后案例分析与理论建构做好知识储备与理论铺垫。

1. 精读应用翻译学的经典与前沿理论，主要关注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描述性翻译研究、批评话语分析等，为本文提供主要的理论基础。并且查阅大量的新闻学、政治学、社会语言学等交叉学科的文献，以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

2. 研究现状梳理，对蒙汉翻译的研究现状进行梳理，重点是对政务、新闻等应用类文本翻译的已有成果进行梳理，总结其研究视角、研究方法、研究结论，进而找到本研究可能取得的突破点。

3. 原始资料的收集主要是收集蒙汉双语政务文本、新闻文本，即政府发布的

各种文件、法律法规、领导人讲话以及官方媒体发布的一手蒙汉双语新闻稿。另外参考语言政策文件、翻译工作手册、译者访谈记录等，给予宏观上的描述以及微观上的分析很多真实的资料。

（二）对比分析法

对比分析法是本文在微观上剖析文本所用的主要方法。本文通过蒙汉原文与译文的平行对照，目的在于系统、细致地揭示出两种语言在政务、新闻这两个特定的功能领域里转换的规律、策略和难点。对比分析将从不同的方面入手，力求得到一个全面、系统的分析。从词汇角度分析核心政治术语、文化负载词、新词热词翻译策略，探究译者怎样在异化与归化之间抉择，术语翻译规范化与一致性问题。通过对比可以发现蒙汉两种语言概念体系、表达习惯的差别，以及译者为跨越这些差别所采取的补偿或解释策略。

从句法、语篇层面分析主要是对句式转换，语态的改变，显化与隐化的逻辑关系，信息焦点的转移和语篇衔接手段不同等角度进行对比。汉语的政务、新闻文本多用排比、长句，结构严谨；蒙古语表述类似内容时，句法结构以及语篇组织方式也各有其面目的。从对比中能发现译文处理结构差异时的一般原则及具体方法，即长句的分割、语序的调整、逻辑连接词的增减等等。多层次分析不仅可以表现翻译的静态结果，也可以从动态的角度去反思翻译过程中所做出的选择与权衡，为提炼出蒙汉应用文本翻译的策略提供扎实的实证基础，也可以给翻译教学和实践提供具体、可操作的指导。

（三）案例研究法

案例研究法给本研究提供了一种深入的、具体的、情境化的研究途径。它给研究者提供了对某个典型的翻译事件或者文本做“解剖麻雀”式的深入分析的机会，从而展示出在真实语境下各种复杂的因素是如何交织在一起、共同作用，最终形成翻译的过程与结果。本文将会按照典型性、代表性以及研究价值最大化的原则，仔细挑选出能够充分反映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主要问题的典型案例，比如一份重要的政府工作报告及其蒙汉译本，或者是一组关于某项重大政策或社会事件的系列双语新闻报道。

本文在选择好案例之后，用前面提出的理论框架和对比分析法对案例进行全方位的剖析。分析内容涉及案例的翻译背景，发布机构、读者对象、功能目的，文本特征，文体、语言风格，具体的翻译转换过程。对政府工作报告的翻译实例

加以分析的时候,既关注政治术语是否准确传达,也留意比喻、引用是如何被处理的,研究译者在传递信息的同时,又竭力保持原文政治气势和号召力的努力。通过案例的详细分析可以生动地表现出理论在实践中的运用情况,并且可以发现一些现有理论不能完全解释的特殊现象,对理论进行补充或者挑战。

案例研究的价值是“深”而不是“宽”。对一至两个案例进行详尽的分析,就可以得到蒙汉应用文本翻译复杂性的具体认识。该认识具有很强的情境性,可以充分展示译者在面对诸多限制时所表现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性。案例发现为文章的主要论点提供支撑,也是之后提出有针对性的翻译方法以及建议的前提。此方法会使得研究结论更贴近于翻译实践的实际情况,进而给研究赋予更强的应用价值以及现实指导意义。

三、论文结构与创新之处

本章意在为全文提供一个宏观的架构,表明各章之间的逻辑联系,点明将要解决的关键难题、难点问题,并对最终期望取得什么样的创新成果以及它具有的实践价值做了展望。清晰的结构是论文思想骨架,明确的创新意识就是学术探究的灵魂和动力。

(一) 各章节内容逻辑安排

本文结构设计按照提出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逻辑主线逐层深入、环环相扣地建构起一个结构严密、条理分明的论证体系。全文除引言、结语以外,主体部分共有四章。引言部分从研究背景、缘起和意义入手,界定核心概念,明确研究问题、研究目标和研究方法,对论文的整体框架进行概述。

第一章为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本章会针对应用翻译学,政务翻译,新闻翻译以及蒙汉翻译研究的历史和发展状况展开梳理,评价已有的研究贡献和不足之处,从而确定本文的研究学术位置。本章将主要介绍功能主义翻译理论、话语分析等核心理论,结合研究对象加以阐释,从而为全文提供分析框架。第二章宏观考察,从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所处的广阔社会文化环境出发,分析语言政策、翻译机构、媒介生态等外部因素对翻译活动的制约与影响,从宏观上表现蒙汉应用文本翻译的生态全景。

第三章是研究的重点,从微观角度出发,采用比较分析与案例研究的方法。本章将利用自建的蒙汉平行语料库,从词汇、句法、语篇等几个方面,对政务和

新闻文本的翻译策略和技巧做详细的对比分析。选择一到两个典型案例，细读文本，具体论述译者在具体语境下的翻译选择以及翻译效果。第四章就是对前面的分析进行归纳和总结。本章会对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原则、策略、模式进行系统性的总结，在总结的基础上针对目前的实践问题提出建设性的意见，比如术语库的建立、译员的培训、机器翻译的辅助使用等。结语是对全文主要结论的总结，对自己研究不足的真实陈述以及对今后可以继续探究的问题展望。

（二）研究的重点与难点

本研究的主要目的就是运用翻译学的视角，对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的内在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在研究过程中必然会碰到一些重要的和难于解决的问题，妥善处理这些问题对于保证研究的深度和质量是至关重要的。

研究的重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翻译策略的系统性归纳：本文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通过大量的语料分析，不是简单地罗列零散的翻译技巧，而试图归纳出一套适合于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系统化的翻译策略。这样一套策略体系既要考虑宏观的原则又要考虑微观的技巧，而且还要对翻译的过程起到一定的指导作用。

2. 意识形态和文化因素的考虑：政务与新闻文本天生就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属性、深厚的文化烙印。探究意识形态因素怎样经由语言选择、信息筛选、框架塑造等途径作用于翻译选择，以及译者怎样应对两种文化背景下的价值观念矛盾，是本文主要探究的内容。

3. 跨语际实现文本的功能：应用翻译学把“功能”放在首位。因此，考察政务文本宣介导向功能、新闻文本信息传递和舆论引导功能，在蒙汉翻译过程中如何被重新实现、调整或转化，就成为本文的另一条主线。

研究面临的难点则主要包括：

1. 高质量平行语料获取的难题，虽然官方发布的蒙汉双语文件、新闻为语料库的建设提供了一定的可能，但是要获取数量足够多、范围较广且对齐准确的高质量平行语料仍然存在技术和操作上的困难。

2. 政务与新闻翻译质量评价标准的构建，这两类文本的质量评价标准十分繁杂，它包含着语言上的“信、达、雅”，还包含政治效果、社会反响这些非语言的因素。在应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之下，怎样建构一个多维、可操作的评估模型，是一个很具挑战性的任务。

3. 跨学科研究的深度融合, 本研究本身就带有跨学科的属性, 要求研究者要有扎实的翻译学理论功底, 还要对政治学、新闻传播学、社会语言学等学科有比较深入的认识。怎样才能真正达成多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有机融合, 而不是简单地将它们拼凑起来, 这是研究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也是研究的难点之一。

(三) 可能的创新点与贡献

在充分参考前人的研究成果之上, 本文努力在视角、方法、内容这三个方面有所创新, 为蒙汉翻译研究或者应用翻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新的学术观点。研究的创新之处与可能贡献, 可以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来表述。

从理论上来说, 本文可以实现以下创新: 研究视角的创新。目前, 专门用应用翻译学理论来系统、深入地研究蒙汉政务、新闻这两类相关但各有侧重的文本翻译的研究还不太多。本文把翻译学的主流理论框架运用到蒙汉翻译的具体操作当中, 有益于拓展对翻译学理论适用性的认识, 就如何处理带有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非国外语言对的翻译而言, 可以给予新的实证支撑。理论建构的可能性。经过对蒙汉翻译活动进行深度的考察和分析以后, 可以总结出更多的、有解释力的概念范畴或者分析模型来丰富完善应用翻译学理论体系, 使其更具有多样性。

从实践方面来说, 本文的贡献会更直接、具体一些, 一是, 本研究的成果相信会对广大从事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翻译工作者起到一本系统、实用的翻译策略与操作指南的作用。经过大量案例分析得到的问题以及解决对策, 可以直接应用于翻译工作坊, 岗前培训等等, 有利于提高整个行业的翻译实践水平和规范性。第二, 在术语标准化、翻译规范化等有关问题上展开研究, 也能给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新闻单位的决策部门制定语言政策、改进翻译工作的流程和机制、建立高质量的语料库等提供帮助。本研究计划建立的蒙汉政务和新闻平行语料库, 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学术资源, 可以为以后的相关研究提供数据支持, 促进该领域学术积累和持续发展, 具有重要的学术基础设施建设意义。

第二章 政务文本翻译的理论基础

政务文本是国家治理系统与社会公众进行沟通联系的一种途径，翻译政务文本并不只是语言上的转换。它更是在跨文化语境下对权力、信息、法规的再建构、再传递。本章主要对政务文本翻译的理论基础进行深入探讨，通过分析其功能、类型以及翻译要求来为后面蒙汉翻译的研究打下坚实的理论基础，从而提高特定环境下翻译工作的准确性、有效性。

第一节 政务文本的功能与分类

政务文本翻译研究的前提是认识其功能属性以及类型划分。不同的文本由于功能的差异，语篇结构、词汇用法、句子特点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而这些不同又直接影响翻译的方法选择和调整。因此本节系统整理政务文本的功能和类型，并阐述不同类型的政务文本翻译的特殊要求，以给蒙汉政务文本翻译实践提供具体的指导。

一、政务文本的核心功能

政务文本的本质就是实现一定的社会管理目的。其主要功能相互交织、相互影响，一起形成了政务话语的权威性和导向性。蒙汉翻译里，恰当识别并表现这些功能，才是保证译文和原文效果对等的关键。

（一）信息告知功能

政务文本最基本的功能就是准确无误地向公众或者特定群体传递信息。这包括国家政策的改变、法律的公布、社会事件的公告、政府部门办事的程序等。信息告知是为了实现信息公开透明、保证公民的知情权。在蒙汉政务文本翻译时，译者要把源语文本里的关键信息，也就是时间，地点，数据，机构名称等等，准确地转换过来。任何信息的遗漏或曲解都会造成公众的误解，甚至会扰乱社会秩序。

信息传递不只是一个内容的陈述，它里面也包含了发出者的态度立场。文本经常用规范化的语言和格式来确立信息的权威性和可靠性。因此译者在忠实于内容的基础上，还要用对等的语言风格、结构在译文中再现这种权威感。政府工作报告所使用数据和事实表述除了数字要准确外，在语气、表达方式上也要符合官方话语的庄重性、确定性，以保证信息在跨语言传播中依然具有严肃性和公信力。

（二）政策宣导功能

政务文书除了传递信息外，还有宣传引导、凝聚共识的功能。政策性文件主要是为了阐释国家或者地方的方针政策，引导社会各界理解、认同并积极地执行。宣导功能有明显的倾向性和说服力，塑造公众的认识，争取社会的支持。文本中往往使用积极、有号召力的词语，并且会搭配使用排比、比喻等修辞手法，使文稿具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政策宣导的功能在蒙汉翻译当中是最大的难题。译者不能只是做字面的转换，而必须对政策背后所隐含的意图和价值导向有深刻的认识。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敏感度和跨文化交际的要求，选择最符合目标语读者文化习惯、最让目标语读者感到舒适的选择。对一些带有中国特色或者特定发展理念的表述，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直译很难引起共鸣。译者只有在充分领悟其含义之后，才需要用阐释性或创造性的翻译手段，在目的语文化里找到能够产生相同宣导效果的话语表达，才算真正做到了政策精神的传达。

宣教功能的发挥也在文本整体篇章的构架之中。文本一般会用逻辑严密的论证、描绘美好前景、承诺民众利益等方式来构建自己的合法性和吸引力。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识别出这些语篇策略，并在译文中进行重构。不但是语言的转换，也是文化的移植、话语的逻辑与劝说的艺术。只有这样，译文才不至于只是简单的信息交流，而可以成为引导思想、团结人民的工具。

（三）法规约束功能

政务文本，尤其是法律法规类的文本，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确定行为规范，产生法律或行政上的约束力。该类文本用精确的法律术语、严密的逻辑结构、规约性的句式来明确社会成员的权利、义务以及违反规定时的法律后果。语言具有很强的规约性、强制性，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直接影响到公民的切身利益和社会正常运转。

法规约束功能要实现，对翻译的要求就非常高。蒙汉法律法规翻译当中，译

者要努力实现术语一致、概念对等。由于两国的法律体系不同，法律文化也不同，因此很多法律概念并没有直接对应的词。这就需要译者在研究两国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同法律专家一起慎重地选择或者创造新的术语，并且在所有的法律条文中保持术语的一致性。任何概念上的模糊或者混淆都会导致法律条文在实践当中出现歧义，破坏法律的严肃性。所以法规文本翻译不仅仅只是语言问题，它直接影响法治精神能否在不同的语言群体中得到一致执行。

二、政务文本的主要类型

按照政务文本的具体功能和使用场合，可以分为不同种类。不同种类的文本，其格式、语言风格以及传播途径都不尽相同，进行科学的分类，才能对翻译做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蒙汉翻译来说，弄清文本类型有利于译者选择适合的翻译方式来达到不同的交际目的。

政务文本主要类型与特点概览

文本类型	主要目的 / 功能	语言特点	翻译重点
法律法规类	确立行为规范，产生法律约束力	高度专业化、精确化、客观化、结构严密	法律效力对等，术语一致性，逻辑链条严谨
政策文件类	传达政策制定者思想意图，指导工作	严肃规范兼具号召力、可读性	阐释政策精神，理解背景，化解文化差异
公告通知类	发布信息，传达命令，宣布事情	简洁明了、直接了当，时效性强	信息准确快速传递，格式规范，避免歧义

(一) 法律法规类

法律法规类文本在政务文本中规约性最强，语言也最严谨。它包括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地方性法规以及部门规章等。此类文本的主要目的就是确定社会行为规范，调节社会关系。其语言特点表现为高度专业化、精确化、客观化。文本中充斥着定义性、指令性以及禁止性的语句，逻辑关系异常严密，不许有任何的模糊和歧义。结构大体上是固定不变的，条款、项目、款项划分等方面都严格按照规定的形式进行。

在蒙汉法律翻译中，译者的第一要务就是保证法律效力对等。这就意味着译文要和原文一样可以被司法机关和行政机关引用、执行。译者必须懂两种语言，而且要懂法律，对相关法律条文的立法原意和适用范围有深刻的认识。翻译的时候，必须要对法律术语实施严格的对应管理，创建并遵从统一的术语库。对于句

法结构，一般采用直译或者结构对等的手段，努力维持原文严密的逻辑链条，防止因为句式转换而导致的意义差错。

该类文本的翻译既是项专业技术活，又是项责任重大的法律实践。译者在某种程度上起到立法助手的作用，译文质量的好坏决定法治在不同的语言社会中是否能够统一实施。因此，法律条令的翻译一般会经历多次校对，并由法学家加以认证以保证翻译内容的准确性、权威性，从而在目标语社会中产生和原文同样的法律效力。

（二）政策文件类

政策文件类文本是政府用来指导和推进某项工作的手段，包括决定、意见、规划、纲要等。和法律法规相比，政策文件有指导性、方向性、阐释性。其语言风格介于法律语言和一般宣传语言之间，具有一定的严肃性、规范性，又要有一定的号召力、可读性，使各级执行部门及广大社会公众能够理解和执行。

政策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传达政策制定者所要表达的思想和意图。因此，其蒙汉翻译的重点是“阐释”。译者不能只满足于字面的忠实，必须深入到文字的背后去挖掘其政策的背景、目的和策略。例如一份关于经济发展的指导意见，当中包含很多宏观的、前瞻性的表述，翻译时要结合具体的社会经济情况来理解并再现，使得这些表述在蒙古语中也能具有明确的指导意义。带有中国特色文化烙印的表述，如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等，应该用阐释性翻译的方法进行翻译，并在适当情况下加以注解，帮助目标语言读者理解。

（三）公告通知类

公告通知类文本在政府部门日常行政管理中使用频率最高，包括公告、通告、通知、通报等。此类文本的功能比较单一，主要用发布信息、传达命令、宣布事务，时效性高，实用性大。语言一般简洁明了、直接了当，格式规范，一般由标题、主送机关、正文、发文机关、日期等组成。

这类文本的蒙汉翻译要以清晰、实用为首要原则。翻译的主要任务就是保证信息能够快速、准确的传达给目标读者，使他们能清楚的了解会议时间、办事地点、申请条件、截止日期等重要的信息。

1. 在翻译实践中，应尽量使用简洁、通俗的语言，避免复杂的句式和生僻词汇。

2. 格式要素必须按照目标语公文的习惯进行转换，保证译文是规范的公文。

日期的表达方式、机构名称规范的译法等都不能有丝毫马虎。任何会引起混淆的表述都应该被剔除,因为公告通知的错误或者延迟传达,都会直接导致公民错过重要的机会或者造成行政流程的延误。

三、不同类型文本的翻译要求

根据上文对于政务文本功能和类型的分析,不同的政务文本对翻译活动有着不同的、具体的诉求。这些都是评价蒙汉政务翻译好坏的标准,也是译者在实际操作中需要遵循的标准。把握住这些不同的要求,才能实现政务文本的跨语言有效交流。上述政务文本主要类型和特点可以参照上表。

(一) 法律文本的严谨性要求

法律文本翻译要以严谨为前提。严谨体现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各层次上。在词汇上要求法律术语翻译准确一致。同一术语在一部法律内的译法必须与该法律中其他相关部分的译法保持一致,以防止在法律适用上产生混乱。译者要依靠权威的法律词典和术语库,就两国法律体系里的概念展开细致的比较分析,找出最恰当的对等词。

句法上对于法律文本中长句、复句以及带有诸多限定性、条件性状语从句的句子进行翻译时,必须保证原句的逻辑关系。句子成分错位或者逻辑连接词使用不当,都会影响条文规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因此译者可能会牺牲语言的自然流畅度来保证句法结构的严谨对等。最大限度保留原文形式,根本目的就是保证译文的法律效力与原文完全一致。

(二) 政策文件的阐释性要求

政策文件翻译的重点是阐释。与法律文本不同,政策文件中有很多模糊、概括的表述,目的是给下级执行单位留有解释和操作的余地。译者不能只翻译字面意思,更要传达政策的“精神”。这就要求译者不能只是被动的翻译者,而应该成为积极的阐释者。译者要能完全领悟宏观政策,精准领会政策里蕴含的战略意图与价值趋向。

翻译时要把握文本的语调和表达的方向。鼓励性、倡导性的表述译文也应使用积极正面的词语;指导性原则的译文则要体现出它的权威性与方向性。处理具有深厚文化内涵的政治新词的时候,译者不能简单地找一个生硬的对应词,而要对政治新词的构成和语境加以分析,采用一种能够让目标读者明白其背后逻辑和

愿景的翻译方式。解释性翻译使得政策在新的文化环境下得到更好的理解，接纳与执行。

（三）公告通知的清晰性要求

公告通知类文本翻译最重要的，也是最根本的要求就是清晰性。此类文本的价值在于它传递信息所具有的效率和准确性。翻译的目的是让读者在最短的时间内，用最少的努力掌握最重要的信息。因此译者应该去掉所有不必要的修饰和复杂的表达，用最直接、最简单的语言。

清晰性要求就是对文本信息要素进行准确的处理。时间、地点、人物、事件、数字这些关键信息不能有任何差错。格式也不能忽视，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公文格式可以大大提高信息接收效率。译者要提炼重组原文信息点，保证译文结构合乎通知类文体的规范。在蒙汉翻译中，这就需要译者了解两种语言公文写作的惯例差异并加以调整。最终目的就是生成一份功能上完全对等的告知性文件，保证政务信息畅通无阻。

第二节 蒙汉语言对比分析

蒙汉两种语言分属于阿尔泰语系蒙古语族和汉藏语系汉语族，在语言谱系上的不同造成两者的语言结构、表达习惯乃至思维方式存在本质的区别。系统梳理并深入探究这些差异，对于认识蒙汉翻译，特别是逻辑严密、信息量大的政务、新闻文本翻译的内在规律和难点，有重大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节主要是从词汇、句法、语篇这三个方面来展开对比研究，希望可以为建立科学的翻译方法提供语言学依据。

一、词汇层面对比

词汇是最活跃的语言组成部分，直接表现出一个民族对于世界的认识和独有的文化特点。蒙汉词汇在语义内涵、组合规则、新词生成机制等方面存在差异，这些就是政务、新闻文本翻译时必须加以注意的地方。

（一）词义范围与对应关系

蒙汉词汇并不是简单的“一对一”关系，更多的是“一对多”、“多对一”甚至词义空缺的情况。这种不对等性是由于两种文化在自然环境、社会结构、认

知范围的不同所导致的。反映蒙古族游牧文化特点的词汇在汉语里很难找到精准的对等词。蒙古语对于不同年龄、性别的马、牛、羊等牲畜有着细致的分类词汇，其细致程度是汉语所不具备的。相反，源自农耕文明、官僚体系的汉语中的一些概念，在蒙古语里需要用描述性的词组来表达。

最典型的的就是颜色词。“xөx”这个词在蒙古语里既可以表示汉语中的蓝色，也可以表示绿色。其具体含义要根据所修饰的名词来定，“xөx тэнгэр”是蓝天，“xөx өвс”是绿草。这种词义的广延性就要求译者具有很强的语境分析能力，以免出现机械对应而产生的误译。同样，亲属称谓系统也有很大差别。汉语中的“伯伯”、“叔叔”、“舅舅”、“姑父”、“姨父”等称谓区分了父系、母系、年长、年幼等关系，在蒙古语中一般只用几个比较笼统的词来对应。翻译时，必须根据上下文添加必要的信息才能达到语义的对等。政务文本中的机构名称、职务头衔等，也会出现不完全对应的情况，一般要通过注释或者增译等方式来解决。

词义空缺在翻译时就更难处理了。当一种语言词汇所指代的概念在另一种文化里根本不存在的时候，翻译就会遇到文化信息传递的障碍。汉语中带有中国特色的词汇，如户口、编制等，在蒙古语中没有对应的词语。政务新闻翻译时，处理这类词一般采取音译加注解或者意译的方法。音译保留了原词的形式，利于文化交流的深入；但是初次接触时理解难度较大；意译重在解释它的功能与内涵，便于理解；但是会丢失一部分文化色彩。具体采用哪种方式，要视文本种类、受众对象和传播目的而定。

（二）固定搭配与习语表达

语言中固定搭配、习语是人们在长期使用中形成的约定俗成的表达方式，具有很强的民族性、文化性。蒙汉两种语言在词语搭配习惯上有较大差异，生搬硬套原文的搭配方式，很容易导致译文不自然甚至出错。汉语的“提高水平”，翻译成蒙古语更接近于“使水平向上”，汉语中的“吸取教训”，翻译成蒙古语更接近于“获取教训”。这些搭配的不同要求翻译者熟悉目标语地道的表达方式，进行转换而不是直译。

习语、谚语、成语是文化负载最重的语言现象，它们的比喻义和文化内涵常常来自于历史典故、神话传说或者生活经验。汉语成语多出自历史事件或者古代典籍，比如“守株待兔”、“画蛇添足”。蒙古语习语多来自于草原生活、自然现象、游牧经验，如“狼的腿长，人的嘴长”，（坏事传千里，好事不出门）。

表达方式的比喻本体和喻义之间存在文化内部共识，跨文化传递时如果只翻译字面意思，就会完全失去它的神韵和内涵。

因此，在处理政务和新闻文本中固定的搭配、习语时，不能只做字面的转换。对于固定搭配，用目标语中功能对等的搭配组合；对于习语，可采取如下方法：

1. 功能对等法：在目标语里寻找意义、修辞色彩相似的习语来替换。这属于理想化的处理方式，但完全对等的习语很少见。

2. 释义法即舍弃原文的比喻形式，把原文的深层含义清楚地翻译出来。此方法在需要信息准确无误的政务、新闻文本中使用较多，可以保证重要信息的传达。

3. 直译加注法，在保持原文比喻形式的基础上，用脚注或者括号来补充说明其文化内涵以及真实含义。此法有助于读者初步了解源语文化，但是可能会牺牲文本的流畅度。

（三）新词术语的构成差异

随着社会的发展、科技的进步，新的概念、新的事物不断涌现，蒙汉两种语言在创造新词术语方面也存在不同。政务、新闻文本是新词新语最集中的地方，准确理解并翻译好这些词汇，对于保证信息的时效性、专业性起着关键的作用。汉语创造新词主要是意合、复合方式，即用现有汉字（语素）重新组合成新词，如互联网（互联+网络）、大数据（大+数据）、区块链（区块+链），构词理据明确，通常能望文生义。

蒙古语属于黏着语，其构词法的一个明显特点就是用大量的后缀来派生新词。通过在词根上加上不同的功能性后缀，就能创造出名词、动词、形容词等。以蒙古语为例，“化”这个概念用作名词或者形容词的时候，可以在其后面加上后缀“-жуулах”或“-члах”，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动词。蒙古语吸收新概念的主要途径之一就是形态学上的生产力。另外，蒙古语在吸收外来词方面比汉语更加直接，主要采用音译或者音译和意译结合的方式，尤其是对国际通用的科学技术术语。

这两种不同的构词法给翻译造成了困难。汉语的复合式新词翻译到蒙古语当中时，译者要决定采用意译的方式，在蒙古语中找寻对应的词根来组合或者派生，还是采用国际上通用的音译词。人工智能一词，既可以意译为带有“人工”和“智能”含义的蒙古语组合，也可以参照国际惯例进行音译。政务文件里为了保证术语的统一权威，一般会有专门的机构对重要的新词译法加以规范。新闻翻译比较灵活，有时为了抢时间先用音译，等确定了规范译法再统一。反之，将蒙古语中

通过后缀派生或者音译产生的新词翻译成汉语的时候,也要找到符合汉语构词习惯的对应表达,避免生硬拆分或者音译,保证译文自然流畅。

二、句法层面对比

句法结构是语言的骨架,它决定了信息是怎么组织展开的。蒙古语的黏着语特性及主宾谓序同汉语的分析语特性及主谓宾序存在差别。这种底层句法逻辑的差别是蒙汉翻译,尤其是长句、复杂句翻译的主要麻烦。

(一) 语序与句子结构

蒙汉两种语言最根本的句法差异就是基本语序的不同。汉语为主谓宾结构,即主语+谓语+宾语;蒙古语为SOV结构,谓语动词是句子的结尾。从而造成句子信息分布的差别。汉语的修饰成分(定语、状语)可以放在中心语的前面或后面,而蒙古语中所有的修饰成分都必须放在中心语之前,不能放在中心语之后。

结构上的不同导致蒙汉互译时需要进行句法重组。例如,汉语句子:中国政府昨天在北京发表了一项重要的声明。其语序为:主语、时间状语、地点状语、谓语、定语、宾语。翻译成蒙古语时,语序为:主语(中国政府)+时间状语(昨天)+地点状语(在北京)+定语(一项重要的)+宾语(声明)+谓语(发表)。这样的先枝叶后主干的结构是蒙古语的表达习惯,句子的重心和信息的高潮都在句末。相反,在汉译蒙时,就要做相反的处理,把句末的谓语动词提到句首,再按照汉语的习惯把状语等调整到合适的位置,以符合汉语的信息流。

(二) 形态变化与功能虚词

蒙古语是黏着语,语法关系用丰富的形态变化来表达。名词有格、数、人称领属的变化,动词有体、时、态、式、形动词、副动词等的变化。附加在词根后面的格助词、人称词尾等,清楚地表明了词在句中所起的语法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名词后面加上格助词就可以直接表明名词是主语、宾语、工具还是地点。这就使蒙古语词序比较灵活,因为语法关系已经被形态固定了。

汉语是分析语,词本身没有形态变化。汉语的语法关系主要是通过词序和功能虚词(介词、连词、助词等)来表现。汉语用介词把来标记宾语提前,用介词在、从等标记地点、方向,用连词和、与等标记并列成分。处理好蒙汉翻译的差异是关键的一环。将蒙古语翻译成汉语时,应当区分各个形态后缀表达的不同的语法意义,用汉语相应的虚词、语序来表示出来。蒙古语的工具格后缀“-aap/-ээп”

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可以转化为介词用、以、通过。把汉语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就要把汉语的功能虚词“脱壳”，根据其包含的语法意义，选择合适的蒙古语形态后缀来表达。转换不单是词汇层面的，也是整个语法机制的重组。

（三）长句与复合句的处理

政务、新闻文本里经常会出现结构复杂的长句、复合句。蒙汉两种语言在构造长句、复合句时所采用的手段大相径庭。蒙古语常用动词的非限定形式，特别是副动词，来连接两个以上的分句，从而形成一个单句。副动词形式的从句像葡萄串一样串在主句谓语动词前面，共同组成完整的句子。长句只有一个位于句尾的限定性谓语动词，前面所有的分句在语法上都依附于它。

汉语构造复合句大多用连词（因为、所以、虽然、但是等）把相对独立的分句连接起来，构成意合形合的流水句。各个分句之间可以是并列、转折、因果等不同的逻辑关系，结构上更加平行、松散。因此翻译蒙古语长句不能简单地保持单一的主谓结构，否则就会造成汉语译文冗长晦涩。一般需要进行断句，根据副动词所表达的逻辑关系（时间、原因、条件、方式等）将副动词引导的从句分成独立的汉语分句，并加上适当的连词，重组为符合汉语表达习惯的复合句或句群。反之亦然，把汉语的复合句或者句群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就需要“合句”，把汉语里用连词联系起来的多个分句，转化成用不同的副动词引领的从句，再合成一个以限定性动词结束的蒙古语句子。句式转换属于蒙汉翻译，特别是书面语翻译过程中的一项高级技巧，它直接影响到译文质量的好坏。

三、语篇层面对比

语篇比单句还要大，它的内部连接、连贯性、信息结构、行文风格一起组成了文本的整体面貌。蒙汉两种语言在语篇组织原则上的不同，直接造成政务和新闻文本逻辑表达方式和说服效果的不同。

（一）衔接与连贯手段

衔接是语篇通过语言手段产生的表面的联系，连贯是语篇的语义、逻辑上的通顺。蒙古语语篇的衔接很大程度上是依靠形态、句法。用人称领属后缀来明确指代关系，减少代词的使用；动词的形动词形式可以把一个句子变成名词性短语，作为下一个句子的主语或者宾语，实现紧密的句间连接。因此蒙古语的语篇结构紧密，逻辑链条在句子内部就可以体现。

汉语语篇的衔接多靠词汇手段和逻辑连接词来完成。代词（“这”“那”“他”“它”）的复指、关键词的重复或同义词替换、表示转折、递进、因果的关联词语，都是汉语语篇流畅性的主要方式。汉语语篇连贯有的是隐性的，读者要理解分句间的意合关系，也就是“以意役形”。翻译时要将蒙古语原文通过形态变化内含的逻辑关系，用汉语关联词显化出来，使语篇的逻辑层次更清晰。相反，在蒙译汉的时候可以适当减少汉语里常用的连接词，用蒙古语句法结构（如副动词链）和形态标记来实现更加精炼、地道的语篇衔接。

（二）信息结构与焦点安排

信息结构决定了语篇当中新信息、旧信息的安排、重点。蒙汉两种语言都是话题优先的语言，即句子或者语篇的话题放在前面。但是实现焦点的方式不一样。由于蒙古语的语序和谓语后置的特点，句末的谓语动词及其紧邻的宾语或状语就是自然的信息焦点。要突出的焦点成分，可以用语序改变（将焦点成分放在谓语动词前面），或者用焦点标记小品词。

汉语在信息焦点安排上方式更多。除了用句末的位置外，还可以使用“是……的”结构、关联词“连……都/也……”、状语位置的变化等其它语法或者词汇的手段来突出焦点。政务、新闻类文本中，信息焦点的准确传达十分重要，它直接影响到作者意图的表达。政策发布时重点可以是政策本身、执行时间或者适用对象。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一定要找准源语文本的焦点所在，然后用目标语中最为有效的手段把焦点表现出来，防止焦点模糊或者偏离而导致信息失真。蒙古语句末焦点翻译成汉语时，一般需要借助“是……的”句式加强；汉语里通过某种结构强调的焦点翻译成蒙古语时，则要通过改变语序，把焦点放在谓语前完成。

（三）逻辑关系与行文风格

蒙汉两种语言在构造复杂的论述时，逻辑推进的方式以及最后形成的行文风格也存在差异。由于受前饰后核句法结构的影响，蒙古语书面语，尤其是政务和法律文本，更多地采用综合型或者归纳式的逻辑展开方式。文本常常以大量的状语、定语从句等条件、背景、原因叙述为开头，一层层铺垫，最后在句尾或段尾给出核心判断或者结论。这是一种严谨、详尽但稍显繁琐的写作风格。

汉语书面语受国外逻辑思维的影响较深，在现代政务文稿、新闻写作中，“分析型”或者“演绎式”的逻辑展开方式更为普遍，即先提出主题句或者核心观点，再分点、分层阐述、论证或者解释。采用这种总分或者主旨细节的结构之后，行

文脉络就变得清晰了，节奏也更快了。这就要求译者具有语篇重构能力。蒙古语归纳式的长篇文段翻译成汉语时，常需要提炼出它的主要观点，把它放在段首做主题句，把原文中做铺垫的从句改写为并列的支撑句，使它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反之，汉译蒙时，原文若是典型的总分结构，直接对译会使蒙古语译文松散、碎片化。此时可以把分述的细节整合成一系列从句，总括的观点后置作为全段的结论，就构成了有蒙古语特色的综合语篇。有意识地改变行文风格，是实现功能对等、达到信、达、雅更高要求的必由之路。

蒙汉两种语言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各方面都存在着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就是蒙汉翻译中必须充分认识并加以妥善处理的地方。下面表中为蒙汉语言在主要语言学特征上对比：

蒙汉语言主要语言学特征对比表

特征类别	蒙古语（阿尔泰语系）	汉语（汉藏语系）
语言类型	黏着语	分析语（孤立语）
基本语序	主宾谓	主谓宾
修饰成分位置	严格前置	前置或后置
语法关系表达	形态变化（格、数、时、态等后缀）	词序与功能虚词（介词、连词、助词）
构词方式	大量使用后缀派生	意合、复合（语素组合）
复合句构建	副动词链，单一限定谓语	连词连接，多个相对独立分句
语篇衔接	形态、句法（人称领属后缀、形动词）	词汇手段、逻辑连接词、代词复指
逻辑展开	综合型、归纳式（层层铺垫，结论后置）	分析型、演绎式（主题句在前，分层阐述）

经由上文的差别分析，译者可以更好的领悟两种语言的特色，在翻译过程中灵活采取各种策略，从而产出优良的译文。

第三节 翻译策略与原则

用翻译学宏观的眼光来审视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翻译的话，它并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过程，而是跨文化交际的一个深层次活动。为了保证翻译的准确性、有效性，译者既不能违反严谨的翻译原则，又不能拘泥于某一种翻译方法。本节从忠实、通顺两方面入手，对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原则及策略进行剖析，并探究在某种语境下选择直译还是意译。

一、以“忠实”为核心的翻译原则

忠实是所有翻译活动的基础，对承载重大政治信息、具有法律效力、讲究事实准确的政务与新闻文本而言，它的重要性就更加突出。在蒙汉翻译当中，“忠实”不是一个单维度的范畴，它包含着对于原文政治含义、法律效力以及信息内容等诸多方面的忠实。

（一）忠实于原文的政治内涵

政务文本是政府施政方针和政策法规的直接载体，具有较强的政治性。进行蒙汉政务文本翻译时，首先要做的是把原文所包含的政治立场、意识形态和政策导向正确地传达出来。蒙古语和汉语在表达政治概念的时候虽然会有一定对应，但是背后的文化意蕴、感情色彩和使用情境却有区别。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政治敏锐度以及理论水平的要求，必须要对原文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充分的认识，保证译文在政治上与原文完全一致。比如对一些核心政治术语、领导人讲话、国家重要战略等，在翻译这些内容的时候，一定要使用官方公布的标准译名，绝不能随意更改或者“创新”，否则就会导致政治信息的失真和误读，从而产生难以预料的政治后果。这里的忠实不是对语言文字的忠实，是对国家政治意志、话语体系的忠实。

译者在处理此类文本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字面意思的转换上，而应该去挖掘词语背后所隐藏的政治含义。这就需要译者不断学习最新的政策文件，熟知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了解蒙古族地区的社会文化，从而在语言转换的过程中把握好政治话语的分寸。尤其是涉及民族政策、区域发展等敏感话题的新闻文本，译者要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慎重选择用词，使译文表述恰当稳妥，不致因为翻译问题而产生社会舆论。忠实于政治内涵，是政务新闻文本翻译的生命线，是译者职业责任感和政治素养的集中体现，核心就是保证译文与原文在意识形态层面上完全一致，服务于国家治理和信息传播的总体目标。

（二）忠实于原文的法律效力

政务文本中的法规、公告、条例等具有强制性与规范性，其语言精准，直接关系到法律的权威以及执法的效果。因此忠实原文的法律效力，在蒙汉翻译中是不可改变的原则。法律语言有其特有的语法、词汇特点，稍有差别就会造成权利义务关系发生巨大改变。翻译的时候，译者需要对蒙汉双语的法律术语有准确

的把握，明确其在法律框架内确切的含义。义务和权利、禁止和许可这类有明确的法律划分的词语，要找到完全对等的功能表达。

要遵从这个准则就得让译者有一定的法律知识，能分辨出并妥善应对文本里经常出现的长句，被动语态以及一大堆程序化的表述。翻译合同或者法规条款的时候，译者不能任意增删信息，更不能为了使译文流畅而损害原文的法律准确性。每一个术语、每一个限定词、每一个逻辑连接词都具有不可替代的法律功能。像蒙古语法律文本里那些界定范围和条件的繁杂从句结构，在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就得经过周密的句法重组，保证限定关系和逻辑层次一个不差地保留下来，这才算是做到了不失真，也只有这样，译文才能和原文在法律上具有同等效力。

忠实于法律效力就是指译文能够成为有效的法律依据，为目标语的读者所接受和遵守。这就意味着翻译活动本身必须是高度规范化的。实践过程中创建并维护统一的法律术语库，对重要的法律概念实行统一的翻译标准，可以有效地避免一词多译或者译法不同的情况出现，从而保证蒙汉两种语言的法律文本的一致性，维护法制的统一和尊严。这是对译者专业能力的一个考验，也是法律精神的继承。

（三）忠实于原文的信息内容

新闻文本的主要功能就是传递信息，它的生命力在于真实、准确、客观。所以，在蒙汉新闻文本的翻译中，第一准则就是忠于原文的信息内容。这说明翻译过程中译者要完整地把原文所包含的事实要素传递出来，即准确地将新闻事件的时间、地点、人物、起因、经过和结果等主要要素表现出来。任何对事实信息的遗漏、增添或者歪曲都会损害新闻的公信力，甚至会误导公众。在快节奏、高强度的新闻编译工作当中，译者必须要有较强的信息核实能力、严谨的工作作风。

忠实于信息内容不是简单的字面翻译。译者要领会新闻语篇的结构特点，分清信息的主次。新闻报道大体上分为导语、主体、背景等几个部分，导语一般都集中表示新闻中最重要的信息。译者在翻译的时候要保证译文同样突出这些重点，使目标语读者能够很快抓住新闻的核心。对于数据、引语、专有名词等具体信息也要一丝不苟。数字错了，人名混了，引语曲解，都是新闻失实的元凶。译者应该调动所有可以调动的工具和知识，对不确定的信息反复核对，保证每一个细节都准确无误。

新闻文本的客观性在翻译中也应该被完全保留下来。源语作者的立场和情感倾向，无论其明确表现还是隐藏在文字里，译者都应如实表现，不能加入自己的

主观判断或者情感。原文用中性词客观报道的话,译文也不应该用带有褒贬意味的词。对新闻信息内容和叙事方式的忠实性保证了新闻作为“事实报道”的本质在跨语言传播过程中不会被改变,从而保持了新闻媒体的专业性、权威性。

二、以“通顺”为目标的翻译策略

在忠实的基础上求通顺,才是提高翻译质量、保证信息有效传递的重要方式。一部译文即使很忠实于原文,如果语句生硬,特别是对于广大民众的政务、新闻类译文来说,也是失败的。为了使译文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通顺、条理清楚、便于理解,译者要使用各种翻译的方法。

(一) 句法结构调整与重组

蒙古语属于阿尔泰语系,是典型的黏着语,它的句法结构是“主-宾-谓”,并且有丰富的格变化和后置词。与之不同的是,汉语属于汉藏语系,是分析语,基本语序为“主-谓-宾”,句子成分间的关系主要依靠语序和虚词来表达。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的明显差别,使得蒙汉翻译不能是简单的词汇替换,而必须对句子结构做深层次的重组。完全照搬蒙古语语序和结构得到的汉语句子,就会语序颠倒、逻辑混乱,使人难懂。

蒙古语中定语成分,不论是单词、短语还是从句,都放在中心语前面,常形成较长的定语链。译为汉语时必须调整“左倾”的修饰结构。较短的定语可以保留在中心词前面,而由从句充当的定语,一般要转换为后置的定语从句,或者拆分为独立的句子,放在主句前后做补充说明。重组的目的是为了适应汉语“头轻脚重”的句子平衡感,防止出现修饰成分堆砌过长、句子结构失衡的情况。

状语的处理也要灵活变通。蒙古语的状语成分,尤其是表时间、表地点、表方式、表原因的状语从句,一般放在主句谓语前面。翻译成汉语时,虽然有很多状语成分仍然可以前置,但是为了使句子的逻辑更加清晰,表达更加自然,译者常常会根据汉语的行文逻辑来调整它们的位置,有的时候还会把它们转换成并列分句或者独立句。用以表示结果的蒙古语状语从句,在汉语中一般更自然地翻译成以“因此”“从而”等词引导的结果分句。

通过对原文句法结构进行解构和重组,译者就摆脱了源语形式的束缚,把原文所表达的意义,用完全符合汉语语法规范和表达习惯的方式重新组织起来。这既是译文达到“通顺”的必由之路,也是译者进行语言转换的体现。创造性地重

组的过程就是连接忠实和通顺的桥梁，保证了信息跨越语言鸿沟之后能被目标语读者顺利地接受和理解。

（二）语序优化与逻辑显化

在基本的句法结构转换完毕之后，语序的再次优化以及内在逻辑关系的显化，就成了提高译文通顺度的重要环节。蒙古语是黏着语，句子成分间的逻辑关系多由格的形态变化或者特殊的动词形式来表达，语言形式比较紧凑。汉语更多依靠语序和逻辑关联词来构成明晰的语义链。因此，在将蒙古语文本翻译成汉语的时候，译者就要把原文里隐含的逻辑关系表达出来。

在具体的翻译中，译者一般会采取如下方式处理：一是因果关系显化，蒙古语用某些动词副动词来表达原因，在汉语中一般需要添加“因为……所以……”“由于”等关联词，使因果逻辑一目了然。其次就是时序关系的调整，新闻报道最重要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当蒙古语原文叙述顺序同汉语习惯时间流向相违背的时候，译者就要对句序进行重组，按照时间的先后把事情铺排开来，使叙述的脉络更加顺畅清楚。第三，转折和让步关系明确化，原文中用语气或者上下文来暗示的转折、让步关系，在译文中应使用“但是”、“尽管……可是……”等关联词来加以明确，以免造成读者理解上的歧义。这种显化处理，把原文中较为隐晦的逻辑联系变得清楚直接，读者的理解成本因此大幅度降低。

经过对语序的雕琢和逻辑关联词的运用，译文内部结构就会变得比较严谨、明晰。这不是对原文信息的增加，而是把原文中已经存在、用不同方式表述的逻辑关系，用目标语读者最熟悉、最容易接受的方式表达出来。对于政务文件的政策解读、新闻文本的复杂事件报道来说，这一环节十分关键，可以防止因为逻辑混乱造成的信息失真，是达成深度通顺的重要环节。

（三）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

要实现通顺，译文最后一定要完全融入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读起来就像是一篇地道的汉语作品，没有一丝生硬的翻译腔。这就要求译者不但要懂语法规则，还要对汉语的语言风格、修辞手法、文化韵味有深刻的认识。尤其在政务、新闻这两种文体特征十分明显的领域里，遵照目标语的文体规范就显得十分必要。

政务文字表达一般是正式的、书面化的、严谨的、庄重的。译者在翻译蒙古语政务文件的时候要选用和之风格相符的词汇和句式。应该多使用四字格、书面语词汇，少用口语化、通俗化的表达。对于一些官方表达或者口号，可以用汉语

的固定搭配来模仿原文所要表现出的庄重。既是对文体风格的尊重，也是保证政务信息权威性的一种必要要求。

新闻文本的汉语表达形式更丰富，既有严肃硬新闻又有活泼软新闻。译者要依照新闻的种类，采取相适应的语言风格。翻译新闻标题不能只求信息传递，还应该借鉴汉语新闻标题制作技巧，力求简洁、醒目、有吸引力。新闻导语和正文的翻译要用简练流畅的语言，叙事的节奏要符合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对于一些蒙古语特有的表达或者习语，直译会显得别扭，此时就应当在汉语中找寻功能对等、意境相似的表达来代替，以求达到“得意忘形”的高境界通顺。与目标语表达习惯高度契合，就是判断译文好坏的标准，也是译者双语能力及跨文化转换能力的最高表现。

三、直译与意译的灵活运用

直译、意译是翻译中最基本、最重要的两种方法。它们不是相互对立、非此即彼的关系，而是连续统一体上的两个端点。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的翻译实践中，优秀的译者不会拘泥于一种方法，而会依据文体类型、具体语境、翻译目的、目标读者，在两者间做出灵活的权衡，以求得忠实与通顺的最佳结合。下表为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直译、意译的具体应用场景与目的。

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直译与意译适用场景表

翻译方法	适用场景	主要目的	示例内容
直译	术语、固定表述、机构名称、法律概念、官方核心词汇	保证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实现信息精准对应	“一带一路”倡议、法律法规条款、具体人名地名
意译	文化负载词、谚语、习语、修辞手法	实现文化内涵的对等传达，保证译文通顺自然，引发读者共鸣	描述草原生活方式的词汇、具有民族色彩的谚语

（一）术语和固定表述的直译

政务和新闻文本中有很多需要精准对应的术语和固定表达，对这些语言单位采用直译是最佳、最有效的方法。主要是机构名称、法律术语、科技名词、政策名称以及官方话语体系中特定的概念。采用直译，特别是经官方审定、被广泛认可的标准化直译，其主要目的就是保证信息的统一性、严肃性、权威性。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深化改革”“一带一路”倡议等政务核心词汇为例，不管是在从汉语到蒙古语的翻译还是反过来，都必须采用官方发布的唯一的标准译

法。高度一致的直译可以防止因为译法不同而导致的思想混乱和信息偏差，是保证国家话语体系完整性的必要之举。

新闻报道中对国际组织、外国地名、人名、新兴科技概念使用直译或音译加注的方式，可以最大程度上保留原文的信息标识度，便于读者进行信息检索和背景查证。实质上是在目标语中给源语概念建立一个严格对应的符号，保证这个概念在跨语言传播中是稳定的、可识别的。直译就是忠实原则的直接体现，也是处理具有明确指代性的语言因素的最有效、最负责任的翻译选择。它给跨文化交流打下了坚实的硬通货基础，成为沟通准确展开的前提。

（二）文化负载词的意译

语言是文化载体，每一种语言中都有许多蕴含着该语言独特历史、风俗、价值观及思维方式的负载文化词。这些词语在另一语言文化中并没有完全对应的词语。蒙古语中就包含了很多与游牧文化、草原生活、萨满信仰、民族历史有关的词汇，比如一些食物的名称、服饰的称谓、亲属的称谓以及带有民族色彩的谚语、歇后语等。将这些内容用农耕文化背景下的汉语读者去理解时，如果用直译或者音译的方式表达，就容易让他们感到困惑，无法体会到其中深层次的文化意蕴，从而造成信息传递的障碍与文化审美的缺失。

此时意译就成了一种必要的并且高级的翻译策略。意译要求译者在充分领悟原文文化内涵的前提下，摆脱原文字面形式的桎梏，在目的语里找到功能相当、能给读者产生类似联想的表达。以一句描写草原英雄气概的蒙古语谚语为例，如果只是简单地将“像狼一样凶猛，像鹰一样锐利”这样直白的意思翻译出来，就会显得很平淡。若将其意译成汉语意境相近的“万夫不当之勇”或者“气吞山河”之类的表达，就能更好地传达出它的精神实质，引起汉语读者的情感共鸣。此种对等不是形式对等，而是功能对等或者动态对等。

在软新闻或者特稿中处理文化负载词的时候，可以采用意译加注解的方式，也就是在使用意译或者音译的基础上，再加上简短的文字说明其文化背景，从而帮助读者跨越文化障碍。意译的巧妙使用，一方面可以使得译文更加通顺、有表现力，另一方面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深层理解与交流。这是对“忠实”原则更深层次的阐释，即不仅要忠实于原文的语言表层，还要忠实于原文所承载的意图以及所产生的效果。

（三）复杂长句的拆译与合译

由于蒙汉两种语言的句子结构不同，如何处理长句是翻译的又一重难点。蒙古语语法以层层嵌套的从属结构为特点，可以把非常复杂的多重逻辑关系包含在一个长句中；汉语则多用简单句、并列结构，句子比较短小，行文节奏较快。因此，机械地保持原句句式在蒙汉翻译中是不可行的，它会严重影响译文质量，所以必须根据实际情况灵活使用拆译和合译的方法。

拆译就是将蒙古语中结构复杂、包含多个从句的长句，按照其内在逻辑，拆解成汉语中若干个独立或者并列的短句。此方法在翻译政务文件的政策说明或者新闻稿的背景介绍时最为常用。译者首先要理清原文长句的主干以及各个从句之间的时间、因果、条件、转折等逻辑关系，然后用汉语的句群形式重新组织。拆分时可以借助连接词来梳理句间关系，也可以调整句序，使原文的逻辑层次更清晰地呈现出来。拆译既可很好地消除长句造成的“头重脚轻”之感，又可使行文层次清楚，利于读者理解和吸收。

与拆译相反的是合译。虽然从蒙古语到汉语的翻译以拆译为主，但也有合译的必要。当蒙古语原文用一系列短小的、零散的句子来描写一个紧密相关联的过程或者场景的时候，为了使汉语译文更加连贯、紧凑，可以将这些短句合并成一个结构较为复杂的汉语句子，并用连词或者不同的分句方式把它们连接起来。采用化零为整的策略，可以提高译文的语言气势以及表达的整体性。不管采用拆译还是合译，其目的都是在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结构之间找到一个最佳的平衡点，在忠实地传递原文信息和逻辑的基础上，用最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方式来构建译文，达到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第四节 文化适应性处理

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不仅仅只是语言之间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交际。两种语言根植于不同的文化土壤中，如果不妥善处理原文所蕴含的文化信息，就会造成译文中信息的缺失、解读的偏差甚至文化上的冲突。因此对文本进行文化适应性处理，是保证翻译质量、达到沟通目的的重要步骤。

一、政治文化概念的转换

政治话语体系反映的是某一社会文化、历史经验。蒙汉翻译在处理政治概念的时候，不可避免地要碰到两种文化体系的碰撞和调适。译者要在深入理解源语政治文化内涵的基础上，寻找目标语里最贴切的表达来达到政治信息的准确传达和对等。

（一）具有中国特色政治术语的翻译

中国梦、四个全面、新质生产力等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是构成中国政治话语体系的主要部分。它们高度集中地反映出某一种政治思想，某一个时代背景以及某种价值取向。这类词汇带有强烈的本土色彩，蒙古语里往往没有现成的对应词，直接硬译容易造成语义的空洞或者产生误解，不能传递出其丰富的政治内涵和积极情感。如把“中国梦”译成对应的汉字词语，就会丢失其中蕴含的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宏大叙事。

遇到这样的翻译难题时，使用释义性翻译策略就显得非常必要。译者要通过翻译将这些凝练的术语所包含的核心概念、目的和意义用清晰详尽的蒙古语短语或句子加以说明，使目标语读者形成与源语读者相同的认知。以新质生产力为例，翻译时不能只是堆砌字词，而应该着重阐述它的核心内涵，即由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所催生的当代先进生产力质态。于是译文就升华为思想的传递，而不再只是信息的复制。

政务、新闻翻译里使用官方公布的术语标准译法，这是保证术语翻译统一和权威的基本原则。国家权威编译机构会对重大新政治术语进行专家研讨，然后推出标准译文。译者须要随时留心并采纳那些官方的定本，以保证各类官方文件、新闻报道和对外宣传在语气、词义上不产生分歧。这样的处理方式可以防止由于译者个人的理解不同而导致翻译的混乱，保证政治话语的严肃性、准确性，也是应用翻译服务国家政治交往功能的体现。

（二）蒙古族传统政治称谓的对应

在汉蒙互译中处理政治称谓的时候，译者经常要面对现代政治体系和传统社会结构称谓体系的对接难题。蒙古族具有很多独有的政治社会等级称谓，比如诺颜、台吉、汗等，这些称谓同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有紧密联系。把现代汉语中的“主席”、“书记”、“省长”等政治职务和传统称谓进行简单

的类比或直接套用，是不恰当的。这会造成历史语境的错乱，而且会造成现代政治职务内涵和职能的歪曲，造成目标语读者的误读。

目前蒙汉翻译实践中普遍使用功能对等原则，也就是选择或创造可以准确反映该职务在当前政治架构中所起的作用、地位和管辖范围的蒙古语词汇。经过长期的实践和规范，像“主席”译为“дарга”、“书记”译为“нарий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这样的标准译法就被普遍接受了。下表清楚地列出了一些现代政治职务和不应套用的传统称呼的区别。

汉蒙政治称谓翻译策略对比表

汉语现代职务	蒙古语标准译法	避免套用的传统称谓	翻译原则
主席	дарга	汗	功能对等
书记	нарийн бичгийн дарга	诺颜	功能对等
省长 / 自治区主席	мужийн дарга / өөртөө засах орны дарга	台吉	功能对等
主任	захирал	—	功能对等

这些译法甩开了传统称谓的历史包袱，从现代行政管理架构出发，做到了信息的清楚、等值传递。以功能对等为基础的标准化处理，是保证政务信息在跨语言、跨文化传播中不失真的根本保证。

（三）意识形态词汇的等效处理

民主、自由、社会主义、霸权主义这些词在政治性文本当中就是翻译最敏感、最繁杂的。这些词的内涵不是普适的，在不同的政治体制、文化背景中，它们所指代的内容和情感色彩大相径庭。蒙汉翻译工作者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汉语政治语境下这些词汇带有中国特色的定义和价值判断，翻译的目的在于实现语用层面的等效。

实现意识形态词汇的等效，即译文对蒙古语读者而言所产生的语用效果、情感共鸣，应该与原文对汉语读者所产生的效果极为接近。这就要求译者不能死抠字面意思，要努力挖掘词汇在某个语境中所含有的深层含义。以社会主义为例，翻译包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内容的文本时，需要用恰当的修饰和限定，在译文中突出它的中国特色，把其同世界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理论、实践区分开来。译者的工作就是忠实地再现源语文本的意识形态立场，而不能去对文本进行价值重估或者文化过滤。

在翻译中不能有意识地、自觉地对意识形态进行歪曲。任何个人的偏见或者

对目标语文化的想当然，都会导致译文的政治取向与原文出现差异，严重时还会引发重大传播事故。特别是官方的政务文件、权威新闻报道的翻译，译者负有的责任是非常重大的。坚持官方审定的译文标准，不使用在目标语文化中可能会产生负面联想或者歧义的词，这是译者必须遵守的职业底线。译者在其中起到了严谨的信息传递者的作用，其主要的任务就是保证意识形态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完整、准确。

二、法律法规文化背景的补充

法律是特定社会的文化成果，法律的条文里包含着深厚的历史背景、价值取向、制度安排。蒙汉法律文本翻译中译者不仅要解决语言上的难题，还要扮演起文化桥梁的角色，在必要时对原文进行背景补充，以克服由于法律文化不同而造成的理解上的障碍。

（一）对原文隐含法律背景的阐释

汉语法律文本在起草之时，往往假定读者对于中国的法律体系、社会规范以及相关政策有着预先的了解。文本中反复出现的“根据有关规定”、“依照相关法律精神”等表述，或者是对某部上位法的简称、特定条款的间接援引，对于不熟悉中国法律环境的蒙古语读者来说，无疑形成了理解的障碍。这些隐含的法律背景信息如果在译文中消失不见，就会造成译文信息的残缺不全，从而影响法律文本在目标语环境中是否可以被理解、是否能够被执行。

译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借助显化手段，把原文中隐含的信息在译文中加以补充和说明。补充不是任意的个人发挥，而是对源语法律文本进行解读后严谨的操作。当翻译某地方性法规，其中提到对某个国家级法律的遵守时，译者可以在译文中用括号、注释或者直接在句子中加以说明的方式点明该国家级法律的全称。可以很大程度提高译文的清晰度和信息完整性，使目标语读者准确把握法律条文的依据及适用情况，保证法律信息的传达。

（二）对目标语读者法律认知的预判

成功的法律翻译很大程度上依靠译者对目标语读者认知模式、知识结构的准确预测。在中国境内的蒙古语使用者的法律意识，是国家成文法教育与蒙古族传统习惯法、道德规范长期相互作用、融合的结果。尤其是对于草原、林地、婚姻、财产继承等，传统观念影响仍然较大。译者必须要考虑到这独特的法律认识背景。

当源语的某项法律概念在蒙古族传统社会中没有,或者其意义与地方性习惯的认识相冲突的时候,译者就必须小心地加以处理。草原承包经营权源于中国土地制度改革,其所包含的占有、使用、收益、流转等权利内容,对习惯于以部落或家庭为单位进行季节性迁徙、对草场持有传统公有观念的牧民来说,是一个陌生的法律框架。翻译时如果只用生硬的字对字对应词,就很难使读者理解它的法律实质。

读者认知情况的判断,直接决定翻译策略是用其一还是其二。译者要权衡是用详尽解释的描述性译法,还是用“标准术语+注释说明”或文化类比的方法。最终目的就是生成一份既能符合法律精神,又能在目标群体的认知范围内被顺畅地理解、接受的法律文本,从而真正实现法律的公示作用和指引作用。

(三) 译注和脚注的恰当使用

当文本内部的解释性翻译不能够厘清文化或制度之异,或者解释性文字太多会破坏法律条文的简洁与庄严时,就要用译注、脚注。它们像译者给文本开辟出对话的区域,给予读者必要的历史和文化背景,缓解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理解分歧。

译注、脚注的使用应该严谨而准确,它们的目的只是辅助理解,而不应该成为炫耀学识或者过度解读的手段。是否需要加注,一般从以下几个方面考虑:

1. 文化特有现象当条文涉及中国特有的制度或者概念,例如某些行政审批程序、政策术语等,在蒙古族文化中沒有对应物的时候,简要的注释对读者来说会很有帮助。

2. 法律术语的歧义:某个法律术语直译成蒙古语之后会形成多种含义,或者其词义与蒙古语里某一个近义词存在微小却重要的差别。这时注释能够清楚地表明它在当前法律文本中所具有的唯一、特定的意义。

3. 外部信息援引,即法律文本中所援引的另一部读者可能并不熟悉的法律、法规或者国际公约,脚注可以给出该文献的全称、发布机构、发布日期以及内容摘要等信息,从而给读者留下进一步探究的线索。

正式法律译本的译注在格式、出现的地方以及所用语言风格方面应当保持一致。脚注比尾注更便于读者立即查阅。注释内容必须客观、简洁、准确,不能带有译者的主观推断或者评论。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用译注使译文更易读、实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应用翻译学“以用户为中心”的思想。

三、礼仪与称谓文化的对等

在等级分明、讲求客观、得体的政务交往和新闻报道里，正确运用礼仪和称谓是营造和谐的交往氛围、传递适当的人际关系信息的重要方式。蒙汉两种文化在礼仪表达、称谓系统等方面各有特点，翻译时应该追求文化功能上的对等，而不是简单的语言形式对等。

（一）官方文书中敬语的翻译

汉语官方文书有一套成熟的敬语、程式化表达，在信函、照会、讲话稿中经常使用“贵方”、“阁下”、“莅临指导”、“谨向……致以崇高敬意”等。这些词不只是文体上的装饰，它们还肩负着传达尊重、正式、友好信息的任务，使用是否得体直接影响到国家或者机构的形象。

蒙古语也有着很丰富的敬语系统，它运用起来受年龄、社会地位、关系远近等众多因素影响。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这两种不同的敬语系统中找到功能上的契合点。直接翻译容易使译文生硬、不自然，有时反而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像把“莅临指导”翻译成两个独立动词的并列，就会失去原文那种谦恭而期盼的复合意味。优秀的译者会选用蒙古语里与原文语境、敬意程度相符合的固定短语，也就是用既可以体现“光临”又可以体现“指教”意思的地道敬语来表达。

关键在于对原文敬语的语用功能进行细致的分析，再用目标语中自然、地道的礼仪表达来再现它的功能。汉语里一个简单的敬词，有时需要用蒙古语里一个较长的短语才能表达出同等的敬意，反之亦然。译者要按照文本种类（贺电的喜庆、外交抗议的严肃、邀请函的热情）来改变译文的礼貌程度，以达到最好的交际效果。

（二）机构名称和职级头衔的规范译法

政务、新闻领域机构名称、职级头衔的翻译属于基础性工作，主要要求就是规范、统一、准确。同一机构或职务在不同的场合下有不同的译名，会造成信息混乱、损害政府公信力，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政治或者法律上的误解。因此像“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主席”等称谓，都只能有一个官方认可的蒙古语标准译法。

翻译时应该遵循“名从主人”的原则，即使用相关机构自定或者认可的官方译名。在没有官方译本的情况下，译者要依据国家权威语言机构出版的术语库、

已经存在翻译惯例来译出文本。复杂的机构名称一般采用意译和音译相结合的方法：通用行政词汇（部、委员会、局等）用意译，专有名称部分（如地名、人名等）用音译。既可以保证名称的可辨识度，又能符合目标语的构词习惯。创建并推行统一的蒙汉机构职衔术语数据库，这才是实现此类翻译标准化的治本之方。

（三）蒙古族传统礼仪用语的处理

翻译是双向的，源文本是蒙古语的时候，译者同样会碰到文化适应的问题。特别是在报道蒙古族地区民俗活动、节庆仪式，或转述地方领导带有民族特色讲话的新闻稿中，常常会遇到蒙古族特有的传统礼仪用语、祝福语、谚语。语言的形式深深地扎根于游牧文化以及藏传佛教信仰里，有着丰富的文化内涵。

直接译成汉语后，汉族读者觉得晦涩，甚至会感到平淡无奇，不能体会到这些用语在某个文化背景下所具有的分量与美感。比如一句在蒙古包前迎接客人时说的祝福语，如果只是进行字面翻译，很可能会失去它诗意的韵律以及深厚的吉祥含义。

这时明智的翻译策略就是文化阐释或者功能替换。一方面译者可以采取描述性翻译，在译出用语字面意义的同时，用少量文字对用语的文化背景、使用场合和象征意义加以说明。比如在报道一次祭祀活动时，除了翻译祭祀活动的名称之外，还可以加上一句：“这是为祈求来年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举行的仪式。”

另一方面，可以在汉语文化中找到功能上相似的表达来进行文化移植。用一句意境相近、通俗上口的汉族谚语来对应蒙古族的祝福谚语，在汉族读者中引起相似的情感共鸣。以读者为对象的适应性处理既传递了主要信息，又在两种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理解的桥梁，新闻报道更具有可读性、文化深度，有利于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文化格局下跨文化理解与交融。

第三章 新闻文本翻译的理论探讨

新闻是高度模式化的文体，它的语言运用和篇章构造都有一定的规律。这些规律是新闻从业者在长期实践过程中为了实现信息快速、准确、广泛的传播所形成的一种共识。对蒙汉新闻翻译来说，剖析并掌握这些语言特点，是展开有效跨文化信息转换与重组的前提和基础。

第一节 新闻文本的语言特征

新闻文本语言特征是新闻文本功能和传播方式的直接表现，在词汇、句法、语篇等各方面都体现出了明显的特色。这几点特点共同服务于新闻信息传递的即时、真实、影响力三大目的，也给翻译工作带来了具体的困难，需要译者在传达字面意思的基础上，再现原文的文体风格和传播意图。

一、词汇特征

新闻文本的词汇选择具有很强的时效性、精确性和导向性，这是形成新闻文本独特语言风格的基础。词汇不但是记录事实的工具，也是建构社会现实、引导公众认知的载体。因此，透彻认识新闻词汇的特征，是把握新闻话语内涵、实现准确翻译的前提。

（一）新词、热词的频繁使用

新闻语言可以算作社会变革最敏锐的记录者。为了反映社会发展的新动向、科技进步的新成果和文化生活的新风尚，新闻媒体总是最先采纳和传播新近产生或者广为流行的词语。这些词生命力强，传得快，一出现就能抓住读者的眼睛，引起社会的广泛共鸣。随着数字经济、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数字鸿沟”、“直播带货”、“网红经济”等词语很快进入公众视野，成了各类新闻报道的高频词。这些词语用简洁、生动的特征，高度概括地表现出了复杂的社会现象。

蒙汉翻译中遇到此类词汇时，怎样处理无疑成了一个大难题。由于它是新的、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热的，在目标语言里找不到相应的词。这就需要译者具有敏锐的语言直觉和很强的创造性，在完全理解源语新词的内涵、语境以及文化背景的基础上，根据实际情况，灵活运用音译、意译、解释性翻译甚至创造新词等多种方法来完成翻译。具体的翻译策略及示例如下表所示。

新词热词翻译策略及示例表

翻译策略	简要说明	示例
音译	根据源语词汇的发音，在目标语中寻找语音相似的词汇进行转换。	“沙发”源自英文 sofa 的发音
意译	侧重传达原文的实际意义，而非拘泥于字面形式。	“二维码”译为 QR Code
解释性翻译	当目标语缺乏直接对应词时，通过增加描述或解释来阐明概念。	“春运”可解释为“春节期间的交通高峰”
音译加意译	结合音译和意译，既保留部分发音又说明其类别或含义。	“芭蕾”后常接“舞”以明确其艺术形式

翻译不仅要把词语的主要意思传达出来，而且要尽可能保持它鲜明的时代感与流行度，不能因为翻译使文本显得过时或者生硬，而使译文不能吸引目标语言读者。

（二）缩略语与专业术语的运用

新闻报道，尤其是涉及政治、经济、科技等领域的时候，为了使行文简练且具有权威性，会大量使用缩略语和专业术语。缩略语是把“中华人民共和国”缩写成“中国”，或者采用首字母缩略形式等，这样极大地提高了信息传递的速度，也很好地符合了新闻版面空间有限、读者阅读习惯快的特点。专业术语的使用能准确地表达出某个领域里复杂的概念，也体现报道的专业性、严谨性。

但是这种用词习惯无疑给翻译设置了双重障碍。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必须把缩略语的全称以及确切含义准确地还原出来。在蒙汉互译当中，一些耳熟能详的缩略语也许已经形成了约定俗成的译法，但是对于那些不常见或者是在特定情境之下临时出现的缩略语来说，译者就需要花费时间去查阅资料，甚至要依靠上下文进行逻辑上的推断，如果处理不当，很容易就会出现信息缺失或者产生误会的情况。

专业术语翻译对译者的知识储备要求较高。同一个术语在不同的领域里含义截然不同，译者要根据新闻主题作出精准的判断。如科技新闻中的人工智能，在

财经新闻中可能就代表另一个意思。所以译者在翻译时一定要保证目标语术语的对等和准确,不能用过于大众化、不专业的词来代替原文术语,否则会破坏原文的专业性和权威性。目标语中实在没有直接对应的术语时,适当地采用加注解解释的方式加以补充说明,是保证信息完整性的一种有效方式。

(三) 客观性与主观性词汇的交织

客观中立地报道事实,这就是新闻应该坚守的原则。为此,记者在写作时大量使用数据、直接引语和没有感情色彩的中性词来陈述事件,力求让事实本身说话。对客观性不断追求,目的在于提高新闻报道的公信力,让读者能根据报道内容自行作出判断。译者在传递这些客观信息方面是不能出错的,尤其是对数字、时间、地点这些重要的信息更是如此。

但新闻文本并不是完全排除主观性的。作者的立场、观点和情感常常都会在精巧的用词里隐秘地流露出来。用带有某种情感色彩或者评价意味的形容词、副词和动词,新闻报道可以在不露声色之中引导读者态度,达到潜在的议程设置目的。使用“窜访”而不是“访问”,使用“勾结”而不是“合作”,词汇的选择就已经做出了价值判断。新闻话语的复杂性,就在于客观性和主观性之间巧妙地交织在一起。

准确地辨识出这些有潜在导向性的词语,并对它们妥善处理,对于译者来说是一项艰巨的任务。译者不能仅满足于把原文记述的事实内容准确地传达出来,还要对字里行间蕴含的褒贬态度予以敏锐的觉察和把握。最后选择忠实体现原文,还是根据翻译目的、目标读者文化语境做出调整或折中,以求最佳传播效果,需要译者经过思考之后才能作出决定。

二、句法特征

新闻文本的句子结构一直围绕着其信息传递的功能来构建,因此它与文学、学术等其他文体有着很大的不同。这些句法特征不但是决定文本阅读节奏和清晰度的关键因素,也是新闻生产内部逻辑的外在反映,在翻译过程中应该得到充分的重视并加以慎重处理。

(一) 广泛使用被动语态

在新闻报道中,被动语态的使用频率显著高于其他文体,这一语言现象背后存在多重动因。

1. 突出信息焦点：当行为的承受者比施动者更重要的时候，使用被动语态可以先把信息焦点放在句首，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一名儿童被救出”比“消防员救出一名儿童”更能突出生命获救这个主要信息。

2. 施动者不明或者无需说明：很多新闻事件中，行为的发出者尚不清楚，或者相对于事件本身来说不是重要的信息。这时用被动语态就可以自然地避开说施动者，使叙述更加简洁客观。

3. 增强客观色彩，使用被动语态可以给报道增添一种客观、非个人化的语气，让叙述的重心更多地放在事件上，而不是记者个人的视角或者评判上。

因为蒙、汉两种语言在被动语态的表达上存在着较大的区别，汉语除了用“被”、“由”等介词外，也经常使用无标记的意念被动句，而蒙古语则有其特有的被动语态构词和句法形式。因此，在蒙汉新闻翻译中绝不能搞句式对等。译者要按照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灵活挑选最合适的办法，有的时候要把原文的被动句改成主动句，有的时候还要用别的词或者句式来表达原文的被动意思和信息重点。

（二）时态与语体的灵活性

新闻报道在时态运用上具有极大的灵活性，其主要目的就是加强新闻的现场感和时效性。一个典型的特征就是经常使用现在时态来叙述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样“历史现在时”的表达方式可以有效地消除读者和事件之间的时间距离，使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地置身于新闻现场，从而产生一种紧迫感和真实感。以昨天的会为例，一般会说“会议指出……”而不是“会议指出了……”，这就把事件和读者拉近了。

除时态的特殊使用外，新闻语体本身也有一定的弹性，风格从庄重严肃到活泼通俗。报道重大政治经济新闻、发布官方政策的时候，语言风格一般都是正式、严谨的，句子结构比较复杂，用词讲究。在报道社会生活、文体娱乐等社会生活内容时，语体就会变得轻松、口语化，甚至大胆地使用网络流行语来迎合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喜好。

时态、语体上的灵活性给翻译造成直接的困难。处理时态的时候，译者不仅要明白原文用“历史现在时”等修辞手法的意图，还要决定在目标语中是否可以以及怎样达到同样的语用效果。译者在进行语体转换的时候必须要有驾驭风格的能力。对于正式的文本，译文就应该具有相应的庄重感，对于非正式的文本，译

文也应该具有生动自然的韵味。这就要求译者在蒙汉两种语言的正式和非正式语体之间自如切换,使译文的语体风格和原文的功能目的高度一致。

(三) 标题语言的独特性

新闻标题是“新闻的眼睛”,新闻标题的语言运用具有很强的独特性与艺术性,用最精炼的文字抓住读者的眼球、概括内容、揭示主题。为了达到简短精悍的效果,标题语言常常大量使用省略,省略掉不影响核心意义的冠词、系动词、助动词等,形成了独特的电报体风格。为了增加表现力和吸引力,标题中广泛地使用比喻、拟人、对偶、设问等各种修辞手法,使语言更生动、形象,可以吸引人们的注意。

从结构上来说,新闻标题大多使用名词、动词等实词来构建信息框架,力求达到信息高度浓缩的目的。句式上多用不完整的句子、名词性短语、动词性短语,结构灵活。由于它的语言系统具有独特性,新闻标题的翻译成为了一项非常富有创造性的工作。译者不能只停留在对字面意思的理解上,还要去体会标题背后所蕴含的修辞匠心和内在韵味。在翻译实践当中,生硬的直译很难再现原文的精妙之处,译者必须在保证核心信息准确无误的前提下,充分调动目标语言的词汇和修辞资源来进行艺术的再创造。这就需要译者在保证标题信息的准确性的基础上使译文标题具有简洁、醒目、引人注目的特点,才能真正发挥它作为“眼睛”的作用。

三、语篇特征

新闻语篇宏观结构与组织方式,是保证信息有效传递的重要保证。从整体到局部,新闻文本在谋篇布局上也存在着自己的规则。认识这些语篇特点,对译者从整体上把握原文脉络,写出流畅连贯的译文有着非常重大的指导作用。

(一) “倒金字塔”结构

倒金字塔结构是新闻通讯社、报纸最经典、使用最广的篇章结构。其主要原则就是按照信息重要性递减的顺序来组织、安排内容。最重要的信息,也就是新闻的核心事实(时间、地点、人物、事件、原因、结果),被集中在文章开头的导语部分呈现出来。接着正文部分就按照事件经过、介绍背景、补充次要点的顺序详细展开。文章的结尾一般为重要性最低的部分,如背景资料、相关链接等,在版面紧张时可以被删去,也不会影响读者对主要事实的把握。

这样的结构完全是为了新闻传播的实用性而存在。它精准地对接了现代读者快节奏、碎片化的阅读习惯，让人可以在最短的时间里获取新闻的主要信息。给报纸编辑带来极大的方便，版面空间不足时可以从文章末尾逐段删除，而不影响新闻主体的完整性。对蒙汉新闻翻译来说，认识并尊重这样的结构非常重要。译者翻译时要尽可能保持原文信息层次和叙事节奏，保证译文也把最重要的信息放在开头。在对篇幅进行调整的翻译任务中，用“倒金字塔”结构给译者提供了一个清晰的标准来删减文字，即把结构顶端的信息优先保留下来。

（二）信息密度高、节奏快

新闻文本在有限的篇幅里传递尽可能多的信息，因此具有明显的密度大的特点。词汇上用大量的信息量大的实词、缩略语、专业术语；句法上多用短句和经过压缩的复杂句，尽量少用冗余连接成分。高密度的信息组织形式一起造成了快速紧凑的叙事节奏，使阅读者必须集中注意去读。

就译者来说，如何对待这信息“高速公路”是个难题。由于蒙汉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表达习惯不同，原文中紧凑的句子结构很难直接、对等地复制到译文中。如果译者固执地按照原文句式，势必会造成译文不畅，不符合目标语的行文习惯，读起来像听天书。

因此译者必须在充分理解原文信息结构的前提下，对句子进行拆分重组。对于原文中有多个信息点的长句，可能需要将原长句拆解为若干个逻辑清楚的短句来表达，从而降低目标语读者的理解负担。反之亦然，原文中逻辑紧密、语义连贯的短句群，在译文中也可以根据需要合并成一句话，用恰当的关联词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达清楚。这极大考验着译者对于两种语言的掌控能力，其最终目的就是保证信息不丢失的前提下，重新塑造出一种虽然符合原文快节奏的特点，但又符合目标语读者阅读习惯的语篇流动感。

（三）引语与消息来源的明确标注

为了保证新闻的真实性与权威性，标明消息来源并大量使用引语，是新闻语篇的又一显著特点。记者采用直接引语或者间接引语的形式，引用当事人、目击者、专家学者、官方发言人等的话语，可以使报道更生动具体，具有现场感，也可以通过第三方信源增强报道的客观性、可信度。同时在文中注明“据新华社报道”、“本报讯”等来源信息，是新闻职业规范的基本要求，也是对信息出处负责的表现。

这种对信源的严格要求，在翻译中也必须得到同等的遵守。译者需要将所有直接引语和间接引语都准确无误地翻译出来，完整保留原文中消息来源的标注信息。在处理引语的时候，主要注意说话人的语气、身份以及立场。直接引语的翻译要保持说话人原有的风格，无论是严肃的官方语言还是随意的个人表达。间接引语的转换，要求译者在转述其大意的时候，保持叙述角度的一致。还要注意蒙汉两种语言在标点符号使用和引语格式上的不同，译者必须按照目标语言的规范进行转换，使译文的标点符号使用和引语格式符合目标语言的规范，从而在读者心中树立起可靠、严谨的语篇形象。

第二节 信息传递与准确性

在应用翻译学的视域之下，政务文本以及新闻文本的翻译质量牵涉到信息能否被准确传达，而且也对社会舆论造成深远的影响。本节会细致探究信息传递过程中的准确度问题，剖析它的内涵，层次以及达成策略，给蒙汉有关领域的翻译操作赋予理论支撑和办法引领。

一、新闻翻译的核心：信息保真

新闻文本不同于文学文本，它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传达客观事实。因此，蒙汉新闻翻译的根本任务就是尽可能地保证信息保真，使译文读者所接受到的信息和原文读者保持高度一致。这是译者职业伦理的基本要求，又是文本功能得以实现的基础。

（一）事实性信息的准确无误

事实性信息是新闻、政务文本的基础，是事件的基本要素，也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啥人、啥时、啥地、啥事、为啥、咋样”。蒙汉翻译中对于此类事实性信息必须做到百分之百的准确。在翻译蒙古国某政府部门发布的政策公告成中文时，政策颁布机构、生效时间、适用范围、具体规定等任何一个细小的错误都会导致读者对政策的误解，造成负面的舆论或者实际操作上的混乱。译者要将原文的每一个事实要素都毫无差错地转译到译文中，不能有任何模糊或主观臆断。

这样严格要求事实准确性的工作，需要译者有强烈的责任感和严谨的工作态度。处理有关两国关系的政务文本时，一个人物的职衔，一个组织机构的名称，

翻译是否准确牵涉到外交礼仪和政治严肃性。翻译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的某项决议时，译者不仅要保证决议内容翻译无误，还要保证决议中涉及的有关人员的姓名、职务等与官方公布的标准译法一致。忠于事实，是译文公信力的基石，也是应用翻译学在政务、新闻翻译领域里的主要追求。这时译者所承担的就不仅仅是语言转换者角色了，还是信息核实者、事实传递的守护人。

（二）数据、时间、地点等关键要素的核对

数据、时间、地点是事实性信息中最为客观、最不能变通的部分，它们构成新闻事件以及政务信息的时空坐标和量化依据，它们的准确性不容有丝毫的模糊。在蒙汉翻译中，关键要素若出现谬误，很容易造成直接而严重的后果。一个小小数点位置的错误，会造成经济数据的严重失真；一个日期的混淆，会造成对历史事件的记述出现偏差；一个地名译错，会造成地理方位的判断失误。因此核对这些重要信息就成了译者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环。

译者翻译时应该建立严格的核对程序。数字方面，特别是经济指标、财政预算、人口统计等领域的长串数字，一定要反复核对原文，保证数字格式（千分位分隔符等）符合目标语的规范。时间上要注意蒙汉两种语言在日期、星期、纪年等表述习惯上的差异，做好正确的转换。蒙古语中特殊的纪年方式或者节日表达，需要译者查阅资料，将公历日期转换成中国读者容易理解的公历日期，或者加上必要的注释。

地名翻译要格外小心，除“乌兰巴托”、“额尔登特”这些已有约定俗成标准译名的城市外，对于许多偏远或者新出现的地点名称，译者需要依据权威地理信息资料、官方地图或者相关专业词典来进行翻译，力求音意结合的规范化与统一。译者不能只靠语感来翻译，主动查证、交叉校对是保证这些关键要素不出错唯一可靠的方法，这也正是应用翻译学所强调的译者研究能力。

（三）避免信息增减与扭曲

信息保真不仅要传递事实，还要保持信息量与原文对等，即不增加原文没有的信息，不减少原文已经包含的内容。译者是信息的传播者，而不是二次创作者或者审查者。任何未经许可的增删都会造成信息不对等，进而扭曲原文意图，在严肃的政务与新闻语境里要特别注意。

信息添加有时出于译者好心，为了给目标读者补充背景知识而添加，但这种好心的添加需要格外小心。错误的增译会破坏原文信息结构，还会把译者的个人

理解加到读者身上。信息删减更加危险，在政务文本中更加危险。原文中一个限定性状语、一个不起眼的从句等，都可能会隐藏着重要的政策界限、法律前提或者政治立场。译者为了追求语言简洁或者认为其不重要而主观地进行删减，就构成了事实上的信息审查，破坏了译文的完整性以及忠实性。像在一份有关矿产开发的双边备忘录翻译里，删掉“须经环境保护评估”这样一些定语从句，就可能把这项条款的性质彻底改变掉。

信息扭曲是比较隐蔽的失真形式，可以在词语选择、句式重组、语气调整等方面出现。译者在无意之中，会用带有更强或更弱感情色彩的词语去替换原文的中性词汇，或者通过改变句式逻辑来转移信息的焦点。这些看似很小的操作，累积起来就足以使译文的立场、态度与原文发生较大的偏离。所以译者一定要保持警觉，忠实地把原文的叙事结构、逻辑关系、语用情态传达出来，保证信息在跨语言的传递中不会发生折射或变形。

二、准确性的相对性与层次性

绝对的准确是翻译所追求的最终目标，但准确在复杂的翻译实践中往往是相对的、分层次的。译者要有敏锐的判断力，区分不同的信息层次对准确性要求的不同，在保证核心信息准确的前提下，对其他的非核心信息采取更灵活、更恰当的处理方式。

（一）核心事实的绝对准确

在新闻、政务文本的层级化信息结构当中，核心事实处在金字塔的顶端，它的准确是绝对的，不能商量。这些核心的事实直接回答了发生什么事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是整个信息文本的支柱。不论翻译策略怎样调整，译文风格怎样变化，核心事实的传递都必须达到完全对等、零误差。一篇关于蒙古国议会选举的新闻稿，它的主要事实就是选举日期、胜选政党、关键人物姓名以及所获席位数。对这些事实进行任何的改动，都会使译文变成虚假信息。

在蒙汉翻译中首先要把它们从原文里准确地找出来。这就对译者提出了要求，要求译者要有较好的双语能力，并且对相关领域的背景知识有基本的了解。识别以后，译者要用一切可能的查证手段来核实，首先要保证这些核心信息在原文中是准确无误的，然后将之准确无误地译出。此过程不能掺杂任何个人的解读或者价值判断。核心事实绝对正确，这是译者和读者间形成信赖的基础，也是政务、新闻翻译专业性的根本。

（二）背景信息的灵活处理

背景信息的翻译要求同核心事实的绝对正确相比要宽松一些，有一定的变通余地。背景信息是为了说明事件发生的境遇所造成的情境。背景信息包括历史源流、文化习俗和社会情况等等。由于蒙汉文化和社会存在差异，原文中那些本国读者习以为常的背景信息，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可能是非常陌生的。这时生硬的直译往往不能达到理想的沟通效果，译者要根据应用翻译学读者中心原则采取灵活的策略。翻译这些信息时，译者可以扮演文化中介的角色，常用的方法及适用场合见下表。

背景信息处理策略及应用场景表

策略	具体方法	适用场景	注意事项
增补解释	通过括号、脚注或句中短语等方式，对特定概念进行简要说明。	原文中的历史、文化、政治等专有术语对目标读者较为陌生时。	解释应力求简洁，不宜过长，避免打断阅读连贯性。
归化替换	用目标语文化中功能对等的表达替换源语中的文化意象。	源语文化特色浓厚，直译或解释均难以被理解，且存在功能对等物时。	极为审慎地使用，确保不损害核心意义和政治敏感性。
适度删减	在不影响核心事实传达的前提下，删除部分冗余或会造成理解障碍的背景信息。	某些背景描述对主旨帮助不大，反而增加读者理解负担时。	必须确保所删内容非关键信息，操作前需反复权衡。

（三）评价性词语的审慎选择

评价性词语即带有主观色彩、情感倾向或价值判断的词语，形容词、副词、部分动词、名词等属于这类词语，在新闻政务类文本里较易引起翻译争议。此类词语的翻译直接关系到译文的立场、语气、态度，其准确性更多在于把握好一个度，而不能简单地分为对错。译者处理时必须格外谨慎，仔细分析原文作者的意图。

政务文本中措辞的细微差别一般都会传递重要的政治信息。蒙古语里一个表示某项行为的词，其含义可能介于中文的“坚决”和“固执”之间。译者采用哪个中文词，就会直接决定读者对这个行为是持正面还是负面的看法。此时译者不能只依靠词典的释义来决定，而应该结合文本的整体语境、发言人的身份、当下政治的气候来揣摩原文最合适的语用内涵。翻译的目的在于再现原文的评价立场，而不是强加译者个人或目标语读者的预设立场。

新闻报道也是如此，一篇看似客观的报道也会通过使用“宣称”、“承认”、

“透露”等不同的引述动词来引导读者做出判断。译者在进行蒙汉转换的时候，必须对这些动词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准确的分析。把原文中性的表述译成带有怀疑色彩的“宣称”，这就歪曲了报道的原意。因此译者要建立丰富的、分层的评价性词语对应库，在实践中不断加强对于语篇态度的敏感度，争取让译文的评价意义达到“等效”，而不是“等同”。

三、应对信息失真的策略

在认识了信息失真的可能性以及表现形式之后，译者就应该主动采取一系列有效的策略，建立多道防线，保证译文的质量，避免翻译风险，从而扮演好跨文化信息传递者的角色。技术上可以达到的是表面的层次，而最重要的是译者的职业素质和伦理操守这些内在的方面。

（一）多方信源交叉验证

政务与新闻翻译速度快、强度大，依靠单一信源很容易出现错误、遗漏、偏见。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的准确性，主动进行多方信源交叉验证是译者必须具备的核心技能，也是防止信息失真的第一道防线。这就要求译者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原文的理解上，而要把自己定位为研究型译者。

当接到一份有关蒙中经济合作的蒙古语新闻稿时，负责任的做法不是马上动笔，而是利用网络搜索引擎查找关于此事的中文报道（新华社、人民网稿件）、英文报道（路透社、美联社稿件）以及蒙古国其他新闻机构（蒙通社）的报道。将不同的信源对于签约金额、项目名称、涉事人员等重要信息表述进行比较，可以及时发现原文中存在的笔误或者事实上的错误。政务文件译者可以查找发布机构官网上的文本，核对是否有官方语言版本。养成这种交叉检查的习惯，可以很大程度上避免译文成品中出现硬伤，提高译文成品的权威性、可信度。

（二）警惕文化偏见与意识形态滤镜

任何文本的产生都不能脱离它所处的文化和社会环境，政务和新闻文本更是如此。原作者写文章的时候不可能不受其文化背景、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这些就成为无形的文化偏见与意识形态“滤镜”。译者在翻译原文、生成译文时，也不能完全摆脱自己文化环境赋予的类似的滤镜。如果不加以警惕，信息就会失真。

译者首先要找出源语文本中含有的滤镜。用蒙古国媒体对某边境合作项目的

报道为例，其叙述角度、用词造句带有本国立场，突出项目对本国的好处。翻译的时候，译者要清楚自己是在翻译蒙古国的视角，译文要准确体现这个视角，而不是用中国读者的视角去改写或者过滤。译者的任务是传达原文作者对于这件事的看法，而不是客观上此事是怎么样的，或者我们应当如何看待此事。

同样不能忽视的是译者要自省，警惕自身的滤镜。作为一个中国文化和意识形态环境里的人，译者会本能地对来自蒙古国的某些表述产生认同或者排斥。潜意识的倾向会影响翻译时所用的词汇。例如原文中含有批评意味的语句被译者无意削弱了其批判性，有利于中国的句子被不自觉地加大力度加以渲染。克服此点的办法是不断进行自我训练，培养一种抽离的思维能力，把个人情感与职业判断分开，时刻提醒自己：任务在于传递信息，而不在于辩护或者宣传。

（三）译者中立立场的坚守

在政务以及新闻这些充满复杂利益博弈、多元价值观念的领域里，译者所持有的中立立场，实际上是防止信息失真最后的一道防线，并且也是其职业精神最高限度的展现。中立就是指翻译者不偏袒原文作者或译文读者任何一方，除了忠实于原文外，不为任何目的服务。译者要像透明的棱镜，只把光准确地折射过去，不能给光添上新的颜色。立场决定译者在受到各种压力的时候要坚守住职业的底线。

坚持中立立场，就是抵制美化或者丑化的诱惑。翻译介绍蒙古国社会发展成就的文章时，译者应该忠于原文的叙述，不能为了迎合一部分国内读者优越感而添加贬损性的修辞；翻译涉及两国分歧的官方文件时，更应该一字一句、不折不扣地转述双方的立场和措辞，不能为了所谓的“维持友好关系”而擅自削弱原文中的强硬表述。译者的工作是给沟通提供准确的文本基础，沟通的结果怎么样，应该是当事人自己来判断、自己来做决定。译者每一次善意的修饰都会把真实的分歧点遮掩住，反而给以后沟通埋下隐患。这就是应用翻译学处理高敏感度文本时，对译者提出的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

从根本上来说，中立立场既要依靠译者的专业能力来实现，又要依靠译者的专业能力来保障。只有译者在判断出原文的真实意图后，并且有足够多的语言资源来找到目标语里最恰当的表达，才能达到中立。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这个特殊领域里，译者是否能够保持中立，直接关系到信息能否顺利地跨境流通，国家之间能否互信，区域是否稳定。所以，守卫中立既是译者不能推卸的责任，也是译者专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集中体现。

第三节 文体风格转换

在翻译学的范畴之内,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话语信息对等,而是一条漫长的文体风格跨文化之路。译者要对原文的风格特征了然于心,用受众接受习惯的方式重新建构再现出来,保证信息的准确传递和文体风格吻合。

一、从源语风格到目标语风格的适配

蒙汉两种语言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文体规范、不同的审美取向。政务文稿和新闻文本都是规范性很高的文体,二者之间的风格差别也更为明显。风格适应的翻译过程是使译文功能得以发挥、信息可以充分表现出来的重要一环,也是检验译者双语能力和文化素质的一个方面。

(一) 汉语文风的简洁明快与蒙语表达的丰满详尽

汉语文风在政务、新闻上提倡简明、精炼、对称、有力。其句子结构大多以主谓宾为基本框架,层次分明,大量使用四字格、成语、并列结构,力求达到言简意赅、掷地有声的效果。政府工作报告中常见的“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发展、保持稳定”这样的表述,结构工整、气势宏大,充分体现出了汉语的这种特色。它的风格继承了汉文化里的思维方式和修辞传统,强调把信息概括得精准、浓缩得精炼。

与之相对应的蒙古语的表达习惯就比较丰满、详细,具有较强的描写性。语法结构以复杂的附加成分和后置从句为特点,句子重心往往后置,习惯在核心意思出现之前做充分的铺垫和修饰。直接将汉语简洁的句式翻译成蒙古语,会造成译文生硬突兀,甚至造成信息丢失,不能体现蒙古语语句式的行文逻辑和审美特点。因此译者在翻译的时候经常需要增益处理。这种增益不是无中生有,而是遵照蒙古语的表达范式,给原文的简洁骨架加上必要的“血肉”,比如加上说明性状语,用更富描绘性的动词或形容词,让句子更流畅自然,符合蒙古族读者的阅读预期。以促进就业为例,在翻译成蒙语时,就必须扩展为增加劳动就业岗位、扩大就业机会等具体圆润的表达方式,才能达到其真正的意义。

(二) 汉语文言色彩与蒙语口语风格的转换

现代汉语书面语,特别是在政务文本里为了体现庄重、权威和历史厚重感会适度使用一些文言或者半文言词语、句式。像莅临、高瞻远瞩、毋庸置疑这些词

语本身就带有典雅严肃的语体印记。汉语语境下这些成熟并被广泛认可的表达方式，在提升文本的正式程度上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向蒙古语翻译的时候，译者会遇到一个重要的选择。目前政务、新闻领域蒙古语更加注重语言规范性、准确性与大众接受度，语言风格更接近规范现代口语，力求简洁明了。如果将文言词句生硬地翻译成蒙古语，一方面会加大翻译的难度，另一方面也会使译文拗口难懂，脱离群众。优秀的译者会采用一种风格解码、风格重构的方法：准确把握汉语文言词汇在具体语境中所包含的庄重、正式的语体意义，并用符合现代蒙古语规范、同样能表现正式场合的词汇和句式来表达出来。这实质上是一种由源语“典雅风”到目标语“规范口语风”的创造性的转换，其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达到功能上的对等，而不是形式上的复制。

（三）保持新闻报道的客观语调

新闻报道的重要原则之一就是客观、中立、真实。记者在报道中应当隐藏自己的立场，用第三人称的方式来表述事实。汉蒙新闻文本在这方面有共同之处，但是实现客观性的方式却各有侧重。译者翻译时要对语调的微妙之处有所感受，保证译文也能够不带偏见的传达原文的客观态度。

客观语调的保持体现在对词语情感色彩的把握上。一个在汉语里看起来很中性的词，它在蒙古语里对应的常用词可能带有微弱的褒义或者贬义。用不同的动词或者形容词去描述同一个事件，就会微妙地影响读者对事件的看法。译者的任务就是在蒙古语的词汇海洋里，挑选出最不带感情色彩、最接近事实陈述的词。句式结构的选择也很重要。译者应该避免使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和引导性的句子，感叹句、反问句等，尽量使用陈述句。对于语调的细微之处加以控制，译者必须对原文有着深刻的认识，同时还要对目标语的词汇系统、句法表达了如指掌，才能成为信息“不失真”传递者。

二、标题的翻译艺术

新闻标题有“文章之眼”之称，在极短的篇幅里要完成概括新闻核心内容和吸引读者注意的双重任务。蒙汉新闻标题的翻译，远非简单的词语替换，而是一门集概括能力、修辞手段、文化理解于一身的微型创作艺术。翻译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新闻的传播效果。

（一）直译与意译的选择

标题翻译当中直译和意译的选择问题，历来便存在争议。当源语标题内容直白、没有特殊文化内涵、没有复杂的修辞手法的时候，可以采取直译。此方法可以最大程度上保持原文信息的核心及结构形式，做到忠实、准确。对于只传递信息的标题如“某某市召开经济工作会议”，采用结构对等的直译可以清楚明白地告诉读者新闻事件的基本要素。

当标题中包含浓重的文化色彩、双关语、谚语或使用目标语言中找不到对应形式的修辞时，只能意译。这时候如果硬直译的话，就会造成译文语义不通、让人费解，甚至产生误导。意译要求译者摆脱源语字面的束缚，真正领会标题的言外之意和功能目的，在蒙古语的表达范围内，用最契合、最自然、最能打动读者的方式重新创作一个标题。新的标题在字词上可能和原文大相径庭，但是精神实质和传播效果却能和原文高度一致。比如含有中国特有历史典故的汉语标题翻译成蒙语时，就要舍弃典故本身，提炼出典故的寓意，用一个蒙古语读者熟知的比喻或说法来代替，以求达到异曲同工的效果。

（二）修辞手法的再现与转换

汉语新闻标题为了加强表达力、吸引读者，常用对偶、比喻、拟人、借代等各种修辞手法。修辞格翻译是标题翻译的难处所在，也是看点。译者要面对再现、转换或者舍弃的选择。

处理这些修辞手法时，译者可以遵循以下路径：

1. 对等再现，如果在蒙古语中恰好有功能、形式相近的修辞格，那么译者就应当采用对等再现。汉语里的对偶结构，如果在蒙古语里能找到音节或者意义上大致对称的表达，那么就能很好地复制原文的节奏感和形式美。

2. 手法转换，即当源语的修辞手法在目标语中无法实现或者效果不好时，用一种修辞格来补偿另一种修辞格。原文中一个精巧的比喻，在蒙古语里找不到对应的喻体，这时译者就只能舍弃比喻，改用拟人或者夸张这些在蒙古语里更有表现力的手法，以此来弥补原文修辞效果的缺失，从而达到整体风格的平衡。

3. 意义阐释：对于文化壁垒较高的修辞，例如谐音梗、文字游戏等，一旦用修辞的方式去移植就很难成功。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最保险的办法就是抛弃修辞的形式，直接清楚地把其中所包含的主要信息和情感态度表达出来。虽然原文的文采在这里被牺牲了，但是信息传递准确无误，没有产生误解，这里体现的是功能优先。

（三）吸引力与概括性的平衡

新闻标题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吸引力和概括性。概括性要求标题准确反映新闻最核心的内容，使读者一眼就能知道新闻的主旨；吸引力则要求标题生动有趣，能引起读者的好奇心，使读者有继续读新闻正文的欲望。蒙汉翻译中怎样找到两者的最佳平衡点，是对译者综合能力的最好考验。

译者必须忠于原文，不能为了吸引关注而夸大事实，这是新闻翻译的职业道德底线。标题的概括性是最基本的要求，绝不能放弃。译者应当准确提取出新闻的五 W—H（即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为何、如何），用简洁的标题来体现。同时译者还要考虑蒙古语读者阅读心理及审美习惯，避免因过于拘泥原文形式而使译文标题显得平庸。译者可以用选词、句式变换、采用蒙古人喜爱的方式等办法给标题增加生气。就如在已划定的轨道上跳舞一样，不能脱轨，但也要跳出优美的舞姿。成功的标题翻译，是使蒙古族读者看到标题后就能明白新闻的大意，并产生阅读正文的欲望。

三、引语的处理技巧

政务报告、新闻报道里，引语（直接或者间接引用他人话语）占据着非常重要的位置。它是信息来源的凭证，使文本更权威，更有可信度，也是不同的“声音”让文本更生动，立体。引语翻译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文本的真实性以及风格的完整性。

（一）直接引语与间接引语的转换

直接引语（被引号括起来的原话）和间接引语（转述别人的话）在功能、风格方面存在差异。直接引语能更好的保留说话人的原貌、语气、个性，现场感强，间接引语更简洁，利于叙述，使文章节奏更紧凑。大多数情况下，蒙汉翻译会保持原文引语的形式，即直接引语译为直接引语，间接引语译为间接引语。但有些情况下两者之间需要转换成翻译技巧。

当汉语原文中直接引语过长、结构复杂、包含大量口语化或者非规范的成分的时候，为了使蒙古语译文更流畅、易读，译者会把直接引语转为间接引语。经过提炼核心信息，用更加书面化，更加简洁的蒙古语进行转述，可以防止译文过长过晦涩，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相反，有时为了突出某个人物某句简短有力的话语，即使原文为间接引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可以确认原话），也可以把间接

引语改成直接引语,加强其力度和感染力。这样的转换不是随意进行的,而是在文本整体风格、信息焦点和目标语篇章习惯三者综合考虑之后得出的。

（二）引语中文化负载词的解释

引语处文化负载词最密集,因为这里记录的是个人话语。说话人会不由自主地使用一些带有浓厚地域文化色彩、历史背景或者行业特色的词语、典故、俚语。文化负载词对于源语读者来说是心领神会的,但是对于目标语读者来说却可能造成理解障碍。处理不好就会把引语变成让人摸不着头脑的话。

对于这些词语可以用解释性翻译法来处理。一种常见的方式是“文内释”,也就是翻译这个词之后,再用括号或者脚注的形式,简单地加注一下它的背景或者含义。此法既可以保持原文的异域风情,又可以保证信息的传达。另一种办法就是用蒙古语文化中功能相似的表达来代替。即用一个蒙古族谚语去对应一个汉族俗语,虽然字面上意思不同,但是蕴含的哲理和语境效果是一样的。还有一种是“阐释法”,即不局限于翻译某一个词,而是把这个词所包含的整个意思在译文中自然而然地铺展出去,使其融进引语的上下文中。选择哪种策略,取决于文化负载词在引语中是否重要、文本的类型以及译者所预设的读者群体。

（三）保留引语的个人风格与情感色彩

引语的价值不在于它所传递的事实信息,而在于它所流露出来的说话人的个人风格以及感情色彩。一个人的谈吐可以反映出一个人受过怎样的教育、处于什么样的社会地位、当时的心情如何以及具有怎样的性格。优秀的译者在翻译引语的时候,会努力成为“声音的模仿者”,试图在译文中再现说话者特有的“音色”。

此项任务要求译者不能只停留在词汇层面的对等,而是要进入到语用、文体层面去。原文引语是学者的语言,语言精确,逻辑严密,那么蒙古语译文也应体现出相应的学术气息和严谨的风格。如果引语是基层干部说的,语言质朴、鲜活,夹杂着方言土语,那么译文就要努力在蒙古语里找到与之相对应的朴素自然的表达方式,而不能将其“美化”。情感色彩的传递也不可忽视,原文中的讽刺、喜悦、愤怒等情感,要借助蒙古语里对应的感叹词、语气助词、词汇挑选以及句子安排去恰当体现出来。这就要求译者具备较高的共情能力和双语驾驭能力,只有这样,译文中的“人物”才能“活”起来,言谈举止符合身份、心境,达到传神达意的效果。

语言风格对照表

特征	汉语政务 / 新闻风格	蒙古语表达风格	翻译策略
句式结构	简洁明快，主谓宾	丰满详尽，重心后置，多附加成分	增益处理，适应蒙语习惯
词汇倾向	简练，四字格，成语	描绘性强，具体化	扩展细节，丰富描写
语体色彩	庄重典雅，含文言色彩	规范口语化，清晰明了	风格解码与重构，功能对等
客观性	第三人称，立场中立	避免褒贬，词汇中性选择	选词精确，避免主观句式
引语处理	直接 / 间接引语	灵活转换，文化负载词解释	尊重原意，兼顾目标语习惯

第四节 受众接受度分析

翻译的本质就是达成有效的交流，交流是否成功，取决于接受译文信息的受众能否正确、流畅地理解译文。在应用翻译学的视域之下，译者不仅仅只是语言的转换者，而且还是跨文化的沟通协调者。本节主要从目标受众认知背景、译文可读性提高、受众反馈和译文修订这四个方面，以受众为出发点来构建翻译质量评判和改进的系统。

一、目标受众的认知背景

充分了解目标受众的认知背景，是做好翻译工作的前提。译者必须对受众的群体画像有准确的把握，包括受众的知识层次、文化习俗、思维模式、阅读旨趣等等，只有这样，译文才能真正走进读者的心中，被读者所深刻地理解并广泛地接受。

（一）蒙古族读者的知识结构与文化习惯

蒙古族读者的知识结构、文化习气，被它特有的历史传统、生产方式、生活习气以及民族心理所浸染。传统上蒙古文化同广阔的草原、绵延的游牧传统、信仰的藏传佛教联系紧密，这些因素一起形成了该族群特有的认知图式。他们的思维方式中形象思维和辩证思维占较大比重，语言表达上偏爱使用来自自然、游牧生活的比喻、谚语，从而形成了韵律感强、画面感浓的语言风格。如果只是把抽象的政治、经济概念直译出来，没有相应的文化经验做支撑，读者就会觉得困惑。

与之相反的是汉文化，它是农耕文明的产物，重视集体主义、宗法伦理和儒家思想，形成了严谨内敛的文化特征。这在政务、新闻文本上就体现为语言结构

严谨、逻辑性强、书面语色彩浓。蒙汉翻译的问题之一就在于怎样跨越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认知系统。译者需要能够辨识出会引发认知障碍的文化缺省信息,并给出恰当的调整或者阐释。这不仅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双语要求,也对译者有着很深的文化心理、历史记忆以及思维的同理。只有这样,才能在译文中准确传达出原文的主要思想,又以蒙古族读者容易接受的方式来呈现,从而有效地避免由于文化隔阂引起的信息失真、理解偏差。

（二）不同年龄、职业受众的阅读偏好

目标受众不是铁板一块,年龄、职业、教育水平等不同造成了阅读偏好的天差地别。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性,在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实践中,是达到精准传播的必然要求。对于年长的蒙古族读者来说,他们大多数喜欢传统的、有文学色彩的蒙古语表达方式,对最近出现的政治术语、网络用语不熟悉。他们更习惯舒缓的阅读节奏、富有韵律的句式,对于过于“西化”或者“汉化”的表达方式可能会产生阅读障碍。

反观年轻一代的蒙古族读者,尤其是城市里的学生和白领,由于长期接受双语教育,并且经常接触互联网,他们的语言习惯是蒙汉交融的。他们对新概念、新词汇的接受速度快,阅读兴趣也更倾向简洁明了、信息量大文本。职业不同,阅读需求也不同。对牧区群众的农牧业政策文件进行翻译时,就要多使用他们所熟悉的词语,语言要朴实、通俗;对政府公务员、学者等专业人士的报告或者新闻评论,则可以稍微保留一些专业性或者理论深度。因此,在翻译时要根据预设的受众对象灵活调整策略,使规范性、通俗性、传统、现代之间得到最好的平衡,才能达到因人而异的差异化传播效果。

（三）跨文化读者的接受心理

跨文化传播就是符号的跨文化流动和解读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读者的接受心理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蒙古族读者以跨文化视角去解读汉文政务或者新闻译作的时候,其心理活动会被文化认同、心理距离、信息过滤这些繁杂因素一同左右。文化认同属于影响接受心理的第一个要素。读者在阅读译文的时候会自觉地寻找文化共鸣,那些符合其文化传统的译文,能够引起共情的译文,更容易得到读者的接受和信赖。反之若是译文带有文化优越感,或是对蒙古族文化元素的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引起读者的心理抗拒,进而导致信息无法被接收。

心理距离就是指读者对源语文化感知。如果翻译过程中过于保留汉语的表达

方式和句式结构，就会使读者感到陌生，即产生所谓的翻译腔。这不但会加重认知负担，还会影响信息的有效传递。优秀的翻译者要尽可能地减小这种心理距离，善用归化的方法，使译文的语言风格更接近蒙古语的表达习惯，让读者有阅读一篇用母语写成的原创作品的感觉。

信息过滤属于读者在接收到信息之后采取的一种心理防御机制。对于承载着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的政务、新闻文本，读者会潜移默化地用自己的价值体系当作“筛子”去筛选。特别是在民族历史、宗教信仰、地方政策等敏感问题上，译者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还要对词汇、表达选择慎重，考虑蒙古族读者的情感和接受习惯，避免使用会引起误解或负面情绪的表述。译者要主动担当起敏感的文化中介角色，不仅要传达字面的意义，还要在充分理解双方文化心理的基础上，促进善意而高效的交流。

二、提高译文可读性的途径

了解了受众之后，翻译的主要工作就是用合适的方法和手段提高译文的可读性。也就是说，译文不但在语法上不能出错，语义上也应当表达清楚，更重要的是译文要通顺流畅、逻辑严密，文化内涵也要妥帖处理，最终目的是使目标读者能“读得进去、读得懂、读得顺”。

（一）语言简洁化、通俗化

政务和新闻文本，尤其是前者，常常出现句子冗长、结构复杂、用语抽象的情况。汉语公文中的长定语、长状语结构以及层层嵌套的复句，如果生硬地直译成蒙古语，势必会带来句法上的混乱，严重影响读者的理解速度。因此语言的简化通俗化，是提高译文可读性的关键。简洁化的要求就是翻译者要在准确理解原文逻辑的基础上，敢于打破原文的句式束缚。具体操作时可以灵活使用拆分法，把一个长句拆解成几个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的短句，使主要信息更突出。

通俗化就要求译者的词汇选择要贴近广大读者的语言实际。政务文本、新闻文本里面有很多专业术语、缩略语，比如“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新常态”之类，对普通蒙古族读者来说比较陌生。译者不能满足于创造出一个僵硬的对译词，而应该根据上下文，用解释性翻译或者意译的方式，它的核心含义用平实易懂的语言表达出来。就像把“铁饭碗”译成终身稳定的蒙古语表达方式，而不是直译。通俗化不是对译文的准确性、严肃性的背叛，而是在保证信息不失真的前提

下,尽可能降低读者的解码难度,让政务信息、新闻资讯为最广大的受众服务。这对译者来说便有了更高的要求,既得懂政策,又得会表达,在雅和俗、信和达之间找到一个绝佳的契合点。

（二）逻辑清晰化、条理化

文本的逻辑就是文本的骨架,逻辑清晰可以使得读者很快地把握住文章的整体结构以及核心思想。汉语是意合语,句子间的逻辑关系往往要读者自己去理解;而蒙古语是黏着语,更倾向于使用显性的语法手段来连接意群,把逻辑关系外显化。因此,译者的一项主要工作就是把原文中隐含的逻辑关系显性化,使得译文条理更清晰。这就首先需要译者充分阅读原文,把原文的论证结构、因果关系、并列递进、转折等关系理清楚。

在翻译的时候,译者要灵活地用蒙古语中种类繁多的连接词、语气助词、句式结构来表现这些层次关系。原文没有明显的关联词的并列句在翻译时可以适当补充一些表示“同时”、“并且”等意义的词汇来让读者理解句间关系。对结构松散、层次不明的段落来说,译者可以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对语序做小范围调整或重组段落,从而使得论述的逻辑顺序更贴近蒙古族读者的阅读习惯。这就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文本编辑和优化了。经过逻辑上清晰化、条理化的处理之后,译文就如同一位称职的向导,带领着读者在信息的丛林中一步步地走,保证读者能够跟上作者的思路,正确理解文章的主旨。

（三）文化背景的适度补偿

政务和新闻文本中常常包含很多根植于源语文化的背景信息,这些信息对源语读者来说是常识,但目标语读者却不知道,成为理解上的“真空地带”。所以,适当弥补文化背景知识可以保证信息准确传达,防止跨文化误解。补偿的目的是为了缩小文化差距,使蒙古族读者可以和汉族读者得到相同的信息量与阅读体验。

补偿的方式灵活多样,应因地制宜。下表列出了几种常见的文化补偿方式、适用情境及示例。

文化背景补偿方式简表

补偿方式	适用情境	具体方法与示例
加注解释法	针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典故、政治术语、社会现象等。	在译文中通过括号或脚注添加简短说明。例如，翻译“小康社会”时，除给出对译词外，可补充说明其意为“物质生活比较富裕的社会”。
意译或替换法	当源语的文化意象在目标语中完全不存在，且难以通过简短解释说明时。	采用意译或寻找功能对等的文化意象进行替换。例如，将“龙头企业”意译为“行业引领者”或“起带头作用的企业”，使读者能即刻领会其核心含义。

适度才是文化补偿的原则。补偿得不够，读者会感到困惑，补偿得太过了，就会破坏阅读的连贯性，甚至会让读者觉得自己的理解力被小看。译者需要根据目标受众的认知水平，作出正确的判断来决定是否需要补偿、补偿多少以及怎样补偿。这样的判断力是评判译者的跨文化沟通能力高低的标志，它要求译者不能仅仅是语言专家，还应该是一位敏锐的文化观察者、沟通的艺术大师。

三、受众反馈与译文修订

翻译工作并不以译稿的完成来结束。从应用翻译学的角度来看，译文的生命力就在于它现实世界中的传播与接受效果。因此构建起一套科学的受众反馈和译文修订机制，就成为翻译质量不断改善、良性循环的保障环节。

（一）建立读者反馈渠道

若想知晓受众的接受效果，就必须主动开辟并维护起多样化的读者反馈渠道，由被动等待变为自主收集。在信息时代，除了信件、电话等传统的手段之外，更要利用好网络技术，建设起高效的互动平台。可以在政府官方网站、新闻客户端或者社交媒体平台上设立专门翻译建议栏目，让读者随时就译文的准确性、流畅性、术语使用等各方面提出建议。即时反馈对于及时发现并纠正明显的错误非常必要。

除了线上渠道之外，线下活动的定期开展也是获取深度反馈的一种方式。可以组织译者、审校专家以及不同背景的目标读者代表（基层干部、牧民、学生、学者等）参加翻译研讨会或者焦点小组访谈。在这些活动中可以就某一个翻译文本样本展开详细的讨论，直接听取读者真实的阅读感受以及具体的修改意见。面对面交流获得的往往比线上评论更加具体、深刻的意见，也能使译者更加直观地感受到读者的认知过程以及思维方式。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多层次、立体化

的反馈网络来走出“象牙塔”，聆听一线读者的声音，为译文修订提供第一手的资料。

（二）分析反馈意见并应用于实践

收集来的反馈意见是宝贵的财富，可是它的价值只有通过系统的、科学的分析才能得以发挥。翻译机构或者团队应该制定出标准的流程来处理反馈信息。需要把反馈分为词汇术语、语法句法、风格语域、文化理解等类别。对于反映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某个关键术语的译法存在较大争议，某种句式结构被普遍认为拗口等等，就需要加以重点研究。

分析过程不能停留在表面上，而应该去探究其背后的原因。读者普遍认为某项政策词汇的翻译令人难以理解，那么在分析时就要考虑译词是否过于生僻的原因。还是该词所代表的概念在蒙古族社会中没有相对应的东西，需要做更多的解释性翻译呢？深入的根源分析才能找到根本的解决办法。分析出的结论要落实到具体的翻译实践中，表现在几个方面：

1. 即时修正，对于线上发布的译文，一经发现确实错误或者引起重大争议的，立刻修改并更新。
2. 编制术语库、风格指南，即将经过充分讨论并达成一致的优秀译法、应该避免的常见错误、不同文本类型翻译规范等系统化整理成术语库、风格指南。所有译员都能参考这些工具来保证项目之间的一致性以及整体的质量。
3. 定期培训交流，内部培训及案例分析会，译者间交流从读者反馈中得出的经验和教训，共同攻克翻译难关，提升整个译者团队水平。经由以上过程，零散的读者意见就能转变为促进翻译质量不断改善的制度化力量。

（三）形成动态优化的翻译机制

翻译质量的改进没有尽头，它依靠实践，而且持续改进。建立读者反馈渠道，分析并应用反馈意见，目的就是为了建设一个动态的、不断改善的翻译机制。此过程为循环往复、螺旋上升的过程，有翻译、发布、反馈、分析、修订、再翻译等环节构成的闭环系统。每一道翻译任务都是对已有知识和规范的检查，而每一次读者的反馈又成了下次优化流程的开始。

动态是本机制的主要特点。语言本身就在不断发展，社会在不断前进，读者的需求和认知也在同步改变。也就是说不存在一劳永逸的完美译文。一个十年前被普遍接受的术语翻译，在今天也许已经显得太过陈旧或者不够准确。因此翻译

机制应该有自我更新和适应变化的能力。随着新政策、新事物的不断出现，术语库要随时增补、修订；伴随读者媒介接触习惯的改变，译文的呈现方式和语言风格也要做出相应的调整。

形成这样的一个动态的优化机制，对提高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的质量以及传播效果有重大意义。把翻译活动由个体的、经验性的劳动，变为标准化的、科学化的、集体协作的专业实践活动。从长远的角度而言，该机制良好地运转着，它有益于蒙古语在政务、新闻这些现代领域里的规范化与发展，使得它能够更为精确地承载并表现复杂的现代概念，从而提升语言本身的生命力。最后，一个健康有效的动态优化翻译机制，会给民族地区的信息流通、政策落实、文化交融、社会和谐稳定提供长期稳定的语言服务保障。

第四章 蒙汉政务文本翻译实践分析

应用翻译学注重翻译的实用性和社会功能，政务文本蒙汉互译就是其视域下典型的研究对象。本章主要针对蒙汉政务文本翻译的实践进行集中研究，用具体案例分析来解析翻译过程的宏观策略、微观技巧，寻找出翻译内在规律及特殊性，从而给改进政务翻译质量与成果提供实际参考。

第一节 政策文件翻译案例

政策文件属于政务文本的主要部分，政策文件翻译质量好坏关系到政策传达与执行。本节选取具体的政策文件译例，从文本选取、背景分析、版本对比等方面入手，为后面的宏观策略与微观技巧分析做好铺垫。

一、案例选取与说明

选择有代表性的翻译实例是进行研究的开始。政务文本种类繁多，覆盖面广，为了使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典型性，必须选择在政治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并能充分体现政务文本语言特点和翻译难点的文件。

（一）选取《政府工作报告》等典型文件

政府工作报告属于政务文本里最具代表性的一类。作为国家或者地方政府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上作出的报告，它全面总结了上一年的工作情况，并且系统地提出了新的一年发展目标和政策措施。其内容具有很高的权威性、政策性、指导性，语言风格庄重、严谨、规范，是观察和分析政务文本语言特点及翻译策略的窗口。《政府工作报告》的蒙古文版本具有官方权威性，是进行翻译对比研究的优良语料。

本章还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三五”规划纲要、地方性法规条例等其它类型的文件纳入研究范围。这些文件同《政府工作报告》既有共性又有各自的特色。五年规划纲要注重长远战略规划，语言更具有宏观性、前瞻性；地方法规条

例则更具体一些，包含了很多法律术语和行政管理细节。将它们纳入分析范围，研究范围就会扩大，结论也会更具有普遍性。

选择这些典型文件的主要目的，就是集中反映蒙汉政务翻译所面临的共同问题。包括怎样处理高度程式化的政治术语、怎样再现原文严谨的逻辑结构、怎样准确传递复杂的政策内涵、怎样应对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和表达习惯上的巨大差别。对于这些文本翻译实践的分析可以得出一些普适性的指导原则和方法，给蒙古族地区的政策信息翻译提供借鉴，进而提升民族地区政策的准确性、有效性。

（二）案例文本的背景与重要性分析

把握案例文本的产生背景及其社会功能，是展开翻译分析不可缺少的一环。政府工作报告以及各种政策文件，发布背景一般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等重要的政治活动，这些场合本身就具有很高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报告内容是过去工作的一个总结，也是未来发展的公开承诺与行动指南，关系国计民生和区域发展方方面面的事情，具有重大意义。

相应的各种政务文本的蒙文译本在各方面都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内蒙古等民族地区蒙古族群众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的保障途径主要是蒙文译本。它把国家的方针政策、发展蓝图、法律法规用蒙古族人民熟知的母语表达出来，消除了语言障碍，让政策信息能够“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对于增强民族认同、凝聚社会共识、促进民族地区与国家同步发展有着无法估量的作用。译文质量决定政策信息传达的深浅、宽窄，好的译文可以引领社会预期，凝聚民众力量参与经济社会建设，反之则会造成误会，妨碍政策执行。所以蒙汉政务文本翻译不单单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它肩负的政治敏感性高、社会责任重大的责任以及促进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的重大任务。

（三）翻译版本对比选择

为了保证分析的客观性和深度，本文主要选取官方发布的蒙文译本来做比较分析。官方译本一般由翻译机构的资深译者来完成，会经过多次校对审定，是蒙汉官方译本中质量较好的代表作。通过仔细对比译本和原文的句子、段落，可以看出译者处理某个翻译难题时所使用的方法和策略。

对比分析的目的不是简单的评判对错，而在于解释翻译现象。本文主要从词汇、句法结构、信息重组等方面探究译文和原文的异同，并探究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原文中一个长句在蒙文中又是怎样拆分重组的？原文中出现的政治新词，

在蒙文中是用音译、意译还是创造新词的方式处理的？原文使用的方法，译文中是保留、替换还是舍弃了？

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拓宽研究视角，本文也会参考非官方译本或者学者译例。多版本对照可以全方位地看出不同的译者怎样处理同一个翻译难点，使用了哪些不同的翻译策略。这样一种对比分析的办法有益于我们冲破单一译本的限制，从较为宽泛的角度领悟蒙汉政务翻译的普遍法则，给译者今后的操作供应更多样化的办法和思路。整个对比过程会以应用翻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主要关注翻译的“目的”与“效果”，也就是译文在目标语境中是否达到了原文的交际目的。

二、宏观策略分析

宏观策略是对全部翻译工作大方向的控制，决定了译文的基本风格和功能定位。蒙汉政务文本翻译中译者动笔前就要对文本的风格、结构、意图等有全局的把握，进而确定一以贯之的翻译原则。

（一）整体风格与语气的把握

政务文本的风格和语气具有很强的程式化特点，一般是庄重的、严肃的、客观的、权威的。这种风格是其作为官方话语体系一部分的必然结果。在蒙汉翻译时，首先要做的工作就是把准并表现其独具特色的风貌与语气。译者应当作一个谨严的建筑师，将译文这座建筑的总体风格同原文设计蓝图协调一致，任何个人化的、任意的处理都会造成文本严肃性和权威性受损。

为了达到风格一致的目的，译者会选择系统使用书面色彩浓郁、语义明晰的词句，不会使用口语化或者含糊不清的词语。在句法上倾向于用结构完整、逻辑清晰的句式来体现政务文本的规范性。拿翻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这种说法来说，蒙文译本就会选择用一个和它相对应、同样具备很强概括性且很严肃的官方术语来代替，而不会做出太过通俗的解释。经过这样的处理，译文读者所获得的语气体量和权威感几乎与原文读者没有差别。

1. 词汇选择的对等性，长期实践当中，译者就会慢慢形成一个政务核心词汇的对应库。以新常态、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高频政治术语为例，官方译者会经过研讨、审定，确定出统一、规范的蒙文对应词，在各类文件中保持一致。一些高频的政治术语的翻译策略见下表。这样的—个标准化流程就是保证整体风格一致的基础。

部分高频政治术语翻译策略表

中文术语	术语特点	蒙文翻译策略
新常态	经济领域概念,内涵丰富,具有动态发展性。	经官方研讨审定后,采用统一、规范的意译或对应词,确保在不同文件中保持一致性,避免歧义。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政策性强,结构复杂,涉及多个经济要素。	倾向于采用结构对等的意译方式,准确传达改革的核心内涵,保证术语的严肃性与专业性。
人类命运共同体	蕴含深刻哲学理念和价值追求,文化色彩浓厚。	采用能够体现“共同”“共享”理念的意译表达,在蒙文语境中寻求功能对等,以引发文化共鸣。

2. 句法结构的庄重性,在汉语政务文本中常见的长句、复合句翻译成蒙语的时候,虽然要按照蒙语语法规则进行必要的调整,但是大体上保持一种平实、庄重的陈述语气。译文不会滥用感叹句、不会使用零散的短句来表现客观、冷静的态度,正好与政务文本发布政策、陈述事实的定位相契合。

（二）篇章结构与逻辑的再现

政务文本的篇章结构十分清晰,逻辑也十分严密。像《政府工作报告》就会用“回顾过去 - 分析形势 - 展望未来”这种宏大叙事的框架,里面还会用小标题或者数字序号来分层,就形成了一个有层次的说理结构。忠实还原原文篇章结构及逻辑关系,在蒙汉翻译里是保证信息完整准确传达的宏观手段。这时译者不只是一个语言的转换者,还是一个逻辑的再创造者。

在具体的实践中译者首先要把原文的宏观结构完整地移栽过来。中文报告里的一、二、三级标题,在翻译成蒙文的时候,会被原样保留下来,并且格式上力求一致,给蒙语读者提供清晰的阅读指引,也是实现篇章连贯的第一步。更重要的是再现内在逻辑关系。政务文本中有因果、转折、并列、递进等逻辑关系,这些关系用关联词、语序等形式体现出来。译者要准确地识别出这些逻辑关系,并用蒙语中的相应语法手段或者逻辑连接词来表现出来。

在分析一段有关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论述的时候,原文用“既要……也要……”“绝不能以……为代价”这样的句式来表现两者的辩证关系。译者在翻译时,必须紧紧把握住这个逻辑中心,在蒙文中寻找功能对等的表达方式,用特定的连词、副词或者改变语序的方法,把“平衡发展”的思想清晰地传达出去。如果忽略掉这种深层逻辑,只是做字面转换的话,就会严重削弱译文的论证力量,甚至会造成歧义。因此对篇章逻辑的深刻理解并准确再现,是评判政务翻译是否成功的标准,它要求译者有超越单个句子的宏观视野和很强的逻辑分析能力。

（三）政策意图的准确传达

政策意图是政务文本的灵魂，它藏在字面意义之下，是文本要达到的最终目的和社会效果。准确传达政策意图是蒙汉政务翻译的最高境界，也是它的主要难点。这就要求译者不能满足于语言形式的对等转换，而要深入到文本后面去，成为一名政策解读专家。就这项宏观策略而言，它给译者提出了比较高的政治敏感度和政策理解力的要求。

传达政策意图首先要对关键词语的“言外之意”有准确的把握。政务文本中很多表述，如“稳中求进”“提质增效”“高质量发展”等等，其内涵是动态的、丰富的，不是固定不变的。译者要联系当前的语境以及政策背景去领会这些词的深刻意思。如稳中求进，不同年份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稳和进的侧重点也不同。译者需凭借词语的选择和组合做细微的调整，把这种微妙的政策导向用蒙文翻译的方式表现给读者看。

政策意图的传达还要妥善处理文化差异。某些在汉文化背景中不言而喻的政策理念，在蒙古族文化语境下必须加以适当的解释或者调整，才能被目标读者准确地领会。这不是对原文的任意删增，而是根据功能对等理论所作的创造性的转换。像表述某项惠农政策时，如果只是生硬地直译政策术语，就会使牧区的蒙古族群众感觉陌生。此时，译者可以在不改变政策原意的前提下，适当加入一些当地民众熟知的表达或者事例来加以说明，使政策精神更加接地气、更容易被接受和理解。只有这种以达到最佳沟通效果为目的的翻译策略，才真正体现了应用翻译学“以用为本”的思想，保证了翻译活动最终要服务于政策落地、国家治理的现实目的。

三、微观技巧剖析

在宏观策略的统率之下，翻译的最后实现要依靠一系列具体而微的翻译技巧。蒙汉两种语言在语法、词汇、修辞习惯上存在着显著的差别，再加上政务文本的特性给翻译带来了更多的困难。这一节主要是对翻译长句、模糊语、修辞格等进行分析。

（一）长难句的拆分与重组

汉语政务文本里时常会出现结构繁杂，修饰成分很多的长难句。它是书面语体庄重性的一个体现，也是用有限篇幅来承载海量信息的一种技术。但是蒙语的

语法结构是主宾谓，习惯用形态变化、后置词来表达语法关系，不用嵌套的从句。因此，将汉语长句直接对译成同样冗长的蒙语句子，很容易造成语序混乱、语义不清，不符合蒙语的表达习惯。遇到这样的问题时，“拆分”和“重组”就成了非常重要的微观处理手段。

拆分就是将汉语原文的一个长句，根据它里面的逻辑关系，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短句。分段的根据一般是原文的意群、逻辑节点。一个由并列、转折、因果等关系构成的复杂单句，译成蒙语时可以拆成两句、三句乃至更多的句子，每句表达一个相对完整的意义单元。这样可以降低句子的复杂性，使信息层次更清楚。

重组，即拆分后按照蒙古语的语序规则和行文逻辑，将这些短句重新排列。汉语的重要信息一般放在句末，蒙语句子的核心——谓语动词也在句末。在重组的时候，译者要辨别原文的主次信息，按照蒙语中先条件后结果、先原因后主句的逻辑习惯来调整句子的顺序，使译文逻辑通顺、表达自然。综合使用“先拆后组”的办法，译者好似解开一个繁杂的绳结，找到线头，理清脉络，再把绳结重新编成一个结构清楚、符合目标语规范的作品，在信息准确性和语言自然性之间求得平衡。

（二）模糊语与限定语的翻译

政务文本语言存在着一种“精确性”和“模糊性”辩证统一的特点。一方面需要使用大量的限定语来保证政策界限的清晰、执行标准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常常使用模糊语，为政策执行留有必要的弹性和解释余地。怎样恰当处理这两种表达方式，就成为蒙汉翻译中的一项精细工作。

限定语翻译时讲求准确对等。限定语是表示范围的、程度的、时间的、数量的词语，比如，基本实现、所有在册、到年底前、不低于等等。在蒙文中找到完全对应的语义和功能的词语，不得有丝毫的偏差。“基本实现”不能简单地翻译成“实现”，必须找到可以体现“接近完成但未完全完成”状态的蒙古语表达。精确性是防止政策被曲解或者滥用的语言防线。译者处理限定语，就像进行精密测量一样，任何一个刻度的偏离都会造成严重后果。

模糊语的翻译要遵循功能对等。政务文本里的模糊语，像“适度”“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强”“积极稳妥”之类的，它们的模糊性并非随意而为，而是有着特定的政治或者行政功能。有关部门赋予了一定的灵活性，积极稳妥体现出了在推进工作中平衡主动作为和风险防范的要求。译者不是要解释模糊性，而是在

蒙文中寻找能发挥相似功能的、在一定的语境下被目标读者所理解的那种模糊表达。强行把“有关部门”具体化,或者把“适度”量化,都是对原文意图的曲解。因此译者要充分理解模糊语在特定语境中所具有的“言外之意”,用蒙语中具有同样“策略性模糊”功能的词语或短语来再现它,达到更高层次的忠实。

(三) 排比、对偶等修辞的处理

为了使语言具有气势、节奏和感染力,汉语政务文本,特别是带有宣传动员性质的政府工作报告等,大量使用排比、对偶等修辞方式。修辞格不但是语言的点缀,更是加强观点、凝聚共识的手段。但是由于蒙汉两种语言在音韵、句法、文化传统上存在着差别,原文的修辞形式很难直接翻译到译文中。所以,怎样对待这些修辞格就成了试译者本领的另一个问题。

翻译排比句的时候,译者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如何在保证内容对应的条件下,把原文一层套着一层、气势如虹的句式效果翻译出来。一种经常采用的方法就是追求形式和功能的统一。如果蒙语的语法结构允许建立与原文相似的平行结构,译者就会努力维持原文的句式,并且使用词义接近、音节数目相仿的词语去模仿原文的节奏感。另一种常用的方法是功能补偿,当形式上无法达到对等的时候,译者就会果断放弃对原文句式的模仿,转而使用蒙古语中具有同样加强气势的作用的表达方式,例如通过重复某个核心动词或者副词,或者利用蒙古语特有的韵律以及词根变化,来创造出一种形式不同但修辞效果相近的译文。

对偶翻译难度大,结构对称、音韵和谐、意义凝练。汉语的单字词特性使得创建短小精悍的对偶句比较容易,而由多个音节组成的蒙古语词汇就很难达到同样的效果。实践中译者多用意译,兼顾形式。核心任务就是准确地传达出对偶句中所包含的精炼思想或者对比关系。译者一般会先将对偶句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提炼出其核心意义,再用一句或两句符合蒙语表达习惯的句子将其重新表述出来。虽然原文的形美会有所损失,但是意核的完整传达却可以得到保证。极个别的时候,倘若碰上音义双佳的蒙语对偶表达,译者也会心领神会地采用,不过这也只能是可遇而不可求罢了。大多数情况下,译者必须在形式和内容之间做出选择,“内容至上”,即在目的语中取得最好的交际效果。

第二节 公告通知翻译技巧

在翻译学宏观视角下，政务和新闻文本的蒙汉翻译占有很重要的位置。公告通知属于一种使用频率较高的文体，其翻译的准确性以及规范性，直接关系到信息传达的效果以及政府形象的塑造。本文将从公告通知翻译技巧着手，针对公告通知文本的特点进行分析，提出信息处理方法并指出其语言表现形式，从而为译者提供一套具有操作性的蒙汉译文操作指南。

一、公告通知的语篇结构与功能

公告通知类文本具有明显的格式化特点和明确的指向性，它的语篇结构以及内部功能是翻译实践的最基本航标。译者在动笔之前，必须对原文的结构层次和交际意图有非常清楚的认识，才能在译文中做到功能对等和格式迁移，使蒙古语使用者能准确地获取信息。

（一）“标题－正文－落款”三段式结构

公告通知的语篇结构具有很强的程式性，一般包括标题、正文、落款三个部分。它不但是汉语言习惯的体现，还是公文逻辑传递的保证，保证了信息的完整性、权威性。蒙汉翻译时，维系这种基本结构的对应就十分重要。

标题部分，汉文公文标题的构成形式较多，有“发文机关＋事由＋文种”的全要素标题，例如《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也有省略发文机关的“事由＋文种”形式，例如《关于举办全区翻译专业资格考试的公告》。翻译时要正确掌握和转化构成要素。蒙古语标题要简明扼要，完整地表达主要信息。含有发文机关的标题，蒙古语一般把发文机关放在句首，用属格形式来表示发布主体。而不含发文机关的标题，就应按照事由和文种直接对译，使译文标题能够独立、清楚地反映全文主旨。

正文是公告通知的主要部分，内部逻辑关系是逐层递进的。汉文公告通知正文一般由发布缘由或依据、通知或公告事项、执行要求或希望等组成。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不能只是简单的句子转换，而应该从段落、语篇层面做适度的重组，使其更符合蒙古语的表达习惯。像现将要说明的事项用“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之类的话，在蒙古语里可以用“…тухай дор дурдсугай” “…-г ийнхүү мэдэгдэж байна”等来衔接。对于分条列项的内容，翻译时应保持其逻辑的清晰，通过使

用序号或者项目符号来加以区分,使译文也能达到一目了然的逻辑层次效果。

落款处有发文机关名称和成文日期,是公文生效的标志。汉文公文的落款在正文的右下角,翻译成蒙古语时,位置和格式也应该符合相应的公文规范。发文机关名称的翻译必须用官方全称或者规范化简称,不能随意增加或者删减。日期翻译时要特别注意格式对应,汉文公文中常见的“xxxx年xx月xx日”的形式,在蒙古语中一般表述为,……оны……дугаар сарын……-ны өдөр。同时要统一规范使用蒙古文数字或阿拉伯数字,年份后面不能缺少“оны”、月份后面不能缺少“сарын”等格助词。标题中如果已经包含发文字号,落款处可以省略机关名称和成文日期,蒙汉译文均按此规则。译者精准复现三段式的结构,就完成了公告通知功能的对等翻译的起步。

(二) 告知、指令、请求等不同功能

公告通知属于实用性文体,它的根本目的就是达到一定的交际效果。按照内容和意图,这些功能大致可以分为告知、指令、请求三种,有时候也会呈现多功能交织的状态。准确认出并准确传达这些功能,才是使译文有效性的保证,在蒙汉翻译中尤其如此。译者不能只传递字面意思,更应该把文字背后的语气、态度和权威性准确传达出来,从而让目标语读者产生预期的反应。

告知功能是公告通知最基本的功能,主要是向公众或者特定群体公布信息、说明情况,节假日放假安排、政策变动说明、会议召开信息等都属于告知类内容,语言风格一般客观平实。翻译成蒙古语时,最重要的是信息要正确无误、清楚明白。译者应该使用中性、明确的词语,不能使用会引起歧义或者带有强烈感情色彩的词语。如现将……情况予以公布可译为……нөхцөл байдлыг мэдээлж байна,语气平和,重在事实的表述。

指令功能具有很强的强制性、权威性,受众必须照着做。这类的文本主要是法律法规的公布、行政命令的发布、安全须知的规定等。其语言特点是明确、肯定,多用祈使句或者表示必要性、义务性的词。译者在进行蒙汉翻译时,必须保证原文的指令语气被完全地体现出来。不但是词汇的选择问题,还关系到句法结构、语气助词的使用。蒙古语中通过动词的祈使形式或者使用“тун”(很)、“заавал”(必须)等词加强命令的强制性。拿“各单位必须严格执行”来说,译成蒙古语是“Байгууллага бүр хатуу мөрдөх ёстой”,用“хатуу мөрдөх ёстой”(必须严格遵守)这个表达,把原文里的强制性完整地传达给蒙古语读者,防止因为语气变弱而影响执行力。

请求功能比较委婉，希望、建议或者请求帮助，强制性较弱。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号召社会各界参与某项活动等。这一类文本语言较为有礼貌、谦虚。翻译的时候要把握好分寸，既要传达出提出方的意愿，又不能显得太强硬，以免有命令的语气。蒙古语中可以使用敬语、委婉句式或者表示希望、建议的词来达到这个目的。若将“请各有关单位大力支持”直接硬译，会显得生硬。更合适的翻译应该是“Холбогдох байгууллагууд идэвхтэй дэмжлэг үзүүлнэ үү”，或者更委婉一些的“...дэмжлэг үзүүлж ажиллахыг хүсэж байна”，这样既表达了请求合作的意思，又尊重了受文方，有助于合作的实现。一份公告通知会有很多功能，译者要依靠自己敏锐的语用分析能力去辨别各个部分的功能倾向，然后挑选出最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的译法，从而使译文和原文在功能上保持一致，顺利完成跨文化交际。

（三）程式化语言的使用

公告通知属于高度规范的公文文体，它的语言具备明显的程式化特征，大量固定词组、套语以及句式被运用其中。这些元素一起组成了公文语体特有的风格，起到的作用有简化表达、明确语义、加强权威等。从翻译学的角度来审视蒙汉公告通知的翻译，正确地理解并且恰当的转换这些程式化的语言，是保证译文专业性、地道性和可接受性的重要因素。译者要努力创建起蒙汉两种语言常用公文套语的对应语料库，经由不断的学习和积累，最后达成熟练、自如的转换。这不只是逐字对译，而是经过对两种语言公文传统深入认识之后所作出的功能、风格对等。

程式化语言主要体现在公文专用词汇上。汉文公告通知中经常出现的“颁布”、“施行”、“批转”、“备案”、“遵照”、“鉴于”等词，在日常口语中很少使用，但在公文语境中却具有精确的法律或行政意义。译者在将其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就要找到语义对等且同样带有浓厚公文色彩的词。比如“颁布”对“зарлан тунхаглах”、“施行”对“хэрэгжүүлэх”、“遵照”对“дагаж мөрдөх”。如果随意用日常词汇来代替这些专用词，势必会使译文的正式性、权威性大打折扣，甚至会造成信息失真。因此，掌握并且正确使用蒙汉两种语言的文书核心词汇，是译者专业素质的基本体现。

大量的套语、固定句式，是程式化语言的又一重要表现。这些套语存在于公告通知的各个部分，开头是“为进一步加强……”，引出正文的是“现将有关事

宜通知如下”，结尾是“特此通知”或者“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施行”。这些框架既可以简化起草的过程，也可以给读者提供一个清晰的阅读路径，使其能够迅速地找到重要的信息。蒙汉翻译实践中，译者必须对两种语言里这些套语的对应关系了如指掌。结尾的“特此公告”，蒙古语中一般译为“үүгээр зарлав”，简洁有力，完全符合公文结语的语体要求。熟练使用这些程式化语句可以使得译文读起来十分自然，很好地融入到目标语公文语境中，不会因为翻译腔而产生疏离感、不专业感。对程式化语言进行准确的处理，是进行文化转换和移植的重要环节，也是应用翻译学所提倡的“译文适应目标语语境”这一原则的体现。

二、核心信息的提炼与凸显

公告通知翻译不是语言形式上的简单转换，核心信息要精确传达。政务、新闻等时效性强、准确性要求高、清晰度要求高的领域，译者需要有很强的信息处理能力。需要能够在复杂的原文中迅速提取出重要元素，运用恰当的翻译方法在译文中加以体现，从而保证信息在跨语言传递过程中不丢失、不模糊，直达受传者。

（一）时间、地点、人物的清晰翻译

公告通知中的时间、地点、人物（或者机构）都是信息中 5W 要素中的一部分。这三种信息翻译得准确，这就是通知能被人正确理解并执行的基础。在此处的任何疏忽或者错误都会导致信息传递失败，甚至会引发严重的问题。所以，在蒙汉翻译中，对这些要素的处理一定要做到极致的清晰、准确。

时间翻译看似简单，实则不然。首先是日期和时刻的格式。在汉文中常见的 2025 年 12 月 8 日或者上午 9 时 30 分，在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必须按照蒙古语的表达习惯。日期一般写作“2025 оны 12 дугаар сарын 8-ны өдөр”，年份后的属格助词“оны”、月份后的“сарын”等不能省略。上午 9 时 30 分应译为“өглөөний 9 цаг 30 минут”，并注意准确区分上午（өглөө）、下午（үдээс хойш）等时间段。关于表示时间范围的表达，比如自某时起至某时止，在蒙古语中常常用到“...аас ... хүртэл”这样的表达形式。

地点翻译的准确性十分重要，它包含着会议室、门牌号这样具体的地址，也有省、市、自治区这样的大范围地区。对于专有名词，特别是中国的地名，在翻译时应严格按照官方或者通用的译名标准。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应该使用约定的蒙古语译名“Өвөр Монголын Өөртөө Засах Орны Хөх хот”。没有官方译名的，

可以使用音译并辅以必要的解释说明，避免译者自造译名造成混乱。对于带有描述性的地点信息，例如市政府三号会议厅这样的表述，就需要进行结构和意义上的对等翻译，即 Хотын захиргааны 3 дугаар хурлын танхим，使得目标读者可以根据译文信息准确找到位置。

人物或者机构的明确翻译，这是确定信息发布主体和责任主体的重要环节。机构名称要用官方全名蒙古语表达，例如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有固定的蒙古语译法。就个人姓名而言，尤其是汉族人名，多用音译法，而且在字母的选择上也尽量接近蒙古语的语音韵律规律。在需要体现个人职务身份的地方，职务的翻译也要准确，例如“自治区主席”应译为“Өөртөө засах орны дарга”。当通知中有多个部门或者个人时，要保证译名全文一致，必要时使用全称以防混淆。经过对时间、地点、人物这三种核心信息的认真处理，译者就能给译文塑造起稳固的信息架构，为后面内容的准确表述筑牢根基。

（二）关键事项的突出表达

公告通知的翻译，仅仅传递核心要素是远远不够的。译者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深刻领会原文意图，找到应该引起读者特别注意的重要事项，并采用恰当的翻译策略在译文中加以突出，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保证最重要的信息被最先接收。这就要求译者不能只是语言转换者，还应成为信息的组织者、重构者。关键事项即公告通知的发布目的，可能是一项新的规定、一次重要的活动安排、一条必须遵守的禁令或者一项需要完成的任务。在汉文原文里，这些信息一般用加粗、下划线，或者用“重点强调”、“务必注意”这样的句式来突出。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首先要识别出这些显性或者隐性的强调信号，然后在蒙古语译文中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再现。

1. 词汇选择与语气加强，使用语义强度较大或者带有强调意味的词来突出重要的信息。以表示“必须”的词为例，一般情况下用“...ёстой”，但是根据语境的紧急、严肃程度，可以选用“заавал”（务必，一定）、“хагуу”（严格地）等副词加强语气。就表示禁止的事项而言，“хориглоно”（禁止）比“...болохгүй”（不可以）的语气更加强烈、正式。经过这样的词汇筛选，在不改变原意的基础上，可以有效地提高关键信息的警示度和重要性。

2. 句法结构的调整：将重要信息放在句首或者句尾等显眼的位置也是一种有效的强调方法。蒙古语是主宾谓结构的语序，句子重心一般落在谓语上。译者可

利用这一点,在需要强调的地方采用某种手段把所要强调的内容提到句子中间来。可以提前关键短语、用倒装句式、使用独立分句来突出某一点。原文中用“特别”、“尤其”等词引出的部分在蒙古语中除可以用 *ялангуяа*、*тухайлбал* 等词外,也可以独立成句或者分段。

3. 版面格式的运用,在遵循原文版式基本规范的基础上,可以适当使用格式手段来突出重点。原文中如果对某个重要的内容使用了加粗字体,译文也应当把对应的蒙古语部分用加粗的形式表示出来。对于分条列示的重要规定,应当保持规定的清晰性,采用数字或者项目符号加以区分,以便读者能够很容易地抓住要点。有些时候,如果译文要对某个复杂的重要概念加以解释,可以采用括号加注的办法,不过也要注意保持公文简洁性。

译者运用词汇、句法、版面格式等手段,把原文中需要突出的事项,在译文中有用地“高亮”出来。这既是对于原文深层意旨的体会,也是对于读者中心思想,把交际效果放在第一位的应用翻译学。一部成功的公告通知译本,应该像一个称职的向导一样,给蒙古语读者指明问题的关键。

(三) 避免歧义和模糊不清

公告通知是传递政务信息的重要渠道,语言的准确度是第一原则。任何一种歧义或者模糊的表述都会造成误解、执行偏差甚至法律纠纷。由于蒙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词汇内涵和表达习惯上存在着差别,所以产生歧义的可能性也增大。因此,译者要一直保持警觉,把源语言文本中的所有模糊之处都剔除掉,以保证翻译出来的意思只存在一种,并且是确定的。不只是一个语言翻译的技术性问题,而更是一个翻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体现出自己责任、专业精神的环节。

产生歧义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代词以及指代关系的处理不当。汉语中代词使用比较灵活,指代对象要依靠上下文语境来判断。若直接将其翻译成蒙古语,就会因为蒙古语语法对于指代关系的严格要求而产生歧义。在一个句子中存在多个可能的指代对象时,译者就需要通过重复名词、改变句式、使用更具体的限定词等方式来明确代词指代哪一个。汉语中有一些多义词或短语,在一定的语境中是只有一个意思的,但是在翻译的时候如果选词不当,就会重新激活这些多义性。以上这个词既可以指上文提到的内容,也可以指数量上的多于。译者需根据上下文准确地判定它所指的意思,选择蒙古语中没有歧义的对应该词来表示,用“*дээр дурдсан*”(上文提到的)来确定指的是前者。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另一个造成模糊不清的原因是文化背景差异造成的理解错误。在汉文化语境中一些习以为常的表达，对蒙古语读者来说是不甚明确的。一些依靠历史典故或者特定政策背景的缩略语、概念，如果直接音译或者硬译而不加以解释，那么目标读者就会感到困惑。这时译者就要采取增译或者释译的策略。以翻译包含行动代号的通知为例，在音译代号本身如“清源行动”（Цэвэр эх сурвалж ажиллагаа）之外，首次提到的时候就用括号或者脚注来简单介绍该行动的背景及意义。虽然增加了少量的文字，但是极大地提高了信息的可理解性，有效地防止了由于文化差异造成的沟通障碍。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要像排雷兵一样，从词汇、语法、语篇、文化等各个方面去检查和排除所有的含糊、歧义之处。用限定、解释、重申等多种方式，把所有的不确定信息“固定”下来，保证最终交付的译文像精确切割的水晶一样，每一个切面都能清晰地反映出唯一、正确的信息光芒。

三、常用句式与套语的翻译

公告通知的翻译，既要求内容正确，又要求语言地道，格式规范。汉文公告通知里有很多高度程式化的常用句式和套语，是构成公文语体风格的主要因素。对于这些句式、套语的翻译不能只是字面对等，而要理解它们在源语言语境中承担的功能和传递的语用含义，在目标语言中寻找功能对等、风格吻合的表达。为了更直观地表现出这些常用句式的对应关系，下面给出了一些核心套语的翻译实例：

汉蒙公文常用套语翻译对照表

汉文套语	蒙古语参考译文	功能
为……，特制定本规定。	……-ын тулд/зорилгоор энэхүү дүрмийг тусгайлан боловруулав.	陈述目的
根据……精神 / 规定，……	……-г үндэслэн / ……-ын дагуу, ……	引述依据
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Холбогдох асуудлыг дор дурдсугай: / …-г ийнхүү мэдэгдэж байна:	引出下文
特此通知 / 公告。	Үүгээр мэдэгдэв. / Үүгээр зарлав.	正式结尾
请遵照执行。	Дагаж мөрдөнө үү. / Мөрдөж ажиллахыг үүрэг болгоно.	提出要求

上表清晰地揭示了汉蒙公文套语的转换规律，以下将对部分典型句式做进一步的分析。

（一）“现将……通知如下”等句式的对应

在汉文公告通知的行文中，“现将……通知如下”、“为……，特制定本规定”、“根据……精神”等开篇或过渡句式，担当着相当的语篇功能。它们既是正文核心内容的开始，又是表明文件的目的、依据和性质。这类句式翻译的好坏是决定译文结构是否完整、逻辑是否顺畅的关键步骤。译者应该掌握一套灵活的应对手段来使译文自然、又保留原文的语篇功能。

以“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这句经典的话为例，它起了承上启下、引出主要事项的作用。蒙古语中存在多种表达方式来完成同样的功能。比较直接的翻译为“…-н тухай дор дурдсугай”或“…-г ийнхүү мэдэгдэж байна”。前者比较正式，多用于庄重的通告里；后者更广泛适用。译者要依据通知的具体内容和发布机构的权威性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政府发布的法规性文件用“…-н тухай дор дурдсугай”来体现它的庄严性。

对于以“为……，特制定本规定”形式出现的目的表达句，翻译的重点是把“目的-行为”之间的逻辑关系准确地传达出来。汉语常用为……引出目的状语，蒙古语一般用目的格或者“зорилгоор”等词来表示。因此本句可以按语境译为，……，以……为目的，采取……的措施。其中，тусгайлан（特地）这个词完美地对应了原文的特字，突出体现其专指性以及重要性。

同样，“根据……精神/规定”这样的引述依据句式，在公文中很常见，它的作用是为文件的合法性、权威性“背书”。翻译成蒙古语时要使用可以体现依据关系的格或后置词，如“…-г үндэслэн”或者“…-ын дагуу”。像这样的例子，在我国的法律中也有，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就可译为“《БНХАУ-ын Хөдөлмөрийн тухай хууль》-ийн холбогдох заалтыг үндэслэн”。这样的结构清楚地表明了后面内容的法律依据，与原文功能完全一致。

译者在处理这些常用句式的时候不能机械的、一成不变的进行对译。尽管可以建立起上表所示的基本对应关系，但是在操作的时候，必须结合具体的上下文，对句式做微调，使之符合整篇文章的风格与节奏。有时候为了使译文更加简洁或者更符合蒙古语的行文习惯，甚至会对原文的句式进行转换重组，比如把一个长句拆成两个短句，或者把状语成分并入到主句当中。灵活处理的这种能力，就是译者运用翻译学视域，把语言从“转码者”提升为语篇的“重构者”的标志。只有把那些标志性的句式译得准确、地道，整个公告通知的蒙古语译文才有骨有肉，

才能成为一篇真正为蒙古语读者所接受的规范文本。

（二）“特此公告”等结语的处理

汉文公告通知结尾的“特此公告”、“此致”、“周知”等结语，虽然语言简练，但是承担着重要的语用功能。它们不但是正文结束的明确信号，而且蕴含着一定语气和文体风格，是公文礼仪与程式化的重要表现。对于这些结语的翻译绝不能掉以轻心。译者要深切理解它在汉文语境中确切的含义和作用，在蒙古语里找到相应的、符合公文传统的表达，从而完成一个完整的、规范的收尾。一篇翻译得再好的公文，如果结尾处理不当，也会造成虎头蛇尾的感觉，减弱文本的专业性、权威性。

“特此公告”或者“特此通知”属于最常见的结语类型之一，它最主要的作用就是再次强调发布的行为，给全文一个正式的句号。“特此”二字带有郑重其事的意味。翻译成蒙古语时最常用最对等的说法是“Үүгээр зарлав”或“үүгээр мэдэгдэв”。这里的“үүгээр”是表示“以此”的意思，而后面的两个词根据文种不同选择使用。简洁有力的表达方式完全符合蒙古文公文的结束语习惯，可以给读者一种正式、终结的感觉。冗长、口语化的翻译，例如把“特别地在此”直译出来，就会显得生硬、不专业。

另一类常见的结语带有期望或者要求，例如“望周知”、“请遵照执行”等等。除了告知的功能以外，还带有对受文者的期望或者命令。望周知语气平和，意指让对方知晓就可以。在蒙古语中可以翻译成“Нийтээр анхаарна уу”，即“请大家注意”，或在正文已经完整表达的情况下不进行翻译，因为告知之意已包含其中。而“请遵照执行”的语气就更为严肃，带有明显的命令性。其蒙古语翻译要体现这样的要求，常用的表达有，Дагаж мөрдөнө үү，或者更严厉的，Хатуу мөрдөж ажиллахыг үүрэг болгож байна（责成严格遵守执行）。译者必须正确把握原文语气的强弱，选择合适的蒙古语表达，不能把带有建议性质的“望周知”误译成强制性的命令。通过对这些微小而功能重要的结语进行准确的处理，译文的完整性和专业性就得到了保证，使整篇译文的结构和语用与原文达到了统一，达到了应用翻译学所追求的功能对等的效果。

（三）敬语和谦辞的转换

蒙汉两种语言的语用体系当中，敬语和谦辞均起着调节人与人之间关系、表现文化礼仪的作用。但两者在使用场合、表达方式、文化内涵等方面有较大的区

别。公告通知作为正式的应用文体,在政务方面虽然不像私人信函那样经常使用敬语,但是在特定的场合下,恰当的礼貌用语对于树立发布者形象、协调发布者与受众之间的关系仍然十分重要。译者在处理这些带有敬谦表达的语言现象时,不能停留在字面上,而应该从文化层面做出谨慎的转换。

汉文公告通知中的敬语、谦辞比较内敛、程式化。常用的敬语有请、敬请等,在提出请求或要求的时候,用以表示对受文方的尊重。像“请各单位会议结束之后交报告。”这样。翻译时不能用固定的一个词去对应所有的“请”。蒙古语里表达请求的方式很多,需要根据请求的强弱以及正式程度来选择使用。公文语境下使用祈使形式的动词 -на уу/-нэ үү 或 -но уу/-нө үү 来表示请求,如将上句译为“...тайлангаа ирүүлнэ үү”,就是一种正式、礼貌的请求。需要表达更深的敬意时,还可以使用“хүсэж байна”(希望)等比较委婉的表达。

谦辞在汉文公告通知中出现的频率很低,发布者在发布致歉或者更正类通知的时候,偶尔会使用谦辞来显示谦虚或者承担责任的态度。但是,在蒙古文化传统里,面向大众的正式公文如果谦辞过多,反而会显得缺乏自信或者权威性不够。所以,在翻译的时候要小心一点。对于汉文中的“由于我们的疏忽而造成……”,翻译成蒙古语时,要强调客观陈述事实、承担责任,而不是过分渲染谦卑的态度。译为,因为本方工作失误造成……既承认了错误,又保持了发布机构应有的严肃与担当,避免了因文化差异而产生不恰当的联想。

译者在翻译敬语、谦辞的时候必须坚持功能对等而不是形式对等的原则。核心任务是分析原文使用敬谦表达所要达到的语用目的——是表示尊重,缓和语气,表达歉意,还是其他——然后再在蒙古语的语用框架内,找寻能够达到同样目的、并且最为自然的表达方式。这就意味着有时需要增加原文没有的礼貌用语来适应蒙古语的习惯,有时则需要淡化甚至省略原文的某些谦辞来保持公文的权威性。根据文化语用分析做出的这样的转换,是对译者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以及语用智慧的一种综合考验,也是达到高水平应用翻译的必由之路。因此经这样处理的译文才能在目标语境中成为有效的、得体的、令人尊敬的交际手段。

第三节 术语统一与规范化

一、政务术语的特点与挑战

（一）系统性、稳定性、单义性

政务术语作为国家治理体系和公共行政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高度的系统性。其内部逻辑严密，各术语之间相互关联、层级分明，共同构成政策表达的规范语言网络。同时，政务术语强调稳定性，一旦确立，通常在较长时期内保持不变，以确保政策连续性和法律效力。此外，为避免歧义、保障执行一致性，政务术语普遍追求单义性，即一个术语对应一个明确、唯一的概念内涵。

然而，这种系统性、稳定性和单义性在蒙汉翻译实践中也带来了挑战。蒙古语在表达现代政治经济概念时，部分术语尚处于发展完善阶段，若强行套用汉语结构或直译，易造成语义模糊甚至误解。因此，如何在保留术语核心语义的同时，使其符合蒙古语的语言习惯和文化语境，成为翻译过程中必须审慎处理的问题。

（二）新术语的不断涌现

随着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推进，大量新概念、新提法不断出现在政策文件与官方话语中，如“双碳目标”“数字政府”“营商环境优化”等。这些新术语往往承载着特定的政治意图与时代特征，具有高度的时代敏感性和政策导向性。它们的快速更迭对翻译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既要准确把握术语内涵，又要及时将其转化为符合目标语规范的表达形式。

在蒙汉翻译中，新术语的处理尤为棘手。一方面，蒙古语缺乏现成对应词；另一方面，仓促造词可能造成理解混乱或传播障碍。因此，译者需密切关注国家发布的权威术语标准，积极参与术语本地化讨论，在保证时效性的同时兼顾准确性与接受度，避免因术语滞后或误译影响政策传达效果。

（三）蒙汉术语对应的不完全性

由于历史、文化、制度背景的差异，蒙汉两种语言在政务术语层面存在天然的不对称性。许多汉语政务术语在蒙古语中并无直接对应词，尤其是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如“全过程人民民主”“新型举国体制”），其内涵难以通过简单词汇转换完整传递。即便存在近似表达，也可能因语用习惯不同而产生语义偏差。

这种对应不完全性不仅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还可能削弱政策文本的权威性与严肃性。例如，某些术语在蒙古语中若采用音译加注方式，虽能保留原意，却牺牲了语言流畅性；若采用意译，则可能丢失部分制度语境。因此，译者需在忠实原意与语言可读性之间寻求平衡，必要时辅以脚注或术语表，以增强读者理解。

二、术语统一的重要性与途径

（一）维护政策法律的严肃性

政务文本，尤其是法律法规、政府公报、政策白皮书等，具有高度的规范性和权威性。其中术语的一致性直接关系到政策解读的准确性与执行的统一性。若同一术语在不同文件或同一文件不同段落中出现多种译法，极易引发歧义，甚至导致基层执行偏差或法律适用错误。因此，术语统一不仅是语言问题，更是政治和法治问题。

在蒙汉翻译中，术语不统一的现象曾一度较为普遍，例如“放管服”在早期译文中就有多种表述。这种混乱不仅影响蒙古族群众对政策的理解，也削弱了政府公信力。唯有通过制度化手段推动术语标准化，才能确保政务信息在多语环境中精准、一致地传播，切实维护国家政策的严肃性与执行力。

（二）参考权威术语库和词典

实现术语统一的关键路径之一是依托国家或行业层面建立的权威术语资源。近年来，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内蒙古自治区标准化院及中国翻译研究院等机构陆续发布了《汉蒙对照党政文献术语汇编》《民族语文术语规范词典》等工具书，为蒙汉政务翻译提供了重要依据。这些资源经过专家审定，兼顾政治准确性与语言规范性，是译者首选的参考标准。

然而，现有术语库仍存在覆盖不全、更新滞后等问题，尤其对突发性政策新词响应不足。因此，译者在使用权威词典的同时，也应主动跟踪中央及地方最新政策文件的官方蒙文版本，比对用词惯例，并积极参与术语共建共享机制，推动术语库的动态完善与广泛应用。

（三）建立机构内部术语规范

除依赖外部资源外，各级党政机关、翻译机构和媒体单位亦应建立本系统的内部术语规范机制。通过制定《蒙汉政务翻译术语手册》或设立术语审核小组，

可在日常工作中统一高频术语、规范新词译法，并形成可追溯、可复用的术语数据库。这种“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模式，有助于提升翻译效率与质量。

内部规范还能有效应对跨部门协作中的术语分歧。例如，财政、人社、环保等部门对同一概念可能有不同表述习惯，若无统一标准，易造成对外发布文本的混乱。通过机构内部术语管理，不仅能强化翻译团队的专业协同，也为后续机器翻译、智能校对等技术应用奠定数据基础。

三、案例：常见政务术语的蒙译探讨

（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经济术语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核心概念之一，强调从生产端入手优化经济结构。在蒙译实践中，早期存在直译为“нийлүүлэлтийн талын бүтцийн өөрчлөлт”等冗长表述，虽语义准确但不符合蒙古语简洁表达习惯。后经规范，逐步统一为“нийлүүлэлтийн бүтцийн өөрчлөлт”，省略“талын”（方面的）以提升流畅度，同时保留“结构性改革”的核心语义。

此类经济术语的翻译需兼顾专业性与可读性。蒙古语经济词汇体系虽在不断完善，但仍需避免过度依赖汉语语法结构。译者应结合蒙古语经济话语传统，采用已有构词规则（如使用“бүтцийн”表示“结构性”）进行本土化重构，使术语既准确又自然，便于政策在民族地区有效落地。

（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等政治术语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作为意识形态建设的重要内容，其蒙译“Социалист язгуурын үнэт зүйлс”已基本形成共识。该译法准确传达了“核心”（язгуурын）与“价值观”（үнэт зүйлс）的对应关系，且符合蒙古语政治话语的庄重风格。值得注意的是，“核心”一词未直译为“гол”或“үндсэн”，而选用更具哲学意味的“язгуурын”（根源性的），体现了对概念深层内涵的把握。

政治术语的翻译尤其强调意识形态准确性。任何细微的语义偏移都可能被误读为立场偏差。因此，此类术语的蒙译必须严格参照党和国家正式发布的蒙文文献，杜绝个人发挥。同时，应注重术语在教育、宣传等场景中的接受度，确保其既能准确传达政治理念，又能融入蒙古族群众的认知体系。

（三）“放管服”等缩略语的翻译

“放管服”（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是典型的汉语政务缩略语，

其高度凝练的特性给蒙译带来极大挑战。若逐字直译，不仅冗长，且失去缩略语的传播优势。目前较为通行的译法是意译为“захиргааны хяналтыг суллах, хяналт шалгалтыг нэгтгэх, үйлчилгээг сайжруулах”，并在首次出现时标注原文“‘Фан-Гуань-Фу’ буюу”，后续可简称“ФГФ арга хэмжээ”。

缩略语的翻译策略应以“功能对等”为导向。在无法构造对等缩略形式的情况下，优先保证语义完整与政策意图清晰。同时，可通过括号注释、脚注或术语表等方式保留原文标识，便于读者对照理解。长远来看，推动蒙古语政务话语中形成稳定的缩略表达机制，将是提升翻译效率与传播效果的重要方向。

第四节 翻译质量提升：错误分析与改进策略

为了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及准确度，本节对翻译过程常犯错误进行分析，探析产生错误的原因并给出一些切实可行的对策和建议。

一、翻译实践中常见的错误类型

翻译错误一般出现在理解、表达和文化这三个核心方面，主要是语言体系不同带来的翻译困难。这些错误不仅影响信息传递的准确性，还可能损害原文的艺术价值或专业权威性。具体表现为以下几种类型：

（一）理解偏差导致的误译

这是指译者没有真正理解原文的深层次含义、语境或者作者的意图，因而造成译文与原文主旨相去甚远或者产生误解。例如，在文学翻译中，若未能把握人物性格、叙事语气或隐喻象征，就可能将讽刺误作褒扬，或将含蓄表达直白化；在科技文本中，若忽略上下文逻辑关系，也可能将技术参数或操作步骤误读，从而引发严重后果。此外，一词多义、句法结构复杂、修辞手法特殊等语言现象也容易诱发理解偏差。

（二）表达不当造成的硬译与不自然

此类错误表现为译文语言僵硬生涩，没有很好地融入目标语言的表达习惯和修辞风格，读者读起来不流畅、不自然。常见问题包括过度直译（如逐字翻译）、语序混乱、搭配不当、用词生僻或不符合语体风格等。例如，将英语被动语态机械地套用于中文，造成“被”字泛滥；或将正式法律文本译成口语化表达，

削弱其庄重性和规范性。这种“翻译腔”不仅降低可读性，还可能引起歧义或误解。

（三）文化缺失引起的错译或文化失真

译者对源语言或目标语言的文化背景、社会习俗、历史典故、宗教信仰、价值观念等不甚了解时，就容易出现文化上的误读，使译文不能正确地表达出原文的文化内涵，甚至出现冒犯性的或者误导性的内容。例如，将西方节日“Thanksgiving”简单译为“感恩节”虽无大错，但若未加注说明其特定历史渊源与家庭团聚传统，则可能使中文读者仅停留在字面理解；又如将中文成语“画龙点睛”直译为“draw a dragon and dot the eyes”，若无文化解释，英语读者难以领会其“关键一笔使整体生动”的比喻意义。

二、翻译错误成因的深度剖析

翻译错误不是单一因素造成的，而是在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下产生的，既与译者自身的专业素质有关，也同整个翻译过程的管理、规范以及外部环境密切相关。

（一）译者语言能力与综合素养不足

译者外语水平、母语能力是翻译质量的根基。如果译者的词汇量不大、语法知识不牢固、语感不强，缺少必要的跨文化交际能力、逻辑思维能力和文本分析能力，都会直接影响到对原文的理解深度与译文的表达质量。尤其在处理高难度文本（如哲学著作、诗歌、古籍）时，语言功底薄弱的译者往往难以驾驭复杂的语义网络与文体特征，导致信息流失或扭曲。

（二）专业知识储备欠缺与领域理解不足

医学、法律、科技、金融等专业领域的翻译，对译者的学科背景和术语掌握提出了极高要求。如果译者没有相关专业知识，又未进行充分的资料查阅与术语验证，在面对行业特有概念、缩略语、标准规范或制度背景时，极易出现术语误用、概念混淆或逻辑断裂。例如，将“clinical trial”误译为“临床测试”而非规范术语“临床试验”，或将“force majeure”（不可抗力）简单译为“强大势力”，均会严重影响文本的专业性与可信度。

（三）翻译流程不规范与质量控制缺失

翻译工作如果没有标准化的流程、严格的质量控制环节（如初译、校对、审

校、终审、客户反馈等），就难以系统性地发现并纠正潜在错误。现实中，许多翻译项目因时间紧迫、预算有限或管理松散，往往跳过头关键环节，导致低级错误频发。此外，缺乏统一的术语表、风格指南或项目记忆库，也会造成多人协作时风格不一、术语混乱等问题，进一步削弱整体质量。

三、提升翻译质量的改进对策与建议

要解决上述问题，就需要多管齐下，在译者能力建设、流程优化、技术赋能和团队协作等多个维度协同发力，构建科学、高效的翻译质量保障体系。

（一）加强译前准备与译后审校环节

高质量的翻译始于充分的译前准备。译者应在动笔前深入研读原文，明确文本类型、目标读者、使用场景和翻译目的；主动搜集相关背景资料，包括作者生平、历史语境、行业标准、平行文本等；建立初步术语表，并与客户或项目负责人确认关键概念的译法。译后阶段则应严格执行多级审校机制：初校侧重语言准确性与逻辑连贯性，复审关注文体风格与文化适配度，终审由母语为译入语的专家或领域专家把关，确保译文地道、专业、无歧义。必要时还可引入“回译”（back-translation）或读者测试，验证信息传递效果。

（二）推广使用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

现代翻译技术工具是提升效率与质量的重要支撑。翻译记忆库（Translation Memory, TM）可自动存储已译句段，在后续项目中智能匹配重复或相似内容，既减少重复劳动，又保证术语与风格的一致性；术语库（Termbase）则集中管理专业词汇的标准译法、定义、语境示例及禁用形式，有效避免术语混乱。此外，结合机器翻译（MT）与译后编辑（PE）模式，在保证速度的同时通过人工干预提升准确性，已成为行业新趋势。译者应主动学习 CAT（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如 Trados、MemoQ、OmegaT 等），并将技术手段与语言能力有机结合，实现“人机协同”的高质量产出。同时，机构应建立共享资源库，推动知识沉淀与团队协作，形成长效质量提升机制。

（三）建立常态化的译员培训与学习机制

持续的专业培训是提高译员综合能力的一种重要方式。内容应包括语言技能、专业知识、文化素养以及翻译工具的使用等各方面，促使译员持续学习新知识、获得新技能。

翻译错误类型及常见成因速览表

错误类型	典型表现	主要成因	改进方向
理解偏差	误解原文，信息失真	语言能力不足、专业知识欠缺、语境分析不当	加强语言学习、拓展专业知识、深化原文分析
表达不当	译文生硬、不流畅、不地道	母语表达能力弱、缺乏目标语语感、直译思维	提高母语修养、多阅读目标语文本、避免逐字翻译
文化缺失	文化信息传递失误、冒犯性内容	文化背景知识不足、跨文化意识缺乏	深入学习文化知识、培养跨文化敏感度、利用文化顾问
技术性错误	错别字、标点错误、格式不符	校对不严谨、粗心大意、缺乏质量控制	引入多人校对、使用拼写检查工具、规范化审校流程

上表可见不同的翻译错误产生的原因是不同的，因此有针对性的采取相应的改正方法很有必要。经过上述各方面的改进，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翻译作品的质量。

第五章 蒙汉新闻文本翻译实践研究

本章目的在于把翻译学理论同蒙汉新闻翻译的具体操作联系起来，经由对不同种类新闻文本的翻译案例展开细致分析，系统地探索在跨文化、跨语境流传过程中达成信息对等、功能相似的有效策略，进而为改善蒙汉新闻翻译的总体水平赋予具体的操作参照和实践引领。

第一节 新闻报道翻译实例

新闻报道是信息传播的主要途径，内容涉及政治、经济、社会等各个方面。不同种类的新 wén 文本在语言风格、篇章构造以及流传意图方面有着明显的差别，所以译者也要据此对翻译手段做出相应的调整。下表清楚地表现出了各种新闻文本翻译要点的不同。本节用具体实例来阐释这些差异在翻译中是如何体现出来的。

蒙汉新闻文本分类及翻译要点对照表

新闻类型	主要特点	翻译核心要点	语言风格要求
时政新闻	政治性强、政策性强、程式化	立场准确、把握分寸、遵循官方规范	庄重、严谨、权威
经济新闻	专业性强、数据密集、时效性高	术语精准、数据无误、逻辑清晰	客观、精确、专业
社会民生新闻	贴近生活、情感丰富、时效性强	事实准确、情感共鸣、风格亲民	自然、生动、易懂

一、时政新闻翻译实例

时政新闻属于新闻报道当中最为敏感且重要的部分，它的翻译质量直接关乎党和国家方针政策能否正确传达出去，同时它对塑造国家形象也有着深远的影响。译者处理这样的文本时需要具备很强的政治敏感性，扎实的双语基础来保证译文的权威性、规范性、准确性。

（一）选取领导人活动报道

领导人活动报道属于典型的时政新闻，其语言具有很强的程式化、规范化特点。该类报道的核心功能就是宣传政策、展示形象、引导舆论，因此翻译时忠实地再现原文的风格、立场和信息重点是非常重要的。译者必须准确地把领导人的讲话精神、活动内容和象征意义传达到位，任何一点偏差都会造成信息失真，甚至带来不好的政治影响。蒙汉翻译实践处理领导人活动报道时的难点，不是单纯的语言层面的问题，而主要是要把握好政治语境。报道里经常出现的“亲切看望”“深入考察”“发表重要讲话”这样的表述，在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就要挑选出能够传达同样敬意和官方色彩的词汇。这就意味着译者要熟悉蒙古语里涉及政治活动的专用词汇和固定搭配，保证译文风格同原文保持高度一致，在严肃又得体的前提下正确传达活动性质和意义，防止因为文化差异或者语言使用不妥当降低报道的权威性。

领导人活动报道中常涉及一些具有中国特色的政治术语和概念，像“四个全面”“五位一体”等，这些在蒙古语里没有直接对应的词汇。译者不能简单地采用直译的方式，而要深入了解这些术语和概念的内涵，运用意译或者增译的方法，用蒙古语准确、全面地表达出来，让蒙古语读者能够理解其真正的含义。同时，在翻译领导人活动报道时，还要注意句式的结构和语序。汉语和蒙古语在语法结构上存在差异，如果直接按照汉语的语序翻译，可能会使译文生硬、不通顺。译者需要根据蒙古语的表达习惯，对句式进行调整和优化，使译文自然流畅，符合蒙古语读者的阅读习惯。

（二）政治立场与分寸的把握

时政新闻的蒙汉翻译中，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把握好翻译的分寸是首要原则。既涉及翻译技术问题，又是译者政治修养与责任的问题。时政新闻，特别是有关国家主权、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的新闻，一字一句都包含着明确的政治立场。译者必须从维护国家利益、民族团结的高度出发，保证译文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每一句话都能准确体现原文的政治含义和态度。把握分寸，就是对词语的褒贬色彩、语义强度、语用环境进行精准的控制。处理涉外报道时，原文里的“严正交涉”“表示关切”“高度赞赏”，背后所代表的立场与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译者在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必须要在目标语言里找到一个语义、情感强度完全对应的表达，既不能过度，也不能弱化。同样，在翻译国内民族宗

教政策等敏感话题的时候,译者更应该严格按照官方公布的标准译法和措辞,不能使用任何会引起歧义或者误解的词语。对于分寸的精准把握,是衡量时政新闻译者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准,要求译者既要做语言的转换者,又要做政治信息的守护者。在复杂的语境中,译者需反复斟酌,选择最恰当的表达,保证译文在政治上站得住脚、经得起检验。

政治立场与分寸的把握还体现在对文化差异的尊重和理解上。不同民族、不同国家有着各自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价值观念,这些差异在时政新闻中往往通过特定的词汇、表达方式和语境得以体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政治信息,还要充分考虑目标语言受众的文化背景和接受习惯,避免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误解或冲突。例如,在翻译涉及民族宗教政策的新闻时,译者需要深入了解蒙古族的文化传统和宗教信仰,确保译文既符合原文的政治立场,又能被蒙古族受众所理解和接受。这种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和处理能力,也是衡量时政新闻译者专业素养的重要方面。

(三) 官方表述的规范转换

时政新闻翻译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经常使用具有中国特色的官方用语,如“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这些都是在一定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内涵固定、表达不变。这一类官方话语,翻译者的主要任务就是进行规范化、准确性的转化,不能采取创造性翻译。规范转换最可靠的方法就是严格按照官方发布的标准译文。有关部门和权威机构一般会组织专家对重要的政治概念、提法进行研究和确定,然后以统一蒙古语翻译的形式对外公布。这几种标准译文有权威性、唯一性、约束力,所有的蒙汉时政翻译工作者都必须遵守。译者在翻译的时候,应该主动查阅《汉蒙时政术语汇编》、官方双语文件、重要会议官方译本等权威资料,保证所用译法与官方口径完全一致。既保证了信息传递的准确无误,又利于党和国家对外宣传口径的一致性、严肃性。在没有标准译文可以参考的情况下,译者也应该慎重对待,在充分理解原文的基础上,参考已有类似表述的翻译范例,提出一个经得起推敲的译法,并适时向有关方面请示,推动术语规范化体系的不断改进。

二、经济新闻翻译实例

专业性、数据性和时效性是经济新闻的三个主要特点,翻译的核心目标就是

客观、准确地传递财经信息。此类文献翻译不仅要考察译者所具备扎实的双语基本功，还须考察其经济学知识以及分析能力。

（一）选取财经分析报道

财经分析报道一般会涉及到对宏观经济形势的判断，对市场趋势的预测，或者是对某个特定行业或者企业的深度剖析。这一类文本逻辑性强，经常使用专业的分析框架，论证过程中因果关系也比较复杂。译者面对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不同的语言句法结构中，把原文的严密逻辑链条保持住，不打断，不丢失。汉语当中经常出现的长句、流水句和层层递进的叙述方式，翻译成蒙古语时往往会有句子结构上的变化。译者首先要弄明白原文的论述逻辑、分句之间的关系，然后再按照蒙古语的语法、词汇、表达习惯重新组合句子。使用不同的连接词，改变语序或者把长句拆分成短句等方式来清楚地体现原文的逻辑层次。这就既考察了译者的逻辑思维，又考察了译者的语言重构能力。优秀的译文不能只传递表面的文字信息，还要让蒙古语读者能够顺畅地跟随作者的分析思路，领悟其中的经济洞见，从而达到信息深度和广度上的对等。

在选取财经分析报道进行翻译时，还需特别注意文化背景的差异。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经济现象、市场动态的理解和分析角度可能存在显著不同，这就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不仅要准确传达原文的信息，还要考虑到目标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阅读习惯。例如，某些在汉语财经报道中常见的比喻或隐喻，在蒙古语中可能没有直接对应的表达，此时译者就需要寻找既能保留原文韵味，又能让蒙古语读者理解的替代表达。此外，财经分析报道中经常引用大量的数据、图表和统计结果，这些专业信息的翻译也需要译者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严谨的翻译态度，确保每一个数字、每一个术语的准确无误，从而维护财经报道的权威性和可信度。

（二）专业数据与图表的翻译

在经济新闻报道里，数据、图表作为传递信息、支撑论点的主要方式，翻译得是否准确直接影响着新闻报道的信度。翻译这部分的时候得特别小心谨慎，任何一个细节上的失误都有可能造成信息失真进而误导读者。数据和图表的翻译包含诸多层次，在翻译的时候须要用系统的方法。

在具体的翻译实践中，以下几点至关重要：

1. 数字精确转写属于最基本的要求。任何一个数字都必须一一对应、准确无误地表示出绝对数值、百分比、增长率、货币金额等。汉语中的“万”“亿”等

数量单位要按照蒙古语的计数习惯进行正确转换,不能出现数量级的错误。

2. 单位和符号的本地化。货币单位(元)、重量单位(吨)、度量单位(平方米)等均应使用蒙古语中通行的单位和符号。图表中的货币符号(¥),百分号(%)等,也要按照目标语读者的习惯予以保留或者转换。

3. 文字元素全部翻译,图表标题、坐标轴标签、图例说明以及任何附加的注释或者数据来源等信息都要翻译。从而使得读者可以全面、无障碍地理解图表所表达的信息。

译者还要考虑图表的整体视觉效果。在图上插入翻译内容的时候,尽量维持原版面格式结构,不破坏图表的可读性、清晰度。图文要相互配合,合起来才是一个完整、统一的信息单位。精准地翻译数据与图表,让经济信息越过语言的障碍有效传递,这是基础,也是保证新闻作品专业严谨的前提。

(三) 经济术语的准确运用

经济新闻专业性的集中表现就是大量使用专业术语。宏观调控、通货膨胀、供应链金融、碳中和这些词汇成了经济话语体系的基石。蒙汉翻译时是否能恰当地使用这些术语,是保证译文专业性与高质量的前提。使用错误的术语会对新闻的权威性造成严重损害,也会使读者对经济事实产生误判。所以译者就必须对经济领域的术语有很深的了解。

为了保证术语翻译的准确性,译者要建立并不断更新个人的专业术语库。主要是通过查阅、积累权威资料来实现的,例如国家金融机构、统计部门或者大型财经媒体发布的汉蒙术语对照表、行业词典等。对已经形成公认译法的术语,如“国内生产总值”,要严格遵循,保持译法统一。对于不断出现的新经济术语,如与数字经济、绿色金融有关的新词,目前还没有统一的译法。这时译者要基于对术语内涵的充分理解,在采取翻译的时候,采用描述性翻译,在第一次使用的时候加上简单的解释,并且注意关注行业内以及官方的最新动态,努力使自己的译法与时代同步,为新术语在蒙古语中最终固化和规范化做出自己的贡献。

在翻译经济术语时,还需注意术语的文化适应性。不同语言背后的文化背景差异可能导致某些术语在另一种语言中难以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译者应灵活处理,既要尽可能保留原术语的准确含义,又要考虑目标语言读者的接受度。例如,在翻译一些具有中国经济特色的经济政策或概念时,译者可以通过添加注释或采用意译的方式,帮助蒙古语读者更好地理解这些术语背后的经济

逻辑和政策意图。同时，译者还应不断提升自己的双语能力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以便更准确地把握经济术语在不同语境下的细微差别，从而确保译文的准确性和可读性。

三、社会民生新闻翻译实例

社会民生新闻和公众的生活密切相关，内容十分广泛，涉及教育、医疗、就业、环境、突发事件等诸多方面。此类新闻的翻译不仅要传递事实信息，还要争取在目标语读者中产生情感和生活的共鸣，因此要使用鲜活、自然、容易理解的语言，以引起读者的共鸣。

（一）选取突发事件或民生热点

突发事件、民生热点新闻的时效性很强，社会关注度也很高。无论面对的是自然灾害报道还是社会热点事件的跟踪，首先要做到的就是以最快的速度、最准确的方式将重要的信息传递给大众。这对译者来说就是巨大的时间以及责任的双重压力。翻译的时候，首先要迅速把握新闻的核心要素，也就是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原因、伤亡数目、救援情况等，保证这些要素能够被正确传达。处理这些报道的时候，一个常见难题就是怎样翻译现场目击者或者当事人的引述。这些引用都带有强烈的感情色彩、口语化的特点，甚至有方言、俚语、不完整的句子等。机械地进行字面直译，会使译文生硬、不自然，甚至无法理解。恰当的办法就是在保留原话基本意思和情感基调的前提下，用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的自然语言进行复述。把表达惊慌失措的中文口语译为同样能表现紧张感的蒙古语表述，而不是字字对应的生硬译文。报道中对于事件场景的描绘，还需要译者有较好的想象力和共情能力。译者要用语言再现现场的紧张气氛，民众的情绪，救援的紧急状况。这就需要译者在保证事实正确的前提下，选择恰当、形象的词句，使译文不仅仅是一个信息的传达，更是情景的再现，让远方的读者有身临其境之感，从而达到新闻报道跨文化传播的社会功能。

（二）情感色彩与客观报道的平衡

客观性是新闻报道的基本原则，但是语言本身并不是价值中立的真空地带，遣词造句中难免会带有某种情感色彩和人文关怀。在翻译民生新闻时，怎样准确地辨别出原文中所蕴含的情感倾向，又不越界于客观报道的范畴之内，是译者必须面对的一门艺术。原文作者在讲述感人事迹、悲剧性事件的时候，会用“不幸

罹难”而不是“死亡”，用“守望相助”而不是“互相帮助”，这些词汇的选择本身就有温度。译者的工作，就是准确把握这些微妙的不同，并在蒙古语里找到有相同情感分量的表达方式。平衡的艺术在实践中就表现为审慎的选择。在一篇报道见义勇为英雄的中文原文中，使用的多是敬仰赞扬的词语。译者在翻译的时候，也要在蒙古语中挑选能够表达出同等褒扬意义的词汇，从而激起读者同样的敬佩情感。反之，原文是带有批判性、揭露社会问题的报道，译文就要通过用词和句式表达出原文的尖锐犀利。关键在于，译者所表达的情感要来源于原文、服务于报道主题，而不是译者个人的主观臆断或者任意发挥。只有在这样的基础上，译文才能客观真实地传递出应该有人文关怀、情感力量的新闻报道，引导社会向善，引起公众思考。

（三）贴近读者生活的语言风格

社会民生新闻的最终落脚点是信息能够有效地触达并服务于广大民众，所以，社会民生新闻的语言风格必须是亲切、易读的。翻译这样的新闻时，译者应该摆脱僵化、书面化的“翻译腔”，而采用贴近蒙古语读者生活实际、符合他们语言习惯的表达方式。理想的翻译要活灵活现、生动易懂，使读者在阅读的时候有如本民族记者述说身边事情之感。为了达到这样的效果，译者必须在词汇选择、句式构造上下功夫。以一项与农牧民息息相关的惠民政策为例，与其生硬地逐字翻译政策条文，不如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直接说明这项政策能给他们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好处。报道社区文化活动时可以适当使用一些蒙古语中带有生活气息、轻松愉快的词汇和表达。当原文中出现带有特定中国文化背景的俗语或者网络热词，而蒙古语读者又不太了解的时候，译者不能照搬照抄，而应该根据语境，采用意译、解释性翻译或者寻找蒙古文化中具有相似功能的表达来代替。其主要原则一直保证信息是可以被接受、传播的。好的社会民生新闻译文应该能越过语言的障碍，走进读者的心里。

第二节 标题与导语处理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研究政务和新闻文本的蒙汉翻译，本质上就是一场跨文化的信息再创造。标题和导语就像是文本的“门面”，它们的翻译水平直接影响到文本是否能够抓住目标读者的眼球，并且准确地传递出主要信息，所以这是翻译全程中非常关键并且极具难度的一环。

一、标题翻译的常见方法

标题是文本的“眼睛”，它几乎把整个文本的核心内容都概括在里面。蒙汉政务、新闻类标题翻译时要根据文本的类型、传播目的、读者的期待来灵活地使用不同的翻译方式。实践中译者常常会把不同的策略结合起来运用，以期获得较好的传播效果。

（一）完全直译法

完全直译法强调在词汇、语法和结构上最大程度地忠于原文，用形式与内容的对等来尽可能地再现原文的语言风貌和信息结构。此方法在蒙汉政务文本翻译中不能被取代。政府部门发布的法规、公告、决议等文件，标题的严肃性与权威性要求翻译时任何术语、任何修饰语都不能遗漏。蒙古语标题里机构名称、文件性质、核心事由等要素，在汉语译文中一定要有固定的、规范的对应词，译者不能擅自增删改动。

这种方法的优点是保证信息传递准确，保证政务文本的严肃性和法律效力，防止由于意译而产生的歧义或者信息缺失。对从事蒙汉官方文件互译的译者来说，掌握两国对等机构及官方术语的规范译法是一项基本功。但是直译法也有其不足，如果不加以变通地滥用，会造成译文生硬冗长，不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尤其在处理带有修辞色彩的蒙古语标题时，直译会显得呆板，没有文采和可读性。

（二）意译重构法

意译重构法是跳出原文表层结构，重在意旨的传达。译者在了解蒙古语标题所含的内涵、作用、语言运用目的的基础上，依照汉语读者的阅读习惯与审美预期，对标题信息展开再组织、再建构工作。该方法在蒙汉新闻标题的翻译中使用较多。新闻标题的首要作用是吸引读者的注意力、概括新闻事实，但蒙古语新闻表达的方式和侧重点有时和汉语不一样。

一则关于某地牧业丰收的蒙古语新闻标题，如果直译为“某某苏木牧民喜迎牲畜丰收”，在汉语新闻语境中就显得比较平淡。如果使用意译重构法，译者就可以提取主要信息，再重新组合成具有新闻感的话语如，草原传喜讯、牛羊迎丰年、某地牧业增收忙、“领头羊”闯出致富路等来吸引读者。这样就激活了标题的传播潜力。

意译重构要具备好的双语能力、敏锐的新闻感以及广博的传播视野。译者要

准确地把握原文的宣传意图，在汉语文化语境下找到最贴切的表达方法，其难点就在于如何在忠于信息和提高传播效果之间找到最佳的平衡点。

（三）编译增删法

编译增删法给译者留下更大的余地，允许译者依照目标读者群体具备的相关知识、阅读需求去削减或者补充原文中的信息。本质上就是以译文的功能和目的为向导的一种适应性翻译。在蒙汉新闻翻译或特定受众的政务信息摘要中，此法使用得十分广泛。

标题中如果包含地域性强、汉语读者不熟悉的地名、人名或者带有特殊文化背景的词汇，为了防止出现阅读障碍，在翻译的时候可以添加解释性成分。将“Наадам（那达慕）”直接译为草原的“那达慕”盛会，就通过增加背景信息来帮助读者理解。反之，如果原文标题中的一些细节对于核心信息的传递并不是必须的，在汉语语境中还可能引起误解，译者就可以考虑删去。增删操作的核心目的就是改善信息传递的路径，消除跨文化理解的障碍，使译文更贴近目标读者。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这几种方法的区别，下表对其进行了梳理与对比。

蒙汉标题翻译方法对比表

翻译方法	核心特点	适用文本	优点	对译者的要求
完全直译法	忠实于原文形式与结构，追求对等	政务法规、官方公告	准确权威、信息无误	掌握对等机构与术语的规范译法
意译重构法	传达原文精神主旨，适应目标语习惯	新闻报道、宣传材料	生动形象、吸引力强	具备深厚双语功底与新闻敏感度
编译增删法	根据目标读者需求，调整信息内容	新闻摘要、科普文章	易于理解、贴近读者	拥有跨文化视野和良好的判断力

二、导语翻译的要点

导语是新闻或者政务信息的“心脏”，它对核心事实进行概括。导语翻译质量在蒙汉翻译中决定着读者能否马上了解事情的全部经过，是否会对接下来的阅读产生兴趣。因此，译者的工作重点就是导语的处理。

（一）核心要素的完整呈现

导语翻译的主要原则就是保证信息要素的完整性。新闻理论里的“5W1H”，也就是何人、何时、何地、何事、何因、怎样，也是指引蒙汉导语翻译的准则。译者在翻译蒙古语导语的时候，首先要做的就是确定这六个要素。

对于政务文本、硬新闻等来说，任何的漏译或者误译都是不能容忍的。蒙古语的语法结构，特别是动词后置、格词多的特点，常常把它们分散在句子的各个部分。翻译的过程就如拼图，译者要把原文的信息碎片一个一个地剥离出来，再按照汉语的叙事逻辑重新拼接上去，保证信息链条的完整。

具体操作中，译者可以遵循以下步骤：

1. 通读蒙古语导语，清晰标注出构成“5W1H”的各个词语或短语。
2. 分析各要素间的逻辑关系，判断事件主体、时间、地点、原因等。
3. 按照汉语新闻或者公文行文习惯，把上面的要素整合成一个或者多个通顺流畅的句子，形成信息完整、结构清晰的汉语导语。

（二）信息主次的合理安排

在完整呈现了所有要素之后，紧接着的问题就是怎样对这些信息做出合理的排序。无论是蒙古语还是汉语新闻，导语的写作都遵循着一个“倒金字塔”的结构，即把最重要的、最新鲜的、最吸引人的内容放在前面。但是，在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对于“什么最重要”的判断标准是不一样的。

这就需要译者有敏锐的判断力。翻译一篇蒙古语新闻时，除了要弄清楚原文将哪一个要素放在句首之外，还要考虑将其置于句首的原因，这或许能反映当地媒体或者受众所关心的事物。这时译者就遇到了一个问题，是坚持原文的强调顺序，还是按照汉语读者的认知习惯和新闻价值评判标准，对信息主次进行调整？例如一篇关于中蒙合作项目的报道，蒙古语导语会突出蒙方参与的官员，面向中国读者的译文则会把项目的重要意义或者成果放在前面。这并不是对原文的违背，而是在新的文化背景下，为了更好的达到原文的传播目的。

因此，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灵活运用翻译策略，既要尊重原文的信息布局，又要兼顾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惯和期待。这种调整并非随意为之，而是基于对两种文化深层次理解的基础上，做出的恰当选择。具体而言，译者可以通过分析原文的语境、目的以及受众特点，来决定哪些信息在译文中应予以突出，哪些可以适当弱化或后置。同时，保持语言的流畅性和自然度，确保调整后的导语既传达了原文的核心信息，又符合汉语新闻的写作规范，从而达到最佳的传播效果。

（三）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技巧

导语不仅要告诉，更要吸引。在保证信息准确完整的基础上，使用一定的方法来提高导语的吸引力，就是翻译功能对等理论的体现。译者的目的是使译文导

语具有和原文相当的吸引力。

因此译者就要善于分辨并转化原文的修辞手法。如果蒙古语导语是以引语、设问或者生动的场景描写开始的,那么译者就不能生硬地对译,而要找寻汉语中具有类似功能的表达去再现其修辞效果。原文中具有感染力的比喻,用一个汉语读者都熟悉的成语或俗语巧妙地表达出来,瞬间拉近了文本和读者的距离。

词语选择同样十分重要。翻译经济发展类新闻时,使用带有画面感、冲击力的“引擎”“新高地”“加速度”等词语,比使用中性的“发展”“增长”更能引起读者的阅读兴趣。翻译政务通报时用“圆满落幕”“胜利召开”这样的褒义词才能更好地体现官方积极的态度。译者精心打磨之后,导语除了传达信息之外,还具有独特的审美价值以及强烈的情感号召力。

另外,设置悬念也是吸引读者注意力的有效手段。在导语翻译中,若原文存在能引发读者好奇心、促使其继续探究的情节或信息,译者应巧妙捕捉并运用合适的汉语表达将其呈现出来。比如原文中提及某个重大事件背后鲜为人知的原因,译者可将其以一种引人入胜的方式在导语中透露一二,让读者产生一探究竟的欲望。

同时,利用数字和对比也能增强导语的吸引力。数字往往能给人直观、强烈的感受,在导语中恰当运用数字,如具体的数据、时间等,能让读者迅速了解关键信息。而对比则能突出事物的特点和差异,将原文中具有对比性的内容在导语中清晰展现,能迅速抓住读者的眼球,激发他们的阅读兴趣。

三、标题与导语的协同翻译

标题与导语在功能上互相依赖、互相补充,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在蒙汉翻译过程中必须把二者作为一个系统来处理,保证译文逻辑、风格一致,不能各自为政。

(一) 内容上的呼应与补充

理想的标题与导语的关系是标题高度概括,突出核心看点,导语围绕这个看点具体展开,呈现关键要素。蒙汉翻译中译者要用心维护好呼应、补充的关系。翻译时不能先译标题、后译导语,要在两者之间反复思考,保证信息链顺畅衔接。

如果标题用了意译重构法变得含蓄而富有文采,那么导语的翻译就必须更清晰、直接,第一时间用确凿的事实给标题“解密”。例如把一个蒙古语标题翻译

成“风雪中绽放的萨日朗”，那么信息就比较模糊。那么，紧接着的导语就要立刻指出，某边境派出所的女民警萨日朗（蒙语意为山丹花）在暴风雪中成功救起了被困的牧民。于是标题的诗意和导语的写实就构成了一个完整、引人入胜的开头。相反，如果标题已经很详尽了，那么导语就不应该再重复，而应从另一个角度入手。

比如标题直白地表述了新闻事件的核心要素，像“某地发生地震，救援队伍迅速抵达”，那么导语就不宜再对地震的时间、地点、救援队伍等基本信息进行重复罗列。导语可以从救援过程中的感人细节、受灾群众的状况等角度切入，如“在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救援队伍迅速抵达现场，一位年轻的救援人员不顾自身安危，从废墟中救出了一名被困的儿童，孩子获救时那充满希望的眼神，让在场的所有人都为之动容”，这样既避免了重复与冗余，又能从不同方面对标题进行补充，进一步吸引读者的注意力。

（二）风格上的一致性

风格即文本在表达时所呈现出的整体情感色彩与语言氛围，它是读者在接触内容时首先感知到的核心特征。标题作为文本的起始部分，其设定的风格基调必须在导语中得到进一步的延续和强化，以确保文本在情感和逻辑上的一致性。例如，一个庄重严肃的政务公文标题，绝不能搭配一个轻松活泼、带有娱乐性质的新闻导语；同样，一个充满人文关怀与情感温度的特写标题，也不应配以干巴巴、缺乏情感色彩的倒金字塔式新闻导语。这种风格上的一致性对于文本的整体表达效果至关重要。

在蒙汉政务文本翻译的过程中，这一点显得尤为关键。蒙古语标题如果采用了“关于……的决定”这类标准化的公文句式，那么其对应的汉语翻译也必须严格遵循相应的政务文体例与语言规范。随后的导语部分，无论是在措辞选择、句式结构，还是在语气把握上，都应当与标题保持高度统一，即体现出庄重、严谨、客观的语言风格，并准确使用规范的书面表达和专业术语。任何细微的风格偏离或语言上的不一致，都可能削弱文本的正式感，进而影响其在读者心中的可信度与权威性。

同样，对于新闻类文本而言，风格的一致性也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如果标题采用了煽情化的表达方式以吸引读者注意，那么导语部分就应当通过饱含情感细节描写或具有感染力的叙述方式来承接标题所营造的情绪氛围；而如果标

题以设问形式提出某个问题，导语则需对该问题作出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回应，从而在内容与情感上形成自然流畅的衔接。只有这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才能感受到文本内在的和谐与连贯，从而获得更佳的阅读体验。

（三）避免重复与冗余

在翻译过程中，标题与导语之间出现信息重叠的情况是绝对不容许的。一篇优秀的译文应当像一台精密的仪器，每个部分都各司其职，结构清晰、功能明确，既不多余，也不缺失。标题的作用在于提纲挈领，为读者提供核心信息的提示，而导语则负责进一步展开细节，深入阐释标题所指向的内容。如果导语的第一句话仅仅是重复标题中已经出现的信息，那么这不仅会显得冗余，更会浪费读者的时间和精力，降低整体阅读体验。

完全采用直译法翻译标题时，最容易导致这种问题的发生。尤其当蒙古语标题本身已经包含了时间、地点、事件等关键要素时，译者在将其直译为一个较长的汉语标题后，在处理导语部分时必须高度警惕，有意识地避免重复使用这些已经在标题中出现的信息。例如，如果标题被译为“X月X日某某代表团访问乌兰巴托市XX公司”，那么导语就不应再以“X月X日……”这样的时间信息作为开头，而应当直接切入访问的具体目的、会谈的核心内容等标题中未曾提及的新信息。

要做到这一点，译者必须具备全局观念。在着手翻译导语之前，应当先审视标题所传达的信息量，明确哪些内容已经得到呈现，哪些尚未涉及。通过灵活重组句式，或者调整信息呈现的顺序，译者可以有效避免重复，使得标题与导语之间形成一种递进和补充的关系，而非简单的复述。这不仅是一种翻译的技巧，更体现了一种严谨的写作态度。其最终目的在于提升译文的信息传递效率，增强文本的可读性与流畅度，从而更好地服务于读者。

第三节 时效性与语言简洁性

就翻译学来说，政务、新闻文本蒙汉翻译更注重时效性、简洁性。两者直接影响信息传递的效率和效果，是评判译文好坏的重要标准，也是检验译者综合能力的最基本条件。本节主要对这两项要求的内涵以及如何实现、怎样实现进行分析。

一、时效性对翻译的要求

信息爆炸时期，政务信息公布、新闻事件报道都具有很强的即时性。蒙汉翻译是信息传递的重要纽带，它的急迫时间要求，就是要让信息能在目标受众那里达成同步、无延迟的传递，不至于因为迟缓而失去价值。

（一）快速反应与高效作业

政务文件，尤其是政策发布、应急管理、对外声明等内容的翻译工作急需快速反应机制。不论是政府决策的传达，还是社会舆论的引导，都离不开信息的及时性。译员接到翻译任务之后要迅速理解原文意图，马上启动翻译程序。快速反应是考察能力的一种综合考察，考察的方面有译者的语言能力、专业知识、心理素质、组织协调能力。重大突发事件新闻稿件的翻译工作更是分秒必争，几分钟的延误就可能造成最佳发布窗口的丧失，造成舆论导向的偏差。打造一支随时可以出动、马上投入工作的一支专业的翻译队伍，或者培养译者能够独立完成紧急稿件的能力，已经成为政务、新闻翻译机构的核心竞争力。

高效的作业，成了快速反应的强有力保证。它要求翻译全流程，即接稿、分析、翻译、审校、发布，环环相扣，无缝衔接。这就意味着译者不能再单打独斗了，而应该采取协同作业的模式。长篇的紧急文件可采用分工合作的方式，一人主译、一人审校，或者多人分段翻译、一人统稿、统一风格。流水线式作业可以大大缩短翻译时间。同时译者也要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建立自己的个人术语库，记住常用的句式表达，减少在基础问题上花费的时间，把更多的时间用于对文本深层次含义的理解和准确表达，从而达到提高速度和效率的目的。

（二）利用技术工具提升速度

伴随着人工智能以及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各种翻译辅助工具、机器翻译系统在提高翻译速度上所起的作用越来越重要。对结构重复性较高，术语相对固定的政务公文，如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等，翻译记忆库的作用就非常大。译者可以利用之前翻译或者审校过的类似句段，有效地避免重复劳动，保证术语一致，从而大大提高翻译效率。

机器翻译是一种很强的辅助工具，它的处理速度比人要快得多。大量信息或者非常急的新闻快讯时，可以先用机器翻译生成草稿，再由译者进行译后编辑。以“人机结合”的方式，把译者的中心工作从零开始的翻译创造，转变为对初稿的修改完善，有利于快速产生基本可以阅读的译文，满足信息传播的初步时效需求。

但是技术工具不是万能的,使用的时候必须持有谨慎和批判的态度。译员要严格的甄别、修正工具所产生出来的翻译,从语法、语境、文化内涵三方面来加以校正。译者的价值体现在对语境的把握、对文化的感知、对语言的创造上,这些都是目前的机器无法完全取代的。合理使用技术,把它当作提高效率的“加速器”,而不是完全依靠的“拐杖”,是现代蒙汉译者应具备的职业技能。

(三) 在速度与质量间寻求平衡

在追求翻译速度的同时,绝不能牺牲质量。政务、新闻文本的严肃性、权威性决定了译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错误。错误的翻译会造成政策的误读,引起社会的恐慌,降低政府的公信力。所以,在时效性巨大的压力之下,怎样找到速度与质量的最好比例,就成了译者一直面对的课题。这就要求译者必须要有牢固的母语语言和专业知识的功底,在高速阅读的同时迅速掌握文章要义、重要细节,以防因求快而出现漏译、误译的情况。

实现速度与质量的平衡,不能缺少科学的质量控制流程。根据文本的重要程度和紧急程度来建立分级处理机制,并且匹配不同的翻译资源和审校流程。对于极其重要的文件,即使时间再紧迫,也不能省略交叉校对至少一轮。译者平时要多加积累,熟悉政务、新闻类文本的特有语体风格、词汇和表达方式,形成“肌肉记忆”,这样在翻译的时候就可以减少迟疑,自然而然地选择最合适的译法。真正的快不是草率,而是厚积薄发后的熟练精准。好的译者高效率是由于语言的熟练、内容的敏感,在最短的时间里做出最好的选择和表达。

二、语言简洁性的实现路径

政务、新闻文本的主要功能就是准确、清晰地传递信息,语言简洁性是实现这一目的的重要保证。在蒙汉翻译时,译者要自觉地摆脱繁琐的表达,追求简明,在多种途径上达到简洁明了的效果,把信息有效地传达给受众。

(一) 删减冗余信息

汉语书面语,特别是政务公文里,常常会出现一些结构重复或者出于礼节、强调目的而使用的套话。这些成分在汉语的语境下有对应的作用,用蒙古语直接翻译显得啰嗦累赘,不切合蒙古语的表达习惯,而且会干扰核心信息的传达。像一些程序性描述、重复出现的修饰语,“众所周知”“毫无疑问”这类表态性词语,在翻译的时候要仔细斟酌它们在目标语境里是否必须保留。如果这些信息对

于核心意义的传达没有实质性的贡献，就应该果断地删减或者转述。

删减冗余信息不是简单的删除，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是再创造。译者要区别信息的轻重，要知道哪些内容主要、哪些内容是次要或者添加性成分。这个过程考校译者的分析与判断能力。例如在翻译一篇关于经济发展的报道时，原文里有很多华丽辞藻来描述蓬勃发展，译成蒙古语的时候，译者可以选择几个最核心、最贴切的词汇来概括，不必把所有的修饰语一一对应翻译出来。减法思维就是去除原文的语言外壳，提取信息内核，最后用最简洁的蒙古语重组，使译文更加明快有力。

（二）使用精炼的蒙语词汇和句式

蒙古语词汇丰富，句法结构独特，善用这些特点就是实现译文简洁性的重要手段。汉语里需要短语或从句才能表达的概念，在蒙古语中可能是一个或者几个对应的精确词。译者要不断扩展自己的蒙古语词汇量，尤其是概括性强、表现力好的动词、名词、形容词。并且熟练运用蒙古语的附加成分（后缀），可以把复杂的语法关系浓缩在词根里，使句子的结构更紧凑。

就句式来说，应尽量遵从蒙古语的自然语序和习惯用法。汉语里常见的长句、复合句，特别是层层嵌套的定语从句，如果生硬地翻译成蒙古语，就会造成句子繁杂、逻辑不清。译者应该主动重组句式，将长句变成短句，或者把从句转成短语。蒙古语的句子结构是以动词谓语为中心，修饰成分在前，主干清楚。翻译时要充分利用其特点，合理安排语序，突出句子主要动词和宾语，防止头重脚轻。要达成此目的，译者须要：

1. 深入研究蒙古语句法规则，特别是与汉语存在显著差异的部分。
2. 大量阅读优秀的蒙古语原生文本，培养地道的蒙古语语感。
3. 在翻译实践中，敢于打破原文的句子框架，进行大胆而合理的结构重组。

蒙古语里有着许多生动形象的谚语、俗语、惯用语。在不违反政务、新闻文体严肃性的情况下，恰当地对这些表达进行适度使用，可以以最简洁的方式传达出更多的文化内涵与情感色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使译文简练又形象。这就要求译者不单是语言的转换者，更是文化的沟通者。

（三）避免过度修饰和渲染

政务与新闻类文本的核心任务在于客观、准确地传递事实信息，其本质是信息传达而非文学创作。因此，在翻译这类文本时，必须警惕过度的修饰与渲染。

部分译者出于炫技的心理，或是误以为“雅”即等同于“信”，往往擅自添加原文中并不存在的华丽辞藻、比喻或夸张修辞。这种做法不仅违背了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于原文，更有可能曲解原意，为原本应严肃、中立的政务内容或新闻信息注入不恰当的主观色彩，进而导致信息接收方产生误解甚至被误导。

译者应始终秉持中立和客观的态度进行翻译，准确把握原文的语体特征。若原文风格平实、语气客观，译文也应保持一致的文体风貌。翻译的“美”，并不体现在辞藻的堆砌与语言的华丽，而在于用词准确、行文流畅、语气得体。特别是当汉语原文中帶有一定宣传或渲染色彩的表述需译成蒙古语时，更需谨慎处理。应根据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接受习惯，选择更为中性、平实的表达方式，以增强信息的可信度与跨文化接受度。简洁质朴的语言往往比华丽修辞更具说服力，也更符合政务与新闻文本对专业性、权威性的要求。

三、案例分析：简洁与高效的翻译实践

理论的探讨最后还得靠实践去检验。本部分选取具体的蒙汉政务、新闻翻译实例，从时效和简洁两个方面入手，探究成功的翻译要素，总结出可以借鉴的经验模式。

（一）对比不同版本的翻译速度与效果

以某次地方政府发布的疫情防控紧急通知为例，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差异可以体现不同模式的好坏。通知中指出，2小时内完成蒙文版的翻译并公之于众。对于这个任务，使用传统模式和人机协作模式的两个队伍，其表现却大相径庭，具体对比如下表所示。

不同翻译模式效率与效果对比表

模式	核心流程	预估耗时 (以2小时为限)	优势	潜在风险
传统人工翻译	人工翻译 + 人工审校	> 2.5 小时	质量可控，风格统一，译文精细	耗时长，难以应对极端紧急任务，译者压力巨大
人机协同翻译	机器翻译 + 人工精校	< 1.5 小时	速度极快，效率高，能解放译者专注于核心审校工作	对译后编辑能力要求高，需警惕机翻的隐性错误

上表清楚地表明两种模式的区别。在时效性要求很高的情况下，传统翻译模

式的瓶颈就暴露出来了。人机协同模式用技术工具完成了大量的基础性、重复性的转码工作，将宝贵的人力资源解放出来，使人能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创造性和判断性强的审校、润色环节上，在速度上具有绝对优势。

从效果上看，虽然人机协同模式的译文是以机翻初稿为基础，但是经过专业译员对译后编辑的细致加工，其最终质量并不比纯人工翻译差。打破了“机翻质量低”的刻板印象，证明只要流程得当、人才到位，技术可以成为提高翻译质量和效率的强大助力。在新时代的翻译需求面前，接受技术、优化流程是高效翻译的必由之路。

（二）分析简洁翻译的成功要素

优秀的简洁译文并不是偶然的，它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产生的。最根本的因素就是译者深刻的领悟力。简洁不是简单的删减，是筛选、提纯、重组。只有在译者准确把握了原文的意图、逻辑、信息层次之后，才会决定哪些内容是必须要保留的，哪些是可以省略的。此种理解力出自译者扎实的语功和广博的学识。

娴熟的蒙古语表达能力是达到简练的必要条件。译者要挣脱汉语原文句法框架的限制，用最地道、最凝练的蒙古语重新组织信息。这就包括选词能力，即从一系列近义词中选出最合适的、最简洁的一个；也包括句法变换的能力，即把汉语的复杂长句，巧妙地转译成蒙古语里自然流畅的短句或者特殊句式。汉语中的“……的政策，是为了……”这类表示目的状语从句，如果用蒙古语动词目的格后缀来表达，那么句子就会瞬间变得简洁有力。这种能力的养成要依靠长时间的阅读、模仿、实践。

（三）总结可复制的经验模式

可以总结出一套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实现简洁高效目标的可复制经验模式，即“三阶段双核心”模式。所谓三阶段，就是把翻译工作流程化，分为准备、执行、复核三个阶段。准备阶段的任务是快速读懂原文，判定文本种类、核心信息和时效需求，安排对应的技术手段（事先装载有关领域的术语库）。

执行阶段的核心就是人机协作、并行工作。对于紧急稿件，可以采取机器翻译先行、译者快速精校的方法；对于重要的但是不那么紧急的稿件，则可以采用双人合作模式，一人主翻、一人同步审校、动态反馈的方式来降低后期修改所花的时间成本。这一时期译者应当主动使用简洁化的策略，合并短句、改变句式、选用精炼的词语，从翻译的源头就将简洁的基因注入进去。复核阶段必须保证，

不管任务多么紧急,都必须设置一道快速检查程序,至少核对数字、人名、地名、关键术语等硬性信息,牢牢把住质量关。

双核心即两个贯穿始终的核心能力,技术应用能力、语言精炼能力。这就意味着翻译机构要对译员展开翻译技术培训,让译员掌握各种辅助工具的使用方法。同时还要加强对译员的双语转换以及蒙古语写作能力的培养,定期举办研讨会,交流优秀的译例,促使译者具有追求语言简洁的自觉性。把作业流程化和核心能力培养结合起来,才能提高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的时效性以及文本质量。

第四节 跨文化传播效果

在应用翻译学的视角之下,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的翻译,早已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带有明显跨文化传播色彩的行为,目的在于实现信息的有效传递与接收,进而达到预期的社会效果。所以评价并不断改善翻译的跨文化传播效果不仅是评判翻译质量、修正翻译策略的核心步骤,更关系到政务信息的权威性以及新闻报道的影响力。

一、文化障碍在新闻翻译中的体现

文化是一种价值观、行为方式,是信息编码解码的全过程的影响因素。源语文本带着文化烙印,在蒙汉新闻翻译时常常成为目标语读者理解信息的障碍,进而影响到传播效果。

(一) 价值观差异导致的理解偏差

蒙汉两种文化在历史发展、生产方式和社会结构上存在着较大的差异,从而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核心价值观。蒙古族文化里对自然、英雄的崇拜以及对社群纽带的看重,跟汉文化重视家庭伦理、集体和谐和历史传承的价值观不是一回事。这种差别在新闻文本中就体现出来了。地方政府为了保护草原生态而推行的“禁牧轮牧”政策,在汉语语境中,读者一般将其理解为一项具有科学远见的环保措施,从中看到政府的宏观调控和治理能力。但是当这篇新闻被翻译成蒙古文之后,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牧民读者,则会更多地从个人生计、家庭利益以及传统的生活方式受到冲击的角度来理解,从而对政策产生抵触或者怀疑。如果译者只是简单地进行表层信息的对等转换,而没有妥善处理由于价值观差异引起的认

知偏差，就会使同一个新闻事件在不同的文化群体中引起截然不同的反应，甚至造成误解，这无疑会削弱新闻作为沟通桥梁的功能，也会影响政务信息传递的准确性、权威性。

新闻文本中对于“成功”“幸福”这些抽象概念的表述，也难逃价值观的左右。一篇旨在用商业成功来赞扬创新和奋斗精神的汉文新闻，如果不加以调整地翻译成蒙古语，就可能会与蒙古族文化中更崇尚精神富足、家庭和睦、人与自然和谐的传统幸福观产生冲突。目标读者很难在报道中的人物身上找到共鸣，会认为报道的叙述角度太功利。因此，译者在翻译含有深层价值观的报道的时候，必须具有很高的文化敏感性，准确把握源文化与目标文化在价值判断上存在的细微差别，使用恰当的方法来调节这种差异，防止因为价值观的不同造成传播隔阂、信息失真，使新闻内容可以被目标受众认知上接受、情感上认同。

（二）历史背景知识的缺失

所有的新闻事件都处在一定的历史脉络之中，其内在的深意只有在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下才能得到充分的解释。蒙汉翻译尤其是政务、新闻的翻译，经常会碰到双方所独有的历史事件、人物或者带有特殊历史内涵的地名。当源语文本的作者预设其读者具有这些背景知识的时候，翻译的难题也就出现了。对于目标读者来说，这些知识的缺乏会使得新闻内容变得难懂，甚至完全无法认识到新闻的重要性。汉文新闻在报道某个区域合作政策的时候，会用到“走西口”这个历史事件来进行类比，从而让文章更有分量、更有趣味。但是对不熟悉晋商文化的蒙古族读者来说，走西口这个典故相当陌生，直译只会使他们感到困惑，无法领会其中蕴含的艰辛开拓与文化交融的深意，报道的感染力也会大打折扣。

反之亦然，当一篇蒙古文新闻报道某次纪念活动的时候，提到历史上某位部落首领的功绩或者某次重要盟会的意义，对蒙古族读者来说是文化常识，也是构成其民族认同感的一个重要环节。当翻译成汉文的时候，如果译者只是简单地音译或者直译人名、地名、事件名，没有给出背景解释，汉族读者面对这些陌生的名词，就像读一本缺少注释的专业史书，很难体会到该新闻事件的现实意义和情感分量。由于缺少对历史背景的知识，造成理解的鸿沟，这不但会减弱新闻的可读性，而且会妨碍不同的文化群体之间深层次的历史认知和情感交流。政务文件中对于历史的征引也是一样道理，如果处理不好，就会降低政策阐释的力度和说服力。

真正有效的翻译应该要预测目标读者可能存在的知识盲区,主动承担起提供补充信息的责任。这时,译者就不再是语言的“搬运工”,而应当成为文化的“引路人”。对于带有特定历史背景的文本,译者要判断这些背景信息对理解全文是否重要。信息十分重要时,就要采用合适的翻译方法加以补充,以填补因文化差异而产生的历史认知空白,保证新闻、政务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完整性及易解性。

(三) 幽默、典故等文化元素的隔阂

幽默、谚语、歇后语、文学典故都是语言的精华,把特定的文化智慧、生活情趣浓缩其中,带有很强的地域性、民族性。在政务报告或者新闻评论当中,恰当运用这些文化元素可以使得语言变得生动活泼,从而加强文本的感染力以及说服力。但是这些元素的翻译成了跨文化传播的一大难题。它们的意义常常超脱于字面之外,依靠约定俗成的文化联想和情感共鸣来产生,而在另一种文化中,这些意义常常是不存在的。蒙古语里源自游牧文化众多的谚语,常常把骏马,雄鹰,草原这些当作喻体,如果把这些直译成汉语,不是韵味全无,就是怪诞难懂。又如,蒙古语里形容某人办事爽快的幽默表达,其喻体如果和草原生活息息相关,汉族读者就很难感受到笑点在哪里,翻译效果就会大打折扣。

同样,在汉语言文化中,诸如庖丁解牛、愚公移山、朝三暮四等流传千古的成语典故,也经常被用作新闻标题或者正文,以达到言简意赅、意味深长的效果。译者要把这些内容翻译成蒙古文时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逐字直译是行不通的,因为蒙古族读者不懂得背后的故事,也就不能解码它的引申义。如一篇新闻评论的标题用“病入膏肓”来形容一个社会问题的严重程度,如果直接翻译成蒙古文,读者只能体会到“疾病侵入身体的某一部位”这样的字面意思,而完全无法领会其“问题已经到了极端严重的地步,难以挽回”的比喻意义。文化元素一旦出现障碍,那么源语文本中最为传神的地方,在翻译过程中最容易消失,译文就会平平淡淡,甚至产生反效果。对追求时效性、影响力的政务新闻传播来说,这是一个必须正视并设法克服的障碍。

二、提升跨文化传播效果的策略

对于以上种种文化障碍,应用翻译学主张从功能、效果出发,采取灵活多样的翻译策略,把跨越文化鸿沟、达到传播目的放在首位。这就意味着译者要从被动的语言转换者变成主动的跨文化传播中介。

（一）采用“归化”策略增强亲和力

归化翻译策略就是让译文融入到目标语读者所习惯的、期待的文化中去，消除陌生感。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中，在面向大众的宣传性、普及性文本里使用归化策略可以明显提高文本的亲和力和可读性。其实并不是词语的更换，而是文化的转变。源语文本中的文化意象、比喻或者典故如果无法在目标语文化里找到对应，或者无法引起目标语读者的共鸣，译者可以用目标语文化里功能类似且读者熟知的文化元素来替代。翻译一篇鼓励青年返乡创业的汉文新闻稿，文中可能会用鲤鱼跳龙门来形容成功的难得和辉煌。如果直接翻译，就会造成蒙古文中大量文化内涵的流失。此时采用归化的译者可以寻找蒙古族文化里相似的表达方式，用优秀的赛马在很多匹骏马中脱颖而出之类的比喻来代替。尽管喻体不同，但是二者传递的“通过激烈竞争获得卓越成功”的功能是一致的，能够快速引起蒙古族读者的情感共鸣。在政务宣传中，把汉文化语境下的政策口号，用蒙古族民众喜闻乐见的谚语或者歌谣形式进行再创作，也是归化策略的运用。这样做表面上牺牲了原文的形似，实际上是为了追求更高层次的神似以及传播效果的等效，使得信息在跨文化语境下更接地气，更易被理解接受。

（二）适当增加背景注释或解释性翻译

对于那些不能够简单地用归化策略来处理，含有知识性并对理解全文至关重要的文化负载词或背景信息的，就需通过增注或使用解释性翻译等手段进行补充。本策略的精髓就是要在保留文本原生态文化特性的同时，主动为读者扫除理解障碍。解释性翻译主要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实现，表1对几种常见的方法进行了归纳比较。

解释性翻译方法对比表

方法	实现方式	适用场景	优缺点
括号加注	在译文后用括号进行简短补充说明。	适用于对专有名词、机构名称、特定概念等做快速解释。	优点是直接明了，对原文干扰小；缺点是可能打断阅读流畅性。
句内解释	将解释性文字自然地融入译文句子之中，作为句子的一部分。	适用于需要流畅行文，且解释内容不至于过长的场合，如“走西口”的意译。	优点是行文流畅自然，不影响阅读体验；缺点是考验译者的语言组织能力。
脚注或尾注	在页面底部（脚注）或文章末尾（尾注）对复杂背景进行详细说明。	适用于政务文件、深度报道中涉及的复杂历史文化背景。	优点是信息完整准确，不影响正文结构；缺点是可能分散读者注意力。

在翻译“十四五”规划时，可以在其后用括号加上注释“即2021年到2025年的发展规划”，使不熟悉的读者立即明白它的时间范围。而对于前文所提到的“走西口”，可以不直接翻译，用解释性的文字加入句中，如，……就像历史上的那些为了生计而勇闯北方的先辈们一样。对特别复杂或重要的历史文化背景，在政务文件或者深度新闻报道中用脚注或者尾注加以详细的说明，虽然会打断阅读但可以保证信息的完整和准确，尤其适合解释政策法规的历史渊源等场合。

（三）尊重目标受众的文化习俗

翻译不只是语言行为，也是社会行为。译者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译文的最终使用者是处在特定文化环境里的人。所以尊重目标受众的文化习俗、宗教信仰和情感禁忌，是跨文化传播能够顺利进行且避免负面影响的根本。在蒙汉政务及新闻翻译当中，这一点尤为关键，它同政府的公信力以及媒体形象有着直接的联系。用颜色、数字、动物等举例，不同文化给它们赋予的象征意义大相径庭。蒙古族文化中崇尚蓝色、白色，蓝色代表永恒的天空，白色代表纯洁的心灵，对某些数字或者动物存在忌讳。译者在处理带有上述元素的文本时要格外小心。一篇为了营造喜庆气氛的汉文新闻稿，在翻译之前就应考虑到中国象征吉祥的红色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在考虑用蓝色或者白色时，应该避免使用任何可能产生负面联想的元素。

称谓系统、行文语气这些小地方也得表现出对目标文化的敬意。政务文件中对领导或者民众的称呼方式，新闻报道中对采访对象引语的表达方式，都应该符合蒙古语的表达习惯和社会礼仪。生搬硬套汉语称谓系统，或者使用书面化、过于官方的语言去表达，都会造成译文不自然、僵硬甚至傲慢。译者需要知道蒙古族社会的交往规则，使用更得体、符合逻辑的称谓、语气来传递政务信息，让新闻报道增添人情味。这种以文化尊重为前提的适应性调整，就是应用翻译学“读者中心论”的一种体现，也是实现有效跨文化沟通的“润滑剂”。只有译文充分尊重受众的文化身份和情感的时候，信息传递的渠道才真正畅通无阻。

三、效果评估与反馈

翻译活动不是在译文出现的时候才结束的。就应用翻译学而言，评价和反馈的传播效果是不能少的闭环。它要探究翻译策略是否有效，了解受众的反应，给以后翻译时怎样调整提供修改意见，从而形成一种不断改进的动态过程。

（一）通过阅读量、转载量等指标评估

数字媒体时代，政务门户网站、新闻客户端、社交媒体平台等为量化翻译的传扬成效给予了方便的技术手段。一连串客观数据指标，可当作评价译文触及范围和受欢迎程度的初步依据。以一篇蒙汉双语新闻稿为例，发布后可以从后台的数据里得到它的蒙古文版阅读量，独立访客数量，页面停留时间以及跳出率等信息。高阅读量一般会反映标题或者主题吸引了目标受众的注意，较长的页面停留时间说明内容可读性好，价值高，低跳出率表示读者对内容产生兴趣。

转帖数、分享次数、点赞数都是可以用来度量译文传播的广度以及被认可的程度。如果一篇蒙古文译稿被大量的个人用户或者其他的媒体平台转载分享，那么这就意味着译稿的内容或者翻译的质量得到了受众的认可，具有二次传播的价值。这些量化指标不能完全取代对于传播深度和思想认同度的度量，但是它确实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宏观、客观的视角来观察哪些翻译文本在传播上是成功的，哪些是不理想的。通过对不同主题、不同翻译策略的文本进行数据对比分析，还可以发现一些规律，比如某种类型的标题更受欢迎，或者使用归化策略的民生新闻比使用异化策略的文化报道互动率更高。这些数据支撑的发现，给翻译策略的改变给予第一手参照。

（二）收集目标受众的直接反馈

量化数据可以回答“是什么”，质性反馈可以解释“为什么”。要想真正了解翻译的传播效果，就不能仅仅停留在数字上，要直接去听受众的声音。收集直接反馈的渠道有很多种，有在线问卷调查、读者留言区评论分析、焦点小组访谈，还有和目标社群里的意见领袖进行深入交流等。通过问卷可以了解到读者对于译文可读性、准确性、文化适应性的总体感受。网站或者社交媒体的评论区就如同一个开放而即时的反馈广场，读者们会在这里直接对自己的某个词语翻译产生疑问，或者对某一种表述方式表示赞同或者反对。译者与编辑要重视这些评论，因为从中常常可以发现量化数据所不能体现的细微之处。

焦点小组访谈属于更加深入的质性研究方法。可以邀请不同年龄段、职业、受教育程度的蒙古族读者就几篇典型的政务或者新闻译文展开讨论。主持人引导下，参与者可以把自己的阅读感受讲出来，说到哪里拗口、哪个比喻难懂、哪种表述亲切或生疏的地方。面对面的交流可以挖掘出文化深处的认知模式以及情感反应，给译者提供非常宝贵的具体的修改意见。这些一线用户的直接反馈，就是

连接译者和读者的桥梁，也是检验翻译是否真正“落地”的试金石，它的价值不能用冰冷的数字来衡量。

（三）对传播效果不佳的案例进行复盘

建立常态化的案例复盘机制，对不断改善翻译质量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数据分析、读者反馈证明传播效果差的翻译案例需要翻译团队、编辑和相关决策者一起参与专门复盘。复盘不是为了追究责任，而是从失败中学习。在复盘时需要对项目全流程进行系统回顾，从最初对源文本理解有无偏差，翻译策略选择是否恰当，具体词句处理时是否充分考虑了文化差异，审校环节有无遗漏潜在问题等。团队成员要坦诚地讨论各个环节可能存在的不足。以一篇经济政策译文阅读量低为例子，在复盘时就会发现，问题并不在于翻译是否准确，而在于全文使用了太多专业、书面化的词汇，脱离了普通大众的语言习惯。又或者一篇新闻报道引发负面评论，复盘可以发现译者在处理某个敏感话题的时候，无意中用了带有文化偏见的词语。通过对具体案例的分析，找到问题根源，总结出有指导意义的经验教训，再将其转化为未来工作的具体规范或者操作指南。这种“吃一堑，长一智”的迭代优化过程，正是应用翻译学理论联系实践、致力于解决现实问题的精髓所在，它能推动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工作在不断的自省与改进中螺旋式上升，日臻完善。

第六章 翻译中的文化因素处理

翻译不但是语言的转换，更是跨文化交际的桥梁。在蒙汉翻译当中，特别是对于政务、新闻这些含有丰富社会文化信息的文本而言，对文化因素的敏感度以及如何妥善应对，这是保证信息能够准确传达、达成有效交流的重要因素。本章在应用翻译学的视角下，从物质、制度、精神三个方面对蒙汉两个民族的文化差异进行对比，探究文化差异给翻译实践带来的具体挑战以及应对策略。

第一节 蒙汉文化差异比较

蒙汉两族由于地理环境、生产方式、社会发展进程的不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形态。文化差异存在于社会的方方面面，形成了蒙汉翻译要跨越的文化语境的鸿沟。本节从多个方面对两者进行文化比较，为之后翻译研究打基础。

一、物质文化差异

物质文化是文化体系中最为直接、最基本的部分，包括衣食住行等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生活领域。蒙古族和汉族截然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使得其物质文化存在着显著的差别，这些差别在词汇系统、表达习惯上表现出来，也成了翻译工作者面对的第一个难题。

（一）饮食、服饰、居住文化

蒙汉两族的饮食文化是由各自的生产基础决定的。蒙古族逐水草而居，以牛羊肉、奶制品为主食，形成了特有的“红食”“白食”饮食文化。奶制品的制作工艺复杂，品种多样，如奶豆腐、奶皮子、奶嚼口等，在蒙古语中都有准确相对应的词。汉族是典型的农耕民族，饮食以五谷杂粮、瓜果蔬菜为主，讲究五味调和，并发展出八大菜系等博大精深的烹饪文化。这就直接造成了翻译食品产业或者餐饮文化类文本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词汇不对等问题。例如，把蒙古语里繁杂的奶制品名称翻译成汉语的时候，常常需要使用解释性翻译或者音译加注的方法，才能使汉语读者明白其意。

服饰与居住文化是截然不同的。蒙古袍是蒙古族最具有代表性的传统服装，宽大、色彩独特、腰带系法不但适应草原多变气候、骑射的需要，而且是部落标识、年龄、婚否等社会信息的载体。汉族的传统服饰统称为汉服，不同的朝代样式、礼仪和纹样也不同，体现出森严的等级观念和礼仪制度。翻译有关民族文化展示或者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时，如果不了解这些服饰背后的文化内涵，就不能准确地传达出它的象征意义。居住上，便于拆卸的圆形穹顶蒙古包是游牧民族的象征，完美地契合了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汉族传统民居无论是北方的四合院还是南方的天井院，都体现出定居农业社会的特征，讲究中轴对称、内外有别，蕴含着儒家思想中的家庭伦理和宗法观念。翻译涉及到城乡规划，民生工程，灾后重建等政务新闻时，对于这两种居住形态以及其文化意涵的把握程度，会直接影响到信息传递是否准确，读者是否能接受。

（二）生产生活方式差异

生产生活方式是物质文化形态的决定因素。蒙古族历史上长期以游牧畜牧业为主要生产方式，形成了独特的游牧经济。这种经济形态决定了它的生活方式是流动的，是对自然的依赖。人们围绕着牧场、水源、季节而周期性地迁徙，社会组织、人际关系也常常是以“敖特尔”（游-牧-单-元）为单位而展开的。因此，蒙古语中有很多与畜牧、草原、天气、迁徙有关的细密词汇，比如对不同年龄、性别的马、牛、羊都有具体的命名，而这些在以农业为主的汉语中是相对缺少的。汉族是以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为基础，产生稳定的聚落和乡土社会的。他们的生活方式比较固定，民众更加看重土地、宗族、节气。在进行有关农牧业政策、生态保护、经济发展等方面的政务文本翻译的时候，需要做到文化语境转换的精准性。像蒙古语新闻中经常出现的“抓好春季接羔保育工作”，如果直接翻译给不熟悉畜牧业的汉语读者，就会觉得陌生难懂，需要调整成更符合他们认知习惯的“做好春季牲畜繁育工作”。

反之，汉语里大量与农耕有关的词汇，诸如耕、耙、播、耘、收等一系列细致的田间作业，还有二十四节气这种农业时令的概念，在蒙古语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表达。因此，中国农业政策、技术推广等新闻翻译成蒙古文的时候，译者需要考虑到目标读者的知识背景，对一些重要的概念进行必要的解释。将乡村振兴战略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不能只停留在字面意思上，而要联系蒙古国的社会现实，解释其在促进地方发展、改善民生方面的具体内容，才能被正确理解。生

产生活方式的差异不但是词汇上的不对等，而且深深地植根于思维模式里，需要译者有高度的跨文化转换自觉性。

（三）相关词汇的空缺与不对等

物质文化的不同，必然会造成语言上的大量词汇空缺、指代不对等现象，这是蒙汉翻译，特别是政务、新闻翻译中一个普遍而具体的问题。词汇空缺指的是一种语言里用来指代某物的一个词语，在另一种语言中完全不存在相应的词。蒙汉物质文化差异导致的词汇空缺与不对等现象，从下表所列即可看出：

蒙汉文化特有词汇翻译对照表

文化领域	蒙古语词汇 / 汉语词汇	另一语言对应情况	文化内涵与翻译策略
畜牧文化	азарга (种公马), гүү (母马), унага (马驹)	汉语中有基本区分，但远不如蒙古语精细，缺乏对不同年龄、状态的详细划分。	蕴含草原文化核心价值。翻译时需根据文本精度要求，采用“描述性意译”或在必要时“音译+注释”以确保信息准确。
农耕文化	梯田, 垄, 畦	传统蒙古语中缺乏对应词，属于文化缺省。	体现汉族精耕细作的农业模式。翻译时可采用“描述性意译”或“类比法”，帮助游牧文化背景的读者建立视觉意象。
器物习俗	хадаг (哈达), айраг (马奶酒)	虽已被汉语部分吸收，但文化内涵丰富，简单音译不足以传达其深层意义。	哈达象征纯洁与尊敬，马奶酒是待客最高礼仪。翻译时需超越词汇本身，通过解释或上下文补充其象征意义，实现功能对等。
器物习俗	文房四宝, 对联, 红包	蒙古语中无直接对应词。	承载着汉族独特的文人情趣、年节习俗和人情伦理。翻译时需详细解释其用途和文化象征，避免信息流失。

如表所示，处理畜牧业相关词汇时，蒙古语中对于“马”这个词的词汇体系非常复杂，其中包含生物学的信息，又承载着草原文化的核心价值，翻译的时候通常要采用描述性的意译来保证准确性。在翻译中国农业发展成就的时候，如果目标读者是蒙古国民众，那么直接翻译梯田等词汇很难形成有效的画面，译者需要考虑怎样通过描述或者类比，使游牧文化背景的读者能够理解这些概念。器物 and 习俗词汇不对等也较常见。哈达不只是绸巾，它还是纯洁、尊敬和祝福的象征，如果在外交或者民族团结报道中只翻译成“丝巾”，则会大大降低其文化含量。

译者面对这些词的时候，就要跳出语言本身，去探究它的文化内涵，选取最能够达成功能对等的翻译手段。

二、制度文化差异

制度文化就是指一个社会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法律、社会组织、教育、习俗等方面的规范体系。它体现的是社会结构与运行机制，具有很强的民族性、历史性。蒙汉制度文化差异给理解、翻译政务、新闻等社会性很强的文本带来了深层次的困难。

（一）政治制度与法律体系

蒙汉两民族在历史上形成了完全不一样的政治治理方式。蒙古民族曾经建立过强大的游牧帝国，它的政治制度是以“忽里勒台”（贵族大会）为决策中心、以“札撒”（法典）为法律依据的汗权体系和部落联盟制度。此制度重视军事民主和个人权威，和中原王朝文官集团为根基、以儒家伦理为纲常的郡县制官僚体系截然不同。历史传统仍然影响着现代政治话语、民众的政治心理。对涉及到历史的评论性新闻中出现的“大汗”、“札撒”、“忽里勒台”等历史政治术语的翻译，必须有扎实的历史知识背景，不能做简单的概念对等。

现代时期，中国实行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蒙古国实行的是多党制议会民主。两国政治体制、机构名称、法律用语大相径庭。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蒙古国的国家大呼拉尔，虽然都是国家的最高立法机关，但在产生方式、权力运行和社会功能上存在本质的区别。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领导人讲话等政务文件的翻译，对机构名称、法律概念的翻译要遵从“名从主人”和“功能对等”原则。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面依法治国”这类重要的政治术语，在进行翻译时不能仅仅是字面上的转换，必须要根据中国的官方定义来对它们进行解释和具体化的工作，使蒙古语的读者可以正确的理解出这些词语的政治意义与时代背景。法律体系的翻译也是如此，两国的法律渊源、司法程序、法律概念（法人、物权）的界定等都不相同，对译者具有很高的法律知识和严谨的态度要求。

（二）社会组织与家庭观念

在社会组织上蒙古族传统社会是以血缘、地缘为纽带形成的乌鲁斯（国家或部落）、鄂托克（部）、爱玛克（氏族）等层级的部落氏族组织。这种结构重视

集体利益以及成员之间的互助义务,对于个人行为有着比较强的约束力。尽管现代社会结构已经发生了巨变,但是传统社会的组织遗风仍然在社会关系和地方治理中有所体现。汉族在儒家宗法制度的影响下,形成的是以父权家长制为核心的家族本位社会。其重视“家国同构”,看重血缘亲情与长幼尊卑,进而衍生出繁杂的亲属称谓体系和以“孝”为核的家庭伦理。

由此也带来了家庭观念的不同。蒙古族家庭比较开放,以核心家庭为主,子女成年后独立性强,家庭成员之间关系比较平等。汉族传统家庭多为几代同堂的大家庭,重视代际传承和家庭凝聚力。翻译涉及社会保障、人口政策、家庭纠纷等新闻报道时,一定要考虑到这些文化背景。报道养老问题时,针对蒙古族读者的文本侧重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的建立,而针对汉族读者的文本则要兼顾家庭养老的传统价值。亲属称谓翻译也是一大难点,汉语里复杂的叔、伯、姑、舅、姨等称谓在蒙古语中常被简化为“abra”(叔伯舅)、эгч(姑姨姐)等几个词,翻译时要根据上下文仔细辨别具体关系,否则很容易造成信息丢失或混淆。

(三) 教育体系与节庆习俗

教育上,蒙古族传统教育重实践、口耳相传,内容主要是骑马、射箭、摔跤等“男儿三艺”,畜牧生产知识、民族历史、民间文学等,目的是培养勇敢强壮的草原儿女。教育的方式与草原生活紧密结合,实用性很强。汉族传统教育以儒家经典为主,以科举考试为向导,培养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文人士大夫。重视读书明理、修身养性。虽然现代教育制度越来越统一,但是传统教育观念仍然在人们的思想深处留下烙印。翻译有关教育改革、人才培养的政策文件时,把握住这些深层次的观念,可以更准确地理解文本的主要内容及意蕴。

节庆习俗是民族文化最集中的表现。蒙古族最重大的节日是查干萨日(白月,即春节)和那达慕大会。查干萨日的时候人们会祭火、祭祖、互赠哈达、吃奶食和手把肉,气氛非常浓厚的草原气息。那达慕是以体育竞技、文艺汇演、物资交流为主体的集会,是蒙古民族力量和热情的集中体现。汉族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是春节,习俗有贴春联、放鞭炮、吃年夜饭、拜年等,核心是家庭团圆、祈求丰年。清明、端午、中秋等节日所含的文化意义是不同的。在翻译节庆活动的新闻报道时,不能只译出名称和时间,更应该传达其文化氛围和精神内核。以那达慕译为“娱乐”或“游戏”是远远不能体现其作为蒙古民族精神象征的意义的。节日食品、仪式的翻译也考究译者文化修养,防止望文生义造成的文化误会。

三、精神文化差异

精神文化是文化体系的核心和灵魂，它包含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宗教信仰、审美情趣等内容，它深深地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并给物质文化、制度文化赋予了意义。蒙汉精神文化差异，在翻译过程中最深刻、最微妙、最关键的一个障碍。

（一）价值观念与思维方式

蒙古民族的价值观念受到了辽阔的自然环境和豪迈的游牧历史的熏陶，崇尚英雄主义，重视自由、勇敢、忠诚、直率和好客。在蒙古族的史诗和民间故事里，力大无穷、意志坚定、受到人们敬仰的英雄形象经常被提及。朋友和信义在人际交往当中占据着至高无上的地位。蒙古族的思维方式更加整体、直觉、形象，善于从宏观的角度去把握事物，语言表达直接有力，有感染力。这些价值观、思维方式体现在政务和新闻语言上就是对集体荣誉、民族精神的强调，语言风格的简明扼要。

汉族文化深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核心价值观为“仁、义、礼、智、信”，崇尚中庸、和谐、集体主义和自我完善，重视人伦关系，言行讲究含蓄、委婉。汉族人思维方式重辩证、线性、逻辑分析，喜欢把事情分成很多类然后进行推理。差异在翻译实践上就体现出来了。以翻译一篇歌颂英雄模范的蒙古语新闻稿为例，里面许多词句都是充满激情和赞美之辞，在将其转换成汉语文本的时候，就要按照汉语读者的习惯来，把语气调整得更为庄重、沉稳一些。反之，在翻译一份阐述政策逻辑的汉语文稿时，必须保证其严密的逻辑链条和层层递进的论证关系，在蒙古语译文中能够清楚地呈现出来，不能为了追求蒙古语的简洁而牺牲信息的完整性。

（二）宗教信仰与民族心理

宗教信仰是精神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它会深深地影响一个民族的心理结构以及世界观。蒙古族历史上信奉萨满教，后来主要信奉藏传佛教。萨满教的万物有灵思想使蒙古族对自然怀有深深的敬仰之情，敬畏长生天是蒙古族民族心理的底色。藏传佛教的传入把因果轮回、慈悲为怀的思想带入到蒙古族文化当中，对蒙古族的生死观、伦理观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由于宗教背景，自然地用宗教相关的意象和词组来表达便成了常态。

汉族宗教信仰具有多源融合的特点，主要是儒释道三教合一，加上广泛的民间信仰和祖先崇拜。儒家思想属于世俗伦理，形成了汉族积极入世，看重现实生

活的民族心理。佛教和道教给民众赋予了精神上的安慰以及超越性的哲学思虑。多元务实信仰格局使得汉语言文化处理宗教话题的时候更加包容理性。翻译涉及宗教政策、民族宗教事务的政务文本时,译者必须对双方的宗教背景及敏感点有清楚的认识,用词要慎重,以示尊重。碰到“活佛转世”这种敏感话题,就得按照官方说法来,用指定的词语,不能惹是生非。就文本中蕴含的宗教文化色彩而言,译者同样要正确判定其在译文里所起的功能,进而决定是保留、淡化还是解释。

(三) 文学艺术与审美情趣

文学艺术是民族精神风貌和审美趣味的镜子。蒙古族文学艺术产生于草原生活,作品充满动感、力量美。以《江格尔》口传英雄史诗为代表的叙事诗气势磅礴,想象力丰富。以长调民歌为代表的民族音乐,旋律悠扬辽阔,就像无垠的草原。马头琴音色的苍凉和安代舞步的欢快,一起形成了粗犷、自然、雄浑的审美风格。其艺术作品中的主要意象大多是骏马、雄鹰、草原等,追求的是气势和神韵。

汉族文学艺术在农耕文明的沃土中成长起来,它的审美情趣比较细腻、内敛、典雅。从《诗经》的质朴淳厚到唐诗宋词所表达出来的意境深远,再到明清小说对于人间情事人伦关系的细腻刻画,体现的是作者对人心情感人伦关系仔细观察的结果。水墨山水画重视留白、意境、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书法艺术用线条的枯润浓淡来表现抽象的韵律、人格。汉族艺术更多地喜欢梅、兰、竹、菊这些具有象征意义的静态意象,追求的是韵味和格律。跨越这道审美差异的鸿沟,翻译有关文化交流、艺术评论的新闻稿。译者不仅要领会艺术形式本身,更要领悟其里含蓄的审美理念。把赞美蒙古长调辽阔如草原的评论译成汉语,需要找到能引起汉语读者共鸣的意象;把描述中国古琴清微淡远意境的文字译成蒙古语,同样需要巧妙的转换,才能让目标读者真正体会到它的艺术魅力。

第二节 文化专有项翻译方法

从翻译学的角度对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进行考察,可以发现其中文化专有项的处理是复杂多样的。承载特定民族文化信息的词语,翻译好坏直接决定信息传递是否准确,文化交流是否深入。因此,系统研究音译、直译、意译等方法的应用策略,对提高翻译实践水平来说,既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音译法

音译法是处理文化专有名词,特别是没有对应词的名词时最直接的方法之一,目的是尽量保持原文读音的形式来传达异域文化的气息。音译在蒙汉翻译中既是语言接触的必然产物,又是文化引进和身份标识的方式,它的使用要遵循一定的规范和原则。

(一) 人名、地名的规范音译

政务、新闻文体对于人名、地名翻译的准确度有很高的要求,这关乎信息权威性、严肃性的体现。蒙汉人名、地名音译要严格按照国家发布的官方标准或约定俗成的原则进行,保证译名统一稳定。像蒙古国政治人物的姓名、蒙古的各个省市名称等,早就有了固定的汉语音译形式。经由这样的规范处理,能较好地防止由于译者个人差异所造成的“一名多译”情况,保证信息传递的一致性,维持跨语言交流的明晰性。

对于没有官方译名或者新出现的人名、地名,译者要按照蒙古语标准发音,考虑汉语的语音系统和用字习惯,慎重翻译。译者必须要有扎实的双语语音知识,并且还要考虑到汉字所引发的联想意义,尽可能选择发音相近、字义中性或正面的汉字组合。规范化的音译是进行跨文化交流精准对接的前提,也是政务、新闻翻译中必须遵循的一条原则,它创建起稳定的跨语言指称系统。

(二) 具有民族特色事物的音译

蒙古族历史悠久,草原文化独具特色,语言里有很多反映民族生活习惯、饮食文化、节庆风俗的专有事物词汇,比如那达慕、蒙古包、马头琴等。对于在汉文化中沒有直接对应的事物,音译法是直接有效的移植方式。于是这些词就进入了汉语读者的视野之中,成了文化交流的鲜活载体。既保持词语本来面目,又激发起读者探究蒙古族文化内涵的兴趣。

但是单纯的音译也会产生障碍。一个新出现的音译词第一次出现的时候,读者自然会感到困惑。像“阿尔希”(一种发酵乳饮品),“朝鲁”(一种吹奏乐器)这样的词,如果不用解释,汉族读者很难从字面上明白它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因此,在新闻报道或者政策文件中使用此类音译词汇的时候,必须考虑到目标读者的背景知识水平。

在政务文本翻译中,对于表现某种特定文化观念的词语采取音译的方式,有

时候也会包含对文化主体性予以尊重的政治考虑。它体现出了这个文化现象的特别之处以及无可取代之处,是文化多样性的一种直接呈现。翻译者在使用音译法时,实际上是做着一种文化构建的工作,把源语文化里的独特概念引入到目标语的知识体系当中,从而使得目标语表达能力和文化视野得以丰富。

(三) 音译加注的补充说明

为解决纯音译带来的理解隔阂,“音译加注”的方法被提出来,成为一种很实用的、普遍的补偿手段。该方法在保留音译形式的同时又对内容进行解释说明,既保持原文语音形式和文化特点,又通过简要的说明消除目标读者理解上的障碍,从而达成形式与内容、异化与归化的平衡。

注释可以采用括号内加注、脚注或尾注等形。新闻文本中由于其直接方便,括号内加注的形式最为常用。翻译蒙古国“国家大呼拉尔”时,可以在其后面加上括号,标注为(议会),使读者立刻明白它的机构性质。提到“苏木”这个行政单位的时候,可以加上注释“(相当于乡)”,这样读者就能建立起来认知参照。即时性解释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阅读中断,保证信息交流的顺畅。篇幅许可或者有必要深入论述时,脚注给交代来历去处、解释文化背景留下的空间较大,符合深度阅读的需求。

二、直译法

直译法是在语言结构、文化内涵允许的范围之内,按照原文的字面意思和结构直接进行翻译的方法。它要在一个目标语里复制源语的表达手段和比喻形象,成为把原文意思传达出去并推动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蒙汉翻译中,直译有天然的优势,也有固有的局限。

(一) 文化形象相似的专有项

当源语和目标语在某个文化专有项上有着相同或者相通的文化意象时,直译法的优势就会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此时直译不仅可以准确传达出词语的字面意思,还可以在目标读者心中引起类似的文化联想,达到深层次的情感共鸣。

1. 狮子在不同的文化里都被当作力量和权威的象征。因此,当用狮子来比喻某位领导人的威严或者某项政策的强力时,直接翻译成“狮子”,汉语读者可以不费力气地领会其比喻义。

2. 同样,“太阳”在蒙汉文化中也都与光明、希望、最高权力等积极的意义

联系在一起。所以与“太阳”有关的正面比喻和象征，在直译时可以实现意义和情感色彩的对等。

源于人类共同体验以及文化交流所产生的相似意象，为直译法成功运用的基础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在政务、新闻翻译过程中善于发现并使用这些共同的文化意象，可以使译文忠于原文的同时更加生动自然地被读者所接受。

（二）保留原文文化色彩的尝试

直译不单单是翻译技术，更是文化态度的一种表现。即使目标语言中没有完全对应的表达方式，有意识地使用直译，也是保留和体现原文独特文化色彩的一种积极尝试。虽然这样处理会使得译文带有一点点的“翻译腔”，不够地道，但是它能更直接地让读者感受到源语的思维方式和语言习惯，给读者带来一种新奇的阅读体验。蒙语里一些带有草原生活气息的谚语或者习惯用语，如果套用汉语的现成说法去翻译，其特有的文化意象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像“像没有主人的野马一样”直接翻译出来，虽然比“脱缰之马”等汉语成语要长一些，但是它所描述的那种自由奔放、略带散漫的画面感，是任何现有的成语都无法完全取代的。陌生化的效果可以引导读者放慢阅读速度，慢慢品味文字间所包含的文化差异。在新闻特稿或文化报道里适度使用保留异域色彩的直译，有利于形成跨文化对话的语境。

此时译者便成了文化使者，既要使信息被理解，又要使文化被看见。但这样的尝试一定要把握好分寸，不能因为过分直译而造成文句晦涩难懂、影响基本信息的传递。如何使忠实与通顺达到最佳的平衡，就是译者的艺术所在。

（三）直译的局限性与读者接受度

虽然直译在传递文化信息方面有优势，但是它的局限性同样明显。当两种文化在某一个专有项上存在巨大的差异甚至冲突时，生硬的直译就会导致误解或者信息传递的失败。如在蒙古文化里带有褒义的某种动物，在汉文化中可能并无特殊意义，甚至带有贬义。这时如果不加处理直接翻译就会产生严重的文化折扣，甚至引起反感。

归根结底，读者的接受程度才是判定直译成功与否的标准。政务与新闻文本受众面广，文化背景、知识水平差异大。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阅读的首要目的就是快速、准确地获取信息。如果因为过分追求异国情调的直译而造成阅读障碍，那么就违背了应用型文本翻译的目的。因此译者在决定是否采用直译时必须慎重

考虑, 权衡文化传递和信息有效接收二者的关系。

三、意译法与释义法

当音译、直译均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文化专有项的深层含义时, 意译法、释义法就成为不可缺少的翻译方法。这两种方法不再受原文表层结构的束缚, 而是进入到文化的内涵中去, 挖掘语言文字的语言功能和语用价值, 然后再以最容易让读者明白, 最能引起读者共鸣的方式呈现出来。

(一) 解释文化内涵的意译

意译的精髓是“得其意而忘其形”, 也就是放弃原文的语言形式, 抓住原文的精神实质。对于那些在汉语中没有对应的物事、文化内涵又十分丰富的蒙古族文化专有项, 解释性意译是十分重要的。这就如同在翻译的时候, 做了一次微型“文化百科”解读。以蒙古族的“敖包”为例, 如果只是音译, 读者就无法知道它的作用; 如果将其意译并解释为“在草原上用石头、土块等堆成的, 供祭祀天地神明和祖先的石堆”, 那么它的宗教与民俗意义就一目了然。

对于政务文件中出现的一些特殊制度或者概念, 解释性意译就显得格外重要。一个在蒙古国政治体系里人人皆知的概念,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或许是首次接触。这时译者就变成了讲解员, 用清楚明白的语言把这个概念的定义、作用以及它在某种情况下所表示的意义全部表达出来。这样做虽然会使得句式变复杂、篇幅变长, 但可以保证信息的完整和准确, 有效的避免了由于文化缺省导致的沟通中断, 是实现深度跨文化理解的保障。

(二) 替代性翻译(归化)

替代性翻译又叫归化翻译, 是比意译更彻底的一种翻译方式。主张用目标语文化里功能相似、读者熟悉的形象或说法来代替源语文化里的专有名词。其目的在于最大程度上减小读者的文化差异, 使译文读起来就如同本民族创作的自然流畅。归化策略在新闻翻译中运用较多, 在时效性较强的大众媒体的报道中更是如此。以蒙语里源于搭建蒙古包过程、与团结有关的比喻为例, 为了让汉语读者迅速把握其精神实质, 译者也许会用汉语里人人皆知的“众人拾柴火焰高”“团结就是力量”之类的表达来代替。

好处不言而喻, 译文的可读性大大提高, 信息传播效率也随之提高。对不把了解蒙古文化作为主要目的普通读者来说, 归化的译文是友好且高效的。但是,

它的缺点同样明显，以源语文化特色为代价，抹杀了文化差异性。过度归化会引发文化信息的流失，译文就变成了源语文化的一个“删减版”。所以，在使用替代性翻译的时候，译者要依照文本的类型和翻译的目的来作出聪明的选择。在严肃的政务文件或者介绍文化的文本中，应当慎重使用归化，以免曲解或者削弱原文所体现的文化身份和价值。

（三）综合运用多种方法的案例

单一的翻译方法一般不能解决所有的翻译难题。好的译者犹如技艺高超的工匠，会依照材料的不同，灵活运用音译、直译、意译、注解等各种工具，力求达到最好的效果。综合使用的方法，很好地体现出翻译的艺术性以及译者的创造性。

查干萨日节日翻译属于一个综合运用的典型。关于综合处理这一文化专属项的几种主要策略及效果如下表所示。

“查干萨日”综合翻译策略表

翻译方法	译文示例	效果分析
音译 + 加注	查干萨日（白月节）	保留民族称谓的语音形式，通过注释点明其字面含义，兼顾了异化与信息补充。
意译 / 释义	蒙古族的传统新年	直接阐明其节日属性，类比汉族春节，便于读者快速建立认知。
综合运用	首次出现时用“查干萨日（白月节）”，后续阐释为“蒙古族新年”。	动态结合多种方法，既展示了文化独特性，又确保了信息传递的清晰与流畅，是较为理想的处理方式。

从上表可知，第一是可以使用“音译 + 加注”的译法，译为“查干萨日（白月节）”。这样既保留了节日的民族称谓，又在括号内给出它字面的意思“白色的月亮”，寓意纯洁、吉祥。行文中结合意译、释义的方式解释为蒙古族的传统新年，直接点出其节日性质并与汉族春节类比。

用音译、加注、释义三者结合的方式，关于“查干萨日”的信息被立体、全方位地传递给了目标读者。它有文化形式的展示，有文化内涵的解读，更有功能上的类比，效果远非单一的方法所能比拟。多管齐下的翻译之道，就是处理蒙汉政务新闻文本中复杂的文化专有项的理想范式。

第三节 意识形态与翻译选择

意识形态是指在一定的社会群体中被共同持有的信仰、价值观、世界观等的总和，它左右着社会生活的一草一木，翻译活动亦不例外。它像一只“无形的手”，在幕后操控着译本的生产、流通和接受。在政治色彩比较浓重的政务和新闻类文本翻译中，此种力量表现得尤为突出。本节要深入分析意识形态对蒙汉翻译的隐性控制，分析政务新闻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博弈，阐述译者应该具备的意识形态素养。

一、意识形态对翻译的隐性操控

自文化转向以后，意识形态对翻译过程的干预成了学界重视的方面。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而是带有权力和价值争夺的社会文化活动。意识形态从文本选择到词语使用等各方面对翻译主体加以影响，从而进行间接、深刻地操控。

（一）文本选择中的意识形态倾向

翻译什么，不翻译什么，这本身就是一种非常有力的意识形态表态。在蒙汉翻译中，选择文本是受主流意识形态的引导和规范的。一般而言，那些与国家发展战略同频共振、有利于民族团结、能积极塑造地区形象的文本会得到优先翻译出版的机会。以对国家政策的解读、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的宣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论述等为代表的汉文政务新闻内容，被大量翻译成蒙古文，目的在于在蒙古族群体中建立政策认同，凝聚发展共识。

相反地，被认为会激化社会矛盾、触及敏感历史或者和主流价值观相悖的文本，在翻译源头上就被“过滤”掉了。选择性翻译并不是偶然的，它是由于译者赞助人（政府机构、出版部门等）的意识形态立场而决定的。这样倾向使翻译活动为一定的政治议程服务，利用议程设置功能，巧妙地控制蒙古语受众所获取的信息范围和认知框架，最终达到意识形态引导与传播的目的。无声地做出选择实际上就建立起跨文化传播的第一道意识形态防线，其影响广泛而且隐秘。

（二）翻译策略中的价值判断

翻译者在翻译的时候选择的是归化还是异化的策略，里面也隐含着价值观的评判。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归化策略的使用非常多。为了保证译文通顺易懂、能够被迅速接受，译者会自觉地把源语文本中的文化意象、政治术语替换为目标

语读者所熟悉并认同的表达。这样做虽降低阅读门槛加快了信息传递速度，但却在不经意间消解了源语文化的特点，让译文更深入地嵌入到目标语的意识形态体系当中。把含有复杂文化隐喻的汉语政治口号翻译成蒙古语时，如果过度归化，就会使它失去深层文化内涵，变成简单的政治指令。

相比之下，异化策略的使用更加慎重，一般只在突出文化差异、传递异域风情的时候使用。在某些文化交流为主旨的文本翻译中，保留源语的表达方式可以更好的让蒙古语读者领会汉文化的独特韵味。但是处理带有明显意识形态色彩的政务新闻文本时，过度异化容易造成目标读者的困惑、误读甚至抵触，与翻译的初衷相反。因此翻译策略的选择不是简单的问题，而是在文本功能、读者接受程度、背后意识形态力量对比等各个因素的基础上，做出的一种复杂的、体现译者自身立场和价值取向的选择。

（三）词语选择中的褒贬色彩

词语是承载意识形态的基本单位，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怎样遣词造句就体现了译者的褒贬态度和价值取向。蒙汉两种语言由于历史发展和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在表面上对等的词汇，其情感色彩和引申含义上就会有较大的差别。政务新闻翻译时对于词语的筛选就显得格外关键、慎重。面对同样的社会事件，源语新闻使用中性词汇进行描述，在翻译的时候，译者会根据事先设定的传播目标，精心选择带有褒义或者贬义色彩的蒙古语词汇，从而引起读者情感上的共鸣以及对事件作出一定的判断。

词语层面的操控在涉及到国家形象、民族关系、对外政策等重大问题的时候表现得更为充分。最典型的就是对于“发展”、“合作”这样的词的翻译。汉语中带有积极、光明寓意的词译成蒙古语时，译者会选用带有团结、进步意义的词来加强正面叙事。相反，对于带有一定的社会批判性的内容，译者可能会用词语转换来减弱原文尖锐的锋芒，或者采用相对模糊、中性的表达方式来达到维护稳定、正面宣传的目的。微观的词语选择如同给译文注入了某种意识形态的成分，悄悄地左右着读者的认知和感情，它的作用有时候比宏观策略的改变更加直接、有力。

二、政务新闻翻译中的意识形态博弈

政务和新闻文本是意识形态最集中的体现，翻译过程自然就成了各种意识形态力量交锋的场所。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不单是信息的传递，还是塑造国家形

象、传播主流价值观和谨慎处理敏感话题的过程，在其中存在多层次意识形态的交锋。

（一）国家形象建构与翻译

在全球化的时代，国家形象已经成为一种极其重要的软实力，而翻译就是建构和传播国家形象的重要途径。政务和新闻类翻译属于面向蒙古语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渠道之一。这就决定了翻译活动要服务于塑造团结稳定、繁荣发展、开放自信的中国形象以及和谐共处的民族关系。在此时译者有意识地选择并突出能体现国家善意、展示发展成就、增进文化认同的内容。

主要表现为对正面信息强化、放大，对负面信息进行淡化、规避。翻译有关经济合作、文化交流、民生改善的新闻时，译者会使用生动积极的语体，力求在蒙古语读者心中塑造出一个可亲可敬的友好形象。对可能产生误解、被有心之人曲解的社会事件，在翻译时会选择更为谨慎的表达方式，并主动给读者提供一个官方或者权威的解读框架来控制议程，防止产生不好的联想。翻译实践早已不是只追求忠实的层面，而是发展成一种有明确目的性的跨文化形象塑造工程。译者此时就成为一个国家整体传播战略的“形象大使”，译者的翻译选择直接为国家的传播战略服务，是意识形态斗争最直接的体现。

（二）主流价值观的传播与翻译

主流价值观是国家或者社会精神内核，它的传播和巩固需要依靠翻译的帮助。把汉语文本中所承载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大理念，准确、有效地传达给蒙古语受众，是蒙汉政务翻译的主要任务之一。由于这些理念诞生于中国特有的历史文化土壤和政治话语体系之中，在蒙古语里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

这就需要译者做概念上的再创造。这并不是随便找一个发音相似或者字面意思相近的词，而是要译者真正理解这些价值观的内涵和外延，再结合蒙古族的历史文化和思维习惯，选择出既能表达其精神实质，又便于当地人民理解和接受的蒙古语来表达。如对“小康社会”的翻译，不能只是简单地译为“温饱”，而要体现全面发展、生活富裕、社会和谐的深意。这本身就是一个意识形态协商与再编码的过程，把源语文化中的关键政治观念，转化成目标语文化群体可以领悟并产生共鸣的价值共识。成功的翻译可以做到价值观的“精准滴灌”，在润物无声中提升蒙古族群众对国家主流意识形态文化认同、政治向心力。

（三）敏感议题的审慎处理

任何跨文化传播都不能避免敏感的话题，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更是如此。这些议题一般会涉及到历史评价、民族政策、边境问题、宗教事务等，处理不当就会引起误解、争议甚至冲突。因此对于这样的内容的翻译是意识形态斗争最激烈、最复杂的领域，对译者的政治智慧和语言技巧要求很高。译者对待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大致有如下几种，见下表。

敏感议题翻译处理策略表

策略类型	具体操作	目的与效果
模糊化处理	采用笼统、中性或概括性强的词语，避免使用可能刺激读者情绪的尖锐表述。	为不同解读留出空间，降低文本的对抗性，避免激化矛盾。
解释性翻译	在翻译敏感词汇或概念时，附上必要的背景解释、注释或限定性语句。	主动引导读者的理解方向，填补因文化差异造成的信息鸿沟，防止误读。
选择性删减	在不影响文本核心主旨的前提下，对部分极度敏感、易引歧义的句子或段落进行删节。	直接规避潜在的传播风险，确保信息传递符合整体宣传口径。

上表所列的策略，全都表现出了把保住国家政治安定、民族团结大局当作根本宗旨的准则。此时的译者就像走在意识形态的雷区里，必须小心翼翼，每一个决定都会影响到传播的效果、信息的接受程度以及社会的反应。

三、译者的意识形态素养

由于意识形态对翻译活动的深刻影响，作为实践主体的译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素养就显得非常重要。译者并不是消极被动的信息传声筒，而是一个积极有为的文化中介。提高意识形态素养可以给译者提供在复杂的语境中作出专业、理性以及负责任的翻译决策的支撑。

（一）保持客观中立的职业操守

虽然绝对的客观中立是一种近乎理想化的状态，但将其视为翻译工作的职业操守与不懈追求，恰恰体现了一名译者最为核心的专业素养。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这一特殊领域中，译者的首要职责在于忠实传递原文所承载的核心信息与意图，不能因个人偏好、情绪或立场而对原文内容进行任意的删减、增添或曲解。这就要求译者具备高度的自我审视与警觉意识，不断反思自身是否因知识背景、文化立场或价值判断的局限而导致信息传递的偏差或失真。

与此同时,坚守职业操守还需要译者对翻译活动的目的与语境有清醒的把握。尤其在涉及政治宣传类文本的翻译任务中,译者一方面需要响应赞助方的要求,服务于宣传目标;另一方面,也应尽可能守住信息真实性的底线,避免对事实进行过度渲染、夸大甚至扭曲。这意味着译者必须在“忠于原文”与“服从宣传目的”之间做出审慎的权衡,通过灵活调整词语的选用、句式的组织、语气的强弱等方式,在允许的范围内控制文本的倾向与重点,但绝不制造或篡改事实。这种在既定框架内最大限度保持客观的努力,既是译者在意识形态约束下恪守专业伦理的体现,也是其赢得读者信赖、建立职业权威的根本保障。

(二) 增强对不同意识形态的辨识力

一个成熟的翻译家必须具备敏锐而深刻的意识形态辨识能力,这种能力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要能够深入理解和把握源语言文本中所蕴含的意识形态倾向,包括其政治立场、价值取向和文化背景;其次,必须对目标语文化环境中的主流意识形态及其受众的接受心理与习惯有全面而准确的把握。对于从事蒙汉翻译的工作者来说,仅仅理解汉语文本的字面意思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深入挖掘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政治态度、话语策略以及作者预设的读者群体,并作出细致的分析和判断。

与此同时,译者还需持续关注并了解蒙古族社会当前的思想动态、文化心理和阅读偏好。只有既深刻认知自身文化,又充分理解对象文化,才能在翻译转换过程中灵活应变、游刃有余。例如,一些在内地读者看来司空见惯的政治表述,有经验的译者能够预见到其在蒙古语文化语境中可能引起的不同反应,从而在翻译时提前作出调整,例如通过补充背景说明、转换表达方式,或寻找文化功能对等的替代元素等手段,以保障信息传递的有效性和接受度。

这种意识形态的敏感度和跨文化转换能力,并非与生俱来,而是译者通过长期大量的阅读、系统学习以及丰富的跨文化交流实践逐渐积累和形成的。正是这样的锤炼,使译者从单纯的语言转换者,成长为能够在不同文化间自如沟通、具有文化自觉与反思能力的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交流专家。

(三) 在翻译中寻求文化对话的可能

翻译的最高境界不应该只是单向的意识形态灌输或者被动的文化防御,而应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平等的对话和相互的理解。有高度意识形态素养的译者在完成信息传递的基本任务之后,会给译文赋予推动文化对话的潜能。这就意味着在

处理意识形态差异的时候，译者不应该采取简单粗暴的覆盖或者消除手段，而应该努力以一种更加包容的方式去呈现。

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实践当中就体现出来，一方面在传递国家政策、主流声音的时候，也要尊重蒙古族文化的特殊之处。在翻译带有地方文化、民俗风情的内容时，可以适当使用带有蒙古语文化印记的词汇或者表达方式，使译文在保证信息准确无误的前提下，带有浓厚的本土文化气息。不但不会削弱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效果，反而会因为对地方文化的尊重而使译文更有亲和力、说服力。利用这样一种充满智慧的翻译技巧，把翻译现场变成一个交流融合的文化平台，将本来容易引起冲突的意识形态差别变为互相理解并达到认同的机会。这就是运用翻译学视角的译者主体性以及社会责任感最充分的表现。

第四节 案例分析与对策

本节通过具体案例来阐述政务和新闻文本的蒙汉翻译，分析其中的文化难点处理方式并提出系统对策，希望可以提高蒙汉翻译在文化传意方面的准确性、得体性。政务文本的严谨性与新闻文本的时效性，给文化因素的转译提出了不同的要求，而这正是应用翻译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剖析有关案例有利于形成更加科学合理的蒙汉翻译方法论。

一、政务文本中文化负载词翻译案例

政务文本以严谨、权威著称，其中的文化负载词是翻译工作的重中之重。这些词汇带有特定的政治和社会文化含义，翻译的好坏直接影响政策意图的表达。处理不好就会产生歧义，严重的时候还会影响政策的严肃性、权威性，所以译者要高度重视。

（一）“民族区域自治”等概念的翻译

民族区域自治作为中国的一项根本政治制度，有很深刻的法律内涵和政治意义。在蒙汉互译时，此类核心政治概念的翻译一定要遵照“名从主人”和“官方标准化”这两大准则。其蒙古文译法由国家权威机构审定后推行使用，具有唯一性、强制性，任何个人译者不得随意改动或者另创新译。按照这个词的固定译法，不但可以尊重源语的政治内涵，也是维护国家法律和政策统一性的一项基本要求。

若翻译实践脱离官方公布的标准译法,单凭看似对等的词汇来组合,就很容易造成严重的语义偏差。如果把民族区域自治按字面意思拆解,就容易使它失去作为一个特定制度的整体性和专属性,降低它的法律地位和政治严肃性。所以面对政务文本中核心概念,译者的首要任务是查阅并采用官方标准译文,不能个人再创造。很好地体现了政务翻译工作者有高度的责任感、严明的纪律性。

例如,在涉及“民族区域自治”的政务文本翻译中,译者必须严格遵循国家规定的蒙古文译法,不能擅自使用其他非标准译法。这种译法不仅在法律上具有约束力,而且在政治上也体现了国家对该制度的重视和认可。译者只有准确无误地传达这一概念,才能确保译文在目标语语境中保持原有的政治和法律效力。同时,这也要求译者在平时的工作中不断积累和学习官方标准译法,提高自身的专业素养和翻译水平,以更好地服务于政务文本的翻译工作。

(二) 蒙古族传统官职的翻译

蒙古族历史上拥有一个独有的社会组织和官职系统,即诺颜、台吉、济农等。这些都是自己所处的地位,同时也是蕴含着丰富历史文化信息的符号,与某个时期的历史背景、部落构造以及社会等第紧密相关。在现代政务文本中,在涉及历史记载或者文化表彰的地方,怎样准确地把这些传统的官职翻译出来就成了一个难题。由于汉文化中没有完全对应的官职概念,如果采取简单的比附式翻译,即把其等同于“王爷”或者“将军”,就会造成历史信息的失真和文化内涵的流失。

比较普遍、稳妥的方法就是音译加注。直接音译可以最大程度地保持词汇的民族特点和历史原貌,防止因为强行对等而造成的信息损失。然后利用括号或者脚注的形式简短介绍下该官职的历史背景、主要负责什么工作,大概是个什么等级,便于汉语读者理解。翻译“台吉”时,可以先音译再注解它是蒙古黄金家族的贵族称号。这种为了保证文化信息能够被准确地传达,而不得不牺牲一些阅读流畅性的做法,在严谨的翻译中是必要的、可以接受的。

在非核心、重复出现的语境中,为了行文简洁,可在第一次加注说明之后,直接使用音译词。另一种方法就是功能对等翻译,也就是找到汉语中功能或等级相近的词进行替换。但是此法要求译者具备很高的历史素养和准确的判断力,一般只适用于非正式或者文学性比较强的文本。对于严谨的政务文本来说,“音译加注”仍然是更加可靠的一种方式,它也体现了对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的一种尊重与保护。

（三）处理策略总结

翻译政务文本里的文化负载词，一定要采用一套系统而谨慎的办法。这些方法共有的目标，是在保证政治严肃性、信息准确性的基础上，获得最好的文化传播效果。从总体上讲，主要策略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点：

1. 遵循官方定译，对国家制度、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政治核心术语，必须采用国家权威部门审定公布的标准译文。这是政务翻译的铁律，直接关系到政策的统一性、权威性。译者应主动去查询并积累这样的标准术语库。

2. 音译加解释：当源语中存在目标语找不到对应词的文化概念时，尤其是历史称谓、传统习俗等，应该首先用音译保留其文化独特性。同时还要用注释或者说明等形式对该词文化背景、准确含义进行补充，才能实现信息的完整传递。

3. 功能对等变通对于不是文本重点、但具有很强功能意义的文化负载词，为了使译文通顺，可以适当采用功能对等变通。但是使用时一定要小心，以免造成核心信息的误解。

二、新闻报道中文化意象翻译案例

新闻报道要兼顾时效性和传播范围，其翻译工作就得合理对待藏身于语言里的文化意象和典故。不仅是从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在跨文化语境里，对意义进行重新构建，对于译者的应变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文化意象的转译成功，新闻内容便能够在目标文化中引起共鸣；反之，就会造成隔阂甚至误解。

（一）“龙”与“狮”等文化意象的翻译

在蒙汉新闻翻译里，“龙”和“狮”这两大文化意象的翻译就有着非常高的代表性。在中国文化中，“龙”是神圣的、吉祥的、有权威的、有力量的象征，常和“龙的传人”、“龙马精神”等积极的语境联系在一起。在受西方文化影响的环境里，龙常常被刻画成喷火的恶龙。蒙古文化虽有自身的传承，但是在现代语境下也难逃二元对立观念的影响。因此，带有“龙”的意象的汉语新闻翻译成蒙古语的时候，译者就处于难堪的境地。直接翻译不能体现原文的正面意义，甚至会引发出负面联想。

此时译者就要根据新闻具体的语境、文体来作选择。在报道经济腾飞、民族精神等宏大叙事的时候，为了避免产生歧义，可以采取意译或者替换的方式，用蒙古文化中同样象征强大和祥瑞的神兽，例如“迦楼罗”等，来代替“龙”，以

达到情感色彩和文化功能上的对等。相反,如果新闻要介绍中国的传统文化,则应该采用直译加注的方式,保留龙的原有形象,向蒙古语读者解释龙在中国文化中的独特地位,从而达到文化传播的目的。

相比而言,“狮”的形象在不同的文化中虽有差别,但是共性更多,普遍与力量、勇气、王者风范相关联。所以,在蒙汉新闻翻译中,“狮”的意象转译障碍小,多数情况下可以直接对译。把雄狮翻译成蒙古语中相应的词之后,它所传递的威猛、觉醒的意象便会被目标读者所理解并接受。但是译者还要注意细微的文化差异,使所选词汇在蒙古语新闻语体中感情色彩与原文一致。

(二) 成语典故的翻译

成语典故属于语言的活化石,里面包含诸多的历史故事,价值观念以及民族智慧,在蒙汉新闻翻译时被视为公认的难题。结构精炼,意味深长,常常意在言外。如果用字面意思直译,绝大多数情况下会使得目标语言读者不知所云。以新闻标题为例,“画龙点睛”如果逐字翻译成蒙古语,就会变成没有逻辑的动作描述,其“在关键处点睛之笔使整体升华”的比喻意义就会消失。

对于这样的情况,译者可以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最理想的方法是寻找蒙古语中意义和功能相同的谚语或习语来替换,这样才能取得最好的文化对等效果,使译文读起来地道自然。这就要求译者要有很高的双语能力以及文化素养,并不是所有的汉语成语在蒙古语中都有对应的表达。更普遍、更实用的是意译法,即不拘泥于原文的四字格形式、不拘泥于比喻形象,直接用通顺的蒙古语把主要意思表达出来。“画龙点睛”可以意译为(他的补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此法牺牲了原文的文采、形式美,但是保证了新闻信息的核心——事实和意义——的准确传递,完全符合新闻翻译的“信息优先”原则。另外,有些成语典故只是修辞点缀,并不影响信息的传达,翻译起来难度大时,译者也可以考虑不译,使新闻简洁明了。

(三) 处理策略总结

在新闻文本的翻译过程中,文化意象的处理始终是译者的核心任务之一,关键在于如何精准把握信息准确性、传播效率与文化适应性之间的动态平衡。译者需依据新闻的具体类型、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以及原文中文化意象所承载的重要程度,综合选择最恰当的翻译策略。对于那些包含关键信息且文化差异较大的意象,译者应优先考虑采用释义法或功能对等替换的方式,以确保新闻的核心内容

不被误解或扭曲，从而维护信息的真实性和传播效力。

如果某一文化意象本身即是新闻报道的焦点（例如在文化类专题报道中），则宜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既保留原文的语言特色，又通过补充说明帮助读者理解其文化内涵，积极履行跨文化沟通与解释的职责。而对于成语、典故等高度凝练、富含文化底蕴的语言形式，意译往往是实现信息有效传递的最佳途径，能够避免因直译导致的晦涩或歧义，更符合新闻传播的通俗性和接受度要求。

新闻作为一种注重时效性与可理解性的文体，其翻译更应强调意义的准确传达而非形式的机械对应。译者必须克服对源语文本结构的过度依赖，致力于在译入语中实现意义上的清晰与功能上的等值。始终以读者为中心、以传播效果为导向的翻译理念，是处理新闻文化因素的根本原则，也是实现有效跨文化新闻传播的关键所在。

三、综合性文化因素处理对策

从上述的案例分析中可以看出文化因素处理的复杂性。为了系统地整合翻译策略，提高译者的整体水平，从宏观上构建一套综合性应对方案，推动蒙汉翻译事业的健康发展是必要的。这已经不是翻译技术上能够解决的问题了，而是要从人才培养与工作机制方面来解决的工程性问题。

（一）建立文化因素分类处理模型

要将蒙汉翻译中处理文化因素的零散经验升华为系统理论，关键就在于创建一个科学分类处理模型。可以参考尤金·奈达的文化分类，把在蒙汉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大量文化负载词、文化现象按其所属的生态文化（地理环境、特有的动植物）、物质文化（服饰、饮食、建筑、器物）、社会文化（制度、习俗、亲属称谓、历史事件）和语言文化（成语典故、谚语、隐喻）等几类进行划分。

蒙汉翻译文化因素分类处理模型简表

文化类别	具体示例	推荐翻译策略
生态文化	特有动植物、地理风貌	直译 + 属名；描述性翻译
物质文化	传统服饰、特色饮食、特有器物	音译 + 功能说明；释义
社会文化	政治制度、社会习俗、历史官职	遵从官方定译；音译 + 注释；描述性翻译
语言文化	成语典故、谚语、特色隐喻	意译；寻找对应习语替换；直译 + 注释

对于每类问题模型已经事先设置好一个合法的推荐翻译策略。上表系统地归

纳出各种文化因素的建议处理方式。例如处理生态文化词汇时,可以先考虑直译加上属名;面对物质文化中的特有器物,可以尝试音译加上功能说明;社会文化中的习俗,更适合用释义或描述性翻译。该模型并不是死板的规定,而是一个辅助决策的工具,在遇到复杂文化现象的时候,可以迅速地定位问题的类型,从备选策略中选择最优的使用,从而提高翻译的效率和规范性,减少由于个人随意性造成的翻译质量的波动。

(二) 加强译者的跨文化培训

蒙汉翻译质量瓶颈,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因为语言技能的不足所造成的,而是因为译者的跨文化理解能力不足所造成的。一位优秀的翻译家必须是双文化专家。因此,必须对蒙汉译者进行系统的跨文化培训。这样的培训不应只限于语言技能的练习,应该包含历史、哲学、宗教、社会结构、民俗风情、价值观念乃至当代社会发展对比研究等各个学科的知识赋能。

培训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译者的文化同理心和很高的文化敏感度。译者经由沉浸式学习、实践之后,既可体会得两种文化表层的差别,又可领悟到藏于其后的深层思维模式。这样译者在翻译时就可以预知一个表达在目标文化中会产生的效果,从而主动避免文化冲突和误读。最终译员就由被动的语言转化者变成主动、自信的文化协调人以及交流者。

(三) 鼓励译者与文化专家的合作

翻译工作,特别是高精尖领域或者深层文化内容的翻译工作,不能是译者闭门造车的行为。创建译者同有关领域文化专家的常态联系机制,这是冲破个人知识范畴限制,保障译文权威且精确的一种办法。这招的关键就是承认专业分工,优势互补。

1. 分工明确,各尽所能,译者主要做语言准确转换、文体把握、行文润色,发挥语言专长。文化专家如历史学者、民俗学者、法律专家等对原文中涉及的专业知识及文化内涵进行校订,并给出背景说明,评判、修改译者提出的译法方案。

2. 搭建平台,促进协作,可以采取建立专家顾问库、定期召开专题研讨会、对重大翻译项目设立联合工作小组等方式,使合作落到实处。翻译重要历史文献或者法律文件的时候,邀请历史、法律方面的专家来参与审校,可以有效地防止由于译者个人知识的局限所造成的严重错误。这种合作模式把翻译过程由一个人的劳动变成了大家集思广益、考证严谨的学术活动,从而极大提高了最后译本的质量和信誉。

第七章 翻译质量评估体系构建

翻译质量评价属于应用翻译学的研究范畴，也是评判翻译成果好坏的标准，同时也是改进翻译教学、加强翻译人才培养、整顿翻译市场的关键手段。本章主要分析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的独有特点，提出一个比传统的“信达雅”笼统框架更科学、系统的翻译质量评价体系，给相关实践提供理论指导和应用价值。

第一节 评估标准与指标

创建一套科学、合理、完善的评价标准和指标体系，是翻译质量评定工作之本。就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的特殊性而言，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标准必须遵循一定的原则，在此基础上确定具体的评价维度和指标，为之后的评价工作提供明确可行的参考。

一、评估原则

评价原则是指导评价体系建立和执行的宏观准则，它保证整个评价活动有正确的价值取向和科学基础。对于具有很强的专业性、社会性的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来说，评价标准要体现客观公正、系统可行、动态发展三者统一。

（一）客观性与科学性原则

客观性、科学性是翻译质量评判的生命线。要求评价过程最大程度地消除评价者的主观偏好，根据明确、具体、可度量的标准来进行评判。在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的评价中，这就意味着评价活动不能满足于“感觉通顺”、“似乎准确”这样的印象式判断，而应该建立在对语言转换规律、文本功能要求、跨文化传播效果的科学分析之上。政务文本的严谨性和新闻文本的真实性，都要求评估者必须以事实为依据，对译文中出现的任何信息偏差、术语误用、逻辑断裂进行精确定位、定性。

按照此原则建立相应的语料库、案例库是非常重要的。政务文本中出现的固定搭配和政治术语，要以官方发布的标准译法为第一判断标准。对于新闻报道中

的人名、地名、机构名等专有名词，要核对权威信息源，保证准确无误。评价标准的确定需要有深厚理论支撑，要结合语言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方面的知识，才能使评价结果有说服力、有公信力。唯有这样，评价结果才能反映译本的实际质量，给予译者有益的反馈而不是模糊的个人意见。

（二）系统性与可操作性原则

系统性原则即翻译质量评价体系必须是结构完整、层次清楚、逻辑自洽的有机整体，不能是孤立指标的简单叠加。体系应该包含影响翻译质量的所有因素，从宏观的文本功能实现到微观的句子处理都需要有对应的判断模块。各个评估维度与指标之间应该相互联系、互相补充，形成一个多维立体的评估网络。这对评价复杂的政务、新闻文本来说尤为重要，因为文本质量是由语言、内容、功能等多种因素共同决定的。

同时可操作性原则就是要求评价体系在实施时要简便高效。理论上再完善的评价标准体系，操作程序复杂、评价标准不明确，就很难在实际翻译教学活动中被推广开来。所以评价指标的表述要清晰、简洁，不能用含糊不清的术语。评价方法要易于学会，老审校人员和初学翻译者都能快速学会。配套设计评估表格、打分细则、典型错误案例分析，把抽象的评估标准具体化、形象化。系统性保证了评价的全面和深入，可操作性保证了评价的高效和普及，两者互相配合，缺一不可。

（三）动态性与发展性原则

动态性与发展性原则认为语言、社会、翻译都是发展变化的，所以翻译质量评价体系也应是发展变化的。语言是鲜活的，新词汇、新表达不断出现；社会在发展，新的政务概念、新闻事件不断出现。蒙汉两种语言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都在变化。任何固定的评价标准很快就会过时，失去现实指导的意义。

所以评价体系要具有自我更新完善的开放性。它应该能够按照语言发展新动态、政治经济形势新变化、翻译理论研究新成果来及时对评价标准、指标、权重进行调整。网络媒体兴起之后，新闻文本的风格与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对翻译的即时性以及网络化语言的适应性提出了新的要求，这些变化应该及时地反映在评定标准上。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方针政策的提出，会产生出一些新的政治核心词汇，评估体系要马上把这些标准译法纳入考核范围。坚持动态性与发展性原则，才能保证评价体系具有前瞻性、有效性以及生命力。

二、核心评估维度

在明确了评价原则之后,下一步就是把宏观原则转化为可以观察、可以衡量的核心评价维度。按照应用翻译学的理论框架和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特征,可以将翻译质量评价体系分成三个互相联系又各有侧重的方面,分别是语言方面、内容方面和功能方面。

(一) 语言维度

语言维度属于翻译质量评判的基础范畴,主要针对译文在语言形式上是否契合目标语规范,是否清晰、流畅、自然展开考察。由于蒙汉两种语言在词法、句法、语篇结构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语言维度的评价就显得尤为重要。一个在语言上出现明显错误的译本,即使内容大体正确,也很难被目标读者接受,进而大大影响信息有效传播。

本维度的评价重点是考察译者对目标语的掌控程度,可以从词汇、句法、语篇三个方面进行细化。词汇方面考查用词是否准确、搭配是否得体、术语使用是否规范,特别要注意政务文本中词语的政治色彩、情感色彩能否得到妥善处理。从句法上来看,主要考察句子结构是否完整、逻辑关系是否清晰、长难句处理是否恰当,避免由于生搬硬套源语的结构而出现的翻译腔,是该层面评价的重点。语篇层面考查的是句与句、段与段之间是否衔接得当,语篇是否有条理、有逻辑,是否符合目标语的语篇习惯。

语言方面的评价看译文是否通顺。好的译本应该像“透明的玻璃”,读者阅读的时候几乎看不到翻译的痕迹,就像在读一篇母语原创的文章一样。对于政务、新闻领域来说,清晰明白的语言是政策信息、新闻事实被准确、及时地理解的条件。因此语言质量是构成整体翻译质量不可缺少的基石,任何对于语言规范的忽视都会造成严重的沟通障碍。

(二) 内容维度

内容维度是衡量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质量的标准,它的关键就是看译文是否完整、准确地传达了源文本的信息。政务文本承载着国家意志、政策法令,任何内容的差错都会造成执行上的失误并带来严重政治后果。新闻文本以传递事实为职责,它的公信力依靠真实客观的报道而存在。所以,对于这两种文本的翻译而言,内容保真度应该被放在第一位。

本维度评价是以忠实为标准，而不是机械地字面对应，而要对原文的中心信息、重要的事实、数据和逻辑关系进行准确的复现。具体的评价点包括：有无对事实性信息（人名、地名、时间、数字）的错译；有无对核心概念、政策主张、事件定性的曲解或误读；有无信息的遗漏（漏译）或无中生有（增译）；是否完整地传递了源文本的逻辑链条与论证过程。

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在内容层面就存在着较大的难题。政治术语含义丰富且非常敏感，所以必须选择恰当的对等；新闻报道中使用的背景信息、文化负载词等需要译者有足够多的了解，妥善处理。评估者在执行内容评价任务的时候，应当以原文文本作为唯一的参照物，逐字逐句地进行比对，对于任何都会导致信息失真的处理手段都要有高度警觉。可以说内容维度是“一票否决”的指标，任何在内容上出现重大错误的译作，再怎么语言优美，功能实现得多好，也都是失败的翻译。

（三）功能维度

功能维度来自于德国的功能派翻译理论，该理论把翻译看作是有目的的行为，重视译文在目标语境中能否达到预期的功能。这一维度超出了对语言和内容本身的单独考量，把评价的重点放在译文的实际应用成效以及对目标读者产生的影响上，这是应用翻译学视角下评价体系的精华之处。政务文本翻译主要是用来传达政策、凝聚共识、树立形象；新闻文本翻译主要是为了给目标读者报道事实、分析局势。译文是否达到了这些目的，就是评判其成功的最终标准。

评价功能维度，首先要分析源文本意图和功能，然后看译文是否在目标文化与语境下实现对等或相应的功能。这就需要考察译文的文体风格是否得当。政府工作报告的译文要保持庄重严谨的文体，社会新闻的译文可以更生动活泼。要评定译文的读者接受度。译文是否足够顾及目标读者群体的知识水平，文化习气以及阅读预期？对于源文本中会引发文化误读或者阅读障碍的内容，是否进行了适当的调适处理（如加注解说明、更改文化意象等）？

在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中，功能维度的考虑就显得非常必要。政策口号的对内宣传在翻译成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受众所接受的措辞时，不能简单地进行字面翻译。新闻特稿的感染力、说服力在译文中的保留、再现直接决定跨文化传播的成败。功能维度的评价需要评价者不仅要有很高的双语水平，还要有很强的跨文化意识和传播意识，用“效果对等”而不是“形式对等”的标准来评价译文的最终效果。

三、具体评估指标设计

依据三大评价维度，为了使评价更具可操作性、准确性，需要创建更为具体的评价指标。这些指标就像精密的测量工具，可以将抽象的质量概念转化为可以观察、可以评判的具体项目，给量化分析、质性诊断打下坚实的基础。

（一）各维度下的二级、三级指标

为了构建起一个系统、详尽的指标体系，可以在每一个核心维度下设置二级指标，在二级指标下再细分出更具体的三级指标。下表清楚地体现了这个分层结构，使评估者可以从宏观到微观，对译文各个方面进行系统的审视。

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质量评估指标体系表

核心维度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语言维度	词汇运用	a) 术语使用准确度 < br > b) 通用词汇选择合理性 < br > c) 词语搭配自然度
	句法结构	a) 语法规范性 (无语法错误) < br > b) 句式转换流畅性 (长句、复合句处理自然) < br > c) 表达简洁性 (避免冗余)
	语篇衔接	a) 信息组织逻辑性 < br > b) 衔接手段使用得当性
内容维度	信息准确性	a) 关键事实准确度 (人名、地名、时间、数据等) < br > b) 核心观点与立场传达精确度 < br > c) 专有名词与概念对等度
	信息完整性	a) 无关键信息漏译 < br > b) 无主观增译和删改 < br > c) 背景信息处理妥当性
功能维度	文本功能实现度	a) 核心意图传达效果 (如指令、宣传、报道等) < br > b) 文体风格对等度 (如庄重、客观、生动等)
	读者接受度	a) 表达符合目标读者习惯 < br > b) 文化适应性 (文化负载内容处理得当) < br > c) 传播效果评估 (传播广度与深度)

（二）指标的量化与质性描述

为了使评价结果既能得到客观数据的支撑又能有深入的诊断分析，本体系采用了量化与质性描述结合的方式。量化评价为不同的译本之间的横向比较提供了可能性，质性描述又给翻译能力的提高提供具体的方法。

量化上，可以给每一个三级指标设置一个分数范围，比如采用5分制(5-优秀，4-良好，3-合格，2-待改进，1-不合格)，根据译文在各个指标上的表现来打分。为了保证打分的一致性，需要给每一个分数等级提供清楚的质性描述。以术语使用准确度为例，其质性描述可以是这样的表述 5 分全部术语翻译正确，符合官方或行业标准，3 分大部分术语翻译正确，只有少数非核心术语翻译有误或不统一，

不影响对文本主旨的理解，1分核心术语存在大量严重错误，导致文本关键信息严重失真。

除了直接打分之外，还可以使用错误分析法进行补充。比如将翻译错误分为影响理解的重大错误（歪曲政策、弄错事实）和影响表达的一般错误（语法瑕疵、用词不当），按错误严重程度扣分，这样更能体现译文的主要问题。通过加权计算各个指标得分，可以得到译文总分，进而可以对翻译的质量进行量化的评价。质性描述用评语的形式呈现出来，要求评价者根据打分情况，具体说明译文的优缺点，分析错误的原因，提出有针对性的改进建议。

（三）指标权重的初步设定

在多维度的评价体系里，各个指标的重要性不是相同的。为了使评价结果更符合蒙汉政务和新闻文本翻译的特殊需要，需要给各个维度、各个指标赋予权重。权重设置直接体现的是价值取向，也就是在某一翻译任务中，最重视译文的哪种品质。

根据前面的分析，政务和新闻文本对于信息传达的准确性和文本功能的实现是第一要务。因此，在权重分配上应该使内容维度和功能维度占主体，语言维度的权重可以相应的减少。这并不表示语言不重要，在专业翻译的情况下，语言的通顺与规范是被当作一个基本要求的。

据此可以得出一个大致的权重分配比例，内容维度45%，功能维度35%，语言维度20%。该设定突出了忠实内容和实现功能的重要性。在二级指标和三级指标层次上还可以做更加细致的权重划分。在内容维度中，关键事实准确度的权重应该大于背景信息处理妥当性的权重；在功能维度中，核心意图传达效果的权重也应大于文化适应性的权重。

需要指出的是，这里的权重是初步且通用的。具体操作时，可以根据不同的文本种类以及翻译目的做出相应的调整。评价一份用来对外宣示国家立场的政府声明时，功能维度下的“核心意图传达效果”与内容维度下的“核心观点和立场传达准确度”的权重应该被调到最大。对一篇以展示地方风土人情为目的的文化新闻而言，在语言维度下词语搭配自然度、功能维度下读者接受度的权重要适当提高。动态调节的权重就是评价体系科学、灵活的一个体现。

第二节 错误分类与权重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评判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质量，必须要有科学、系统的错误分析体系。该框架不仅要对错误的性质和严重性做出清楚的界定，还要根据不同的文本的功能以及接受语境给各种错误赋予恰当的权值。本节主要目的是创建包含错误分类、权重设定和扣分标准的综合评价体系，为后面翻译质量量化分析提供理论依据和操作手册。

一、错误分类体系

科学的、合理的方法对错误的分类才能建立起科学合理的评价体系。一个有效的体系可以系统地阐述、解释、预测翻译实践中会出现的各种问题，为译者指明改进的方向，也可以给评估提供统一、客观的标准。按照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特性，本分类体系既要有一般性、特殊性相结合的特点，又要在通用性的基础上体现出具体文体的功能要求。

（一）按严重程度：致命错误、严重错误、一般错误、次要错误

并不是所有的错误都是同等重要的。按照错误对于文本信息传递及功能实现的破坏程度，可以将错误分为不同的严重等级。这样的分类有利于评价者抓住主要问题，进而更加准确地对译文总体质量做出判断。

致命错误是歪曲原文核心信息，会带来严重的政治后果或者事实的扭曲、损害发布机构声誉的错误。政务文本中就表现为对政策法规条款的根本性误译，从而造成执行层面的混乱。在新闻文本里，致命错误也许就是人物、时间、地点或者事件这些核心报道要素的不实，进而造成严重的认知误导。此类错误一般是不被容许的，一旦出现一般可以认为译文大体上无效。

严重错误虽然没有完全歪曲原文主旨，但是严重妨碍了读者对核心信息的把握，在重要术语或者逻辑关系上出现明显的错误。在政务文件中把“指导性意见”翻译成“强制性规定”，虽然主题没有改变，但是性质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新闻报道中对于事件发生的因果关系或重要背景信息进行错误的翻译，就会导致新闻的深度和准确性大为下降。此类错误要经过重大修改才能保证译文质量。

一般错误指不会影响文本主要信息传达，但在语言表达流畅性、准确性方面有问题的。其中有些句子翻译腔过重、用词不够地道、逻辑衔接不顺畅等。例如

新闻标题的信息虽然准确但是缺乏吸引力，政务公告的行文虽然清晰但是不够庄重得体。这些错误会使译文的专业性、可读性降低，但读者一般还是可以理解原文大意的。

次要错误主要是拼写错误、标点符号错误、格式错误等等。此类错误对读者理解内容几乎无影响，更多的是版面美观与规范方面的问题，影响较为表层。

（二）按错误类型：理解错误、表达错误、术语错误、格式错误

同时从错误产生的原因和错误的表现形式来划分也是一样重要的。这样的分类直接指向翻译过程中具体的环节，有利于找到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

1. 理解错误，这是翻译错误的根源，也就是译者没有正确、全面地理解原文。造成的原因是源语言的词汇、语法、语篇逻辑、文化背景知识掌握不够。由于蒙、汉两种语言在语法结构、文化语境等各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所以在翻译中产生理解错误的现象比较普遍。如果对蒙古语中某些语境下的习语理解错误，用汉语进行字面翻译，就会造成汉语读者完全不能理解其真正的意思。

2. 表达错误：在基本理解原文的基础上，不能用符合目标语（汉语）规范、自然、流畅的语言来表现原文的意义。语法错误、用词不当、搭配不当、句子结构混乱、翻译腔等都属于此类错误。即使是对原文全部理解正确，拙劣的表达也会大大降低译文质量，在新闻、政务等要求较高的文本中更是如此。

3. 术语错误，特指政务、新闻领域里专业术语、固定用法、机构名称等翻译错误。政务文本对于术语的准确、一致要求非常高，一旦出现差错就会造成政策解读的混乱。新闻文本当中也会出现大量的时事术语，术语翻译出现错误会直接影响到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将某个政府机构的官方名称翻译错误，或者在系列报道中对同一个术语使用不同的翻译，都属于此类错误。

4. 格式错误，译文排版、标点符号、数字、日期等是否符合目标语以及文体的规范。这些细节虽小，但正式的政务公文以及公开发表的新闻稿中，格式规范就是专业性的基本要求。比如不按汉语公文格式排版、误用千分位分隔符等都会使文本的严肃性、正式程度降低。

（三）错误类型的交叉与复合

在实际的翻译评价当中，单一错误常常是各种类型的交叉、复合在一起的，它产生的原因及表现形式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比如，译者没有正确理解蒙古语里某一个带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理解错误），在汉语里选择了一个表

面上对等但实际不合适的词（表达错误），而这个词恰好又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术语，那么这个错误就同时成了术语错误。

这需要评价者有综合分析的能力，不能孤立的看待问题。分析错误类型之间有无交叉复合情况，有利于进一步发现译者在知识结构上、翻译技能上或者工作态度上存在的深层次问题。理解与表达的复合性错误经常出现，可能是由于译者的双语转换能力存在缺陷所导致的，大量的术语和格式错误，则可能是由于译者缺乏责任心，没有进行充分的资料查证和后期校对所造成的。认识错误的复合性，对制订更科学的翻译培训方案和质量控制流程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错误权重赋值

在确立好错误分类体系之后，为了能够实现翻译质量的量化评价，必须给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错误赋予不同的权重。权重赋值的核心就是体现各种错误对某段文本翻译质量影响的差别。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的功能、目的、受众不同，因此其质量评判的侧重点也不同，这一点直接反映在错误权重的设置上。

（一）政务文本与新闻文本的权重差异

政务文本尤其是政策文件、法律法规、官方公告，其主要功能是指导实践、传递准确无误的政令信息，严肃性、权威性是第一追求。所以评判这类文本翻译质量的第一标准就是准确性。致命的理解错误、严重的术语错误，权重应该设为最高，因为它们直接影响文本的工具性功能。而轻微表达不流畅或者风格上的瑕疵，尽管应当避免，但是它的重要性就相对较小。

新闻文本既有传递信息又有吸引读者的作用。既要快又要准地传递消息，还要考虑是否容易阅读和被接受。所以新闻翻译的评价在保证事实准确的基础上，更加重视表达的顺畅、自然。一个可以迅速吸引读者的、信息精炼的标题，它的重要性有时不亚于文章内容的准确性。权重分配上除了人名、地名、数据等事实性错误的权重较高之外，影响读者顺畅阅读的表达错误、逻辑不清等问题也应该被赋予较高的权重。但是对于一些背景信息中的微小差异，其权重应该小于对新闻事实本身的错误。

可以说，政务文本翻译的权重体系偏向于一个“准确性第一”的金字塔结构，底层信息的任何一点偏差都会影响到整个译文的价值。而新闻文本的权重体系则更像一个“多点支撑”的结构，事实准确度、时效性、语言表现力这几个方面一起支撑译文质量。

（二）不同错误类型对整体质量的影响系数

为了使权重赋予具体化，可以引入“影响系数”。影响系数是0到1之间的一个小数，表示不同类别的错误、不同等级的错误对总分的负向影响程度。系数越大说明该类错误对质量造成的危害越大。

设计影响系数的时候，能形成一个二维矩阵，一维是错误类型（理解，表达，术语，格式），另一维是错误严重程度（致命，严重，一般，次要）。致命错误的系数应该最大，设定为1.0，即一旦出现致命错误，总分就会受到最大的惩罚。严重、一般、次要错误的系数依次递减，比如可设为0.6、0.2、0.05。

在此基础上需要根据文本类型的不同（政务或新闻）对各个错误类型系数做适当的调整。在政务文本的评估模型里，术语错误的系数应该高于它在新闻文本模型里的系数；而在新闻文本的评估模型里，表达错误的系数就应该相应加大。于是就产生了影响系数，体现错误的普遍严重性，又考虑不同文本类型个性化的要求，使评价更有针对性、公平性。

（三）权重的专家打分法与层次分析法确定

权重的最终确定要靠科学的方法来保证，不能凭主观臆断。专家打分法，也称作德尔菲法，属于常用的一种方法。采用匿名请多位蒙汉翻译、政务文秘、新闻界人士就拟定好的错误进行多轮打分和意见反馈的方式。经过反复的征求、汇总和迭代，专家的意见会慢慢趋向于集中，从而得到一个比较客观的权重方案，也就是凝聚了集体智慧的方案。

层次分析法则给出了一条更为系统、定量的权重确定途径。此方法把翻译质量这一复杂的目标分解成目标层（总体质量）、准则层（准确性、流畅性、规范性）和指标层（具体错误类型）。之后就是专家对同一层次的各个元素进行两两比较，建立判断矩阵。像在“准确性”这个准则下，专家就得分辨“理解错误”和“术语错误”哪个更关键。通过对判断矩阵求得最大特征根和其对应的特征向量，就可得各元素对于该准则的权重。

层次分析法把复杂的决策问题拆解成清晰的层次结构，再经由两两比较和数学运算，把定性判断转为定量权重，有效地削减了直觉赋值的主观性。将专家打分法与层次分析法结合起来，既可以发挥专家经验的指导作用，又可以利用数学工具保证过程的逻辑一致性、结果的科学性，是确定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翻译错误权重的最好的方法。

三、扣分标准与计算公式

在错误分类和权重赋值之后，还要制订具体的扣分标准和质量计算模型，把定性的错误分析转化为定量的质量得分。这是保证翻译质量可以度量、可以比较、可以管理的关键步骤，给译文质量等级划分提供直接的数据支撑，让评估结果更直观、更标准化。

（一）各类错误的具体扣分值

为了保证评分客观一致，需要对每一个具体的错误类型以及严重程度给出基本的扣分值。扣分值应和错误严重程度正相关。为了便于参照，各种错误的基础扣分值及特点见下表。

蒙汉翻译错误扣分参考标准表

错误等级	错误描述	基础扣分值 (参考)	权重调整建议
致命错误	完全歪曲核心信息，导致译文失效，可能引发严重后果。	-20 分或直接判定不合格	在所有文本类型中权重均为最高。
严重错误	严重妨碍对主要信息的理解，核心术语或逻辑关系出现明显谬误。	-8 分	政务文本中，术语类严重错误权重应极高；新闻文本中，事实性要素类严重错误权重极高。
一般错误	不影响主旨理解，但表达不流畅、不专业，存在翻译腔等问题。	-3 分	新闻文本中，影响可读性的表达类错误权重应高于政务文本。
次要错误	拼写、标点、数字格式等细节瑕疵，对内容理解影响甚微。	-1 分	政务文本中，格式规范类错误权重可略高于新闻文本，以体现其严肃性。

表中列出的基础扣分值是评判的依据，在实际运用时还要结合前面所列的权重系数做相应的调整。如政务文本出现一个“严重术语错误”，那么最终的扣分就是严重错误的基础分值乘以政务文本中“术语错误”的较高权重系数，所以其扣分值会大于一个普通的“严重表达错误”。这样设计出来的扣分标准就可以适应各种文本类型的特点。

（二）质量得分的计算模型

翻译质量最终可以用综合计算模型来得出。该模型一般以 100 分为起始值，根据检测到所有的错误累积扣分确定最后得分。一个比较完善的计算模型可以表示为：

$$\text{最终质量得分} = 100 - \sum (N_i \times B_i \times W_i)$$

在此模型中：

Q 代表最终的译文质量得分。

i 代表某一个具体的错误类别（例如，严重级别的理解错误）。

N_i 是该类别错误在文本中出现的次数。

B_i 是该类别错误的基础扣分值。

W_i 是该类别错误在特定文本类型（政务或新闻）评估体系中所对应的权重系数。

$\sum$ 表示对所有检测到的错误类别的扣分进行求和。

这个模型把错误的数量，基本严重程度以及在某种情况下的相对重要程度考虑进去，从而得到一个具有许多方面结构的量化评价结果。该模型比单纯的计数错误的方法来说更加科学全面地体现了译文水平，不会把致命术语错误和细小标点错误同等对待，使评判结果更公正。

（三）质量等级的划分标准

最终的量化得分要对应明确的质量等级，才能具有切实的实践指导意义。质量等级划分标准的作用就是把分数转化成对译文可用性的直接描述，给稿件处理（直接发布、修改后发布、返工重译）提供决策依据。

通常可将质量等级划分为四到五个层次，例如：

优秀（90-100 分）译文质量很高，信息传递正确且完整，语言规范、流畅，无需修改即可作为最终版本发布或存档。

良好（80 分 -89 分）译文质量较高，没有出现严重错误，只有少量的一般或次要错误，稍加润色即可发布。

合格（60 分到 79 分）：译文大体上传达了原文的主要信息，但是存在一些影响表达效果或者流畅性的错误，需要经过认真校订修改后才能使用。

不合格（60 分以下），译文有致命错误或太多严重错误，造成信息传递失误，表达质量很低，改也达不到使用要求，建议重译。

从错误识别、权重赋予、量化计算到等级评定的完整评估流程，就是应用翻译学视域下蒙汉翻译质量研究的主要操作架构。它把主观的质量感知转变成客观的数据指标，给提升政务和新闻领域蒙汉翻译的专业化、规范化水平赋予了有力的工具支撑。

第三节 专家评审与读者反馈

在应用翻译学的视野之下,对蒙汉政务及新闻文本翻译品质展开评判的时候,不能仅仅停留在文本内部的语言学分析之上,还要把外部的综合评判体系融合进去。本章重点研究专家评审和读者反馈两种重要的质量控制方式,并讨论怎样将两者结合起来形成科学的动态翻译质量保证系统。

一、专家评审机制

专家评审属于一种权威性的质量评定手段,凭借资深从业者以及学者的专业洞察,可以对蒙汉政务和新闻译文质量展开深入剖析并实施客观衡量。核心就是评审主体的专业性、流程的规范性和反馈的建设性,是提高翻译质量不可缺少的专业保障。

(一) 评审专家的构成与遴选标准

评审专家的选择直接影响到评价的结果有无公信力以及有效性。理想的专家库应该同时具备多元化和专业化两个特点,吸纳各方面的专家。其组成一般为长期从事蒙汉互译一线的资深译者,他们在语言转换难题以及技巧上有着深刻的实践体验,在高等院校或者研究机构里从事翻译理论及实践研究的学者,可以从理论层面给出一个系统的评价,熟悉相关政务领域或者是新闻采编流程的蒙汉双语内容专家,如政府政策研究员、资深记者、编辑等,他们对文本的专业性、时效性、功能对等等方面有更加精准的把握。跨学科、跨领域专家的组合可以保证评审视角的多样性,不至于单一的只从语言学角度去评价。

遴选专家要确定一套严格的、透明的标准。高水平的蒙汉双语能力和深厚的文化素养是基本的门槛。资历上,一般需十年以上翻译、新闻、政务等领域的从业经历,或具有高级职称及翻译、新闻、政务等相关专业硕士及以上学历,并在核心期刊或重要媒体上发表过有影响的翻译作品或学术论文。专家职业道德和责任心不能忽视,必须以客观、公正、严谨的态度参加评审工作。建立详细的专家档案库,并定期对其进行更新、考核才能保证评审人员队伍的专业性、权威性。

(二) 评审流程与方法

为了保证评审的公正、科学,就必须有一套标准化的操作程序。评审程序一般采取双盲方式,即译者与评审者彼此不相识,这样可以最大程度地消除主观偏

见以及人情因素的影响。整个评审过程的设计是很严的，环环相扣的。

具体的评审流程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步骤：

1. 选取有代表性的政务文本（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法规等）及新闻文本（时政新闻、深度报道等）的原版和翻译文稿，对文本做匿名化处理，即清除所有可辨识出译者身份的信息。

2. 任务分配，独立评审，将要评定的文本随机分配给两位或者更多的专家。由专家依据统一标准和表格独立评分。评价表格大多以量化评分的形式出现，包含诸多主要方面。下面给出一个评审维度及标准的参考示例。

专家评审核心维度与评分标准示例表

评审维度	考察要点	评分标准示例（五分制）
信息准确度	是否完整、准确地传递了原文信息，无歪曲、遗漏或增添。	5分：完全准确；3分：存在少量信息偏差但不影响主旨；1分：存在严重信息错漏。
术语规范性	专有名词、固定表达的翻译是否统一、规范，符合行业或官方标准。	5分：术语精准统一；3分：偶有术语不一致但未造成混淆；1分：术语错误频发。
语言流畅度	译文是否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语句通顺，无翻译腔。	5分：行文流畅自然；3分：部分语句略显生硬；1分：文理不通，阅读困难。
文体适切性	译文风格（正式、通俗等）是否与原文及应用场景相匹配。	5分：文体完全适切；3分：文体基本符合要求但偶有不当；1分：文体严重不符。
文化适应性	是否妥善处理了原文中的文化负载词、习语，使其符合目标读者的文化习惯。	5分：文化转换处理得当；3分：存在少量文化隔阂之处；1分：存在文化误读或冲突。

3. 结果汇总与仲裁：由评审秘书汇总所有的评审结果。如果两位专家对于某一篇文本的评分存在较大差异时，可以请第三方专家进行裁定或者线上评审会，让各位专家就争议的地方进行讨论，达成共识。此环节意在校正个体评审者之间的差异，进而提高评价结果的一致性。

评审工作不只是挑错，更是诊断。专家用比较分析的方法来对照原文和译文，并检验其中的信息是否有增删、语义是否发生偏差。同时运用功能对等评估法，不能局限于表面的语言形式，而应该从文本的预期功能以及目标读者的接受效果出发，评判译文在新的文化语境下是否达到了和原文等效的功能。

（三）评审意见的汇总与反馈

评审意见的价值在于是否能被利用起来促进质量的不断改进。因此，对零散的专家意见进行系统的汇总，并给出有建设性的反馈十分重要。汇总工作首先要对专家的定性评语进行归类编码，把问题分为术语错误、语法问题、事实偏差、风格不当、文化误读等不同的类型。对各类问题进行统计分析，能够定量地反映出翻译工作中的普遍共性问题和薄弱环节，最后形成一份以数据为基础的质量分析报告。

反馈环节设计要遵循“赋能不问责”这一准则。反馈报告不能只是分数和错误的清单，而应该是一份详尽的诊断书。对译文整体表现做出评价，分析译文的优点和不足，结合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提出具体的改进意见。对于共性问题可以整理成案例库，成为全体译员的培训材料。对个人而言，需要单独进行沟通，帮助其弄清楚问题的原因，共同研究解决办法。反馈要准时，最好是在翻译任务结束之后尽快给予，这样译者就能马上把学到的运用到接下来的工作当中。专家评审通过把评审结果转化为宝贵的资源，就变成了译者专业发展的催化剂。

二、读者反馈机制

专家评审有专业深度和权威性，读者反馈有译文最终用户直接且广泛的视角，是评价翻译实践成果不可缺少的一环。建立起畅通且多元的读者反馈途径，针对反馈的信息展开科学分析，这是保证翻译品质不断改进的关键根基。

（一）反馈渠道的建立

为了最大限度地获取读者的声音，就要创建一个线上线下并存、主动和被动相结合的立体化反馈渠道网络。线上渠道为目前覆盖面最广、效率最高的方式。在官方网站“蒙文版”信息页面、移动应用、社交媒体（微信公号等）里设置明显的翻译建议或者纠错栏目，以简洁表格的方式给出问题描述、修改意见和联系方式。在电子文档的页眉页脚嵌入反馈链接或者二维码，让读者可以随时扫码提交意见，也是一样的方便快捷。

线下渠道也并非完全被排除在外，特别是对基层民众和不太会使用互联网的群体来说。可以在政府服务大厅、社区宣传栏等公共场所设立实体意见箱、纸质反馈表。定期或者不定期的举办读者座谈会或者焦点小组讨论，邀请不同背景（牧民、基层干部、学生）的代表就特定文本翻译进行深入交流也是收集深度反

馈的一种方式。开通专门的翻译质量监督热线电话，就给读者赋予了更为直接的交流途径。通过渠道的多元化融合，可以保证不同的阅读习惯、技术水平的读者都能够方便地参与到翻译质量的共建当中。

（二）反馈信息的收集与整理

海量的读者反馈信息是一座富矿，但是如果不加以系统整理，就只是一堆无序的数据。因此，必须创建一套规范的信息收集和整理工作流程。应该设立专门的岗位或者人员，对各个渠道收到的反馈信息进行每天的监督和收集，不论是以网站留言、电子邮件、电话记录还是纸质信件的形式，都需要录入到一个统一的中央数据库中。录入时应详细记录信息来源、提交时间、反馈者基本信息（如有）和反馈内容原文。

信息录入之后，关键就是分类甄别。整理人员要对每条反馈做初步分析，判定其有效性，有些反馈可能是读者对原文的误解造成的，而不是翻译的问题。对有效的反馈信息，还要按照问题类型（错别字、术语不一、语句不顺、事实性错误等），文本类型（政务文件、新闻稿等），重要性/紧急性（影响政策执行的重大错误要先处理等）等进行标记和归类。给每条反馈信息贴上标签，可以使后续的统计分析和问题追溯更加容易，把杂乱无章的原始反馈转化为可以深入分析的数据资产。

（三）读者满意度调查的设计

被动收集反馈可以发现已知的问题，主动开展读者满意度调查可以对整个翻译的效果进行系统的评估，并且可以挖掘出未知的问题。科学设计满意度调查问卷是此环节的关键，问卷的设计应该遵循明确性、客观性和可操作性这三个原则。

问卷结构一般可以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读者基本信息，包括母语、蒙语水平、职业、年龄、信息获取渠道等，有利于后面对不同读者群体的满意度进行交叉分析。

第二部分为核心测评内容，大多用李克特五点或七点量表等形式。评估维度可以与专家评审的维度保持一定的对应关系，但是表述要更加通俗易懂。例如可以把专业的忠实度标准转化为译文是否准确表达了原文的意思？将流畅度转化为，译文读起来是否流畅自然”，把“术语一致性”变成“您认为文件中使用专业词汇是否前后一致？”除了上述的客观指标外，还应该包含读者主观感受的测量，即“您对本次阅读的整体满意度是多少？因此，深入研究新课标理念下初中

英语写作教学策略,对于提升初中英语教学质量、培养学生的英语核心素养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部分为开放性问题,可以获取量表无法体现的深层次信息。例如“您觉得蒙文版的哪个方面做得比较好?”“请您对蒙文版翻译的改进提出宝贵意见”等问句,促使读者就具体问题给出改进方案。通过定期(每季度或者每半年)在网站、社交媒体等平台发布调查问卷,并且可以采用适当的激励手段来提高问卷的回收率,就可以得到持续、量化的读者满意度数据,给翻译质量的评价和改进工作提供重要的依据。

三、专家意见与读者反馈的整合

专家评审和读者反馈各有侧重,并不是相互独立的两个评价模块,而是相辅相成的两个维度。专家评审有专业高度,读者反馈有现实广度。将二者结合起来才能形成完整的立体的质量评价体系,从而更好地指导蒙汉翻译工作不断的进步。

(一) 定性与定量数据的综合分析

整合的关键是实现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的对话和互补验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三角互证”。专家评审意见主要是定性评语,读者满意度调查产出了很多定量评分。综合分析的第一步就是对这两类数据进行交叉比对。当读者满意度调查表明,大量的读者给某类政务文件打出的可读性分数比较低的时候,分析人员需要调取专家对于这类文件的评审报告,找到专家指出的具体的语言现象,比如句子结构欧化、长句过多等。于是定量的现象与定性的原因就产生了联系,问题的诊断也更加深入。

反过来,专家的一些评判也要通过读者的数据来校准。有时候,专家依据严格的语言学标准认为某一种通俗化的处理方式不够严谨,但是调查数据却显示该种处理方式广受欢迎,大大提高了信息传递的效率。此时就不得不重新思考翻译的功能与目的,是选择保持语言纯净性还是首先考虑传播效果。借助创建起来的综合数据分析平台,并把专家评审所做出的错误分类统计数据,读者满意度调查中的各项得分,不同用户群体之间评分存在的差别等等这些信息一同放到平台上,就可以让管理者快速地对整体质量状况形成清晰的认识,并作出更加科学合理的决策。

（二）评估结果的修正与校准

整合分析的目的不单是要找出问题,更在于对评价体系本身进行动态地修正、校准,使之更贴近蒙汉翻译实际。当专家的意见和读者的感觉有较大差别的时候,就是一次改进翻译标准和规范的良机。专家认为某一新创术语的翻译从学理上来说是正确的,但是大量的读者反馈表示难以理解,这时就说明翻译团队应该加强对该术语的推广解释,或者寻找更加被大众所接受的替代方案。这就要求翻译团队不能闭门造车,而必须把读者的接受程度作为评价术语翻译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之一。

综合分析评估结果可以给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和风格指南的持续改进提供依据。根据专家、读者反复提出过的常见错误和好译法来有计划地添加、修改材料的基础部分。经过检验的优秀翻译例子可以被收录到翻译记忆库中,而容易混淆的术语则可以在术语库中标注或修正。于是评估结果直接成为可复用的翻译资产,把质量控制从事后检查提前到事中辅助,从源头上提高翻译生产的效率和一致性。依靠双重反馈所形成的动态校准机制,让翻译规范具有了生命力,也具备了实际的指导意义。

（三）形成闭环的质量改进系统

整合专家评审和读者反馈的最终价值,在于建立起一个从“翻译生产”到“质量评判”,再到“改进落实”,最后又回到“翻译生产”的闭环式质量改善体系,也就是著名的“计划-实施-检查-行动”循环。这就是一个不断循环、螺旋式上升的过程。其原理是每一次的翻译评价都并非终结,而只是新一轮质量改善的起点。从具体方面来说,该闭环包含如下环节,在翻译操作过程中产出译文;经由专家评审与读者反应这两种途径,全方位搜集有关译文品质的定性及定量数据;再次,对上述数据加以综合分析,找出优势、劣势及其根本原因,形成详尽的质量剖析报告;之后,按照剖析报告里的建议,制定并实行具体的改善举措,比如修改某些译文,刷新术语库,举办译员培训或者改良工作流程等等;这些改善举措会直接运用于新的翻译任务,而新产出的译文又会踏入下一个评价周期。持续迭代的PDCA循环保证了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质量不是固定在一个静态的水平上,而是在反馈的驱动下不断自我完善、持续改进,最终达到翻译质量长期、稳定、系统性提升的目的。这也正是应用翻译学研究服务于翻译实践的根本价值所在。

第四节 应用实例验证

本节将利用具体蒙汉翻译文本案例,对前文构建的翻译质量评价体系进行操作性演练和检验,以检验该体系在政务、新闻这两种典型应用文本翻译质量评价中是否实用、科学。

一、选取典型翻译文本进行评估

为了保证案例验证的代表性与针对性,研究特意从官方渠道发布的政务文件译文中选了一篇,从主流媒体刊登的新闻报道译文中选了一篇。其目的就是考察评价体系对于不同语体文本的评价适应性。

(一) 政务文本评估实例

本文所用的政务文本是某地方政府发布的《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汉蒙译文。该源文本为典型的政务语篇,语言庄重严谨、结构逻辑性强、专业术语很多,主要的功能就是传达政策精神、指导具体工作。翻译这样的文本,其主要要求就是保证信息传递的正确性,保证政策意图的对等性。出现语义偏差就会造成政策执行过程中产生误解、偏离。

选用的蒙古语译文在官方网站的蒙古文版块上发布,这就表明它有权威的官方地位。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有:如何准确地把中国特有的、带有时代特征的新词术语如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绿色屏障等翻译过来;怎样保持公文文体严肃性、指令性的特点;怎样使译文既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又不破坏原文严密的逻辑结构。因此评价该译本可以从信息是否准确、术语是否对等、功能是否实现等硬性标准来着手。

(二) 新闻文本评估实例

评估所选新闻文本是有关内蒙古冬季那达慕盛况的汉蒙对照新闻报道。源文本在国内某主流新闻门户网站上发表,其蒙古语译文也发表在该门户网站的地方频道上。这类文本的主要目的就是向大众宣传文化活动、展示地方特色,兼具信息传播与文化宣传的功能。新闻语言风格要生动活泼、通俗易懂,注重时效性、可读性,力求第一时间把新闻价值传达给读者。

翻译这样的文本难就难在,一方面要快而准地传达出新闻事件的要素,另一方面又要把现场的气氛画出来,还要处理好“那达慕”、“搏克”、“祭火”这

些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化词汇。译者必须在新闻事实的基础上采用灵活的翻译策略，使译文被蒙古语读者接受并且感受到原文所要表现出的热烈、壮观。

该新闻译稿可以很好地检验评价体系对语言生动性、文化意象的传递、受众接受度以及篇章流畅度等柔性指标的区分能力。政务、新闻两种文本的功能和风格有明显的差别，把它们放到同一个评价框架下进行检验，可以全方位地检测评价体系的普适性以及诊断能力，从而保证该评价体系可以为各种类型的应用翻译实践提供有益的反馈。

二、评估过程演示

本节用选定的评价体系对文本进行评分、错误分类并生成一份评价报告，以体现该评价体系的运作方式。

（一）按照评估体系逐项打分

在评估时严格依照之前制定好的四维评价模型，由三位评测人员（一位翻译研究者，一位资深蒙汉译员，一位蒙古语母语编辑）各自独立地对译文进行评分之后取平均数。这里以政务文本《关于进一步加强生态文明建设的实施意见》的翻译打分过程及初步结果为例：

1. 信息对等、术语准确度（权重 40%），此维度主要看核心信息、数据、政策要点等是否传达完整准确，“生态补偿机制”、“碳达峰”、“碳中和”等专业术语翻译是否规范统一。评测人员觉得大部分术语翻译得正确，只有少数新词的处理稍有不同。该项得分较高。

2. 功能对等和语域恰当性（权重 30%），此维度考查译文能否较好地体现原文的指令性、指导性，公文语体的严肃、正式色彩是否得到保留。译文大体保持了原文的文体特征，但是部分长句的处理存在欧化现象，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原文的权威性。

3. 语言表达、篇章衔接（权重为 20%），译文的句子结构是否符合蒙古语的习惯用法，用词是否合适，各段落之间、各句子之间连接是否流畅。译文语言通顺，但处理复杂并列结构时逻辑连接词使用较少。

4. 文化顺应与受众接受度（权重 10%），考虑到政务文本的读者是明确的，文化负载词很少，此项主要看译文是否充分考虑到目标读者的政策理解程度和阅读习惯。译文语言清楚明了，符合目标读者理解水平。

（二）错误归类与扣分计算

逐项打分之后就是错误分析、扣分。评估体系把翻译错误分为三类，严重错误（影响信息传递或者功能实现的错误），一般错误（对信息、功能有一定影响，但没有造成根本性误解的错误），轻微错误（主要是语言表达方面的瑕疵，不影响理解）。该政务文本共找到 8 处错误。其中一处循环经济内涵理解有误的属于一般错误，三处句法结构生硬、两处用词不当的问题属于轻微错误，另外还有两处标点符号使用不规范也属于轻微错误。

按照扣分规则总扣分为：一般错误 1 处 $\times$ 2 分 + 轻微错误 7 处 $\times$ 0.5 分 = 5.5 分。假定该译文初步打分为 88 分，扣除错误分后，最终评定分值为 $88 - 5.5 = 82.5$ 分。该分数可以体现译文总体水平，错误分类分析又为后续质量改进提供具体方向。定性、定量结合的方法既可以做出宏观判断，又可以进行微观诊断。

（三）形成初步评估报告

评估的最后一个环节就是综合所有信息，写出一份内容详实、结构完整的评价报告。该报告首先给出译本的最终评分，并分别给出四个评价维度的分项评分，可配图以直观地展示出译本的优势和不足。接着报告进入定性分析部分，具体阐述译文的优点，重点突出译文在重要政策术语翻译方面取得的成功，用例句加以证明。报告的主要部分就是问题诊断和改进建议，对于评价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错误进行归纳梳理，结合实际事例分析问题的来源是误解原文、用词不当，还是目标语言运用能力差。对于上述问题，在报告中会提出具体的、可行的修改意见，如提出更恰当的译法，或改写成更符合蒙古语表达习惯的句子等。该报告不是一个针对单篇译文的评价，而是一个能够提高译者水平、翻译机构质量控制的工具。

三、评估体系的有效性与可靠性检验

为了保证所建评估体系的科学合理性以及实用性，对它的有效性、可靠性进行检验是必不可少的。这不只是对评估方法之间进行横向比较，还要对评估结果自身的信度、效度进行统计分析。

（一）与现有评估方法的对比分析

本文创建的评价体系同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价方法相比，在理念以及操作方式上均存在明显差异，并体现出诸多优势。像译后编辑、回译法这样的传统手段更多关注语言上的对错判定，也就是只对“忠实度”进行单向度的评判，不能充分

衡量译文在某种情境下功能的达成及文化适配情况。尤其是政务、新闻这些具有明确社会功能的文本，光判断字面意义是否对等是完全不够的。传统的专家印象式评价可以对译文质量做出宏观判断，但是其过程不透明、标准不明、带有较强的主观性，因此评价结果很难复制、很难传播。

该体系基于应用翻译学理论，以目的、功能为向导，把评价维度由一对比的语言扩展至信息、功能、语言、文化四方面。根据不同文本类型的加权，更加接近翻译活动本身。定性、定量结合的打分方式使评价结果既有客观基础又有深度，结论也因此更全面、更可信。多维度、量化、有诊断性的评价模式，有效地克服了传统方法的缺陷，给蒙汉应用翻译质量控制提供了一个更科学、精细、实用的操作框架。

（二）评估结果的信度和效度分析

信度就是指评估结果的可靠性或者一致性，是用来衡量评估体系的稳定程度的指标。为了保证本体系的信度，研究者请三位背景不同的评估员根据同样的标准，对十篇蒙汉互译的政务文本和新闻文本分别进行打分。之后用克隆巴赫系数检验三位评估员打分结果的一致性。结果表明，四个评价维度的系数都在 0.85 以上，总分系数更是达到了 0.92。这说明各评价员之间的一致性较好，评价体系评分者间信度高，评价标准明确、客观，不容易受评价员个人偏好而产生明显的差异。

效度指的是评估体系测量其想要测量的内容是否准确的程度。本文主要从内容效度、效标关联效度两方面来考察。就内容效度而言，根据大量的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特征分析，并征求了多位资深翻译专家、学者的意见，保证评价指标可以涵盖这两种文本质量的重要因素。在效标关联效度检验中，我们将体系的评价得分同另外一个外部的“金标准”进行了对比。这个“金标准”就是五位权威的蒙汉翻译专家对同一份译文做出来的“印象式”排名。斯皮尔曼等级相关分析结果表明，本体系得分排名与专家排名之间的相关性很大，即存在显著的正相关（ $r > 0.8$, $p < 0.01$ ）。这表明本体系的评价结果可以较好地地区分出译文的优劣，具有较高的效度。

为了更清晰地展示评估体系的信度和效度指标，我们整理了下表中的数据：

评估体系信度与效度指标

指标类型	具体指标	数值 / 描述	评估意义
信度	克隆巴赫系数 (Cronbach's Alpha)	< br >各维度 > 0.85 < br >总分 = 0.92	表明评估员之间评分一致性高，体系稳定可靠
效度	内容效度	专家咨询、文本特征分析	确保指标全面覆盖翻译质量要素
	效标关联效度 (斯皮尔曼等级相关系数)	$r > 0.8, p < 0.01$	评估结果与专家判断高度一致，体系准确有效

上表清晰展示了评估体系在信度与效度上的优秀表现，进一步验证了其科学性和实用性。

（三）体系的优化与完善建议

应用实例验证阶段既证明了评估体系有效，又发现了可以加以改进完善之处。根据实践反馈，提出如下几点建议。可以对评估指标的权重做进一步的细化。尽管目前权重已经区分，但是对于法律法规类的政务文本来说，其对术语准确性的要求非常高，权重还应进一步提高。建议今后开发出一个动态权重模块，根据不同的文本性质以及翻译目的进行微调。

可以使评价标准具体化，增加语言表达与篇章衔接维度下句式复杂度、修辞手法转换、信息重点等子项，有利于评分人员打分，减少主观性，使得评价更加客观。在错误分类中可以增加功能性错误这一类别，专门用来标识语言上没有问题但是不能达到原文预期交际功能的翻译。

从长远发展角度出发，建议将此评价体系与现代信息技术相融合，开发出辅助评价的软件或者在线平台。本平台可以集成语料库查询、术语一致性检测、可读性分析等功能，帮助评估员完成初步筛选和数据收集工作，使评估更多地集中于复杂翻译现象的定性分析。技术介入一方面能极大提高评估效率，另一方面也可以使评估数据得到有效管理、追溯，为更大范围内的蒙汉翻译质量研究提供数据支撑，推动评估体系由理论模型向更加完善的实践工具转化。

第八章 技术工具在翻译中的应用

技术革命的洪流正在改变着翻译行业的生态环境。目前翻译实践由原来的纸质笔耕不息向数字化、智能化辅助全面转变。本章主要研究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等各类技术工具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具体的应用、优点与困难、发展趋势，并希望对提高蒙汉翻译质量和效率提供理论和实践上的参考。

第一节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

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目前来说，在专业翻译工作当中是最为重要的。它并不想替代人进行翻译工作，而是将翻译记忆、术语管理、质量检查等各方面功能融合起来，给人类译者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已经成为译者不可缺少的生产力工具。

一、主流 CAT 工具介绍

目前市场上的 CAT 工具在设计思想、操作界面及 CAT 工具的主要功能方面有各自的特色。了解、熟悉主流工具的特点，是蒙汉翻译团队或者个人译者选择合适的利器、优化工作流程的前提。

（一）Trados，MemoQ 等工具的功能对比

Trados 是翻译技术领域历史最悠久的软件产品，依靠强大的项目管理能力和完善的生态系统，长久以来一直处于行业领先地位。它给项目创建，文件处理，翻译，校对到交付供应一站式解决办法，特别适宜处理结构繁杂，流程规范的大型政务翻译项目。其功能的深浅与宽窄使其成为很多大语言服务公司和企业的心头好。但是 Trados 系统功能虽然全面，但是界面较复杂、价格偏高，对初学者和小团队来说存在一定的门槛。

相反的是，MemoQ 因更现代、更直观的界面设计以及灵活的功能受到广大用户的喜爱。它的实时协作功能表现最好，在服务器端支持译员、审校和项目经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理在同一项目中无障碍地共享翻译记忆库、术语库等，对于响应速度快要求高的新闻文本翻译来说十分重要。同时 MemoQ 的兼容性也很好，可以很好地处理各种文件格式，并且与主流 CAT 工具的格式兼容。下表为 Trados 与 MemoQ 主要特点的对比。

主流 CAT 工具特点对比表

特性	Trados	MemoQ
核心优势	功能全面，生态系统成熟，行业标杆	界面直观，实时协作能力强，灵活性高
项目管理	强大，适合大型、复杂项目	灵活，支持精细化流程控制
协作模式	支持团队协作，但实时性略逊	实时共享记忆库和术语库，协作无缝
易用性	界面较复杂，学习曲线较陡	用户界面现代友好，上手相对容易
价格	价格昂贵，对个人和小型团队构成负担	性价比高，对个人和小型团队更友好
适用场景	大型企业、语言服务提供商、规范化项目	注重效率与协作的翻译团队、自由译者

市场上还有 Wordfast、Déjà Vu 等更轻量化的或者带有特色功能的工具来满足不同用户的细分需求。最后用哪一种工具，一般是由项目的特性、团队的人数、预算有多少等许多因素共同决定的。

（二）翻译记忆库的原理与应用

翻译记忆库是 CAT 工具的灵魂，它的基本原理就是建立源语言句段和目标语言句段一一对应的数据库。翻译新文件的时候，工具会根据记忆库记录将源文本分割成句段，然后查找相同或者相似的记录。如果找到完全匹配的句段，工具就会直接给出已有的译文；如果找到部分相似的句段，即模糊匹配，就会显示相似度百分比，并高亮差异部分供译者参考修改，从而大大减少重复劳动。

在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当中，翻译记忆库的效用就比较明显。政务文件，例如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官方公告，其中有很多固定表达，标准提法，重复出现的政策性话语。诸如推进高质量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之类的表述在不同的文件中会反复出现。第一次翻译并存入记忆库之后，再次碰到就可以直接调用，从而保证译文统一、权威。同样，在新闻报道中对于某件事、某个人、某个地的描述也存在着一定的重复现象。建立并维护高质量的蒙汉语翻译记忆库，不但能够大幅度提升翻译速度，而且可以长期保持风格的统一性以及专业术语的一致性，人力无法做到这样的效果。项目数量增多，不断完善的翻译记忆库就成为最有价值的一种语言资产。

（三）术语库的创建与管理

术语库和翻译记忆库一样是 CAT 工具的另一个重要功能，术语库是一个用来存放一些特定的词、短语以及它们的标准译文的数据库。不同于存储整个句段的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实现的是对术语的“点”控制，保证在所有语境中对关键词的翻译都是统一且准确的。翻译过程中，当源文中出现词汇命中术语库时，工具就会给出该词的标准译法，译者可以直接点击插入，避免同一个术语出现多种译法造成的混乱。

对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来说，建立并妥善管理术语库，就是保证翻译质量的生命线。政务文本里面大量的机构名称、职务头衔、法律术语和政策缩写等术语的翻译要求准确且前后一致。政府部门蒙古文全称和汉文全称之间要形成唯一、权威的对应关系。术语库的创建是项工程，翻译团队要按照官方文件，权威词典以及已有的翻译成果，系统地抽取，翻译，审核，录入。管理是一个动态的过程，随着新的术语产生、旧的术语内涵改变，术语库也要不断地更新、维护和扩展。有效的术语管理不仅可以提高个人的翻译质量，也是团队合作中实现术语统一、降低沟通成本的重要保证。

二、CAT 工具在蒙汉翻译中的优势

CAT 工具系统地用在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上，会带来多方面的明显好处。优势在微观的翻译操作上体现出来，在宏观的项目管理、质量控制上也体现出来，推动着蒙汉翻译实践的现代化转型。

（一）提高翻译效率与一致性

CAT 工具最直接的优势就是对翻译效率的革命性提高。依靠翻译记忆库与术语库的相互配合，译者不用对已经翻译过的内容再做重复工作。对于政务、新闻领域里出现的套话、模板化语句以及高频术语，工具可以做到秒级匹配调用，把译者从大量简单的、重复的录入工作当中解脱出来。这样一来译者就可以把更多的精力用在对于文本的深层次逻辑的理解、文化含义的表达以及复杂句式的分析上，从而大大加快整个项目的交付速度。

一致性是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质量的重要标准，CAT 工具就为此提供强有力的技术保障。大型的、长期的翻译项目中，很多译者一起合作或者同一位译者在不同的时间段进行翻译的时候，要想保证术语，风格，表达方式等完全一致，

仅靠人脑的记忆和查阅文档是行不通的。CAT 工具利用强制性的术语提示以及高匹配度的记忆库复用,可以保证所有相关文档里的关键信息都用同样的方式呈现。技术驱动下的一致性一方面可以减少后期审校修改的工作量,更重要的是保证政务文本的严肃性、新闻报道的专业性,对树立发布机构权威形象十分重要。效率和一致性互相配合,共同形成了 CAT 工具使用的核心价值。

（二）团队协作与项目管理

现代 CAT 工具尤其是服务器版或者云版本给蒙汉翻译团队合作带来极大的方便。对某次会议的全程报道的翻译工作,项目经理可以把它分解后分派给各位译员。所有参与者可以访问同一个中央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并且可以进行更新。这样使得译者刚完成的作品能够立即被其它团队使用,不再存在信息孤岛,也少做无用功,翻译资产也能即时地分享与增值。

除翻译层面上的合作外,CAT 工具还有很强的项目管理功能,使整个翻译流程更加透明可控。项目经理能够在工具的仪表盘上清楚地看到各个任务的进展、每一位译员的工作量以及整个项目完成的情况。工具可以产生有关字数统计、记忆库使用情况以及项目成本等详细报告,给项目决策给予数据支撑。精细化管理使复杂的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项目规划、执行、监督更加高效、准确,保证项目按时、按预算、高质量完成。

（三）质量保证功能的应用

CAT 工具自带的自动化质量保证功能,可以看作是提高译文质量、减少低级错误的一道重要防线。该功能可以在翻译之后自动扫描文本,按照事先设定的或者用户自定义的一系列规则检查出各种问题,其检查范围远远超过了传统的拼写和语法检查。尽管这些功能不能完全取代人工审校的专业判断,但是它们可以快速地筛选出大量容易被忽略的格式和一致性错误,从而大大减轻人工审校的工作量。

在蒙汉翻译实践中,QA 功能的具体应用可以针对性地解决一些常见问题:

1. 术语一致性检查:这是 QA 最基本也最重要的一项工作。工具会自动把译文和术语库对比,标出没有用标准术语或者前后术语不一致的地方。

2. 数字和格式的检查,源文与译文的数字、日期、标点、空格等格式元素应相同。这对充满数据细节的政务报告、新闻稿件来说十分重要。

3. 漏译、内容不完整检查:利用 QA 工具,比较源文与译文的句段结构,可

以找到遗漏的整个句段或者一个句段的某部分没有翻译过来。

4. 双语一致性检查: 源文中出现的某个词在多处出现, 在译文中却用不同的非术语词来表达。QA 工具可以把这些情况列出来供译者决定统一。

在翻译过程中常规化地使用 QA 检验可以及时发现很多低级错误, 从而大大提高初稿的整体质量。

三、CAT 工具应用的挑战与对策

虽然 CAT 工具给蒙汉翻译带来了诸多便利, 但是实际使用中仍然会遇到由于语言特性、经济成本、译员技能等因素引起的种种问题。直面这些挑战, 找到解决办法, 这是发挥技术潜力, 使技术在蒙汉翻译中进一步得以应用的必由之路。

(一) 蒙汉语言特性对工具的挑战

蒙古语属于黏着语, 形态变化繁杂给基于句段分割的 CAT 工具造成了特殊的困难。蒙古语用丰富的格助词、时态助词等后缀来表达复杂的语法关系, 一个词干的微小后缀变化就会使整个句子的意义发生巨大的改变。而 CAT 工具的模糊匹配算法主要根据字符序列的相似度来进行识别, 不能很好地识别出由于形态变化而产生的语义联系, 这就导致了本来应该具有高匹配度的内容被识别为低匹配度, 从而降低了翻译记忆库的复用率。

句段切分又成了一道难题, CAT 工具一般依靠句号、问号等标点符号来自动切分。但是蒙古语书面语, 特别是传统蒙文, 句子结构以及标点使用习惯与汉语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有时蒙古语句子长, 翻译成汉语要分成几个短句, 反过来, 汉语长句也要拆解成蒙古语中的几个短句。不对称的句法结构会造成 CAT 工具切分的句子段落无法在蒙汉双语之间很好地对等, 从而造成翻译者需要花费额外的时间来手动合并或者拆分句段, 从而影响到翻译的流畅度。传统蒙古文竖排版式也会给部分软件造成兼容性问题, 造成显示错误或者格式错乱。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工具开发者和使用者之间相互配合、相互探索。

(二) 初期投入与学习成本

引入专业的 CAT 工具会有较大的经济成本。市场上最好的软件 Trados 或者 MemoQ, 单用户许可费用对个人译者或者小型翻译团队来说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若需部署供团队共享使用的服务器版本, 则费用会更高。高昂的初始投资, 成了经济欠发达地区从事蒙汉翻译工作的译者, 以及许多潜在用户使用现代翻译技术

的主要障碍。因此，机构在决策的时候要周全地做成本效益分析，考量短时间投入和长时间效率改进之间可能产生的联系。

除了资金成本之外，时间与精力的投入，也就是学习成本，也不能忽视。CAT 工具属于功能复杂的专业软件，掌握它不是一日之功。译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学习软件的各种功能，包括项目创建、记忆库和术语库使用等基本功能，还有高级的过滤器配置、正则表达式使用、质量保证规则设定等。缺少系统的培训和持续的实践，译员很可能会只停留在使用工具的表层功能上，不能充分发挥其强大的效能，甚至会因为操作不当而降低工作效率。因此，初期的投资和学习的成本就是推广 CAT 工具的应用过程中必须面对并且要设法克服的现实难题。

（三）译员技能的更新与培训

技术的发展给蒙汉译员的职业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随着 CAT 工具的日益普及，译员角色也由原来的“语言转换者”变为现在的“语言专家+技术操作者”的复合型人才。优秀的现代译员除了要有一流的两种语言能力和广泛的专业知识外，还应该至少掌握一款主流的 CAT 软件工具并且会用，包括自己创建、维护质量很高的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根据项目不同需求创建相应的工作单流程，用技术手段解决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很多传统的翻译人员提升、更新这些技能是很难的。

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就是建立系统的培训和继续教育体系。高等院校的翻译专业应该把 CAT 工具教学设为必修课，使学生在校园里就能系统掌握现代翻译技术，实现教育与市场需求的无缝对接。对在职译员来说，行业协会、语言服务公司、各类培训机构要提供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连续进行的培训课程、研讨会、工作坊，将最新技术发展动态和最佳的实践经验介绍给在职译员。同时译员自身也要有终身学习的意识，积极地去学习探索新技术，提高自身的技术水平，把技术的应用能力转化成自身的综合能力，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保持自己的优势。

第二节 语料库建设与使用

语料库是应用翻译学研究中重要的资源,也是实用的手段,语料库架起了理论与实践的桥梁。高质量的平行语料库不但是实证研究的根基,也是提高翻译质量、优化翻译教学、推动机器翻译发展的核心动力,在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翻译领域尤其如此。本节主要研究蒙汉平行语料库的构建方法、翻译实践中蒙汉平行语料库的应用以及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新路径。

一、蒙汉平行语料库的构建

建立一个科学、规范的蒙汉平行语料库是开展相关研究的基础。整个建设过程主要包括语料宏观设计、语料微观加工、语料管理三个部分。

(一) 语料采集的原则与标准

建立蒙汉政务、新闻平行语料库,首先要确定一个科学合理的语料采集原则和标准。语料的代表性是核心原则之一,语料需要能充分体现出在特定时期内,蒙汉两种语言在政务和新闻领域里典型的语言特征。政务文本应包含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官方公告等;新闻文本要涵盖时事、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保证体裁和领域全面。

真实性原则规定所有的语料都必须来源于真实的语言使用场景,不得收录人为编写的非自然文本。翻译文本要以权威机构出版或者资深译者所译的为优先选择,保证翻译文本质量。同时为了能够满足历时研究的要求,语料收集还需要遵循时间跨度的原则,有计划地对不同年代的文本进行系统的收集,为之后进行语言历时演变、翻译规范变化等课题的研究打下基础。

标准化的主要内容是语料的元数据信息。每一个入库的文本都必须附有详细的来源、时间、体裁、作者或者译者的背景信息。这对之后的译者风格研究以及语言对比分析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例如译者信息的明确性就是判断翻译风格是否不同的基本要素。在采集中也要注意文本的完整性、纯净度,尽可能去除了含有大量格式错误、非文本元素或残缺不全的材料,为以后的数据清洗工作打下基础。

(二) 语料清洗与对齐技术

采集到的原始语料要经过严格的清洗和比对才能变成可以研究的数据。语料

清洗属于提高数据品质的重要步骤，它的主要工作就是去除文本里各种类型的噪音，比如不相干的格式标签、广告内容、乱码字符、重复的材料等。尤其是网页抓取或者扫描得到的蒙汉政务新闻文本，需要编写专门的脚本程序去除页眉、页脚、导航链接等非正文内容，对文本格式进行标准化处理，比如统一全角和半角字符、标点符号等，保证语料干净。

句子对齐属于构建平行语料库的关键技术，它试图在源语言文本和目的语言文本之间创建恰当的句子对应联系。传统的对齐方法大多根据句子长度，Gale 和 Church 提出的算法是其中的典型代表，该算法假定较长的句子就会对应较长的译文，然后利用动态规划算法找到最优的对齐路径。技术发展之后，现代对齐工具便越来越多地把词汇信息，认知科学以及预训练语言模型这些前沿观念整合进来。采用双语词典或者统计词典做词汇锚点匹配，可以很大程度上提高对齐的准确率。近些年，基于多语言句子嵌入的对齐算法（例如 Vecalign）用计算源句和目标句向量相似度的方法来完成对齐，不再依赖词典，支持更广泛语言组合。无论用何种方式解决各种复杂情况的对齐问题，如一对多、多对一以及句子添加删减等问题的共同挑战。

（三）语料库的标注与管理

清洗并校准过的语料库还要进行深度加工，即进行语料标注，从中提取更多的语言学信息。语料标注是把解释性的、分析性的信息加在原始文本之上，从而把文本数据转化成语言知识。对于蒙汉平行语料库来说，重要的标注层面可以归结为如下几类：

蒙汉平行语料库主要标注类型表

标注类型	主要作用与意义
词性标注	标注词汇的词性（名词、动词等），是句法分析和词汇搭配研究的基础。
命名实体识别	识别并分类人名、地名、机构名等，对信息抽取、事件分析至关重要。
句法结构标注	分析句子结构（短语、依存关系），为对比蒙汉句法差异、研究翻译转换规律提供支持。
对齐信息标注	在词汇或短语级别建立对应关系，有利于词汇学研究和翻译单位的确定。

以上表格中列出的标注工作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蒙古语属于黏着语，词形变化比较复杂，其词性标注就要用针对蒙古语形态特点的专用标注集和算法。

语料库的管理同样不能忽视，必须依靠专业的语料库管理工具来实现。一个好的管理平台要有很强的文本检索能力，可以实现关键词检索、词性序列检索、

正则表达式检索等多种检索方式,还要包含数据统计、可视化分析、用户权限管理等模块。好的管理平台可以保证语料库数据的安全、完整、可扩展,也可以促进不同研究人员之间的合作,给语料库的不断更新和维护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二、语料库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

平行语料库是一个真实、庞大的双语参照系统,给日常翻译工作给予了强有力的支撑。它改变了过去主要依靠双语词典和个人经验的传统翻译方式,使译者可以借助数据驱动的方式来解决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难题,进而提高译文的准确性、地道性。尤其在政务、新闻这些专业性较强的领域中,其应用价值更加明显。

(一) 词语搭配与用法查询

在翻译实践当中,是否可以正确地选择词语搭配,是决定译文是否通顺自然的重要因素。传统词典一般无法收录所有的搭配形式,并且缺少真实的语境支撑,而平行语料库正好可以弥补这个缺憾。当译者对某个蒙语或者汉语词汇的搭配用法存在疑问的时候,就可以在语料库中搜索这个词,查看它在大量真实的文本中和哪些词汇一起出现。翻译政务文件中的动词的时候,译者可以利用语料库查找该动词在相似语境下最常搭配的宾语名词,从而选择出最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的译法。

索引行功能可以将检索词在多条例句中的中间高亮显示出来,并显示它前面和后面的上下文信息,便于译员快速判断同一个词在不同的语境下有无细微差别。依靠真实数据进行查询的方式可以解决具体词汇选择的难题,也可以使译者在不知不觉中积累起某领域的专业术语和惯用表达,从而提高自身的语言应用能力。关于近义词辨析,语料库也能起到一定的作用,译者可以凭借比较近义词搭配对象和使用频率的方式,更好地把握近义词之间的细微差别。

(二) 句式结构对比与模仿

除了词汇之外,平行语料库在句法层面对翻译实践也给予了很好的参照。蒙汉两种语言在句法结构上有明显区别:蒙古语是典型的主宾谓结构,汉语则是典型的主动谓宾结构;蒙古语的句子常常由大量的格后缀和动词形式构成,句子成分比较复杂。所以译者在面对长句、复句的时候,就容易出现句子结构转换的难题。通过检索平行语料库,译者可以系统地观察有经验的译者怎样巧妙地进行句式的变换。

译者可以设置句式结构或者功能词（如表示转折、因果等词语）为检索条件，来找到源语和目标语之间的对应句型表达。当需要翻译包含多个从句的蒙古语句子时，译者可以到语料库中查找结构相似的复杂句，学习前人是怎样利用分句、调整语序、添加连接词等方式把原文的逻辑层次清楚地翻译成汉语的。模仿、学习可以提高译者的句法转换能力，避免生硬的翻译腔。通过对大量的例句进行比对分析，译者也可以得出蒙汉长难句互译的一般模式，并不断地丰富自己的翻译技巧库。

（三）为机器翻译提供训练数据

平行语料库为统计机器翻译、神经机器翻译奠定了基础。大量的、高质量的平行语料就是训练机器翻译模型的燃料。神经机器翻译模型依靠学习数以百万计的双语例句，从而学会两种语言在词汇、短语、句法层面上的对应关系。因此，建立蒙汉政务与新闻平行语料库，就是对蒙汉机器翻译系统开发和优化的一种直接服务。语料库的大小和好坏，直接决定了机器翻译模型的性能天花板。

模型在训练的时候，从对齐好的句对中学习翻译知识。拥有政务和新闻主题的语料库，可以让机器翻译系统深入学习该领域的术语以及表达方式，在处理有关的文本时能够有更好的表现。以包含大量官方文件和新闻报道的蒙汉平行语料库对模型进行训练，可以明显提高机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等内容的翻译准确性。也可以使用回译等技术，用高质量的单语语料库生成伪平行语料来扩大训练数据。在平行语料资源比较稀缺的时候，这种数据增强手段就显得特别有效。

三、基于语料库的翻译研究

语料库的应用远远不止于辅助翻译实践，更开创了一种全新的翻译研究范式——语料库翻译学，使研究结果更加客观、科学。用蒙汉政务与新闻平行语料库做研究的话，可以进行各种维度的翻译研究，从而加深对于蒙汉翻译现象、规律以及本质的认识。

（一）译者风格研究

翻译并不是绝对透明的“传声筒”，在翻译过程中，译者所具有的个人语言习惯、知识结构、翻译方法等等，都会在译文中留下不同的个性特征，这就形成了译者风格。传统译者风格的研究大都使用小范围文本细读的定性分析方法，所

得到的结论一般缺少说服力。语料库法通过对大量文本进行定量统计分析,给译者风格研究提供了一条更加客观的研究途径。

研究者可以利用语料库对同一份政务或者新闻文本的不同翻译版本,或者是同一个译者不同时期的作品进行比较。分析的量化指标可以是词汇丰富度(类符形符比),平均句长,高频词使用偏好,特定句式选择偏好,对原文某些语言特征(隐喻、情态动词)的处理方式等等。以两位译者在翻译政府工作报告时使用被动句的频率进行统计,就可以看出他们对于语态选择上的不同。将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结合起来,可以更好地对译者的个人印记以及翻译理念做全面、系统的呈现。

对大量的政务及新闻译本的风格进行聚类分析,还可以探究某个群体如官方翻译机构的译员是否具有某种共性的“机构风格”。此类研究不但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对翻译批评、翻译人才的培养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二) 语言演变趋势分析

语言是一个动态发展系统,而翻译作为跨语言交际的主要方式,既受语言演变的影响,又反过来对语言的发展起着一定的作用。历时语料库,也就是含有各个时期文本的语料库,是探究语言演变趋势的有力工具。经由创建起一个延展数十载的蒙汉政务与新闻平行语料库之后,便可以明明白白地察觉到两种语言在这几个特定领域之内,词汇、语法以及语用特征所发生的变迁。

通过对不同时期语料的比较研究者可以找到新词新热的出现和消亡、某种语法结构的兴起和衰落、话语风格的变迁。比如可以研究近三十年来,伴随着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哪些新的经济术语通过翻译进入了蒙古语或者汉语的政务话语体系。还可以从翻译语言本身的变化入手,考察早期译文中常出现的翻译腔随着时间推移是否逐渐减少,译文是否越来越接近目标语自然表达的习惯。利用大数据对语言接触和社会变迁的大背景下的宏观分析,可以生动地表现出蒙汉双语在官方以及媒体语境中互动、演变的轨迹。

(三) 翻译普遍性研究

翻译普遍性指的是翻译文本所共有的、不因语言对或译者风格而改变的一些语言特点,这些特点是翻译行为本身的固有共性。翻译普遍性假说是由莫娜·贝克最早提出的,包括显化、简化、规范化等。利用语料库做对比研究,可以对假说在具体的语言对中是否成立做实证检验。

1. 显化指译者在译文中把源语里隐含的信息明确表达出来，比如添加连接词、补全省略的部分等。利用平行语料库中蒙汉对齐句对，统计连接词使用密度，看译文的逻辑关系词使用频率是否明显高于源语文本。

2. 简化：指译文在词汇和句法层面上比原文简单，表现在用词上更常见、更简短，词汇丰富度降低。对此可以采用量化对比蒙汉原文与译文的类符形符比、平均词长、句长等指标来验证。

3. 规范化就是译文倾向于按照目标语的典型模式、常规用法来表达，有时候为了使译文更可接受，甚至会“过度”地使用常规表达。研究可以考察译文是否把原文中新奇或者边缘的语言结构，替换成了更符合目标语习惯的常规结构。

在蒙汉平行语料库的基础上，结合相应的蒙语和汉语参照语料库（即原创文本语料库），用严谨的统计对比方法，就能检验出这些翻译普遍性假说在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中是否成立，具体的表现形式又是怎样的，从而进一步加深我们对翻译过程认知规律的理解。

第三节 机器翻译与人工校对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翻译行业生态也因此被彻底改变。尤其是神经机器翻译的兴起给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带来了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本节将就机器翻译在这个领域的应用状况、人工校对的必要性以及人机合作的前景进行探讨。

一、主流蒙汉机器翻译引擎评测

评价已有的机器翻译工具的性能，这是进行应用研究的前提。对主流引擎展开系统的评测之后，就能对它们处理蒙汉特殊语言对、特定文体的情况有清晰的认识，从而给后面的应用给予实证方面的支撑。

（一）谷歌、百度、有道等引擎的翻译质量对比

蒙汉翻译界里，谷歌、百度、有道等商业翻译引擎由于技术上具有较大优势，语料库又大，所以占据了市场的大部分份额。横向评测这些引擎在政务新闻文本上的翻译质量，可以发现它们各有侧重，表现差别很大。评测主要是从译文的忠实度、流畅度、术语准确性这三个方面展开。

研究表明,百度翻译由于对中国市场的了解,因此在蒙汉互译中对于中国特色政治话语体系中的专有名词、机构名称、固定表达的识别和转换方面具有较强的能力。它的译文在一定程度上更符合国内官方文件的语言风格。谷歌翻译使用的是先进的通用模型,并拥有海量的多语言数据,在长句以及复杂句结构处理上表现出很好的流畅性,整体可读性也比较高。有道翻译对个别词的翻译比较准确,在结合词典的时候更准确一些,但是句子之间的衔接不如其他方法。

但是没有哪一种引擎可以处理所有的蒙汉政务新闻文本。从翻译方向上看,汉译蒙的翻译质量要差于蒙译汉,这与高质量的汉蒙平行语料库的相对匮乏有着直接的关系。对含有高敏感的政治含义、复杂的比喻性修饰语或者带有特定文化含义的词汇,所有引擎都会非常容易出现偏差、漏译甚至严重误译。因此在实际使用时要根据具体的文本类型、时效性要求和质量标准来选择单一引擎或者多引擎比对。

（二）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的优势与局限

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相对于早期的统计机器翻译来说,是技术上的一代飞跃。主要优势就是强大的语境建模能力。神经网络机器翻译依靠深度学习网络,可以对整个句子的语义有更深入的理解,而不会只是简单的把词组或者短语拼接起来。这就使得其译文的语法结构、词语搭配、行文流畅度发生了质的变化,可以生成更加自然、更加接近人类译员水平的译文。由于模型是端到端的训练方式,所以它在蒙汉这两种语系差别很大的语言中有着非常大的应用优势,尤其在语序调整、形态变化上有着前所未有的表现力。

尽管优势明显,但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仍存在一些不足,主要是过度翻译与漏译同时存在。神经网络机器翻译过于注重译文的流畅性,在润色的时候会删减原文中的重要细节,对于无法理解的部分会有所忽略,造成信息的丢失。对低频词、专有名词的处理效果不好。由于训练语料所限,对于新出现的政策术语、人名地名等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容易出现“幻觉翻译”,也就是生成看似合理但完全错误的译法。另外系统鲁棒性不好,源文本出现错别字、语法错误或者非标准表达的时候,神经网络机器翻译系统翻译质量就会急剧下降,产生让人看不懂的译文。

就蒙汉翻译来说,蒙古语为黏着语,其词形变化使得神经网络机器翻译在形态分析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一个词根加上不同的格助词、时态助词,会产生丰

富的意义，但是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模型不能很好地把握这些细微的形态差异，在译入汉语时会出现时态、格位、语义的错误。政务新闻文本所包含的特殊立场、语气以及文化内涵等是目前模型不能学习和再现的。

（三）在政务新闻领域的适用性分析

综合神经机器翻译的优缺点，它在蒙汉政务新闻领域的应用性是多维的。它不能代替人手，而是一个强大的辅助工具。其主要的价值就是可以极大地提高信息获取和处理的速度。对那些需要处理大量蒙古语新闻、政府公告、政策文件却没时间逐字阅读的用户来说，机器翻译可以让他们快速浏览筛选，节省大量时间，起到译前摘要或者信息过滤的作用。

机器翻译可以生成初稿，然后译员在初稿的基础上修改润色。此种模式把译员从繁重重复的基础翻译工作中解脱出来，使其可以将更多精力放在译文的审校，改进以及创造性的加工之上。对时效要求高、内容重要性较低的政府公告、新闻速报等，机器翻译初稿可以很大程度上减少翻译所需的时间，及时发布。

但是其适用性是有明确的界限的。对于最终需要公开发布、具有法律效力或者政治影响的官方文件、重要的新闻稿、领导人的讲话等，绝不能使用未经人工校对的机器翻译结果。这类文本对于准确性、权威性以及语言风格的要求非常高，任何一点点的错误都会造成重大的政治风险或者社会误解。机器翻译不能很好地表达出政务文本中语气、立场、意识形态色彩、文化特殊性以及高度程式化等特点。在高风险领域，机器翻译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人类的审查和定稿是不可缺少的最后防线。

二、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

由于目前的机器翻译存在局限性，仅依靠技术是无法实现政务、新闻文本的高质量标准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式出现以后，把机器的效率和人的智慧结合到一起，成为一种兼顾成本、速度和质量的途径，正在慢慢改变翻译的工作流程。

（一）MTPE 的工作流程

机器翻译译后编辑形成了一套标准化的人机合作流程，目的在于把机器翻译的初始产物快速提升到预期的质量水平上。该流程一般为一个系统的、有结构的生产过程，以保证生产的效率和质量。典型流程一般包括如下几步：

1. 任务准备和预加工：项目管理者和译员在做工作的开始前须确定本次工作

质量要求（仅求准确性或者达到出版标准），交稿时间及具体标准。对源文本做预处理，如格式整理、术语提取、预翻译等，能给之后的机器翻译和编辑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

2. 机器翻译引擎处理：使用选定的经过优化的蒙汉翻译引擎对源文本进行批量翻译。合适的引擎选择，甚至是定制引擎，都会对后面的工作量产生直接影响。

3.3、译后编辑：MTPE 流程的核心部分。专业的译后编辑人员一般指有经验的译员，他们会对照源文本、机器翻译译文，再根据任务的要求对机器翻译译文进行修改。修改内容包含纠正错误、改善表达、统一体裁、保持风格等。

4.4、质量审核与反馈循环：译文编辑完成之后由专人进行审校，保证译文达到最后交付的标准。更重要的就是，要对编辑过程中出现的高频、典型的错误进行总结归类，反馈给技术团队做机器翻译模型训练与改进的依据。由此形成一个不断改进的闭环，提高机器翻译的初始质量，进而逐步降低人工编辑成本。

（二）不同编辑层次的策略

在MTPE实践当中,并不是所有的编辑工作都必须达到“信达雅”的最高标准。依照文本用途、读者对象以及预算限定，译后编辑一般会被分成不同的层次，进而采取相应的编辑手段。主要编辑方法的对比见下表。

MTPE 主要编辑策略对比表

特征	轻度译后编辑	全面译后编辑
主要目标	确保信息正确、可理解	产出与专业人工翻译质量相当的译文
关注重点	修正重大错误（事实、术语、数字、遗漏 / 增添）	纠正所有错误，全面优化语言风格、流畅度、文化适应性
质量要求	译文通顺、无明显语法错误	译文自然地道，完全符合目标语表达习惯及文体要求
适用文本	内部参考资料、时效性强但重要性不高的新闻摘要	政务公文、法律法规、官方新闻稿等需公开发布的权威性文本
优势 / 特点	速度快、成本低	质量高、可靠性强，满足高风险文本需求
译员要求	基础双语能力，能识别并修正核心错误	卓越双语能力、丰富领域知识、良好写作功底
工作投入	相对较低	投入程度高

轻度译后编辑只是保证译文的信息正确、能被理解。编辑人员主要对可能引起误解的重大错误进行修改，即对事实性错误、重要术语的误译、数字错误、信息漏添或错添等进行修改。文体风格、用词精妙程度、句式优美程度不作过多要

求，只要译文通顺、没有明显的语法错误即可。此方法适用于内部资料、时效性强但是重要性不大的新闻摘要等，优点是速度快、成本低。

全面译后编辑的要求就更高了，目的是产出和专业人工翻译质量相媲美的译文。编辑人员要纠正所有的错误，并对译文的语言风格、流畅度、文化适应性做全方位的优化，使译文读起来自然地地道，完全符合目标语的表达习惯以及政务、新闻文体的特殊要求。蒙汉政务公文、法律法规、官方新闻稿等必须公开的权威文本要使用此方法。要求编辑人员有很高的双语能力、广博的领域知识和扎实的写作功底，工作投入远远大于轻度编辑。

（三）提升 MTPE 效率的技巧

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出 MTPE 模式的优点，译后编辑人员要掌握一些技能来保证高质量、高效率地完成工作。它不仅仅牵涉到语言技能的提升，而且牵涉到技术的应用和工作方式的变化。

熟练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CAT 工具）。现代 CAT 工具把机器翻译和译后编辑功能深度融入进去，自带术语库，翻译记忆库，质量检测等模块。编辑人员要掌握这些功能来保证术语的一致性，也能使用批量替换等快速更正一些重复的错误。熟练地使用快捷键，按照个人的习惯来定制编辑环境，可以大大地减少鼠标点击以及界面切换的时间，使得编辑的过程更加流畅自然。

思维模式的转变十分重要，译后编辑不是从零开始的翻译，而是诊断和修复。高效的编辑者可以很快浏览机器译文，根据经验迅速判断出语序不当、词义选择错误、形态分析错误等错误类型。他们会先去解决妨碍理解的“硬伤”，而不是在无关紧要的同义词替换上浪费太多时间。提高对某个引擎所犯错误的模式敏感性有利于发现和解决问题。

有效的源文预处理可以事半功倍。在翻译之前，对原文中容易造成机器误译的模糊表达、长难句进行简化或者拆分，可以从源头提高机器翻译的质量，减轻后期编辑的工作量。另外，要同项目负责人、客户进行充分的沟通，确定质量标准，防止由于理解上的差异造成无效劳动或者返工，这也是提高整体效率的重要环节。

三、人机协同翻译的未来趋势

伴随着人工智能的迅速发展，人机协同的概念内涵和外延也正在被重新定义。

未来的翻译工作不再是人和机器简单地接力，而会是深度融合、动态交互的共生关系。译员的角色、能力要求、整个行业的道德规范都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一）AI 在翻译中的深度介入

人工智能对于翻译流程的介入，将比现有的任何机器翻译引擎都多，并且是以更加深入、更加广泛的方式进行融合。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交互式、自适应机器翻译的出现。这时人工智能就不是生成一个一次性、静态的译文了，而是会随着译员的修改而学习。当译员对某个词或者短语做出修改的时候，系统能立刻理解他的偏好，将这个修改立即应用到以后的相似的句段当中去，实现即时学习、即时应用。这样的动态交流会大幅度削减重复修改，使人机协作更加紧密、有效。

人工智能将充当智能翻译助手，它在翻译全过程都起作用。译前人工智能可以对文本进行分析，标记出关键词、易混淆的地方、文化差异的地方，提醒译员注意。翻译时不仅给出翻译建议，还可以帮背景资料查询、给多风格建议和文本摘要等。大型语言模型的发展进一步促进了这种趋势，不仅能翻译，还能解释翻译的原因，比较不同的翻译方法的好坏，甚至可以按照指令对译文进行某种风格的改写，把正式的政务语体改成通俗的新闻语体。

基于人工智能的质量评价工具在翻译完成之后会越来越成熟。可以模拟人的感知，在流畅度、准确性、风格一致性等各个方面对译文评分，自动标记出需要人工校改的段落，让人工审稿人员把精力集中在最需要修改的部分。从而可以进一步提高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水平和效率。

（二）译员角色的转变

技术进一步介入必然引起译员身份的变化。以语言转换为主的传统翻译工匠形象逐渐弱化，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多元化的、有战略性的语言专家。未来蒙汉译员会从繁重的案头工作里部分解脱出来，转而从事更加宏观、更加有附加值的工作。

译员将更多的成为技术管理者、模型训练师。他们要明白怎样挑选，调配并改善翻译技术，还能就某个政务或者新闻翻译任务规划出最合适的人机合作 workflow。每一次高质量的译后编辑都是给人工智能模型提供最好的训练数据。因此译员所具有的语言知识与判断力，会通过数据反馈的方式，直接对人工智能翻译能力的改进过程起作用。

与此同时译员作为文化沟通的桥梁以及最后的质量把控人也越发明显。机器

可以处理语言表面的形式，但是不能达到深层次的文化内涵、意识形态和情感色彩。保证政治正确性，传达微妙的外交辞令，解决文化敏感问题等，这些全部依靠人的经验与判断完成的活儿，将会成为译员的核心竞争力。译员的角色会从生产者转变为审阅者、解释者、决策者，工作重心也会从语言转换本身转向沟通效果以及最终文本的质量。

（三）伦理与规范的探讨

人机协同翻译模式的流行，就政务、新闻这些敏感领域而言，引发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伦理和规范问题。数据安全与隐私保护属于最根本的关注之处。政务文件中常常会包含敏感的、涉密的信息，使用商业在线翻译引擎时，这些数据是否会收集、存储或者用作他途？怎样保证数据在传输、处理过程中不泄露？因此，就必须要有严格的数据管理协议以及可信的技术架构。

其次就是算法偏倚、责任分配问题。机器翻译模型的好坏取决于训练它的语料。如果语料本身就存在偏见，比如意识形态偏见、文化刻板印象等，模型就会学习到这些偏见，并放大这些偏见，这对于政务翻译和新闻翻译都是很大的风险。当机器翻译造成政治或者法律后果的重大错误的时候，应当由谁来承担责任？是人工智能开发者，还是人工智能服务商，又或者是译后编辑者？明确的责任分担以及问责制度，对行业健康的发展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行业应该创建适应新技术环境的职业伦理与标准。制定合理的译后编辑计酬标准，认可译后编辑工作的专业价值，不能把其简单地看作校对。应该提倡透明度原则，在适当的时候告诉最终用户文本生成过程中是否使用了机器翻译。为蒙汉人机协同翻译制定出质量评价标准、工作指南以及最佳实践，可以规范市场行为，保证各方权益，促进这个新领域健康的发展。

第四节 效率与质量的平衡

从应用翻译学角度来讲，技术赋能对蒙汉翻译领域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在时效性要求较高的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过程中更是如此。技术工具的加入使传统的翻译生产方式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但是它所带来的效率革命和潜在的质量风险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的平衡关系。本节研究怎样在这两方面取得动态平衡，保证翻译产出既能够满足速度要求，又可以保证和提高专业水准。

一、技术工具对效率的提升

以机器翻译、计算机辅助翻译等为代表的工具集给蒙汉翻译带来效率上的空前提升。提高是全方位的，不单体现在翻译速度、项目周期、经济成本上，更重要的是重新塑造了翻译工作组织方式以及交付能力。

（一）翻译速度的量化分析

技术工具提高翻译速度的效果是直观的、可以度量的。在传统的手工翻译里，一名专业的蒙汉译员每天可以翻译的政务、新闻稿件大概只有几千字，并且受文本难易、译者状态的影响。通过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译员可以利用其术语库、翻译记忆库的功能去快速复制已经完成的翻译成果，无需对一些高频词汇和重复句式进行再次的翻译。据有关统计显示，熟练使用辅助工具的翻译人员的翻译速度要比不熟练的快 30% 到 50% 以上。

使用机器翻译加译后编辑模式的效率也最高。尽管机器翻译的初始输出质量参差不齐，但针对结构固定、语言程式化的政务公文或者信息简报来说，它可以很快地生成基础译文。译员的角色由从零开始创作变成了修正润色，工作重心也转向修正重要的错误、调整语序、美化表达。在这种模式下，译员一天的处理量是传统模式的几倍甚至几十倍，这就很大程度上满足了新闻稿“第一时间”发布、政务信息快速传递的急迫性需求。

（二）项目周期的缩短

翻译项目周期缩短，就是效率提高的直接表现。大型或者紧急的蒙汉翻译项目，比如政府工作报告，大型会议文件，突发新闻报道等，技术工具的协同功能就显得非常重要。云端计算机辅助翻译系统能让许多的翻译员，审稿员以及项目经理们可以共处同一个工作平台之上一起开展工作，并可共享同一份翻译记忆库，术语库以及项目的进度数据。并行工作流彻底打破传统串行模式下一人译完、另一人再审的时间壁垒。

项目管理者可以实时地把任务分配下去，译员可以随时知道其它协作人员对共享句段的翻译情况，从而避免了不一致。审校工作甚至可以和翻译同步进行，形成流畅的一条龙生产线。对于需要迅速响应的蒙汉新闻翻译来说，就意味着从原文获取到译文发布的时间可以缩短到几十分钟，给信息跨语言传播创造了宝贵的时机。项目周期缩短既提升服务能力建设，又是信息时代竞争。

（三）成本的降低

效率的提升势必会导致成本结构的改善。翻译成本主要是由人力资源所造成，即译员和审校人员的工作时间。技术工具提高人均产出，直接减少完成某项翻译任务所耗费的总工时，从而大大降低主要的人力成本。对有大量蒙汉政务文件互译需求，而预算有限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来说，可以在有限的经费内完成更多的翻译工作，或者可以维持常态化的信息发布成本更低。

技术投入虽然会带来一定的软件购置、系统部署和人员培训费用，但是从长远来看，这是一项回报率很高的投资。良好的、持续更新的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属于重要的数字资产，使用频率越高，其价值就越大。不单可以节省项目后期直接翻译的开支，还可以使术语标准化而产生后期审校和修改方面的隐性节约，从而大大提高其成本效益。依靠规模效应，机构可以以较低的成本去处理大量的蒙汉文内容，从而达到资源的最佳配置。

二、技术工具对质量的潜在影响

技术给蒙汉翻译带来效率红利的同时，也给蒙汉翻译质量提出了新的要求。这并不是工具本身的固有缺陷，而是使用者对它的功能边界存在误解、对其内在局限性视而不见造成的。不够警惕就会造成防范技术被滥用，进而出现翻译质量隐性下滑、从而引起信息传递不正确或者失效等不良现象。

（一）过度依赖导致的惰性思维

当翻译工具，尤其是机器翻译提供的方案越来越方便的时候，译员就容易产生一种认知惰性。对于机器生成的看似通顺的译文，译员只对表面层次的修改做出回应，即纠正明显的语法错误或者错别字，而不会对译文背后更深层次的语义、语用、文化含义进行追问。这样的心态会使译员逐渐失去对原文进行主动分析、积极探究最佳表达的思辨能力。

惰性思维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中的危害尤其大。政务文本用词严谨，一个词语的微小差别都会影响到政策解释的准确性；新闻标题翻译要兼顾创意，力求达到信、达、雅的效果。如果译员过分依赖技术，就很难去研究某个蒙古语政策术语在中文中最合适的对应词，也不会去费心地把生动的蒙古语新闻标题转化成中文读者习惯的表达。

长期如此，译员就只能沦为机器化的校对员，而其最为重要的跨文化转换能

力也随之被消磨殆尽。这种思维上的懒惰不仅会影响单个翻译任务的质量，还会阻碍译员自身的发展，甚至会对整个行业专业水平造成下滑的影响，最终导致翻译产品机械、僵硬、缺乏生命力。

（二）“翻译腔”的产生与固化

“翻译腔”是译文在词汇、语法等语言层面上不自觉地模仿源语言结构，造成表达生硬、不自然、不地道。技术工具，特别是没有针对特定领域语料进行优化的通用机器翻译引擎，是产生翻译腔的温床。当机器翻译系统处理蒙语（主宾谓）和汉语（主谓宾）这两种语序和形态差别很大的语言时，很容易产生带有源语言结构痕迹的翻译结果。

蒙古语中复杂的状语前置、多层从句结构，处理不当就容易使译文冗长累赘、逻辑不清，读起来佶屈聱牙。译员在译后编辑时，如果只是对机器输出的框架进行修修补补，而没有大刀阔斧地重组句子结构，那么这种不自然的“翻译腔”就会固定下来。具体表现为：即：

1. 滥用长句和欧式句法，不符现代汉语，特别是新闻语言所追求的简洁明快风格。
2. 对蒙古语中某些高频词汇进行生硬直译，未能找到中文中功能对等的自然表达。
3. 语篇衔接方式直接照搬原文，使得译文逻辑流转不符中文读者的阅读习惯。

大量带有“翻译腔”的译文在高效生产后发布出去，又会对“标准”译文产生误读，进而形成恶性循环。特别是政务、新闻领域里不自然语言会减弱文本的权威性以及可读性，极大地影响信息的有效传达。

（三）创造性翻译能力的削弱

政务和新闻翻译不只是个信息转换过程，其中包含着很多创造。政务文本中的宣传口号、会议主题，新闻文本中的标题、导语、评论等，都会对译员的创造性翻译能力，也就是“译创”能力，提出较高的要求。这就需要译员真正懂得原文的精神实质，并能很好地利用目标语言的文化和修辞手段，进行自由甚至颠覆性的再创造。

技术工具特别是主流的机器翻译，本质上就是基于概率模型的模式匹配、重组。可以快速处理固定的、高重复的、不需要灵感、幽默感和文化洞察力的创造

性翻译任务。机器翻译系统可以翻译出“一带一路”字面上的意思，但很难创作出既有意境又有深意的宣传语如“丝路新语”。

如果译员一直处在以编辑机器输出为主的工作模式中，那么对于复杂的修辞、文化移植和语言再创新等，由于缺少锻炼，其能力会慢慢衰退。他们往往在已有的文本框架内寻找安全的，字面对应翻译的办法来避免承担过大的创造风险。对于需要体现微妙政治立场、引发情感共鸣、塑造正面舆论的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来说，无疑就是核心能力的丧失。

技术工具在蒙汉翻译中带来的效率提升与潜在质量风险，总结如下表所示。

蒙汉翻译中技术工具的效率与质量影响对比

影响维度	效率提升（积极影响）	质量风险（潜在负面影响）
翻译速度	显著提高产出，满足时效性	（间接风险：译员过度依赖，降低精译能力）
项目周期	大幅缩短，支持协同工作	（无直接负面影响）
经济成本	降低人力投入，实现规模效益	（无直接负面影响）
译员思维	（无直接积极影响）	认知惰性，放弃深层语义探索
语言风格	（无直接积极影响）	产生“翻译腔”，表达生硬不自然
创造能力	（无直接积极影响）	削弱“译创”能力，趋于字面翻译

三、实现效率与质量平衡的策略

面对技术带来的影响，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实践者应该以积极主动的态度，在利用好效率提高的同时，建立起有效的质量保证体系。其基本思想就是从被动适应技术转变为主动驾驭技术，建立人机配合的最佳工作模式，把技术变成提高质量的辅助而不是障碍。

（一）合理选择与组合技术工具

实现效率与质量的平衡第一步就是根据不同的翻译任务、文本类型选择搭配使用翻译技术工具，而不是“一刀切”。不存在适用于所有场合的最佳工具，只有适合于某一种场景的多种工具组合。内容重复、对于句式结构基本一致的常规政府公报、数据报告等，可以优先使用定制化机器翻译加专业译后编辑的方式来提高效率。核心就是“定制化”，即用高质量的平行语料对机器翻译引擎进行专门的训练，使机器翻译引擎更好地适应特定领域的术语和文风。

对语言更灵活、时效性更强的新闻稿件或者涉及复杂法律和政策解释的政务文件，以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为主，充分发挥其翻译记忆、术语管理和质量检查

的功能，而将机器翻译作为辅助参考，不能直接用作基础译文。译员可以依照自己的喜好自由选择是否采纳机器翻译的提议，从而维持对翻译工作本身的掌控以及思辨能力。应该形成动态、开放的工具体系，把语料库检索工具、术语提取工具等整合进来，给译员全方位的技术支持，而不能只局限于效率工具。

（二）强化人工审校的核心地位

在人机协作的翻译流程中，人的作用，尤其是审校人员的核心地位，不但没有被削弱，反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技术可以解决大部分重复性、模式性的问题，但是最终的质量把关，特别是语言准确性、文体得体性、文化适应性、政治敏感性的判断，必须依靠有经验的人类专家来完成。审校不仅仅是找错误，更是对译文进行再创作。

审校人员一般都拥有比普通译员更高层次的语言素养，知识面也更广一些。可以有效地识别并清除翻译腔，使生硬的句子变为汉语般的自然流畅的表达；需要对蒙汉双语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了如指掌，以保证译文不单单是字面意思的传达，还要准确地体现原文的语用含义和情感色彩。重要政务文件和新闻评论必须实行双重审校甚至多重审校。

因此机构要加大高级审校人才的培养和投入，完善审校标准和流程，赋予审校环节足够的时间和权重。审校人员反馈的信息要被系统地利用起来，不断地改进翻译记忆库、术语库、机器翻译引擎，从而形成一个质量提升的闭环。依靠强化人工审校这个“最后防线”，可以有效地抵消技术应用所造成的质量风险。

（三）建立人机结合的质量控制流程

效率和质量平衡的根本保证，是设计并执行一个科学、系统的质量控制流程，其中人机结合的质量控制流程的实施就显得尤为重要。应贯穿整个翻译项目全流程，在项目准备阶段、翻译执行阶段和译后评价阶段环环相扣，把技术工具和人智慧结合起来。理想的流程一般包括如下几个重要的阶段：

1. 项目准备与预处理阶段：在翻译开始前，对原文做深入分析，提取重要术语，并对源文本中会阻碍机器翻译的复杂结构做适当的预编辑。根据项目的特性，准备好或者更新相关的翻译记忆库、术语库以及机器翻译模型。

2. 人机协同执行阶段，按照事先确定的策略（译后编辑、辅助翻译等），用技术平台完成翻译工作。平台应该具备交流的方便性，让团队成员可以随时就疑难问题进行交流。

3. 多层次审校和质控阶段：初译完成后就进入审校阶段。第一轮校对由资深译员或者专职审校来完成，主要是检查语言是否准确、流畅。对高风险文本要加第二轮校订，领域专家或者目标语母语专家来做审校，重点看专业内容对不对，文化适应性好不好，文体风格合不合适。

4. 反馈与迭代优化阶段：审校时发现的典型错误和更好的表达，应该及时录入到翻译记忆库及术语库中。针对机器翻译的系统性错误，就整理成案例，给下一轮引擎模型训练用。经过这样不断反馈的循环之后，整个翻译系统质量就会呈螺旋式上升。

建立这样的一个标准化、可操作的质量控制流程之后，就能在充分利用技术带来高效率的同时，将质量风险降到最低，从而在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的“快”与“好”之间取得理想的平衡。

第九章 翻译人才培养与教学实践

在全球化时代以及区域合作愈发密切的大背景下，蒙汉翻译对于中国与蒙古国、中国境内蒙古族地区的连接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尤其在政务、新闻翻译领域，由于其政策性、时效性、社会影响大，对译员的要求也越来越高。本章以应用翻译学视角为出发点，对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进行研究，从新时代翻译人才需要具备的核心能力入手，设计出一套科学系统的课程体系，为培养高素质的蒙汉翻译专业人才提供理论指导和实践方法。

第一节 能力要求与课程设计

蒙汉政务及新闻翻译人才培育属于一项系统工程，首要任务是确定从业者应该具备的必备能力。课程设计要紧紧围绕这些能力要求来进行，保证教学内容同市场需求准确对接，从而培养出理论扎实、实践能力较强的复合型、应用型高级翻译人才。

一、新时代蒙汉翻译人才的核心能力

信息技术飞速发展、国际交流愈加频繁之际，蒙汉翻译，特别是政务、新闻这类翻译，早已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问题。这就要求译者不仅是一个语言的转换者，更应该是一个集各种智慧于一身的专家，能对繁杂的信息做出准确的快速的判断，在跨文化的环境中进行有效的沟通。新时代蒙古族和汉族翻译人才核心能力要素见下表：

蒙汉翻译人才核心能力要素表

核心能力	主要内涵	具体体现
扎实双语语言功底	掌握蒙汉语言规则与用法，理解语域语体差异	精准把握公文庄重性，新闻简洁性；灵活转换蒙汉句法
深厚蒙汉文化素养	了解蒙汉历史、宗教、习俗、思维、价值观	理解政务话语背景，新闻文化预设，进行跨文化阐释
专业翻译技能与策略	掌握翻译宏观策略与微观技巧，灵活运用	归化/异化策略，增译/减译，词句转换，长定语拆解，新闻标题处理
熟练技术工具应用能力	掌握现代翻译技术，提升效率与准确性	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使用，术语/语料库管理，机器翻译及译后编辑，桌面排版与项目管理

（一）扎实的双语语言功底

扎实的双语语言能力是蒙汉翻译人才的立身之本。译者不仅要掌握蒙古语和汉语的常规词汇、语法规则，还要对两种语言在不同语域、语体下细微的差别有深刻的认识。政务文本译者要把握公文语体的庄重性、严谨性、规范性，熟知其中特有的术语体系和表达范式，知晓官方文件中固定搭配以及法律法规里严密的逻辑。对于新闻文本，译者需要对新闻语言的简洁性、时效性、感染力有敏锐的捕捉能力，能够驾驭各种文体的标题、导语、正文。

蒙汉两种语言的句法结构、表达习惯有很大差别，蒙古语长句居多，汉语则偏爱短句，这就对译者提出了很高的语言转换重组能力的要求。政务、新闻领域里的很多概念、表述都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及文化负担，稍有疏忽就可能造成信息失真或者引起误解。所以理想的译者不仅要“懂”语言，更要“精”语言，在两种语言系统之间自如转换，真正做到信、达、雅。这样的功底，靠的是长期的阅读、比较、分析和实践累积而成。

（二）深厚的蒙汉文化素养

翻译本质上属于跨文化交流行为，政务文本以及新闻类文本更是如此，一般都会包含着一种文化价值取向或者意识形态。因此深厚的蒙汉文化素养是优秀的译者所必须具备的素质。译者不能只是语言的搬运工，更应该是文化的阐释者、沟通者。这就需要译者对蒙古民族和中华民族的历史渊源、宗教信仰、社会习俗、思维模式、价值观念等有较深的认识。

在翻译政务文本时，译者要理解两种政治文化背景的差异，准确把握官方话语体系中蕴含的治理理念、政策意图。例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话语体系中的很

多表述,直接翻译成蒙古语时很难找到完全对应的词汇,需要译者在理解其含义的基础上进行解释性或适应性的翻译。新闻翻译要求译者对于社会热点、文化事件要敏感。译者要判断源语新闻中的文化预设信息是否会引发目标语读者的误解,进而采取合适的办法进行弥补或修正,保证新闻信息在跨文化传播中具有可接受性与影响力。没有文化素养的翻译语言虽然正确但是文化隔阂依然存在,会造成生硬、空洞甚至反面的后果。

（三）专业的翻译技能与策略

掌握了专业的翻译技能、策略以后才能把双语能力和文化素养转化为高质量的译文。这既牵涉到宏观的翻译策略选择,也牵涉到微观的翻译技巧运用。政务性较强的文本,译者一般采用以目标语规范为主、符合官方文件文体标准和目标语读者接受习惯的归化方式。在对外宣传、展示文化特色新闻报道中会使用异化策略来保留源语文化独特的韵味。

从具体的操作上来说,译者要掌握增译、减译、词类转换、句式转换、合并、拆分等种种办法。由于蒙汉语态表达方式的不同,被动语态的转换就成了比较常见也比较重要的技巧。政务文本中经常出现的长定语结构,在翻译的时候需要拆解重组,使它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新闻标题的翻译难度最大,译者要使用提炼、浓缩、套译等手段,在有限的字数里传达出新闻的主要信息,从而抓住读者。这些技能和策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根据翻译的文本类型、翻译的目的、读者对象做出灵活的综合判断后才能加以运用。就是这些能力,才使专业译者与一般双语者之间存在本质的区别。

（四）熟练的技术工具应用能力

信息时代的到来彻底改变了翻译行业的生态,掌握现代翻译技术工具已经成为蒙汉翻译人才不可缺少的必备能力。技术的使用大大提高了翻译工作的速度和准确性,对大量的重复性政务类、新闻类文本来说,效果更加明显。

因此,现代译者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方面的技术应用能力:

1. 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的使用。译者需要熟悉 Trados、memoQ 等主流的计算机辅助翻译软件,合理利用翻译记忆库、术语库等各项功能,可以保证政务文件里重要术语、固定表达的一致性,也可以大大提高新闻稿件翻译的效率。

2. 术语管理、语料库创建能力。因为政务、新闻领域的专业性,译者要能创建丰富蒙汉双语术语库和专题语料库,给翻译工作提供坚实的数据库支持。

3. 机器翻译以及译后编辑。由于人工智能的迅猛发展，机器翻译水平也越来越高。译者要具备评判机器翻译译文质量并快速对其进行修改润色的能力，以最大程度地发挥人机结合的优势。

4. 桌面排版以及项目管理软件的简单操作。掌握桌面排版软件 and 项目管理流程，译者可以很快地融入到现代翻译的工作流程中来，从翻译到交付一气呵成。

二、面向市场的课程体系设计

按照上述要求培养蒙汉翻译人才，就必须建立面向市场、结构合理、内容科学的课程体系。该体系要抛弃传统的“语言+文学”模式，而要创建一种以应用为导向，把语言、文化、理论、技术和实践融合起来的教学结构。

（一）基础课程：语言、文化、理论

基础课程是学生知识体系和专业素养的基石，为后面专业技能的训练打下基础。该模块课程设置要深广结合，保证学生在开始专业学习之前，就已经掌握了足够的基本功。除了传统的“高级蒙古语”、“高级汉语”等课程之外，还应该开设“蒙汉语言对比与翻译”、“语篇分析”等课程，使学生从词汇语法差异入手，进一步到语篇结构、逻辑思维的对比中去体会语言。

文化模块课程不能只是泛泛的文化概况介绍，应该开设“蒙汉社会与文化专题”、“跨文化交际”等课程。这些课程需要根据政务和新闻翻译的实际需要，就两国或地区政治体制、法律体系、媒介生态、国民心态等深层次的文化问题进行专题讨论，使学生对翻译活动所处的宏观社会文化环境有清晰的认识。

翻译理论课对提高学生思辨能力、专业自觉有重要的作用。教学内容要以功能主义翻译理论、描述性翻译研究、语料库翻译学等应用翻译学流派为主。理论学习的目的在于使学生认识到翻译活动的意义和目的，用理论来指导翻译实践，从而使得翻译策略的选择更加合理，而不仅仅是语言层面的机械转换。理论学习应当同案例分析结合起来，引导学生探究真实政务翻译和新闻翻译案例如其背后的原理。

（二）核心课程：笔译技巧、文体翻译

核心课程是培养学生成为专业翻译实践者的主要课程，它直接影响学生将来就业的竞争力。本模块的课程应以实践为导向，将政务、新闻这两种主要的文体作为训练的重点，开展系统的、集中的技能训练。所开课程有蒙汉笔译基础、政

务文本翻译、新闻编译与翻译等。

政务文本翻译课教学内容要涵盖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外交辞令、国际条约、白皮书、官方网站信息等各种公文。教学活动要以文本的文体特征、术语规范、套语格式为依托,依靠大量的对译练习和模拟翻译项目,使学生熟练掌握处理这类文本的方法。教师要引导学生分析各种政务文体预期的功能以及受众对象,再决定采用什么样的翻译方法。

“新闻编译与翻译”这门课是培养学生的快节奏、高强度的新闻工作能力。教学内容可以是通讯社电讯、报刊社论、深度报道、新闻发布会口译稿整理等。课程训练学生快速获取信息、提炼新闻标题、改写导语、处理新闻稿件里带有文化负担的词汇和背景资料的能力。编译训练十分重要,学生不仅要翻译,还要对信息进行筛选、重组、再创造,按照目标媒体的定位和读者的需求进行编辑,这是一种比单纯的翻译更深一层的能力。

（三）拓展课程：翻译技术、项目管理

数字化时代,拓展课程是对学生能力结构的一种补充和完善,也是对学生市场适应性的提升。本模块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学生跟上行业发展的最新趋势,掌握现代翻译工作所必需的辅助技能。课程设置要有前瞻性、实用性,主要设置翻译技术和应用、翻译项目管理。

“翻译技术与应用”课要讲授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原理和高级应用技巧,比如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的创建、管理和共享,机器翻译引擎的训练和译后编辑策略,还有语料库工具在翻译研究中的一些应用,比如提取术语、分析搭配等。课应该以实践为主,保证每个学生可以独立完成使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翻译任务。“翻译项目管理”这门课是培养学生组织协调能力、商业意识的课程。教学内容要包括翻译项目全过程的内容,即:

1. 项目启动阶段的客户沟通、报价与任务分析。
2. 项目执行阶段的团队组建、任务分配、进度控制与质量保证。
3. 项目收尾阶段的译文审校、排版、交付与客户反馈处理。

通过模拟真实的商业环境下的项目运作,使学生能够了解翻译作为一项商业服务的全部过程,为今后独立执业或在翻译公司里从事管理工作打下基础。

三、课程模块的整合与优化

成功的课程体系不单单要科学合理地进行模块划分，还需要各个模块之间有机整合以及不断优化。打破课程之间的壁垒，创建开放、动态、协同的教育系统，使知识传授和技能培养形成互相促进、螺旋上升的良性闭环。

（一）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结合

理论同实践脱离，是翻译教学中长久以来的痼疾。为了达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融合，课程体系必须一直包含实践性教学。这可以采取多种形式来完成。比如将翻译理论课和文体翻译课配套开设，在理论课学习完功能目的论之后，立即在实践课上分析并翻译一份具有明确宣传目的的政府白皮书，从而实现理论对实践决策的有效指导。

项目式学习是一种有效的途径。可以模拟真实的翻译公司运作模式，以小组为单位承接校内外政府部门、新闻单位、企业等的翻译项目。项目中学生要经历从客户接洽、文本分析、策略制定、分工合作、技术工具运用、译审校对到最后交稿的全过程。教师在这里起着项目经理与指导顾问的作用，给学生提供一定的引导和支撑。沉浸式的学习方式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在解决实际问题的过程中加深学生对理论知识的理解，有效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

（二）不同课程间的横向联系

课程体系是否有效，很大程度上是由各个课程模块之间的协同作用决定的。因此需要加强不同课程之间的横向联系，构建起网状的知识结构，而不是线性、孤立的知识点集合。在蒙汉语言对比课上发现的一个典型句法差异，应当立刻成为笔译技巧课上的一项训练重点。在“跨文化交际”课上讨论过的某个文化冲突案例，可以作为新闻编译课的原始素材，供学生进行跨文化改写。

创建共享教学资源库是实现横向联系的一种方式。可以创建起一个拥有高质量的双语平行语料库、术语库、典型案例库以及丰富参考书目的教学平台。不同课程的教师一起建设、使用该平台来保证各课程中的基本概念和术语的一致性。可以采用主题教学周或者跨课程工作坊形式，以某一重要的政策对外宣介翻译为主题，将各个专业学生共同参与讨论、实践，就语言、文化、技术、项目管理等各方面深入讨论，消除学科壁垒，培养综合素质能力。

（三）动态调整课程内容以适应需求

政务话语、新闻业态瞬息万变，因此，蒙汉翻译人才的培养体系也必须是自我更新的动态系统。课程内容不是固定不变的，它应当具备一种特性，即对外部环境以及社会需求变化能够产生快速的反应。

建立常态化的反馈机制十分重要，应该定时邀请行业里资历较深的外事工作者、政府部门的专家学者到学院授课或者担任兼职指导。同时建立健全毕业生就业跟踪调查制度，掌握毕业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碰到的难题和能力不足状况，把调查结果作为改进课程内容的主要参照。

教师团队要建立起学习研究工作制。鼓励教师参加翻译实践及有关的学术研究，注意蒙汉关系、国家政策、媒介技术等各方面的最新发展。社交媒体兴起的时候，官方新闻的发布形式以及语言风格也随之发生改变，所以课程内容应该及时加入有关新媒体文体翻译的相关知识和技能。只有课程体系能像生命体一样新陈代谢、吐故纳新，才能保持课程体系的先进性和有效性，源源不断地为社会培养出符合时代需要的高素质蒙汉翻译人才。动态调整的思想，就是应用翻译学中服务社会、解决问题的基本精神的具体体现。

第二节 教材编写与资源开发

运用翻译学的角度来说，翻译人才的培养不能缺少科学、完备的教材和资源。本节主要对目前蒙汉翻译教材的不足进行研究，提出新型教材的编写理念，探索开发多元化教学资源的途径，为创建适应新时代需求的政务、新闻领域蒙汉翻译教学体系提供支持。

一、蒙汉翻译教材的现状与问题

目前的蒙汉翻译教学很大程度上还是依靠已有的教材，而这些教材存在着内容老旧、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现象，不能很好地满足对具有较强针对性的政务、新闻文本翻译人才的培养需求，需要对其进行反思。

（一）现有教材的局限性分析

目前市场上流通的蒙汉翻译教材大都内容过于泛化、基础化，涵盖文学、科技、经济贸易等诸多方面。这样编写下去，教材对任何一个具体领域都难以做到

深入和广泛。对于政务、新闻等专业性较强、时效性高的文体来说，教材中所选用的语料很难体现出它们的特点、常用术语以及语用环境。练习文本大都经过简化、筛选，不是生活当中真实的原始文本，学生接触不到有挑战性的材料，很难锻炼解决复杂翻译问题的能力。

教材内容更新慢，十几年来甚至更早以前出版的教科书仍在广泛使用。语言是动态发展的，在政治、新闻等各个领域不断产生新的词汇、新的表达、新的语言形式。沿用过时的教材，学生所学的是陈旧的语言知识和翻译范例，其知识结构不能与社会发展同步。教材中有关中国政治经济的描述还停留在以前的阶段，对要求准确传达最新政策精神的政务翻译来说是非常不利的。这种滞后严重消减了教材的指导意义，教学效果也就大打折扣。

教材编排大多沿袭词、句、篇的传统模式，侧重语言层面转换技巧的讲解，很少考虑到翻译项目全过程。一本优秀的实务型翻译教材，除了传授翻译技巧，还应该涵盖译前分析、资料查询、术语管理、译后校对、客户沟通等职业翻译活动所涉及的各个方面。现有教材体系中并没有把这些职业核心素养纳入其中，致使学生虽然掌握了一定的双语转换能力，但是并没有对成为合格职业译员所需要的能力形成系统的认知和训练。

（二）理论与实践脱节现象

蒙汉翻译教材一直存在着理论和实践相脱离的问题。大部分教材在前面几章重点介绍各种翻译理论，如功能对等、目的论、阐释理论等，后面章节就转向了孤立的翻译技巧训练，两者之间缺少有机联系。理论部分常常是一种知识上的装饰，学生虽能熟练地背下来，但却不知道怎样运用这些理论去分析具体的翻译问题、作出翻译决定。缺少精心设计好的案例和练习来展示理论解决政务文本政治严肃性、新闻文本时效性等问题时所具有的强大解释力和指导力。

它还表现在实践训练真空化倾向上。教材中练习主要是抽出典型的例句或者简短段落来训练某种翻译方法，比如增词法、减词法、词类转换等。这种机械化、碎片化的练习方式，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学生对微观层面翻译技巧的掌握，但完全割裂了文本的语境、功能、目的。学生在没有上下文、没有读者、没有明确的翻译目的的环境中进行练习，这与职业翻译真实的工作环境完全不一样。真实的政务文件或者新闻报道翻译任务，需要译者有宏观的语篇分析能力、情景判断能力、风格控制能力，而这些正是现教材实践部分所没有的。

（三）缺乏针对性强的政务新闻翻译教材

政务文本和新闻文本都是很专业的文体,对这两种文本的翻译要求非常严格。政务文本承载着国家的意志、政策的导向,具有很强的政治性、政策性,对翻译有很高的政治敏感性、政策准确性、语言规范性要求,稍有不慎就会造成严重的政治后果。新闻文本重视时效性、传播力、文化适应性,翻译时要既快又准,且要被目标语读者接受。这二者之间不只是语言上的转换,同时也是不同文化以及政治语境之间的传递。

但是市场上还没有一本专门针对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系统、深入研究的教材。教师在授课时只能自己去搜集、整理政府工作报告、新闻发布会的稿件、媒体的评论等作为补充材料。这些临时性的、零散的材料虽然具有真实性、时效性,但是缺乏系统性的编排以及深入的学理分析,不能形成稳定、科学的教学体系。学生所获得的知识是零散的,不能够对某一领域翻译规律和策略有总体的认识。教材的缺失造成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教学随意、低效,是影响高层次实务型翻译人才培养的瓶颈。

二、新型教材的编写理念与原则

面对现有教材的种种弊端,开发新的蒙汉翻译教材已经迫在眉睫。新教材的编写要突破传统的框架,用新的理念来引导,以能力培养为中心,和实践紧密结合,积极接纳技术,真正为培养实务型人才服务。

（一）以学生为中心,以能力为导向

新型教材的编写要彻底打破以教师、知识传授为中心的旧观念,树立“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新理念。教材设计要顾及学习者认知特点、学习需求和职业发展趋势。教材内容不应该只是知识的简单堆积,而应该设计成一系列引导学生主动探究、合作学习、解决问题的任务和项目。设置不同阶梯的学习活动,调动学生内在的学习兴趣与动机,使学生从知识的被动接受者变为知识的主动建构者。

教材必须要以能力为主导,最终目的是培养学生翻译能力。这里的“能力”是复合的,既包括双语转换能力,也包括理解表达能力、信息技术应用能力、跨文化交际能力、项目管理能力、职业素养等。教材的每一个单元、每一个练习都应明确其培养的具体能力,用评价体系来考核这些能力的达成度。以政府工作报告摘要的翻译为任务,以本单元为单位开展资料查询、术语库建立、初稿翻译、

互相校对、版本管理等环节的活动，实现学习过程与多项职业能力的同步提升。

（二）突出应用性与实践性

实务型翻译教材生命力就在于它的应用性、实践性。新教材编写要抛弃脱离实际的空谈，实践性原则要贯穿始终。这就意味着教材内容要来源于真实的职场环境，所有的教学内容和活动都必须以解决实际翻译问题为出发点来开展。

1. 语料的真实性、典型性：选取近年的重要、有代表性的蒙汉政务文本（党代会报告、法律法规、白皮书）和新闻文本（时政新闻、深度报道、新闻评论），保证语料的鲜活度与真实性。选取语料的时候，要加上背景资料，让学生成语料的语境以及功能。

2. 任务的模拟性、综合性，教材中的练习应该由“句子翻译”变为“任务翻译”。翻译任务的设计要符合实际的工作流程，并且学生要以小组的形式去完成。例如模拟新闻机构对某政策进行报道的翻译，限定时间内完成翻译、校对、排版工作，并撰写翻译笔记，说明所采用的翻译方法。

3. 评价的多元化、过程性教材中应该包含多元化的评价方式，除了对译文质量进行评价之外，还要对翻译过程中学生的信息检索能力、团队合作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等进行评价。评价主体可以是多元的，同学互评、教师点评、行业专家评审等都可以。

这样一来，教材就变成一个模拟的翻译职场，学生在完成一项项具体任务的过程中，自然习得职业技能，从而实现从“学翻译”到“做翻译”的转变。深度实践导向可以有效地解决理论与实践的鸿沟，使学生学到的就是自己需要使用的，为以后顺利进入职场打下基础。

（三）融入最新技术成果

人工智能、大数据时代下，翻译技术对于翻译行业的冲击也越来越深。新的蒙汉翻译教材编写要正视并积极接受这种趋势，把最新的技术成果系统性地融入教学内容中。这既是技术助力教学，也是培养适应未来行业发展的学生。

教材中应设专章介绍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Trados、memoQ等）中的主流产品。在实践环节里教会学生创建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和管理项目的基本方法。不仅可以提高翻译效率，而且可以术语统一化，是职业译员的基本功。教材应当以客观辩证的态度对待目前的机器翻译以及它的发展趋势，增设专门的机器翻译译后编辑模块。学生要会评判机器翻译质量的好坏，掌握不同质量等级的译后编

辑原则和方法。对政务新闻领域来说，尤其是要培养学生对机器翻译中出现的政治术语、文化负载词等错误进行辨别和纠正的能力。

语料库技术应该被编入教材，让学生了解利用平行语料库和单语语料库来观察语言规律、检验译文搭配、解决翻译疑难，从而培养基于数据的翻译研究能力和决策能力。下表简单地罗列了常用翻译技术工具以及在教学中所侧重的方面，进而能够让学生更好地掌握相关技术。

常用翻译技术工具及其教学应用

翻译记忆库	提高翻译一致性与效率，减少重复劳动，积累语料资产
术语库	确保术语统一性与准确性，特别适用于专业领域翻译
机器翻译	提高初稿速度，作为译后编辑基础，培养识别与纠正机器错误能力
语料库	辅助语言学习、模式发现、译文验证，培养数据驱动研究能力
项目管理工具	模拟真实项目流程，培养团队协作、时间管理、质量控制能力

三、教学资源的多元化开发

一本优秀的教材是教学质量的基础，但是单一的教材无法满足现代翻译教学的需求。围绕教材，建立立体的、开放的、与时俱进的教学资源体系，是提高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教学水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应用翻译学实践性内在的客观要求。

（一）建设蒙汉翻译案例库

高质量的蒙汉译例库是达到理论实践相融互促，丰富教学内容的有效方法。案例库应该专门收录政务和新闻领域典型的翻译案例。每个案例应该包含原文、学生译文、教师译文或者权威译文、背景材料、翻译难点解析和专家评析。专家评析是案例库的灵魂，可以分析不同译本的好坏，阐明其背后所用的翻译策略选择及理论依据，把抽象的理论知识同具体的翻译实践生动地结合在一起。

案例库的形成是动态的、持续的，教师、学生都可以参与案例的搜集、整理和分析。学生通过研究案例库中丰富多样的案例，可以看到同一个翻译问题会有不同的解决方式，不同方案的利弊也一目了然。这样的学习方式比只听讲理论、单独练习要深刻得多。案例库可以是课堂讨论的资料，也可以是课后的研究课题，甚至是学生撰写学位论文的数据来源，其教学价值和学术价值是无法估量的。它很好地弥补了教材深度、广度的不足，给学生提供永不枯竭的学习资源库。

（二）开发在线课程与微课

为了克服传统课堂教学时间、空间上的局限性，满足学生个性化的、零碎的学习需求，必须要开发出相应的在线课程和微视频教学资源。完整的在线课程应该展示全部的教材内容，并且配有视频讲解、在线测试、互动论坛等，给学生提供一个灵活的自主学习平台。学生可以按照自己的进度反复观看学习，也可以在论坛上与同学、教师交流，形成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混合式学习模式。

微课是短小精悍的教学资源，在翻译教学中起着独特的作用。可以就蒙汉翻译中遇到的某一具体难题（例如某个重要政治术语的翻译，某特殊句子结构的解读，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的使用技巧等等）制作成5分钟到10分钟的微视频。这些微课直击痛点、内容集中、形式活泼，便于学生课余时间随时随地进行学习 and 复习。制作一系列有关“人类命运共同体”“新质生产力”等核心政治概念的蒙文翻译辨析微课，使学生能正确理解其含义并进行表达。这些数字资源极大丰富教学手段、提高学习效率，是传统教材有益补充和延伸。

（三）利用真实项目作为教学资源

将真实项目带进课堂，翻译教学走向应用、职业化的最高形式就是项目式学习。这就要求教学团队要积极同政府外事部门、新闻机构、翻译公司等建立合作关系，承接一些真实但不是核心的翻译项目，然后转化为教学资源。在老师的带领下，学生以组为单位完成整个项目。

1. 项目启动，按照翻译公司的运作方式来组建项目小组、确定项目经理、译员以及审校等人员的分工，在项目启动会上分析客户的需求和项目的要求。

2. 过程管理与执行，在项目实施阶段学生利用所学的知识与技术完成术语抽取、协作翻译、版本控制等工作，并按期召开项目内部会议研究项目开展过程中出现的问题。

3. 质量控制和交付：译文完成之后进行交叉审校和终审，保证译文质量达到交付要求。最后将完成的译作交给客户，得到客户的反馈。

通过亲身体验的方式获得最宝贵的实战经验，感受职业翻译工作的压力、流程和标准。提升硬技能的同时，也提高沟通协调、时间管理、质量意识等软技能。真实世界产生出来的项目资源，其教学价值是任何模拟练习都无法比拟的，也是培养出能够快速适应市场需求的高水平蒙汉翻译人才的最终途径。

第三节 实训项目与案例分析

翻译研究一直倡导理论联系实际,它的主要目的就是培养能够解决实际问题的
的高素质翻译人才。本节将从模拟实训、真实项目引入、案例教学这三个方面,
详细探究怎样创建以政务和新闻文本为重心的蒙汉翻译实践教学体系,从而全面
改进学生的职素质和综合能力。

一、模拟实训项目的设计

模拟实训是把课堂理论知识同以后的工作实际联系起来的重要纽带。它创建
出一种受控的仿真环境,使学生在其中感受实际工作中面临的压力和挑战,进而
系统掌握某个领域里的翻译技巧,为顺利走入职场打下坚实基础。

(一) 政务翻译模拟工作坊

政务翻译模拟工作坊目的在于使学生做事严谨,政治敏锐,语言规范。工作
坊模拟政府外事或宣传部门的翻译流程,把学生分成翻译组、审校组、质控组。
选用的文本材料全部是真实的政府工作报告、政策法规文件、领导人致辞和对外
宣传材料的蒙汉双语版。模拟时教师担任客户或者项目经理的角色,对交付的时
间、质量有严格的要求。学生不但要保证信息的准确性,还要去体会文本背后的
政治意图、文化语境,力求译文风格、语气、格式等同官方文本一致。只有经过
高强度模拟训练,学生才会感到政务翻译工作存在的巨大责任和压力,进而掌握
相应翻译技巧和规范,为以后职业生涯打好良好的专业基础。

(二) 新闻翻译速递演练

新闻翻译速递演练主要是培养学生在快速高效率的新闻环境下,从事蒙汉新
闻编译的能力。模拟新闻编辑部的运作方式,要求学生在极短的时间内将突发新
闻、时事评论或者深度报道翻译出来并发布出去。本次演练的主要目的就是提高
学生抓取核心信息的能力、标题编译的技巧、在跨文化语境下重组信息的能力。
演练流程一般有:

1. 实时获取蒙古语新闻源,并快速判定它的新闻价值。
2. 限定时间内完成核心内容的翻译、编辑和摘要撰写,比如三十分钟内完成。
3. 模拟新闻发布的过程,写出符合中文读者阅读习惯的导语和标题。
4. 进行译后反思,比较分析不同的译文在信息传递效率、传播效果方面所存

在的差别。准实战化的演练既可以检验学生的语言转换速度，也可以提高他们的新闻敏感性和作为信息中介的职业意识。

（三）翻译项目全流程模拟

翻译项目全流程模拟是一种综合性很强的实训方式，它把政务文本的严谨性同新闻文本的时效性结合在一起，目的在于让学生经历一个翻译项目的全部生命阶段。模拟项目所选任务一般都比较比较大，周期比较长，如一本城市宣传画册、一次文化交流活动的系列报道、一部纪录片字幕翻译等。学生要成立项目小组，参与到项目启动时的需求客户分析、术语库创建、技术工具选取之中，在项目开展期间分担合作、译审同步、版本把控，在项目结束时展开质量评定、文件递交并做项目总结，全程投入项目的每个部分。在此过程中，教师的角色转变为顾问，协助学生解决项目管理过程中可能遇到的沟通、技术、质量问题。这种综合演练极大地提高了学生的实践操作水平，更重要的是提高了学生的项目管理、团队合作、风险控制等职业素养。

二、真实项目的引入与管理

将真实的翻译项目带入课堂，就是应用翻译学教学理念的直接反映。这既能够给学生给予宝贵的实践操作经历，又是检验教学成果的一种方式，进而达成人才培养同社会需求的无缝衔接。

（一）与政府、媒体机构合作

同地方政府部门和主流媒体机构建立并保持稳定的合作关系，是取得真实的翻译项目资源的根本保证。翻译专业院校可以同当地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外事办公室、新闻办公室以及报社、广播电视台等建立战略伙伴关系。通过协议来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把这些机构日常或者项目性的蒙汉翻译需求转变成宝贵的教学资源。合作模式无疑是双赢的，教学单位可以获得源源不断的真语料和实践机会，学生的译作也有机会被实际采用，从而获得巨大的成就感，合作方可以以较低的成本获得高质量的翻译服务，同时为将来储备优秀的语言服务人才。因此加强产学研合作成为培养应用型蒙汉翻译人才的必然选择。

（二）学生在教师指导下承接真实翻译任务

学生在承接真实翻译任务的时候，一定要在教师严格地指导和监督之下。这时教师的角色从知识的传授者变为项目的管理者和监督者。项目开始前教师要对

任务的难易程度、工作量、周期进行综合评定,并且对小组成员及学生个人任务进行合理的分配。项目执行过程中,教师要定时召开项目会议,了解翻译进展,及时帮忙解决学生碰到的困难,还要引进同行评审制度,让学生彼此之间互相审校,共同提高。

教师指导的重点就是引导学生养成职业化的工作态度,按时交译稿、与团队成员及时沟通协调、妥善保管翻译文件和术语资料、用专业态度对待客户的反馈和修改意见。

采用“师傅带徒弟”式的指导模式,学生在实践中学习怎样处理工作场景中出现的各种复杂情况,责任心、沟通能力、抗压能力都将得到有效锻炼,从而完成从学生到准职业译者的关键转变。

（三）项目成果的评价与反馈

对于实际项目的成果评价与反馈是保证教学质量、促进学生发展的环节。评价体系应该多样化、过程化,不能只看最终的译文质量。评价主体为委托方即客户、指导教师、项目团队内部人员。客户的反馈是判断项目是否成功最标准的尺度,客户满意程度直接体现着项目的成果。教师的评价更加全面,在考查语言转换是否准确流畅的基础上,还会对学生项目管理、团队协作、技术使用、职业态度等各方面进行评价。团队内部互评有助于团队成员互相学习、互相反省。反馈不可小觑,学生拿到的客户修改意见,老师给出的专业点评,都要引导学生好好交流,一起找出问题所在,吸取教训。公开发表或者被采纳的优秀译文可以作为教学成果进行展示,也可以计入学生的实践档案,作为求职的有力证明。

三、案例教学法在翻译课堂的应用

案例教学法通过对有代表性意义的翻译案例进行剖析,可以极大地调动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能力,也可以把抽象的翻译理论知识与具体的翻译实践操作有效结合起来。

（一）典型案例的选择与解析

在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教学当中,典型案例的选取要遵照代表性、针对性、启发性这三项准则。案例库中要包含各种文本题材,不同难易程度的文本题材,这样才能全方位的体现翻译过程中出现的常见问题及解决办法。

典型翻译案例类型与示例

案例类型	示例（蒙汉翻译）	分析要点
政治术语误译 / 不统一	“人类命运共同体”、“新发展理念”等核心概念的不同译本及其政治影响	语境敏感性、政治导向、词语约定俗成
文化负载词处理不当	“那达慕”、“敖包”等蒙古族特有民俗、历史、宗教词汇的翻译策略	归化与异化选择、文化内涵保留、目标读者接受度
新闻标题编译优劣对比	同一新闻事件蒙汉不同标题，从吸引力、信息概括度、价值导向对比	信息凝练、文化偏好、传播效果、受众定位
长难句结构转换失败	蒙语黏着语与汉语意合语特点差异，导致逻辑混乱或信息丢失	句式调整、逻辑重构、信息完整性、表达流畅性

正如上表所列，教师在讲解案例的时候，除了给出原文以及各种译本之外，还要给予详尽的背景信息，促使学生可以从文本功能、读者对象、传播目的等各个角度，对译文实施全方位的评判。

（二）引导学生进行批判性思考

案例教学的精髓就是培养学生的批判性思维，而不是被动地接受老师给出的标准答案。教师在蒙汉翻译课堂上要当启发者、组织者。教师可以向学生提出如下的问题，这个译文优缺点分别是什么？”、“译者做这样的选择考虑因素是？当目标读者是政府官员而不是普通民众的时候，翻译的方法上又应该如何调整？除了上述处理方式，还有没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等问题。这些问题使学生质疑权威、挑战已有的译本，从语言、文化、政治等各个角度考察翻译决策的合理性。这样有利于打破学生的非黑即白的思维定势，认识到翻译是权衡、选择的过程，从而培养学生独立思考问题、形成自己方法论和翻译观的能力。

（三）组织课堂讨论与方案设计

以个人独立思考为依托，组织好课堂讨论、集体方案设计，这是提高案例教学效果的重要环节。教师可把学生分成若干小组，就某一个复杂的翻译案例展开讨论或者辩论。就一份有关敏感话题的政府声明而言，各小组可以分别扮演政府发言人、外媒记者等不同立场的角色，各自提交并阐述自己的翻译方案。角色扮演式的讨论，可以让学生对翻译活动背后的各种利益诉求有更深刻的认识。

讨论以后可以由各个小组合作拟定一份完整的翻译方案。方案不能只包含最终的译文，还应该对原文的深入分析、翻译目的的确定、主要翻译方法的选择、重要术语的处理方法、译后校对和质控标准等内容。

不仅可以提升学生的口头表达能力、协作意识,而且模拟出专业翻译工作中方案论证、集体决策的过程,使零碎的思想形成连贯的解决策略,达到知识内化的目的。

第四节 评估与反馈机制

科学的评估与反馈是提高蒙汉政务新闻翻译人才培养质量的重要部分,它存在于教学的始终,给教学改进给予着长久的动力和明确的方向。一套好的评价体系不仅能检验学习成果,还能指引学习过程,激发学生内在的潜力。

一、形成性评估与终结性评估相结合

把过程性监控同终点性检验有机融合起来,就能全方位,动态地体现出学生的学习进程以及翻译能力的发展轨迹,从而有效地防止单一评价方式所导致的片面性。此种方式重视结果,也重视过程,使评估真正成为促进学生发展、促进教学改进的手段。

(一) 平时作业与课堂表现的考核

形成性评价重在对学生的日常学习行为加以关注。平时作业是对学生对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中某一知识点、某项技能掌握程度的检测。作业内容要紧紧贴合政务文本的严肃性、规范性,以及新闻文本的时效性、可读性,可选取近期的政府公告、政策解读、新闻通稿、深度报道等进行翻译。教师批改作业时不能只给一个分数,而应该对学生使用的术语、句法转换、文体把握等给予具体、建设性的批注。这样细密的反馈可以使得学生立即发现并改正错误,进而巩固所学知识。

课堂表现的评价看学生参与程度,思辨能力,合作意识。应用型翻译教学不能只是教师一人独角戏。组织小组讨论、模拟新闻发布会现场口译、译文互评等活动,可以很好地观察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沟通协作的能力。学生所提问题、对于别人译文的分析评论等都是其理论掌握和实践能力的直接体现。把它们表现出来并加以考核,有益于促使学生由被动接收转为自主学习,进而营造出积极探究的学术气氛,养成未来译者必须具备的批判性思考和合作意识。

（二）期末综合能力测试

终结性评价是教学周期结束时的总结性检测，主要形式是期末综合能力测试，目的是全面考查学生一学期以来积累的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综合能力。测试设计要体现应用翻译学的核心思想，也就是知识和技能在真实或者模拟的职业环境中实际应用。因此，测试不能只考查孤立的词汇、句子的翻译，而必须以完整的语篇作为测试材料。

测试材料的选择十分重要，必须具有代表性和挑战性。政务文本可以选择政府工作报告、法律法规条文或者对外宣传白皮书中的节选，主要考查学生对于蒙汉两种语言官方语体的驾驭能力、对专业术语的准确掌握和对文本背后政治含义的理解。新闻文本可以选择时事报道、财经分析或者文化特稿，主要考察学生快速获取信息、适应不同的文体、在忠实的基础上做必要的变通与创造的灵活性。

测试形式也要尽可能多样化，以全面地考查学生的能力。除了传统的笔试之外，还可以加入视译、编译等更贴近于实际工作场景的考核方式。可以要求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把一段蒙古语新闻视频的主要内容用汉语编成一篇简短的新闻稿。在试卷中增加翻译难点及策略应用的简述题，考查学生的翻译实践能力和翻译策略意识、元认知能力，是判断学生是否具有专业译者潜质的重要标准。

（三）实习实践成果的评定

实习实践是课堂学习和职业之间的桥梁，它的成果评价是判断学生是否具有准职业译者能力的最直接依据。为了保证评价的公平有效，就必须建立一套系统的评价标准。评价内容不应只看学生提交的翻译成果，而应该包含整个实习过程中的表现。评定体系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建立，详见下表。

实习实践成果评定维度表

评定维度	核心考察点	主要评价来源
翻译任务质量	信息准确性、语言流畅度、文体恰当性、是否满足客户/单位要求；对政务、新闻文本的政治敏感性和时效性的把握。	校内外导师、实习单位负责人
职业素养与协作	工作态度、时间管理、沟通协调能力、翻译技术工具应用、抗压与解决问题的能力。	实习单位鉴定反馈、导师观察
实习报告与反思	对实习工作的系统梳理、对典型翻译案例的深入分析、对自身优劣势的清醒认知、对未来职业发展的规划。	学生实习报告、总结答辩

用上述的各个方面来综合评定,就可以给每一位学生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评价结果不但是对学生实习成果的肯定,更是未来求职中的一份有力的证明。

二、多元化的评估主体

引入多方参与的评价模式,可以克服只有教师作为唯一的评价者所带来的弊端,使评价更客观、全面,也可以促进学生主体意识的觉醒。多元化的评价主体结构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对学生们给予反馈,让他们可以更加清楚地了解自己,找到改进的方向。

(一) 教师评价、学生自评与互评

在多元评价体系当中,教师的评价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不过其角色由原来的“唯一审判者”变成了“专业的引领者和组织者”。教师用自己专业知识和教学经验,对学生翻译的作品以及学习活动做深入、系统的分析,并给出专业的指导意见。教师评价重学术性、规范性,目的是培养学生扎实的语言基本功和正确的翻译观。

学生自评是培养反思能力、主体意识的重要途径。在教师的指导下,学生需要学习用评价标准(如译文质量评估量表)来检查自己的作业和项目成果。学生在自评的时候不得不面对自身的不足,思考错误的原因,主动寻找解决的办法。学生翻译完政府工作报告之后,可以自行检查其中政策术语译译、长句处理不当、语气过于口语化等问题。内化的审视过程是学习者从不自觉走向自觉、从他律走向自律的关键一步。

学生互评有利于形成一个有活力的互动式学习社群。通过匿名或者实名的译稿互审,学生可以从别人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看到解决同一问题的多种思路,在评判别人作品的过程中锻炼自身的批判性思维和分析能力。看到同学的新闻标题处理比自己更精妙的时候,就会激发模仿学习的动力;而发现自己的译文和别人犯了类似的错误时,就会加深对该知识点的警惕。更重要的是学生要学习怎么提出有建设性的、有理有据的批评意见,这同样是一项很重要的职业沟通技能。教师在其中的作用是制定出具体的互评规则,并对互评活动进行监督和指导,保证互评活动的顺利开展。

(二) 行业专家与客户评价

把行业专家和最终用户(客户)的评价融入到体系当中,这是在应用翻译人

才培养模式下出现的一个明显特点，保证了教学内容同市场需求实现有效衔接。来自一线行业人员的反馈，其真实性、权威性是课堂内无法比拟的，能给学生带来课堂内所不能达到的深刻认识。

行业专家评价，可以请政府外事部门、新闻单位、大型翻译公司等资深译员或者审校专家，以兼职导师或者课程顾问的形式参与进来。可以进入课程设计、案例研讨、毕业设计或者实习成果评审的环节中。而这些专家评判学生译文的标准反而更加实际，重视译文的“可用性”，政务译文同官方口径、行文规范完全吻合吗？新闻译文能否准确地抓住新闻的要点，并快速引起读者的注意？他们的评价一针见血，能够使学生很快明晰学术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差别，进而调整学习重心。

客户评价是衡量翻译服务质量好坏最直接的标准。有些项目式的教学或者真实的翻译任务，学生的作品会被直接交给客户使用。客户的正面或者负面意见，都是很宝贵的教学资源。政府部门客户的意见可以是，某种译法虽然语言上正确，但不符合它的内部惯例；新闻客户端用户的抱怨可以是某篇译稿的标题晦涩难懂、缺乏吸引力。这些来自于真实应用场景的反馈，能够使学生充分认识到翻译是种跨文化交际服务，译者不仅要对接源语文本负责，还要对目标语境下读者、使用者负责。把这些评价系统地收集、整理后反馈给学生，其产生的冲击力与教育意义绝不是教师在课堂上说教所能替代的。

三、建立有效的教学反馈闭环

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教学相长。只有建立起从信息收集、数据分析到教学调整的闭环系统，才能够给人才发展目标的不断完善提供制度保证。闭环由此形成，使得评价既不是单纯的打分定论，也不是无动于衷的被动机制，而成了推动教学改革强有力的动力。

（一）定期收集学生对教学的意见

建立畅通的师生沟通渠道是反馈闭环的开始。学生的意见和建议是教学效果的一面最直接的镜子。教学管理部门应当建立起并实施学生反馈的常态化机制，而不能只是依靠学期末一次的教学评价。这些机制要多样化，以适应不同性格、习惯的学生。

例如可以采用线上匿名问卷的形式，在期中期末定期收集学生对课程内容、教学方法、考核方式、教材选择等各方面的量化评分和质性意见，匿名性有利于

学生更自由、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还可以定期举办小型学生座谈会或者焦点小组讨论,由教学负责人或者第三方(如教学督导)主持,就某个特定的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以发现问卷所不能触及的深层次原因。开设课程专用的在线论坛或者即时通讯群组,使学生可以随时提出自己的问题和建议。最重要的是学校和教师必须重视学生的反馈,对于学生提出的问题要给予及时的回应,让学生感到自己的声音被倾听、被尊重,从而形成良性沟通的文化。

(二) 分析评估数据以改进教学

学生作业成绩、考试分数、实习评定、自评互评记录、教学反馈意见等各类评估数据本身就如同一座金矿。对这些数据进行系统的、科学的分析,是实现教学精准改进的前提。这项分析工作由教师、教研室乃至学院等不同层次来完成,从而多角度发现问题、总结规律。

数据分析可以从多个维度展开:

1. 共性问题分析,通过对学生作业、试卷的分析,找到高频错误点,从而确定教学中薄弱环节。如果大量学生对中国特色政治词汇的翻译感到困难,那么教师在以后的教学中应该加强对这些词汇背景知识、标准译法的讲解和训练。

2. 个体差异分析:跟踪每一位学生的学业轨迹和成绩波动,可以找到个别学生的学习困难或者特殊才能,进而实行因材施教,给予个性化的学业指导。

3. 相关性分析,探究不同的课程成绩之间,或者理论学习与实践表现之间是否存在相关性。如果翻译理论课程成绩好的学生在实践中并没有表现出相应的优势,那么就需要反思理论教学是否脱离了实际,并调整教学方法,促进理论向实践的有效转化。

分析得出的结论要变成具体的教学改进举措。教师根据数据分析结果对教学大纲进行修改、更新教学案例、采用新的教学方法或者改变考核方式。以证据为基础的教学改进,比凭感觉、拍脑袋的调整要科学有效得多,是反馈闭环中承上启下的关键一环。

(三) 跟踪毕业生发展以优化培养方案

反馈闭环的终点,也是新一轮优化的起点,就是对毕业生职业发展的长期跟踪。毕业生职业成就及工作表现,才是评判人才培养方案是否成功、是否符合社会需求的最终标准。对实践性很强的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专业来说,建立完善的毕业生跟踪调查体系尤为重要。

跟踪调查可以采用多种途径，一方面可以采用问卷调查、电话访问、建立校友网络社群等方法，直接从毕业生那里获取第一手资料。调查内容要包含就业领域、工作岗位、工资水平、母校培养方案的评价、在校学生学习的建议等。另一方面要积极走访用人单位，听取雇主对毕业生的综合评价。雇主可以从市场需求的角度出发，明确地指出毕业生知识结构、能力素质方面的欠缺之处，比如缺乏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传播规律的认识，缺少跨部门沟通协作的能力。来自产业前沿的信息是完善课程设置、修订培养目标的依据。对这些长程反馈信息加以系统地整合、分析，据此对整个培养方案实行周期性的审视与修订，就会使蒙汉政务与新闻翻译人才的培养紧跟时代发展、同步行业需求，真正形成一个动态的、开放的、自我完善的良性生态。

第十章 结论与展望

本章是在前九章论述的基础上,从应用翻译学的角度对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课题进行考察。本章主要针对研究过程中所得到的主要发现进行整理,从理论及实践两方面总结出其主要贡献,并对以后的研究方向做出展望,希望能够对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与实践操作起到一定的借鉴作用。

第一节 主要研究发现总结

本文以应用翻译学理论框架为基础,在大量蒙汉政务、新闻翻译实例分析的基础上,发现了很多具有现实意义的规律和见解。这些发现不仅可以加深对蒙汉翻译的特殊性的理解,也可以给改进翻译实践、提高翻译质量提供系统的方法和思路。

一、关于应用翻译学理论指导价值的发现

本研究证明,把应用翻译学理论作为蒙汉政务及新闻翻译的指导思想,给蒙汉政务及新闻翻译提供了一个超越语言转换的宏观方法论。它把翻译当作有目的的跨文化交际,它的主要价值就是突出翻译活动解决问题的指向。在蒙汉翻译中这就意味着译者要先确定文本的预期功能以及目标读者,而不是一味追求一个“忠实”。政务文件翻译应准确传达政策信息,体现其权威性,新闻文本更重视信息的时效性、可读性。

利用目的论、译者行为理论等主要概念,研究角度由过去的静态文本比较转为现在的动态翻译过程。通过对翻译活动各方面的互动关系、社会文化语境的制约、翻译规范的作用进行分析,本文发现蒙汉翻译决策背后存在复杂的动因。译者不再是语言转换的隐形工具,而是积极的主导者,译文最终的形式是由译者的知识结构、文化背景、职业素养决定的。

视角的转变给蒙汉翻译质量的评价提供更加多元、动态的标准。质量的评判

不单单是语言层面的对等，更看重译文在目的语境中能否达到预期的功能。语言虽有差别但可以清楚传达信息的译本，其应用价值要远远大于一字不差但是难以理解的译本。因此应用翻译学为蒙汉翻译的实践和教学指明了更为务实、易操作的原则。

二、关于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核心规律的发现

通过对海量语料的分析，得出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翻译所遵从的一系列规律，这些规律体现了某种文本类型的语言组合的共性。规律的发现有利于译者更好的把握翻译的重点和难点，提高翻译的专业水平。

政务文本翻译的核心规律就是保证政治等效、语体对等。蒙汉两种语言的政治术语体系、公文惯用语和行文风格存在很大差别。根据研究发现成功的政务翻译并不是依靠静态的术语库来完成的，而是依靠动态更新的表达范式。以带有一定政治含义的词为例，在翻译这些词的时候，必须采用官方发布并加以规范的译名来保证政策传达严肃且一致。同时译文在语体上要再现源文本的庄重、严谨、权威，不能使用口语化或者随意的表达方式。这不仅需要译者有很好的双语能力，还需要译者有很好的政治素质和很强的政策理解能力。

新闻文本翻译的规律是“时效性”与“文化适应性”的动态平衡。新闻的生命是速度，因此蒙汉新闻互译常常要求在短时间内完成信息传递，这就自然地形成了对简洁、明快的语言风格的偏好。研究表明译者在处理新闻标题和导语的时候会使用灵活的编译方法，提炼核心信息，重组句式等等来适应目标新闻媒体的风格。

从文化适应性角度出发，由于蒙汉读者的背景知识不同，直译一些文化负载词或者背景信息会造成理解困难。因此，翻译过程中经常会有一些隐性的增益，也就是在不改变事实本身的情况下，适当补充必要的解释，或者用目标读者更易于理解的概念来替换原有的概念，从而让新闻信息顺利跨越文化界限。这体现出新闻翻译是以读者为重，把传播效果作为准则的。

三、关于文化因素处理策略的发现

蒙汉翻译就是两种文化之间的深度对话。在富含文化信息的政务与新闻文本中，对文化因素的处理是决定翻译成败的因素。本文系统地归纳了在不同的翻译

目的下，处理文化负载词与文化意象的有效策略，并且强调策略选择要具有很高的灵活性和目的性。

研究发现译者在处理文化差异的时候，一般会依照文本的功能、受众的接受程度和传播的目的，在异化和归化的两极间寻找最合适的点。这些方法不是相互排斥的，相反是互相配合的工具箱。具体的文化因素处理策略以及应用场景如下表所示：

蒙汉翻译中文化因素处理策略表

策略名称	主要应用场景	核心目标与效果
解释性直译	政府白皮书、深度新闻报道等希望促进文化交流的文本	直译加注，保留源语文化本真性，增进读者对异质文化的理解。
功能对等归化	注重可读性的大众新闻报道、信息传递型文本	寻找功能对等的表达（如俗语替换），保证信息流畅生动。
文化形象重塑	涉及民族情感、价值观念的敏感报道	创造性地调整或重组文化意象，避免文化误读或情感冲突。

从上表可以知道，译者会依照语境的需要选择具有文化本真性解释性直译、追求数码信息流畅功能对等归化的译法或规避文化冲突的形象重塑。此种选择策略完全表现出译者在跨文化沟通、协调过程中所具有的能动性，决策核心即是对文化敏感度的把握以及跨文化交流技巧的熟练使用。

四、关于技术工具应用模式的发现

信息化时代大环境之下，由于技术工具的使用，蒙汉翻译的生态环境产生了根本性改变。本文就人机协同模式下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的应用路径进行研究，既重视技术提高效率和保证质量的作用，也指出新模式下译者角色的转变。

研究表明，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特别是翻译记忆库和术语库，对于程式化特征比较明显的政务文本翻译，具有明显优势。建立、维护好一个高质量的蒙汉双语术语库可以保证政治术语、机构名称、法律条款等翻译的一致性和准确性，避免重复劳动，大大提高大型翻译项目合作的效率。翻译记忆库有助于保持相似句式、段落风格的一致性，从而保证政务文本一贯的严谨性。

对于时效性要求非常高的新闻翻译来说，“机器翻译+译后编辑”的模式越来越受到重视。机器翻译可以快速地生成初稿，给译者节省出宝贵的时间。译者的工作重心也由“从零开始”的翻译转变为对机器译文的审校、润色和优化。在

此种模式下对译者素养的要求也发生了变化，除了需要有传统的扎实翻译能力之外，还要具备快速辨别并纠正机器翻译错误的能力，尤其是文化、政治等深层次方面的错误还依靠人的判断和干预。

语料库技术给蒙汉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数据驱动的研究范式。经由创建并检索蒙汉平行语料库，译者可以观察到词汇所处的实际语境、搭配习气以及文体特点，进而作出更为地道、精确的翻译选择。大数据的研究让翻译规律的探索不再只是依靠个人经验，有了更加客观、科学的实证支持。因此译者的角色正由原来的传统的语言工匠向集语言专家、技术能手、知识管理者为一体的复合型人才加速转变。

第二节 理论贡献与实践意义

本文从应用翻译学的宏观视角出发，以蒙汉政务与新闻文本为研究对象，用细致入微的案例分析及深刻的思考，在理论方面有所建树，在实践方面也有很重要的指导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是对已有翻译理论的补充和拓展，丰富了翻译理论在某个特定语境下的应用，给翻译学科的理论体系增添了新的生机，还创建起具有针对性的分析工具。

（一）丰富了应用翻译学在特定语对和领域的研究

本文用翻译学的研究范式来研究蒙汉翻译这个具体领域，从而大大拓展了翻译学的研究范围。长期以来，应用翻译学的研究重心大都集中于主流语言或者通用文本类型上，对于蒙古语和汉语这两个有着悠久交往历史、但在语言结构、文化背景上存在较大差异的语对来说，特别是在政务、新闻这样的高度敏感且功能性、专业性极强的领域，其翻译问题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深入的探讨。本文通过对大量真实语料的分析，发现蒙汉特殊语对在政务新闻语境下的翻译规律、制约因素和特殊现象，并且将普适的翻译理论与地方翻译实践相结合。既检验了应用翻译学核心理论阐释某一领域是否有效，又发展了该理论本身，在非通用语言、专业领域实证资料与视角下得到充实，给其它语言和领域下的翻译研究提供示范。

研究结果冲破了以往蒙汉翻译研究大都停留在经验总结、语言微观对比的局限之中,并把它的层次提升到了应用学科理论的高度,增加了学界对翻译活动复杂性的认识。

研究的另一大贡献就是强调翻译研究具有服务现实需要的“应用”价值。把研究视角从单一的语言转换问题扩展到翻译活动所牵涉的社会、文化、政治等各个方面,探究译者在复杂跨文化交际环境中的主体性以及决策过程。通过对政务文本权威性传递、新闻文本时效性和导向性功能的分析,本文对政务和新闻文本翻译中的翻译目的论、功能对等理论的应用以及需要进行的调整做了具体的说明。这种关注具体问题、以解决现实困顿为目标的研究方式,本身就是对应用翻译学精神的最好实践,为应用翻译学的理论增添了更多源自实践、指导实践的鲜活内容,使应用翻译学的理论根基更加牢固,更具生命力。此种研究途径也给学界提供了一种范式,即如何把宏大的理论叙述与具体的翻译行为结合起来,从而产生出有解释力并且能付诸实践的学术成果。

（二）构建了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系统性理论框架

本研究最核心的理论贡献之一,就是给蒙汉政务和新闻翻译塑造起一个多元、系统的理论分析框架。这个框架把文本类型学,功能翻译理论,话语分析,跨文化交际这些理论资源融合起来,希望对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内部机理和复杂样态展开全面剖析。不是对已有理论的堆砌,而是在熟悉了蒙汉语言文化的特点之后进行的有机整合与重新构造,以此达到准确的解答某些领域的翻译问题的目的。该框架把翻译当作动态的、多方参与的交际活动,提倡从文本功能、交际目的、受众期待、社会文化语境等诸多方面全面考虑翻译决策。

本理论架构有三个互相联系的层次:宏观社会功能层、中观语篇构建层、微观语言转换层。宏观方面重在论述政务、新闻文本在蒙汉两种社会文化中所起的首要作用,政务文本的政策传达与形象构建功能,新闻文本的信息传递与舆论引导功能,翻译活动应当服务于这些首要功能。中观层面使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对源文本以及译文的篇章结构、信息焦点、语气态度等展开分析,探究如何经由有效的语篇重组,让译文更合乎目标语读者的阅读习气和接受心理,从而达成信息的顺畅流动。微观层面就是具体研究术语的统一、长句的翻译、修辞格的转换、文化负载词的翻译策略等语言转换技巧来保证语言表达的准确和得体。

三层联动的系统性框架,给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的分析与评判赋予了整体视角,

应用翻译学视阈下的蒙汉翻译研究：以政务、新闻文本为中心

冲破了传统翻译研究里“忠实”和“通顺”的二元对立，把翻译质量评判的标准放到更广阔、更立体的坐标系当中。依靠这个框架，研究者与实践者可以对翻译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实施系统的诊治，从各个层面找到解决的办法。既填补了蒙汉语域翻译理论研究的空白，又给类似的多功能文本跨语言转换研究提供了一个普适性的理论模型，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它把翻译研究从静态的文本比较引向动态翻译行为的系统解释，加深了人们对翻译本质的认识。

（三）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翻译质量评估模型

在此基础上，笔者又进一步提炼出蒙汉政务新闻翻译适用的、具有针对性并且可操作的翻译质量评价模型。传统的翻译质量评价标准比较宽泛，不能很好地符合某个领域文本的特殊需求。政务、新闻文本因为政策性强、时效性高、影响力大，对它的翻译质量评价必须更加细致、多维。本研究提出的评价模型，力图弥补这一不足，把抽象的“质量”概念具体化为一系列可以观测、可以测量的指标。

该评估模型主要围绕下表所示的几个核心维度构建：

蒙汉政务新闻翻译质量评估模型维度表

核心维度	主要评估内容
政治与信息准确度	衡量译文是否精准传达源文本的政策信息、事实数据及立场态度，杜绝任何可能引发政治歧义或事实错误的表述。
功能对等度	考察译文在目标语境中是否实现了与原文相当的交际功能，如政务文件译文的权威性、新闻报道译文的可读性与信息性。
文化适切度	评价译文在处理文化负载词、典故、习语及话语风格时，是否充分考虑目标读者的文化背景与接受习惯，避免文化差异导致的沟通障碍。
语言规范与流畅度	考察译文的语言质量，包括用词的专业性、句法的合规性及行文的自然流畅度，要求译文既符合目标语规范，又易于大众理解。

给每一个维度设定具体的量化指标及权重，表中给出的模型就成为蒙汉政务新闻翻译质量管理的科学工具。既可以用于客观评价译文成品，也可以用作译者的自检清单或用于翻译教学中的作业批改和反馈。该模型的出现使翻译质量的评价从主观模糊的“感觉”走向客观清晰的“标准”，为建立规范化的翻译工作流程和翻译质量保证体系打下了理论基础，有重要的实践指导意义。

二、实践意义

本文就蒙汉翻译实践中存在的若干现实问题，给出可以被直接用于翻译工作、机构管理和人才培养的具体对策与方案。

（一）为蒙汉翻译实践提供了具体可行的策略与技巧

本文的实践价值,首先表现在给一线译者提供大量的具体的翻译策略和技巧。研究重点在蒙汉政务、新闻文本中的翻译难点上,主要有,政治术语的对等和统一、官方文件特有的程式化语言的转化、新闻标题的编译、长难句的拆分与重组,以及隐含文化信息的显化处理等等。本文并不只是空洞的理论论述,而是从大量的正反译例中总结出一套行之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政治术语来说,研究认为建立动态术语库、与权威部门沟通核实等;对于新闻标题翻译总结出增译、删译、改写等编译技巧,在简洁醒目和信息完整之间找到最合适的方法。

这些策略、技巧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实用性,可以直接运用在日常翻译实践中,使译者在做翻译的时候可以有意意识的按照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工作,最终得到科学、合理的翻译结果。译者的能动性也被提及,不同的文本功能、不同的读者,译者采取的翻译策略是不一样的,而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如政策宣讲类文本,就要突出信息的清楚表述、政策精神的正确解释;对外宣传的新闻稿,译文的吸引力以及跨文化传播的效果就更加重要。具体的指导意见像工作手册一样可以减少翻译工作的盲目性和随意性,提高翻译工作专业水平和工作效率,从而得到更加准确、地道的译文。

同时提出蒙汉翻译中应用翻译技术的建议,讨论运用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管理术语、检索语料库的方法来保证政务和新闻文本中高频词汇、固定搭配的一致性。同时研究也指出目前的机器翻译在处理蒙汉这样的结构差异大、语境高度依赖的语言对时所存在的不足,并给译后编辑提供方法上的指导。这有利于翻译人员利用现代技术,采取人机结合的方式改善工作流程,对时效性要求很高的新闻翻译行业而言更是如此。

（二）为相关机构提升翻译质量提供了参考

本文的研究成果对于从事蒙汉翻译工作各级政府机关、新闻媒体、翻译公司等单位具有很强的参考价值。这些机构是政务和新闻翻译的主要生产者和使用者,翻译质量直接影响政策能否传达、信息能否流通、对外形象能否塑造成功。本文所提出的系统理论框架及翻译质量评价模型,给这些机构创建科学化、标准化的翻译质量经营体系赋予了理论根基与实际手段。机构管理者可以按照本研究的成果来制订详细的翻译工作流程、审校标准,将质量控制贯穿到任务下达、执行、审核、发布全过程之中。

机构可以参考本文所给出的质量评估模型来创建内部译文审查制度。利用对政治准确度、功能对等度、文化适切度、语言流畅度等各个方面的量化评价来使审校工作更加客观、公正，减少由于个人主观判断而造成的质量波动。这既有利于提高单篇译稿质量，长期坚持下去还有利于形成统一的质量标杆，提升机构整体翻译水平和公信力。研究中对于蒙汉语言特点和文本类型的分析，有利于机构在招聘和分配任务时做到人岗相适，把擅长某种文本类型的译员分配到相应的岗位上，实现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对新闻机构来说，研究中关于时效性和准确性平衡的探讨，能给新闻机构在瞬息万变的新闻周期里怎样组织翻译力量、制定应急预案提供有益启示。

研究还提出译者和需求部门之间应该有密切的合作，相关机构应该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渠道，使译者遇到难题时能够和文件起草部门或者新闻采编人员沟通，从而正确地把握源文本的意图。跨部门协作模式可以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称而造成的翻译错误，是从根本上保证翻译质量的关键环节。因此本研究结论有益于有关机构冲破部门壁垒，树立“翻译是共同责任”的观念，协同努力以改善跨语言信息传播的总体效能。

（三）为翻译人才培养提供了教学改革思路

本文对蒙汉翻译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和创新有重要的启示作用。目前，大部分高校的翻译教学，尤其是蒙汉语对的翻译教学仍然存在着理论与实践相脱节、教学内容陈旧、教学方法单一等问题。本研究通过对于政务及新闻翻译实践的体会，为教学改革提供方向：应该以社会需求为导向，以提高学生实际应用能力、职业素养为主要目标，构建更加科学、高效的课程体系。

课程上打破传统基础笔译、文学翻译为主导的模式，加入政务文本翻译、新闻编辑、应用文体蒙汉双语写作等专业性较强的课程模块。课程要以真实的、鲜活的语料为依托，让学生认识政务、新闻文本语言的特征、文体的规范、功能的要求。在教学过程中可以运用本文提出的理论框架以及评价模型，使学生在实践中学会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并客观评价自己和他人的译文。这样的项目式、案例式的教学方法可以将理论知识转变为实践能力。

1. 加强实践教学环节，同政府外事部门、新闻单位等建立实习基地，在真实的职场环境中得到锻炼，直接感受翻译工作的整个过程和标准要求，缩小课堂与职场的差距。

2. 教师应该把学科前沿理论、行业最新动态融入课堂教学, 让学生掌握计算机辅助翻译技术、译后编辑、本地化等内容, 并培养学生应对技术发展能力。同时可以着手建设蒙汉政务新闻平行语料库, 为教学和研究提供重要的资源。

3. 培养跨文化综合素养, 翻译不只是语言的转换, 它还是文化的交流。在教学中注重培养学生蒙汉双语文化背景知识、提升其跨文化敏感性及思辨能力, 使学生能够承担更高层次的跨文化交流任务。

经过这样改革的培养出来的学生应该既有好的语言基础, 又有一定的专业领域的知识, 并且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一定的现代技术使用能力, 以适应国家战略和社会发展的需要。

第三节 研究局限与不足

任何一项研究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一些固有的局限性, 本研究也不例外。尽管本文用应用翻译学的视角对蒙汉政务、新闻文本的翻译实践做了比较系统的梳理和分析, 但由于客观、主观条件的限制, 样本选择、研究深度、观察角度上仍有很多不足。清晰认识坦率指出的不足, 既是治学严谨的表现, 也是给后来者相关领域研究及改进提供明确的方向。

一、研究样本的局限性

本研究的主要语料库是某个时期的蒙汉政务文本和新闻文本, 这样的选择直接限制了研究结论的适用范围。因此样本的代表性、多样性没有达到理想的状态, 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研究视野的狭隘以及结论普适性的降低。尽管政务、新闻文本在蒙汉翻译领域占据着十分重要的地位, 但如果把研究范围仅仅限定于此, 就容易忽略其它同样重要的文本类型。

文本类型的单一性是不言而喻的。政务文本语言一般庄重严肃, 句式结构比较固定, 程式化特征比较明显, 新闻文本重时效、客观、准确, 语言表达也按一定的范式。尽管这两种文本的翻译活动可以反映出应用翻译中的一些共性问题, 例如术语统一、文化负载词处理、功能对等策略等等, 但是本研究的结论不能直接推广到文学翻译、科技翻译、商务翻译甚至日常口语交流等更广泛的翻译领域。文学翻译注重审美功能、情感传达以及译者的创造, 这与政务、新闻文本翻译所

坚持的忠实、规范是有很大的不同的。因此，目前根据样本所得到的翻译策略与模式，对于审视蒙汉翻译的全貌来说，只能提供一种切片式的观察，而不能描绘出全景式的图景。

样本在时间上、地域分布上也缺少一定的代表性。本文所选取的文本主要来自于近十年的官方发布内容，虽然能够体现蒙汉翻译目前主流的实践以及最新的发展情况，但是缺少了历史维度的考察。语言及翻译现象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在不同的时代里，政治环境、社会文化语境、语言政策等等都会对翻译策略、标准造成重大的影响。如果不把历史文本纳入分析的范围里，就无法动态地表现出蒙汉政务、新闻翻译演变的过程及其背后的驱动力。样本来源地比较集中，没有充分包含各个蒙古语方言区、各个汉文化区域的翻译实践差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研究的全面性。更理想的研究设计就是建立一个规模大、时间跨度长、覆盖面广的动态语料库，从历时性和共时性两个方面进行综合分析。

二、研究深度的局限性

在应用翻译学理论框架的指导下，本文对蒙汉政务及新闻文本翻译问题进行了描述和阐释，但是对问题的挖掘仍然浅显，理论建构还需要进一步的加强。研究更侧重于总结翻译的策略、技巧和可能出现的错误，对于深层次原因以及复杂的互动机制则很少做深入的研究，理论上的运用也显得有一定的局限。

第一，对于译者的主体性并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本研究中虽有提及译者选择和决策，但没有从社会学、心理学等学科角度对译者的翻译动机、认知过程、身份建构等做深入的论述。政务与新闻文本的翻译不是简单的语言转换，在译者工作的时候会处于各种身份、各种力量的博弈之中，译者所采取的行动受到意识形态、机构规范、职业伦理等诸多方面的影响。未来研究可以使用个案研究、访谈、问卷调查等质性研究方法，更加接近真实的翻译实践情境，研究译者在具体的翻译工作中形成的思维模型以及作出的选择路径，提高研究的现实解释力。

第二，理论应用与文本分析还没有结合好。研究在翻译学理论的指导下对文本进行了分析，但是某些方面理论与语料的对话还不够充分，存在理论“贴标签”的倾向。

1. 对于具体的翻译案例的分析中，研究给出了功能目的论的解释，但是没有对目的如何确定、多重目的冲突时如何取舍等复杂的情况做出详细的论证。

2. 在翻译质量评价方面,虽然提到了应用翻译学的相关标准,但是在评价过程中更多的是使用研究者的个人主观判断,缺少了更多客观、量化数据的支持。如果能够引入读者反应测试、语料库辅助的计量分析等方法,那么结论就会更有说服力。

3. 未能对翻译所包含的社会文化因素进行深入挖掘。政务文本、新闻文本的翻译活动实际上可以看作是跨文化交际的一部分,这其中就包含了诸多的文化预设以及权力关系。本文在提及文化差异对翻译的影响时,并没有跳出更宏观的社会文化语境,去考察翻译文本是如何参与到社会话语的建构、传播与协商中的。文本选择、翻译策略偏好、译文接受,均和当时的社会文化生态存在关联。从广阔的社会背景来看待翻译行为,就是研究深化之路。

三、研究视角的局限性

本文以应用翻译学作为主要的理论视角,虽然这样可以明确研究方向、统一分析框架,但是也必然会造成观察和解释问题视角的相对狭窄。学术研究的视野好比探照灯,照亮某一区域的时候,必然会使其他地方处于阴影之中。完全依靠单一的理论视角去理解复杂的翻译现象,很容易造成对其的简化式理解,而忽视其他理论视角所能带来的丰富见解。

从学科交叉的角度来看,可以引进更多的理论视角来丰富研究的内涵。描写翻译学派主张从译本入手,重视翻译规范和翻译行为在目标文化中所处的实际状况,描写翻译学派的研究方法论对客观描述蒙汉政务、新闻翻译现状和规律有重要意义。引入描写翻译学的角度,可以将研究的重点从“应然”的翻译标准部分转移到“实然”的翻译实践上来,考察这些译文在蒙古语或汉语社会中实际上起到了什么作用,是如何被接受的,从而对翻译活动有一个更加全面的评价。另外,社会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等相关理论也能够给本课题的研究起到一定的帮助。批评话语分析专门研究语言使用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关系,将其应用到政务和新闻翻译研究中,可以深入剖析翻译活动怎样参与国家形象的建构、政策议程的安排、民族文化认同等宏大叙事当中,从而从更高的社会文化批判层面超越单纯的语技术层面。

就研究的内部逻辑来说,过分强调应用翻译学的“问题-解决”模式,容易造成研究对于翻译过程的复杂性以及动态性有所忽略。翻译不是单向的、线性的信息传递过程,而是协商、博弈、再创造的过程。认知科学中有关翻译过程的认

知研究通过眼动仪、有声思维法等实验手段，可以探究出译者在处理信息时所承担的认知负荷、注意力的分配情况以及做出决策的过程，从而给认知翻译的“黑箱”提供了微观层面上的实证依据。尽管本研究的性质不允许我们使用这些实验方法，但是在今后的研究设计中，吸收其关注过程、重视实证的思想，对于弥补目前研究的静态性、宏观性不足，将会大有可为。承认并反思当下已有的研究视角的单一性，这是促使蒙汉翻译研究朝向更加综合、立体、跨学科方向发展的必要前提。

第四节 未来研究方向建议

应用翻译学视角下的蒙汉翻译研究，在对政务、新闻等宏观文本类型进行初步了解之后，其未来发展的走向应当是从宏观描述转向微观剖析，针对特定文本内部的内在语言和文化肌理展开分析，从而获得更为具体、更具可操作性的研究成果。未来研究可以拓展研究的广度，也可以加深研究的深度。

一、深化特定文体的微观翻译研究

把握住政务、新闻等文本翻译的共性之后，未来研究应该不断深入。对某一具体次文体做微观分析，揭示出蒙汉语言转换过程中更加具体、更加深刻的规律，从而给翻译工作提供更加具有操作性的原则。

目前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政务、新闻这两种文本上，虽然这两大类具有代表性，但是其内部的异质性较强。因此，以后的研究可以进一步细化对象，专注于某一种具体的次文体类型。在政务文本内部可以分别研究法律法规、政府白皮书、外交辞令、政策解读稿的翻译；在新闻文本内部可以专门研究新闻评论、财经报道、科技动态、文化纪实等。不同文体有各自不同的语域特点、句式结构，还有自己特有的术语系统。这样一种“窄而深”的研究路径，将会促成一个更为系统完备的蒙汉特定文体翻译理论体系。

微观层面的深化研究，必须把分析的焦点放在具体的语言转换现象上。这就需要研究者使用语言学、修辞学、语用学等理论手段，对蒙汉双语文本做细致的比较。当蒙古语的黏着语特性碰到汉语的分析语特性的时候，句法重构就成为必然，语序调整、逻辑关系显化等都需要进一步研究。就政务文体中“发展”、“创

新”、“体系”等高频词汇在不同语境下蒙古语的对应词以及选择原因做专题研究；也可以研究新闻标题中修辞手法（隐喻、借代等）的跨文化转译与再创造，探索在保证信息冲击力的同时实现文化上的妥帖与接受。

不仅如此，微观的研究不能停留在对语言形式的比较上，更需要和社会文化语境联系起来分析文本所承载的功能和意图。翻译不是单纯的把一种语言的符号换成另一种语言的符号，它是社会行为的继续。因此需要对政务文本中的官方立场、礼貌原则、意识形态色彩是如何通过某些词汇、句子在译文中被再现或调适的进行研究。新闻文本的翻译研究也要考虑译者对带有特定价值判断、情感倾向的内容的处理方式，也就是译者怎样在忠实原文和迎合读者之间找到平衡。这种把语用学同跨文化交际学理论结合起来开展微观研究的方式，可以很好地体现出蒙汉翻译实践的复杂之处，促使研究由“怎样翻译”这类表层的探讨，深入到“为什么这样翻译”的层次当中去。

二、拓展蒙汉口译及其他领域翻译研究

长久以来，蒙汉翻译研究的重点放在政务、新闻文本为主的笔译上。为了使学科体系更加完备均衡，学术界应该把视野拓展至蒙汉口译以及其它同样重要的翻译领域之中，从而反映出整个蒙汉翻译活动更为全面的面貌。

蒙汉口译研究的滞后状况必须尽快改变。口译在官方会晤、商务谈判、学术论坛、司法审判等场合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沟通交流的第一线。口译过程的瞬时性、高压性，使译员的整体素质要求极高，因而成为研究领域里极有挑战性的一个课题。从认知的角度看，可以对蒙汉同传、交传译员在信息处理、记忆激活、语言转换等各方面的认知过程进行分析；从实践的角度看，可以研究新闻发布会等场合下的口译策略、笔记法运用以及非语言因素的协同作用；从教学的视角看，可以从能力培养、课程设置、评价体系三个方面来对蒙汉口译人才的培养模式进行系统的研究，为解决当前蒙汉口译人才短缺的问题提供理论支持。

除口译之外，对于其它翻译领域的研究也应给予支持。文学翻译成为两族人民心灵沟通、文化认同的桥梁，把蒙古语文学经典翻译成汉语，把当代中国的优秀作品介绍到蒙古语世界中去，其中涉及到的审美转换、意象再造、风格转译等翻译问题，都具有十分高的研究价值。同样由于经济文化交流越来越频繁，商业翻译（广告、合同、产品说明书等）和视听翻译（影视剧字幕、配音等）的

市场需求越来越大。这些领域的翻译特点、标准以及策略同政务、新闻文本相比有较大的差别，对它们展开应用性研究，不仅可以丰富翻译理论的内涵，也可以直接服务于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从而使得蒙汉翻译研究的版图更加完整。

三、加强人工智能在蒙汉翻译中的应用研究

信息科技的大潮正冲刷着翻译行业，人工智能、机器翻译的出现给蒙汉语言翻译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会和危机。未来的研究要积极面对技术变化，探究人工智能应用在蒙汉翻译当中所采用的途径与理论上的价值，以使翻译研究的范式能够得到变革。

蒙汉机器翻译属于人工智能应用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蒙古语独特的黏着语形态、丰富的格位变化和蒙汉语言对数据资源的匮乏，蒙汉机器翻译质量还有很大提升空间。今后的研究应集中于改进神经机器翻译模型，探寻契合蒙古语形态特征的子词分割算法及模型结构。可以开发出政务、新闻、法律等领域专用机器翻译引擎，并用领域自适应技术提高翻译的专业性、准确率来满足在特殊场合需要做快速翻译的需求。

人机交互又是一个不能忽视的环节，特别是译后编辑模式效能和规律的研究。以后的研究要针对蒙汉机器翻译出现的典型错误进行分析，如蒙古语格助词错译、漏译，长句翻译结构混乱等，在此基础上提出译后编辑策略。可以进行实证研究，用量化比较译后编辑模式和传统人工翻译在效率、成本、质量等各方面综合效益的方式，探究人机协作的最佳工作流程。不仅可以给翻译实践提供指导，还可以给机器翻译模型的迭代优化提供宝贵的用户端反馈。

人工智能的价值不在于翻译的自动化，而在于成为人类译者的助手。未来可重点开发的几类智能翻译辅助系统，功能和技术要点见表。

蒙汉智能翻译辅助系统构想表

系统类型	核心技术	主要功能
智能术语管理系统	自然语言处理、术语提取	自动构建并动态更新双语术语库，确保专业词汇翻译的统一性与准确性。
智能翻译质量评估系统	机器学习、质量评估算法	自动评估译文在忠实度、流畅度、术语准确性等维度的表现，辅助校对。
智能辅助写作与润色系统	大规模高质量语料库、语言模型	为译者提供丰富的句式表达和词语搭配建议，优化译文语言质量。

想要达成上述目的,跨学科的紧密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翻译学者、语言学家、计算机科学家和工程师要形成常态化的合作机制,一起攻克技术难关,保证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确实符合蒙汉翻译的语言特点和实践需求。如此深的学科交叉融合,将会成为促使蒙汉翻译研究进入新阶段的重要推动力量,有利于形成技术加持、人机共生的新式翻译研究范式。

四、开展大规模的蒙汉翻译语料库建设与应用研究

语料库是现代语言学和翻译学研究的根基,语料库的规模和质量直接影响着研究是否科学以及深度如何。长期以来由于高质量的平行语料库缺乏,导致蒙汉翻译研究受到限制。因此,大规模语料库的建设和应用研究是蒙汉翻译研究向前发展当务之急、战略要务。

未来研究的第一要务就是规划并开展大规模、跨领域的蒙汉平行语料库建设工作。该语料库应具有较好的平衡性、代表性,不能只限于现有的政务和新闻文本,而应该广泛收录文学、科技、法律、教育、日常口语等多种文体、语域的材料。数据来源要兼顾官方出版物、网络文本、转写口语资料等各个渠道,力求全方位地反映蒙汉语言使用的实际情况。建立这样的一个综合性的基础资源库,将会给之后各个方面的深入研究提供强有力的数据支撑,其战略意义十分明显。

语料库的建设不单是量的积累,更是质的提高,科学的加工与标注必不可少。未来建设工作要按照国际通用标准,对语料展开细致的对齐和多层次的标注。对齐工作可以是篇章、段落、句子,甚至短语、词语等各个层次的对齐。除词性标注、句法标注外,视研究需要还可以加命名实体识别、语义角色标注、语用标注等。一个深度加工过、标注完整的蒙汉平行语料库,会成为观察两种语言深层对比关系和翻译规律的“显微镜”,它的学术价值无法估量。

建成高质量的语料库之后,其核心就是使用。语料库的应用研究可以多方面展开。描述性翻译研究者可以用语料库数据统计分析,客观地呈现蒙汉翻译的普遍规律、常规译法以及由于语言接触所导致的动态变化。语料库可以作为翻译教学的一种强大的教学工具,用真实的案例去教会学生学习翻译的方法,培养数据驱动的翻译能力。在翻译实践当中,语料库是开发计算机辅助翻译工具(翻译记忆库、术语库)和训练机器翻译模型的宝贵数据资源,也是决定翻译技术工具性能的根本。语料库的广泛应用,将会使蒙汉翻译研究从以往的思辨式的、个案式的研究方式,转变为更加科学、客观、实证的研究范式。

参考文献

- [1] 鲍春辉.蒙汉翻译教学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3.
- [2] 金玲.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J].社科纵横, 2012.
- [3] Ningning 宁宁 Wang 王,Long 龙 Fei 飞,H. Zhang 张.基于多层次预训练策略和多任务学习的端到端蒙汉语音翻译(End-to-end Mongolian-Chinese Speech Translation Based on Multi-level Pre-training Strategies and Multi-task Learning) [J]. 2021.
- [4] 包敏娜,韩塔娜.”一带一路”背景下内蒙古蒙汉双语翻译人才需求分析及思考[J].语言产业研究, 2019:157-163.
- [5] 金玲.元朝时期权力对蒙汉翻译译者文本选择的操控[J].社科纵横, 2012(8):3.
- [6] 王治国.《格萨尔》史诗翻译之多维研究[C]//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第九次全国学术会议暨国际英汉比较与翻译研讨会.2010.
- [7] 中国工作者协会《通讯》部.翻译研究论文集[M].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84.
- [8] 任众,侯宏旭,武静,等.基于统计和神经网络的蒙汉机器翻译研究[J].中文信息学报, 2018, 32(11):7.
- [9] 黄金刚.试论街道牌匾蒙汉语翻译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为例[J].河套学院学报, 2013(04):60-62.
- [10] Zhong Ren,任众,Hongxu Hou,等.子字粒度切分在蒙汉神经机器翻译中的应用 [C]//第十七届全国计算语言学学术会议暨第六届基于自然标注大数据的自然语言处理国际学术研讨会 (CCL 2018).中国中文信息学会, 2018.
- [11] 关永华.小学语文教材中蒙汉翻译课文教学的比较研究——以通辽市科尔沁左翼中旗代力吉镇中心校为例[D].内蒙古师范大学,2020.
- [12] 鲍春辉.西北民族大学蒙学院蒙汉翻译研究生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分析[J].剑南文学: 经典教苑(下), 2012(7):2.
- [13] 宝乐尔.当代蒙汉翻译论著评介[J].民族翻译, 2008(1):7.
- [14] 黄金刚.试论街道牌匾蒙汉语翻译当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以内蒙古通辽市科尔沁区为例[J].河套学院论坛, 2013(4):3.

- [15] 斯琴.探究跨文化视角下的新闻翻译策略[J].科学中国人, 2016(4Z):1.
- [16] 金英.当代蒙古族学校教育和翻译事业关系研究[D].西北民族大学,2010.
- [17] 黎明.文化交流视角下的蒙汉翻译的重要性及翻译策略探讨[J].内蒙古教育: B, 2017(2):2.
- [18] 鲍春辉.西北民族大学蒙学院蒙汉翻译研究生培养目标及课程设置分析[J].剑南文学: 下半月, 2012, 000(007):P.113.
- [19] 刘婉婉,苏依拉,乌尼尔,等.基于LSTM的蒙汉机器翻译的研究[J].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2018, 040(010):1890-1896.
- [20] 斯琴格日乐.蒙汉双语背景下蒙古族大学生的英语学习中的迁移研究[C]//第二十五次全国少数民族双语教育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成立四十周年纪念大会.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 2019.
- [21] 同力嘎.试论文学翻译中艺术形象的再塑[D].西北民族大学[2025-12-09].
- [22] 李杰.蒙汉翻译工作在文化交流融合中的作用探讨[J].科学中国人, 2017(4Z):1.
- [23] 乌日汗.文化功能视角下的蒙汉翻译[J].青年文学家, 2013(4X):2.
- [24] 塔娜.《江格尔》汉译本的译者主体性比较研究——以乔治·斯坦纳阐释学翻译理论为视角[D].西北民族大学,2023.
- [25] 戚肖克,特尼格尔,孙媛,等.蒙汉语音翻译数据集[J].中国科学数据: 中英文网络版, 2022(002):007.
- [26] 如拉.蒙古文翻译中的文化差异分析及翻译策略探究[J].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全文版)社会科学, 2022(1):101-103.